太平洋战爭史

第二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

内部讀物

商务印書館

太平洋战爭史

第二卷　中日战爭

編　者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

譯　者

金　鋒　冷　明

孔知行　王炳达　馬君雷

內部讀物

商　务　印　書　館

1961年・北京

編輯部前言

《太平洋战争史》(共五卷)是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写的。全书記述的史实,起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止于1951年旧金山片面和約的签定这一历史时期。本卷記述的是自1936年到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这一阶段的史实。

本书第一卷中譯本已于1959年由我館翻譯出版,由新华书店发售。自本卷起改由內部发行(三、四、五各卷正在翻譯中,将陆續出版)。为使全书統一发行,第一卷再版时,亦将改由內部发行。购有第一卷的讀者,請妥为保存,不再外傳。

1960年12月

目　次

第一章　法西斯主义与人民陣綫

第一节　凡尔賽体系的瓦解

法西斯的威胁

1931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在远东地区掀起了侵略战爭的風暴。与此同时，欧洲的天空上也布滿了新的战云。公然标榜对外扩張政策的納粹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就和一向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勾結起来，共同以极端露骨的帝国主义侵略国的面目出現了。

人們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反动独裁政权称为法西斯統治。因为它是“金融資本中最反动、最排外的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一种公开的暴力独裁”（1933年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三次会議）的典型。在这个时期，这些法西斯国家以自己是“穷国”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而以凡尔賽体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現。德国本是凡尔賽体系的牺牲者，是身受严重压迫的国家；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可是对凡尔賽会議的結果是极端不滿的。另一方面，通过凡尔賽体系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的日本，自从受到相当于凡尔賽和約一环的华盛頓九国公約的約束以后，也把“旧秩序”看成是对于自己侵略中国的障碍了。

在这种情况下，凡尔賽体系的創始者“富国”和反对国之間的对立，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們常这样說，——总之不外乎，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間的对立，动摇和打破了它們之間的势力平衡。由于德、意、日是后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同时又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它們是比較脆弱的。因此在世界經济危机中受到了最深刻的打击以

后，为了摆脱危机，它們就不得不寻求最反动的途徑。

同时，反对凡尔賽体系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的特征。法西斯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是在俄国革命以后的年代里誕生的金融壟断資本主义的一种反动政治形态，也就是为了对付革命力量并把革命力量鎮压下去，以挽救資本主义危机而成立的暴力的政治形态。从法西斯标榜“反苏反共”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除了反对革命以外，并沒有任何其他目的。法西斯主义不仅鎮压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級的組織，为了維持它的統治，它甚至从人民手里剝夺資本主义制度范圍內的一切民主权利，对于人类的理智和文化也进行了野蛮的摧殘。就这样，对內摧殘民主的法西斯主义者，对外就以凶惡的帝国主义战爭的发动者的身份出現。法西斯主义者离开战爭根本不可能維持它的統治。法西斯主义不但是极端暴力的和露骨的壟断資本独裁的一种政治形态，而且，惟其如此，它必須在另一方面玩弄某种手段欺騙群众，以便騙取群众的支持。为了这个目的，法西斯主义者根据各自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欺騙性宣傳。

德国的納粹党最能巧妙地玩弄这种欺騙性宣傳，它針对着走向沒落的中間阶层的心理，許以种种諾言，把他們誆騙过来，作为它的基本群众，同时极力煽动群众的不正常的民族感情，以便把他們拖进侵略战爭。法西斯主义者为了实現这个目的，对国民实行了最彻底的統制，实現了“国民的軍队化”。这样，法西斯政权便成了压榨人民的最殘暴的政治形态。

納粹德国的侵略外交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法西斯国家走向侵略战爭的开端。納粹德国的对外攻势首先表現在重整軍备和退出国际联盟上。在这以前，从 1932 年 2 月 2 日起，国际联盟在日內瓦召开了有五十

九个国家参加的裁軍会議。正在这个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上海事件，当时抱着和平願望的世界各国人民天眞地期望着这次会議的成功。可是，由于德国要求軍备平等，引起了德、法之間的对立，会議处于擱淺状态；到了12月，終于在原則上承認了德国的要求。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凡尔賽体系的破产。接着在1933年1月，德国成立了希特勒政权；4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裁軍会議迟迟不能进展，一直到了9月，会議才通过了一項英、美、法、意四国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在大約八年內分兩期裁減軍备：在前一期，禁止德国扩充軍备并对它实行监督；在后一期，各国开始裁減軍备。但是，德国認为这是强加在自己头上的不平等措施，并譴責各国不实行裁減軍备，在以后不久的10月14日它就退出了裁軍会議和国际联盟。这就表明了納粹德国决心要摆脫国际約束，而恣意地扩充軍备。

由于德国的退出，裁軍会議在1934年6月糊里糊塗地閉幕了。德国甚至在会議进行期間就加紧扩充軍备和制造武器。世界各国人民重新受到了扩充軍备和战爭的威胁。裁軍会議失敗的責任固然在于納粹德国，但是英、法等国也应該負相当的責任。列强企圖通过扩充軍备来摆脫它們各自的經济危机；特别是英国还期望德国的武力能够成为防御共产主义的壁垒。1933年7月签訂的英法德意四国协定，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实行的对德国的讓步。不难推想，深感裁軍对自己不利的各国軍需工业資本家們，为了阻撓裁軍会議的成功，一定在幕后进行了頻繁的活动。

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以后的外交政策是：首先从东欧排除法国的势力，从而打下进攻苏联的基础。这个阴謀在波兰得到成功。波兰一向是拥护国际联盟的，它以亲法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后来随着軍人在国內的势力的扩大，在外交上表現出濃厚的反苏色彩。当波兰看到納粹德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后，就希望和德国妥协；而德

国也主張德、波两国联合，結果在 1934 年 1 月 26 日签訂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約。据說当时两国間还签訂了一項瓜分烏克兰的密約。这个条約当然要引起苏联的警惕；同时对于一向把波兰当作自己在东欧的一座要塞的法国来說，这个条約的签訂意味着法国失掉了东欧的屏障，这就使得法国逐漸向苏联靠攏。

德国在巩固了东部边界以后，立刻把矛头轉向南方，开始了合并奥地利的工作。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的第一頁写道："具有德意志民族血統的奥地利必須回到大德意志帝国来！"希特勒本人就出生于奥地利，他从"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角度一向主張德、奥合并。奥地利也由于它的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四是德意志民族，由于这种民族的、文化的关系以及經济上的需要，也希望同德国合并。但是从納粹掌握政权以后，奥地利意識到德、奥合并的結果，不管在什么意义上，都不会对奥地利有利，因此，不但奥地利的工人阶級反对合并，就連奥地利的法西斯政府也从对抗納粹的立場出发傾向于反德了。

1932 年 5 月取得奥地利政权的陶尔斐斯，在法西斯团体"护国团"的协助下，加强了他的被称为"僧侣法西斯"的独裁。陶尔斐斯的政策是：依附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他不但压迫奥地利的納粹运动，而且解散了納粹的組織；同时为了对付納粹的压力，組織了"祖国陣綫"，糾合納粹以外的所有反动势力来加强他的統治。但是，在另一方面，陶尔斐斯也压迫工人阶級，禁止共产党，对工人組織进行了殘酷的鎮压。在这种情况下，1934 年 2 月 12 日，反对鎮压的工人們，因为奥地利警察占領了林嗣社会民主党党部，在維也納以及其他各地掀起了暴动。对此，法西斯政府頒布了戒严令，并进行了彻底的鎮压。由于社会民主党領导干部的犹豫不决，暴动在牺牲一千五百名工人以后宣告失敗；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也被禁止。这样一来，反动势力越发加强，同年 5 月陶尔斐斯制定了意

大利式的新宪法，完成了法西斯体制。但是，在鎮压了进步力量以后，法西斯政府的独立却遭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它沒有任何办法可以制止納粹势力抬头。

早在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說中就暗示了合并奥地利的企图。从此以后，奥地利的納粹运动日益活跃，他們趁着工人阶級遭到鎮压的机会，在官僚和軍人中間发展了势力，終于在同年7月25日发动了政变。在維也納，一支納粹党徒在白天闖进总理官邸，刺死了陶尔斐斯总理。得到了这項消息以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立刻发出通电，声明保障奥地利独立，并且向勃倫納隘集結了五万軍队。原来，意大利很早以前就惧怕德、奥合并。因为一旦德、奥合并，意大利就要同德国接壤，这就意味着它要直接受到来自納粹德国的压力，同时，住着許多德国血統居民的意大利南卡拉亚地方，說不定会引起新的糾紛。另外，德、奥合并将堵塞意大利向中欧、巴尔干扩張的道路。在这以前，意大利为了加强它在中欧的統治地位，曾在同年3月和奥地利、匈牙利签訂了罗馬条約。据說，同年6月，希特勒为了在合并奥地利的問題上取得墨索里尼的諒解，曾到威尼斯会見过墨索里尼，但結果是失敗了。当时希特勒因为还沒有足够的准备来对付意大利，害怕局势恶化，因此采取了封鎖德奥边境、罢免駐奥納粹监察官哈比希特职务等措施，把合并奥地利的計划推迟了一步。7月28日，納粹在奥地利发动的政变被鎮压下去了，次日，舒斯尼格出任奥地利总理，并且开始了善后工作。这次事件虽然激起了各国的反德情緒，但是并未能有效地制止納粹德国的侵略。

德国兼并薩尔和重新武装

納粹德国在奥地利遭到的失敗，由于在第二年即1935年合并了薩尔而得到了弥补。盛产煤鉄的薩尔原屬德国，根据凡尔賽和

約的規定，矿权归法国，行政由国际联盟管理，并在十五年后由人民投票来决定薩尔的归屬。投票的日期是 1935 年 1 月。渴望收复这块失地的納粹，在事前向居民反复地进行了恫吓宣傳。到了同年 1 月 13 日，在英、意两国軍队执行的国际监督下举行了投票，納粹取得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票数，結果从同年 3 月 1 日起，薩尔又正式归屬于德国，并且以贖买的方式从法国手里收回了矿权。这次事件对于因凡尔賽和約而失掉土地的德国来說，是收复失地上的第一次胜利。这时，納粹德国便想乘势进一步廢除凡尔賽和約中所規定的軍事条款。

策划联合苏联，組成包圍德国陣势的法国外长巴尔都于 1934 年 10 月 9 日在馬賽遇刺以后，賴伐尔繼任了法国外长，他的外交政策是对德国妥协，疏远苏联而接近意大利，結果在 1935 年 1 月 7 日签訂了法意罗馬协定。在这項协定中，法意两国相約进行合作，来解决非洲的領土糾紛，并共同保障奥地利的独立。賴伐尔接着又到了倫敦，在 2 月 3 日发表了英法共同宣言。宣言的內容极其广泛，除了保障奥地利的独立，要求德国确認保障集体安全的必要作为德国重新武裝的条件以外，还要求德国重新回到国际联盟，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还建議締結英、法、德、意、比空軍协定（又称空軍罗加諾公約），以期在遭受空襲时能够互相援助。当时德国对于英法共同宣言只贊成其中关于締結空軍协定这一条款（因为这一条为德国重建空軍提供了口实），并且要求首先举行英德会談。德国的这种态度引起了苏联和法国的警惕，苏联并邀請英国政府首脑訪苏，可是，英国答应了德国的邀請，决定派外交大臣西門和掌璽大臣艾登訪德，并在 3 月 8 日举行英德会談。大概是由于希特勒企图在会談以前造成旣成事实，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他在 3 月 5 日突然要求英国緩期举行会談，紧接着，在 3 月 10 日，戈林宣布德国拥有空軍。到了 3 月 16 日，希特勒又以炸彈式的声

明宣布廢除凡尔賽和約中限制德国軍备的条款，并且把常备軍扩充到五十万。这表明納粹已公然走向战爭，給予了全世界以很大的震动。

对于德国重新武裝的声明，法国一方面提出抗議，一方面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訴。国际联盟定于4月18日召集理事会。3月23日，英、法、意三国在巴黎举行会商，决定4月在意大利北部斯得萊薩举行三国会談討論如何应付新的局势。但是，这时英国对德国的态度仍然傾向于妥协，在极力劝阻法国反对的情况下，仍按原定計划派外交大臣西門前往德国，于3月25—26日举行了英德会談。当时德国已看透了英国反苏的意图，便乘机强調德国重新武裝的必要，并要求拥有人数相当于英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海軍。根据这次会談的結果，在三个月后締結了英德海軍协定。当时在英国政府內部也有人——如象艾登——主張保障集体安全，并持有和政府的主流稍微不同的見解。艾登認为有必要联合苏联。英德会談以后未久，3月28日，他就到了莫斯科，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进行会談，对加强保障集体安全体系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但是，整个說来，英国对德外交政策是缺乏彻底性的，因此逐漸形成了亲德的“綏靖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意味着支持作为牵制法国势力的德国；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英国恐惧革命期望德国能同本質上和大英帝国对立的苏联以及共产主义处于敌对状态。英国的这样一种态度，在远东方面，就是期望日本的武力同苏联和中国革命势力相敌对，它用行动表明，在这种限度以內，它可以默認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这种态度在欧洲的第一个表現是，繼斯得萊薩协定之后，締結了英德海軍协定。斯得萊薩会談是1935年4月11—14日在意大利北部的斯得萊薩举行的，它的目的在于討論英、法、意三国对付德国的策略。这次会議决定支持法国向国际联盟控訴德国，保障奧地利的独立，并譴責德国片面廢弃凡尔賽和約的行动。这次

三国会談被称为斯得萊薩陣綫，并且被宣傳为反德联合陣綫的結成。然而这次会議并未明确提出对付德国的具体办法；而于次日即4月15日在日內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虽然也譴責了德国关于重新武裝的宣言，但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这就充分暴露了国际联盟的无能为力。

局势的这种变化使苏、法两国重新接近，法国佛兰亭內閣在1935年5月2日同苏联签訂了苏法互助条約。接着在5月16日，苏联又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訂了同样的互助条約。当时，苏联本来希望通过苏法互助条約的締結，使两国成为事实上的同盟者，可是法国方面的态度并沒有那样彻底，它以避免同国际联盟規約相抵触为理由，只同意把苏法互助关系作为国际联盟范圍以內的一个防卫体系。不久，賴伐尔繼任法国总理，他对法苏合作表示冷淡，故意拖延对苏法互助条約的批准。由于德、意两国因埃塞俄比亚战争而日益接近，以及国內人民陣綫的推动，直到1936年2月这个条約才获得批准。

斯得萊薩会談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希特勒曾經表示了愼重的态度，在5月21日的国会演說中，他强調了德国抱有和平的愿望，在这次演說里列举了十三項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德国海軍应为英国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方案。这次演說的精神和3月間英国外交大臣西門訪德时的主張相同，这是由于希特勒想引誘英国，以便对付苏法互助条約，击破斯得萊薩陣綫。害怕苏法联合的英国，立即同意和德国举行談判。德国的海軍代表团在6月2日到达倫敦。6月7日，英国麦克唐納內閣辭职，保守党的鮑尔溫組成了新內閣，由亲德分子霍尔繼任外交大臣，他就任不久，就在6月18日和德国代表里宾特洛甫签訂了英德海軍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德国可按英国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的比例公开拥有海軍四十二万吨。这件事情表明，英国自己破坏了斯得萊薩陣綫，背叛了保障集体安全的

原则，給侵略者开辟了道路。早在 1934 年 12 月挑起烏阿烏阿事件，开始向埃塞俄比亚进行侵略的意大利，看透了英国的这种态度，抓紧时机，在 10 月間对埃塞俄比亚展开了全面的进攻。这是繼日本侵略中国的东北之后，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个导火綫。

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亞和德国进軍萊茵

1935 年 10 月，雨季剛过，意大利为了扩大非洲殖民地，立即开始大举进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訴，国际联盟在同年 10 月 19 日通过了对意大利实行經济封鎖的决議，并决定从 11 月 18 日付諸实施。但令人奇怪的是，对意大利进行侵略战争所不可缺少的石油，却未被列入禁运項目以內。这是因为考虑到，禁运石油就意味着战争。况且世界上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家——美国又不是国际联盟的成員国，因此意大利在石油供应上并未发生絲毫困难。鋁的对意輸出受到了严禁，但鋁是意大利产量超过本国需要的几乎唯一的一种金屬(意大利的矾土——鋁的原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就这样，經过大肆宣傳的这种强硬措施，并不是眞正使侵略者癱瘓的制裁，而只是侵略者也不甚介意的、不痛不痒的制裁。实际上它反而鼓舞了意大利的士气。所以說，国际联盟是抱着决不阻碍侵略軍活动的根本态度，开始援救埃塞俄比亚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埃塞俄比亚虽然在印度、埃及、南非联邦的人民以及美国黑种人等組織的志愿軍的援助下抗击了絕对优势的敌人，但是在国际上是孤立的，首都亚的斯亚貝巴在 1936 年 6 月終于被攻陷了。意大利向全世界宣布:把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領土。

对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問題，英法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同时国际联盟也暴露了自己无能为力。希特勒抓住了这个机会，在 1936 年 3 月 7 日，以法国批准苏法互助条約为借口，宣布廢除罗

加諾公約，并且違反凡尔賽条約的規定，进軍萊茵非武装区。这是繼納粹宣布重新武装后又一次的炸弹式宣言，再一次聳动了全世界。同时，德国的进軍萊茵非武装区，加强了它在中欧的战略地位。当时英、法等参加罗加諾公約的国家，为了謀求对策，曾召集会議，但由于英国采取了对德妥协的态度，經过种种波折以后，会議終于宣告失敗。这样，作为“打破現状国家”的德国的地位巩固下来了。本来是为了約束德国和对付苏联而組成的国际組織凡尔賽体系至此完全崩潰了。这时，各国如果想要彻底制止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就必須联合日益强大的苏联。虽然这条道路本来是帝国主义者所不愿走的，同时英国露骨地为結成国联反苏包圍圈而卖力，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相互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不但削弱了联合反苏的可能性，而且逐漸使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苏联和反对德、日、意的列强之間的相互合作成为可能。这就是說，使帝国主义間的对立轉化成为建立反法西斯战綫的客观条件逐漸成熟了。

第二节　反法西斯人民陣綫

李維諾夫外交

“欧洲呀！讓我們携起手来拉成一个圈儿——一个和平的圈儿，并提防坏人破坏它！”（罗曼・罗兰）

反抗法西斯威胁，保卫民主主义，制止战爭，成了全世界人类的首要任务。

对于日益猖狂的德、日法西斯的威胁，苏联始終未抱任何幻想。譬如，苏联領导人对于希特勒的挑战性的对外政策綱領——《我的奋斗》，进行了詳尽的分析研究，这是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所作不到的。东西方的法西斯国家只有依靠鎮压民主势力，尤其是各种

工人組織，才能維持它的存在，因此，它必然要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帜。法西斯国家不仅本質上是反苏的，而且日本和德国在地理上也处于可以从东西两面直接进攻苏联的位置，所以，日本陆軍还經常把苏联当作假想敌国来进行練兵。至于希特勒不断地公开叫嚣进攻苏联，那更是人所共知的。况且法西斯国家只要把侵略的矛头指向苏联，英、美、法这些国家还有和它們妥协的一面。面对这种新的威胁，正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第一个五年計划的基础上实行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苏联，首要的任务就是制止反苏統一战綫的結成。而且，前面已經說过，随着德、日法西斯的猖狂，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这就促使帝国主义国家也向苏联接近。抓住这个机会，苏联开展了和資本主义各国調整外交关系的活动，这就是所謂李維諾夫外交。

苏联一向处在資本主义各国的包圍中，和列强在外交上几乎沒有任何来往。但从 1926 年以后，为了确保国境的安全，它先后和邻近各国締結了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約。后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陆續和更多的国家締結了互不侵犯或中立条約：在 1931 年 6 月 23 日和阿富汗，1932 年 2 月 5 日和拉脫維亚，同年 5 月 4 日和爱沙尼亚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接着又在 1932 年 7 月 20 日和波兰，11 月 29 日和法国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这就更进一步地加强了互不侵犯体系。到了次年即德国成立了納粹政权的 1933 年，苏联为了不使这些条約成为具文，認为有必要“对侵略下尽可能正确的定义，以便消除侵略者的任何借口”，因此在 1933 年 2 月 6 日的日内瓦裁軍会議上提議締結“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約”。这件事未能获得成功。后来在同年 6 月召开的倫敦世界經济会議上苏联再度提出原案，結果在 7 月 3、4 日两天內，和波兰等九个邻国签訂了“关于侵略定义的条約”。同年 11 月，由罗斯福領导的美国政府承認苏联，建立了邦交，至此，苏联的国际地位大大地提高了。

1933年的3月和10月，日本和德国先后退出国际联盟，因此国际联盟的内部构成起了很大的变化。国际联盟本来是凡尔賽体系的核心，是資本主义国家对付苏联的国际机构。由于德、日两国的退出，它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資本主义各国对抗德、日的集团。恰好就在这时候——1934年1月，德国和波兰签訂了互不侵犯条約，这就意味着波兰放弃了它一向作为法国包圍德国的一环的任务。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法国外长巴尔都极力慫恿苏联加入国际联盟；而苏联也由于德波互不侵犯条約的签訂直接受到威胁，因而表示同意。結果，在1934年9月18日国际联盟第十五次大会上决定接受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且选任苏联为常任理事国。

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可以說是苏联外交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轉变”，因为苏联一向譴責国际联盟是“資本家的联合”。然而这个轉变是从新的历史任务中必然地产生的，就是說，必須依靠各国人民的团結，来制止法西斯国家企图挑起的侵略战爭。同时，法西斯国家旣然主張摧毁凡尔賽体系，那么，“維持現状”的各国間通过国际联盟的团結，就意味着反对法西斯，从而也就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此外，前面已經說过，在1935年3月，英国掌璽大臣艾登訪問了莫斯科；同年5月，为了保障各个地区的安全，又签訂了苏法和苏捷互助条約。这样，在列强不可能結成反苏統一战綫的情况下，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統一战綫，就作为明确的任务被提出来了。

然而，由于列强的利害关系，当然也給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战綫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前面所說的，例如，法国拖延批准苏法互助条約，英国的表現在签訂英德海軍协定上面的对德“綏靖政策”，这些都使英、法两国同苏联之間的距离扩大了

共产国际的人民陣綫运动

尽管存在着这些阻碍条件，但是国际局势还是开始向建立反

法西斯陣綫的方向发展了。与此相呼应，資本主义各国的人民也認为反对法西斯的一切民主力量首先应該团結起来。这是由于发生經济危机以后，各資本主义国家都出現了法西斯化的傾向，而希特勒的暴力政治已使各国人民深切地感覚到，为了保卫民主，必須进行斗爭。特别是在法西斯势力眼看就要占統治地位的法国、西班牙等国家，以工人阶級的統一战綫为中心的一切民主力量的走向团結更显得活跃。当时在法国，民主力量的这种团結被称为“人民陣綫”(Front Populaire)。1935年6月，在巴黎召开了旨在保卫文化的国际作家会議，参加的有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界人士。会上呼吁知識界团結起来，保卫文化。这次会議加强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气氛。

这种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以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各种形式主动地建立起来的人民陣綫运动，不久就被共产国际当作策略方針确定下来，并且組織化了。

1935年7月25日到8月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这次会議被称为苏联社会主义胜利的大会，工人阶級和人民群众反对法西斯、反对战爭的統一战綫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書記季米特洛夫所作的著名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就保卫民主，反法西斯主义的統一战綫以及人民陣綫的斗爭目标，作了如下的明确規定：

“第一，必須切实地共同斗爭，把危机的后果的負担，都轉移到統治阶級的肩上，資本家、地主的肩上——一言以蔽之，轉移到有錢人的肩上。

“第二，必須共同斗爭，来抵抗各式各样的法西斯的进攻，借以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使資产阶級民主的权利免遭毁灭。

“第三，必須共同斗爭，来預防日益迫近的帝国主义战爭的危

險，要使法西斯更难准备这种战爭。"①

根据这次大会的决定，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运动便从以劳动人民日常要求为中心的最初步的抗議性运动出发，通过共产主义者采用灵活的战术，把更广大的群众、特别是把无意識地跟着法西斯走的工人吸引到运动中来。同时，大会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即：把保卫和平、反对法西斯主义作为斗爭的目标，采用有关日常发生的各种具体的政治、經济、社会問題的大众化的口号，在合法的場合或合法运动的条件下展开斗爭。

这一斗爭的能否成功，和上述各国之間能否結成反法西斯战綫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說，人类的命运，将决定于人民陣綫的成功与否。当时人民陣綫运动在世界各地开展起来，特别是在法国和西班牙，甚至建立起人民陣綫政府，而且在西班牙，法西斯和人民陣綫之間还爆发了武装斗爭，成为全世界規模的人民陣綫对法西斯主义斗爭的焦点。

法国的人民陣綫

由于世界經济危机的影响，1930年2月，在法屬印度支那的安沛地方爆发了越南民族独立运动（即所謂"安沛事件"）。这次独立运动虽然在殖民当局的殘酷鎮压下，牺牲了兩万越南人民而被平息，但是給予了法国的殖民統治以沉重的打击。世界經济危机的侵襲不仅使法国在欧洲的政治上、經济上的优越地位发生动搖，而且使法国的統治阶級也感覚到极度的不安。然而，在經济危机中受害最重的，还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层。因为資本家能用大批的解雇和降低工資等手段，把損失轉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而政府也可以采取"企业合理化"、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等措施来压低人民

①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8頁。

的生活。結果百分之六十的工人遭到失业、工資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左右（1929—1934年），而农民也因为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种生活的不安、納粹德国的威胁，以及人民对于法国政府对以上这些束手无策的不滿情緒，一方面促进了人民的激进情緒，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使“保皇党”的法兰西行动同盟（Action Francaise）和“火十字团”（Croix de Feu）等法西斯团体的势力加强了。“火十字团”是在香水大王可第、电气托拉斯大王迈尔謝等大資本家的資助下，在陆軍参謀总长魏剛和海軍軍令部长立奥地的直接支持下，由前参謀人員德·拉·魯克上校領导的。参加这一組織的，还有巴黎荷兰銀行总裁、鋼鉄委員会的昂迪尔，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下院右派議員杜美格等人。他們反对共和制，主張消灭社会党和共产党，和納粹德国合作。为了发动武裝政变，他們采用了軍队式的組織形式，并且拥有野炮、机关枪、飞机等武器，不断地进行小規模的演习和动員訓練。大体說来，法国的法西斯組織，因为沒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所以沒有采取象意大利和德国那种群众政党的形式，而采取了目的在于对工人施行恐怖手段以及发动武裝政变的武裝团体的形式。它的成員主要是一些右派学生、退伍軍人、农民和中产阶級分子，正如“火十字团”的情况所表明的，它們是直接受到軍閥、大資本家的支持的。法国統治阶級——壟断資本，为了維持它的搖搖欲墜的統治，企图利用这些法西斯团体建立起象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暴力統治。

1933年年底发生了著名的斯达維斯基案件，① 暴露了政界和

---

① 1933年末，侨居法国的一个白俄斯达維斯基利用投机手段賺得了十五亿法郎，使好几千个小資产者破产，他收买了二十七个議員及其他政客，其中包括执政党激进社会党的代表和各資产阶級政党的代表，这一件空前的大貪污案于1934年初被揭露，称为斯达維斯基案。——譯者

財界互相勾結营私舞弊的內幕，因而使民众对于老牌政党和議会大失所望。法西斯分子抓住这个机会，策划廢除議会制度，建立法西斯政权。从1934年1月起，他們就在斯达維斯基案件的参与者巴黎警察总监夏朴的公开庇护下，高喊着"打倒議会制度！""打倒小偷！"等口号，不断地在巴黎街头上鬧事，并在2月6日动員保皇党、"火十字团"及其他一切法西斯团体发动了政变。在这一天早晨，除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机关报以外，所有的报紙都协助法西斯分子，在第一版上刊登了"到宫高尔德广場去集合！"的法西斯指令。巴黎主要的車站和工厂、各重要建筑物、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会的办公处和印刷所都被法西斯分子和支持他們的警察所占据，法西斯分子并对工人阶級頒布了戒严令。次日，在法西斯分子的压力下，达拉第內閣被迫辞职，成立了法西斯临时政府，并且发布命令禁止三个人以上的集会以及言論和出版自由。但是由于遭到工人阶級的反击和軍队的反对，法西斯临时政府宣告垮台，2月9日，由杜美格組成了半法西斯性質的內閣。对此，据說"火十字团"的領导者德·拉·魯克表示热烈欢迎，他通电全国党徒說："第一个目的已經达到了"，另外，还在演說中大肆吹嘘說："法西斯主义者至迟在1934年年底以前可以掌握法国政权。"

但是，事情并沒有象法西斯主义者們預想的那样向前发展，因为在共产党領导下的法国工人阶級阻擋了他們的去路。三十年来一直为了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工資而进行了多次罢工斗争的法国工人阶級，当2月6日法西斯分子的暴动一发生，立即在共产党領导下，在当天晚上組織了反对法西斯的示威游行。到了2月9日，进一步联合了屬于社会党系統的工人，举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2月12日，又在法国总工会（C.G.T——社会党系統）和統一总工会（C.G.T.U——共产党系統）（这兩个工会組織于1936年6月在建立人民陣綫的过程中合并，一直到現在）的联合号召下，四百五

十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八十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来回击法西斯的进攻。斗爭的結果，不但使法西斯临时政府垮了台，而且基本上挫敗了法西斯主义者发动政变的企图。尽管如此，法西斯的势力仍然不容忽視。当时“火十字团”曾宣布“每个月增加新团員一万五千名”，这个数字虽然是夸大了許多，但是从2月6日政变以后，中产阶級分子加入法西斯組織的人数逐漸增多却是事实；而且掌握政权的就是支持法西斯团体并与之相勾結的、以杜美格为首的半法西斯內閣。

反对法西斯的斗爭能否成功，取决于全体工人阶級能否为反对法西斯而团結起来。自从1920年共产党和社会党兩党决裂以来，共产党曾多次地要求社会党实行合作，但都被拒絕了。尽管这样，法国共产党因鉴于德国共产党的失敗，抱定决心“不惜任何犧牲”，一定要結成統一战綫，并为此作了最大的努力。同时，德国納粹的胜利和2月6日事件等法西斯的进攻深深地教育了社会党系統的工人，因此要求結成統一战綫的呼声日益扩大了。在2月12日的大罢工中社会党所以能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因为它不能无視这种要求。在那以后，社会党的領导干部对于統一战綫并不那么热心。但是，1934年5月在吐尔滋召开的社会党大会上，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贊成派遣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以討論社会党和共产党兩党的統一行动的主張，这就表明社会党內要求兩党采取統一行动的傾向已經非常强烈。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下，社会党的領导机构終于在附带許多条件的基础上，在1934年7月27日决定和共产党結成統一战綫；并在7月29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紀念日那一天，在巴黎共同举行了示威游行。与此同时，工会的統一工作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各地兩个系統的工会組織，不顧总工会（社会党系統）領导的反对，相繼进行了合并。此外，法国的进步知識分子也一向表示反对法西斯主义，早在1934年3月12日，就有一

千名左右的知識分子成立了"知識分子反法西斯主义监察委員会",并积极展开了反法西斯的活动。这个运动在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和这种趋势相对抗,杜美格在 1934 年 10 月末举行的地方选举以前的 9 月 24 日,为了建立法西斯独裁,向議会提出了关于加强內閣总理权限的修改宪法的草案,"火十字团"等法西斯团体也大肆活动起来了。險恶的空气又籠罩了巴黎,到处流傳着"火十字团"再次举行暴动的風声。在这以前,杜美格內閣在 1934 年 2 月 15 日,通过議会获得了財政独裁权,然后以紧急总統令强行大量减低退伍軍人退職金以及公务人員、国营工矿企业職工的工資。这种通貨紧縮的措施压低了人民的生活,致使中产阶級分子也对杜美格內閣日益感到不满。另外,以工人为中心进行着頑强的反法西斯斗争;优秀的知識分子表明了反对法西斯的态度;法国人民对于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国、意大利人民所遭遇到的悲慘命运有所了解(法国法西斯一向是亲德、意的),这些情况,使中产阶級的大多数免受法西斯欺騙宣傳的蒙蔽而站到了反法西斯这一方面。这样,在10月举行地方选举的結果,共产党获得了显著的胜利;而包括右派激进社会党在內的所有右翼党派都宣告敗退。这个事实和法国共产党总書記多列士在 10 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以前,向激进社会党大会提出共同建立人民陣綫和人民陣綫政府而放弃建立苏維埃政府的口号一事,大大地影响了激进社会党。在这种影响下,激进社会党表明了反对杜美格修改宪法的态度,并从杜美格內閣中撤回了六名屬于該党的閣員,使杜美格內閣在 11 月 18 日宣告垮台,繼之成立了标榜自由主义的弗兰丹內閣。这样一来,"火十字团"就不得不暫时消声斂迹,弗兰丹也只好发表了尊重議会制度的声明。

不久,弗兰丹內閣由于壟断資本的攻击而垮台;后任的比宋內閣寿命也很短。1935 年 6 月 7 日,"火十字团"的賴伐尔繼比宋之后

組成內閣，这样一来，法西斯分子再一次大肆活动起来。賴伐尔自1934年10月9日，前外长巴尔都遇刺后即担任外长。他一方面对德国，特别是对意大利采取綏靖政策，例如：在1935年1月薩尔区举行人民投票时，他保証了納粹的胜利，对于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則采取了默許的态度；在另一方面，甚至故意拖延在他自己任內（1935年5月2日）亲自签訂的苏法互助条約的批准手續，給德国和意大利提供了有利条件。对于国內，他利用在激进社会党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財政全权委任法，强制推行通貨紧縮政策，企图把經济危机所带来的損失轉嫁到人民身上，而对于起来反抗的群众示威游行，則不惜出动宪兵和軍队加以鎮压。

然而，人民陣綫的力量又一次成功地挫敗了法西斯主义者阴謀发动政变的企图。在10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表現出激进傾向的中产阶級更加靠近了工人阶級，农民也很快地向人民陣綫靠攏了。这就使得以中产阶級和农民为基本群众的激进社会党不得不轉而支持人民陣綫。于是，在1935年7月14日，人民陣綫正式宣告成立。前述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也在这时通过了人民陣綫的战术。到了同年9月，兩大工会組織就合并問題达成了协議；次年即1936年1月10日，禁止私人团体持有武器；同年3月，兩大工会組織完成合并工作。由于这一切，人民陣綫进一步加强了。另外，在1936年1月，公布了人民陣綫的綱領，这是以对抗“二百家族”，拯救广大群众，使他們免于貧困，堵塞走向法西斯的道路以及保卫和平为目的，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实現的最低綱領。人民陣綫高举着这个綱領，同时也受到西班牙人民陣綫胜利的鼓舞，参加了大选（4月26日—5月3日），結果，获得了下院过半数的席位。这样，就在1936年6月4日成立了以社会党領袖里昂·勃魯姆为首的人民陣綫內閣（激进社会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內閣，共产党在野进行合作），并且在全国范圍的大罢工的推动下，通过了每周四十小时工

作制、集体合同签定权、工資照发休假制、改組法兰西銀行、軍需工业国有化、为救济失业而大兴土木工程、成立小麦統制局等各項法案；6月28日又頒布了解散“火十字团”等所有法西斯团体的命令。

对此，壟断資本家采取了向国外轉移資金的办法进行对抗；并頑强地要求勃魯姆內閣施行导致实际工資降低的貨币貶值政策。当时共产党提出了弥补工資降低的对策，可是勃魯姆內閣不但沒有采納，反而采取了鎮压工人的靜坐罢工等措施，以此来迎合激进社会党，并向壟断資本再三表示讓步。不仅如此，勃魯姆內閣还公然承認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在西班牙內战問題上追随英国的反动派，采取不干涉政策，坐視西班牙人民陣綫政府的失敗。

圍繞着国內外的各項問題，人民陣綫內部的矛盾日益深刻。当时勃魯姆妄想通过对壟断資本家的讓步来挽救政治危机，在1937年2月宣布“停止”人民陣綫綱領，但沒有达到目的。同年6月21日他就下台了。繼任的旭当內閣虽然被称为第二届人民陣綫內閣，然而实际上是有名无实的。1938年3月，勃魯姆再度上台，但仅仅三周就垮了台，至此，法国的人民陣綫事实上已完全瓦解了。

西班牙的內战

1936年1月16日在位于欧洲西边的西班牙，左翼共和党、共和党同盟、加泰隆尼亚左翼党、社会党、共产党及馬克思主义統一工人党联合起来締結了人民陣綫协定。同年2月16日大选的結果，人民陣綫各党派以二百六十五席比右派各政党的一百四十四席、中間派的六十四席而获得胜利。2月19日，由左翼共和党、共和党同盟联合組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人民陣綫政府——阿采納內閣。

当然，反法西斯力量的这种胜利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間取得的，而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西班牙人民为了推翻名聞欧洲的根深

蒂固的封建势力和反动政权的暴政，經过了几代的艰苦斗争，特别是在 1931 年 4 月推翻了波滂王朝，另外，为了反对法西斯势力的抬头，工人阶級曾經历过起义和失敗的 1934 年的十月斗争，并在这次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經驗。人民陣綫的結成本身并不是革命，它是自由主义的中間阶层、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和工人阶級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形式。然而，不容置疑，人民陣綫政府的成立在西班牙的历史上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同时，在国际上，它也意味着反战力量的增长。

西班牙的法西斯势力以及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局势自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西班牙的資本家实行停工，并把大量資金轉移到国外，来进行对抗。法西斯分子不断用恐怖手段迫害工人积极分子，同时还运用巧妙的宣傳来离間参加人民陣綫的各党派。不但如此，法西斯势力为了推翻人民陣綫政府，还阴謀策划发动政变，在 1936 年 7 月 12 日，以法西斯的大头子苏迪罗被刺为借口，掀起了叛乱。7 月17日西班牙屬摩洛哥駐軍中的法西斯分子实行叛变，次日，前参謀总长佛朗哥从加那利群島赶到摩洛哥指揮叛軍，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起来响应；接着西班牙本国的軍队相繼叛变，于是西班牙便进入了內战状态。但是，当法西斯一开始叛乱，工人們就自动地武裝起来；政府經过改組以后也决定了进行武裝斗爭的方針，由于人民陣綫的这种团結，認为可以一举攻陷首都，推翻人民陣綫政府的法西斯主义者的計划被粉碎了。然而，西班牙人民陣綫面前还有外国法西斯的进攻，这就是德、意法西斯对佛朗哥的援助。

原来，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的叛乱并不是单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搞起来的，在他們的背后，存在着德、意兩国有計划的援助，甚至有人說，这次內战在爆发以前就已經是一場国际性的战爭。西班牙在地理上控制着地中海的咽喉；同时还拥有占世界总产量百分之四十的水銀及硫化鉄等重要矿产資源。不难設想，正在瘋狂地进

行扩軍的德国对此不会不感到兴趣。从战略上看，如果能确保比利牛斯山脉，对法国形成包圍陣势，那对德国說来，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对于日夜梦想称霸地中海的意大利来說，西班牙、特别是它的港口，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但是，只要西班牙人民陣綫的力量强大，德、意兩国的这些企图就不可能实現。因此，远在1933年間，德、意兩国就开始援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者，在人民陣綫政府成立的同时，更进而策划发动叛乱，就在德、意兩国的这种軍事援助下，西班牙的叛乱爆发了。叛乱爆发后，当佛朗哥的第一步計划失敗，德、意兩国便立即把大量的武器、兵員和物資供給了叛軍。由于这种援助，佛朗哥軍重新振作起来，同年8月6日以摩尔人及其他外籍部队为主力的大軍在本土登陆，并轉入攻势；不久，到9月底，便占領了本土三分之二的土地，并对馬德里形成了半包圍陣势。据說为参加西班牙內战而侵入西班牙的德軍达三万至五万；意大利軍达五万至十万。所以，与其說德、意兩国是在干涉，不如說是在侵略。从德、意两国来說，是要通过挑起內战来达到侵略目的，这是法西斯国家假借"反苏反共"之名来侵略弱小民族的慣用伎俩。同时，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向人民陣綫的武裝进攻，也只有在隶屬于德、意两国的侵略政策的情况下才可能开始，所以，对于人民陣綫来說，抗击法西斯就意味着保卫民族独立。

从这次內战的本質来看，阶級斗爭是它的中心內容，因此随着內战的进展，社会面貌也起了很大变化。同年7月，叛軍就在布果成立了以佛朗哥为首的国民政府，着手巩固法西斯統治，在叛軍占領地区，反动势力在德、意两国的支配下进行統治，有人甚至說，在那里重又恢复了"中世紀"。反之，在人民陣綫統治区里，則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逮捕了法西斯分子，沒收了勾結叛軍的地主、資本家的財产，把沒收的土地分給农民，政府接管了重要企业和交通机关，改革了行政机构。据說，这种改革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

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所施行的社会改革是同一性質的。虽然如此，在优势的德、意軍和叛軍的压力之下，形势对人民陣綫方面日益不利。人民陣綫政府有必要把屬于各党派和各工会系統的义勇軍整編为統一的正規軍，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間。同年9月，阿采納內閣辞职，卡巴勒洛內閣成立，但它也未能完成改編軍队的任务。直到次年，卽1937年5月涅哥林內閣上台以后，才完成了这項改編軍队的任务。尽管作了这种种努力，但由于英、法等列强一直默許德、意的侵略行为，形势对人民陣綫还是越来越不利。

西班牙內战一发生，法国人民陣綫政府总理勃魯姆就在7月25日通过內閣会議，决定对西班牙內战严守中立，并且禁止向西班牙輸出武器。7月30日意大利援助佛朗哥的飞机在法屬摩洛哥因故被迫着陆，利用这个事件，法国政府在8月1日提出不干涉西班牙的建議。所謂"不干涉"，就是意味着对西班牙內战双方都不給予援助，但是不向西班牙的合法政府——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出售武器这种作法，从国际法的慣例上說是很奇怪的。原来，法国关于不干涉西班牙的建議是在英国的压力下提出的，它表明了英国統治阶級害怕西班牙"赤化"的立場；也可以說，勃魯姆人民陣綫政府因为在外交上从屬于英国，所以背叛了西班牙的朋友。法国关于不干涉西班牙內战的建議很快地就被欧洲各国所接受，同年9月9日，包括德、意和苏联在內的二十七个国家在倫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員会"，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議。前面說过，"不干涉"本身在原則上对西班牙合法政府是一种非善意的作法，但如果德、意两国眞正履行，那么，战局的发展就不一定对政府方面不利。然而，德、意两国不仅沒有停止干涉，反而加强了武器的供应和兵員的派遣。这样，叛軍就能够充分得到武器装备的供应；而政府軍的景况却异常恶劣，每三个士兵才有一支步枪和六发子彈。当时，法国的广大群众曾呼吁援助西班牙，西班牙政府也向各国控訴了德、意两国的

干涉；可是英、法两国死抱着有名无实的"不干涉"的招牌，硬說还沒有充分掌握德、意干涉的証据，使不干涉委員会停留在无聊的爭論上，以致被人們諷刺为"倫敦的喜剧"。但是这对西班牙来說，却是一場悲剧。

当西班牙人民陣綫面临着危机的时候，批判了不干涉政策的欺騙性，声明援助西班牙共和国的正是苏联。苏联在 1936 年 10 月 23 日譴責不干涉政策是对侵略者的掩护，并声明自己不再受不干涉协定的約束，从 10 月末就开始对人民陣綫进行援助。針对苏联的措施，德、意两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叛軍的援助，同时封鎖了政府軍控制地区的海岸綫。

1936 年 10 月末，叛軍包圍了首都馬德里，并大肆宣傳首都指日可下；但是政府軍傾注全力保卫首都，市民們除了参加战斗以外，还从事挖掘战壕，修筑防御工事来支援政府軍，甚至妇女們也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当时的馬德里被誉为"英雄主义和抵抗的象征"。馬德里市民們这种团結一致英勇战斗的情况，被各国新聞記者用充滿贊揚和同情的笔調加以报道。另外，对于政府軍的奋战表示感动和同情的，有来自德、意两国的亡命者、世界各国的知識分子和民主主义者数千人，他們組織了国际縱队，和馬德里的市民一起投入了战斗。同年 11 月 17 日，虽然政府各机关从馬德里轉移到巴倫西亚，但是馬德里的防卫仍然固若金湯，叛軍反复进攻均告失敗，馬德里的攻防战在这一进一退的情况下，出人意表地变成了长期战而一直繼續到次年。在这期間內的 11 月 8 日，德、意两国正式承認佛朗哥政权，进一步以义勇軍的名义增派了大批軍队。过去本来可以勾結而未能勾結起来的德、意法西斯，通过这次西班牙內战成了亲密的朋友。1937 年 3 月，在馬德里附近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意大利軍的大部队遭到了慘敗。到了次年春季，战局逐漸移向北方。4 月，巴斯克省的介尔尼加市遭受了德国空軍开战

以来最大的空襲，6月，巴斯克省的首府毕尔巴鄂宣告失守。7月，佛朗哥为了打下政权的基础，把所有的法西斯政党統一起来，組成长枪党，借此来炫示"新国家"已經形成。在同年夏秋两季中，北部各重要城市相繼失守，于是阿斯都利斯的工人們便以山区为根据地展开了游击战。这时，战局对人民陣綫已經是肯定地不利了。恰好在这以前，英国已經向佛朗哥政权派遣了商务代表，实际上已經承認了佛朗哥政权；而来自遙远的苏联的对人民陣綫政府的援助則日益困难了。同年夏天，不干涉委員会在瑞士的尼翁举行了会議，但会議仍象以前那样爭辯不休而得不出結論。

西班牙內战是这样一次事件，它最明显地表現了这个时期人民陣綫和法西斯主义这两个陣营在国际上和国內的斗爭。西班牙人民英勇不屈的斗爭虽然失敗了，但是它深深地感动和鼓舞了全世界民主力量，給予了面临着反法西斯斗爭的日本工人阶級和知識分子以莫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这次战爭在促使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互相勾結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德、意法西斯援助佛朗哥以及通过这样做加强了它們之間的勾結的情况，上面已經說过；至于日本方面，据說日本駐西班牙武官守屋上校也曾参与指揮叛軍的作战，由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日本統治阶級的态度。总之，由于英、法的不干涉政策，也就是对西班牙反革命的消极援助，使战局的发展肯定有利于反革命方面。此后，英、法对德、意两国的妥协愈益加强，国际人民陣綫也日趋崩潰。

第二章　二·二六事件和准战时体制

第一节　二·二六事件

事件的發生

在欧洲法西斯和人民陣綫之間的斗爭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威胁也越来越严重了。二·二六事件的发生即其象征。

前面已經指出(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政治、經济全面地陷入了絕境的情况下，圍繞着为了加强法西斯体制，軍部实行蛮横的政治領导这一問題，在統治阶級內部发生了尖銳的对立。无力解决这种矛盾的岡田內閣，受到了策划发动更大規模的新的侵略战爭的軍部法西斯分子的严厉責难。特别是在人民中間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日益扩大，在1936年的大选中，社会大众党等无产阶級政党的力量有了飞跃的发展，这更触怒了一再企图发动武装政变，建立軍政府的极端国家主义者——少壮軍人。他們以由于参加陆軍士官学校事件①而被撤职的前陆軍上尉村中孝次、前陆軍一等軍需官磯部淺一等过激分子为首，在北一輝、西田稅等人的領导下开始策划大規模的暴动。他們利用从1935年底至1936年初进行的对相澤案件（刺死永田軍务局长的案件——参看本書第四章第二节）的公审，以明确事件的动机为由，不断地要求軍部、政界、实业界等各方面的要人出庭作証，从而把社会的視听吸引到法庭上来。他們利用法庭斗爭大肆攻击軍部的統制派，宣傳皇道派的主張；并煽动社会輿論反对政界、实业界

① 1934年11月，陆軍士官学校学生曾密謀发动"改造国家运动"，由于該校中队长辻政信上尉的告密而敗露。

各报也大量登載有关这場公审的消息，并且采用聳人听聞的标題对他們的宣傳和煽动进行帮助。

1936年初，正当相澤案件的公审陷于糾纏状态的时候，駐扎在东京的陆軍第一师团突然奉命調往中国东北。該师团的少壯軍官多数是皇道派的过激分子，他們是經常策划阴謀活动的核心。因此，这道命令确实包含着統制派对付皇道派的意图。但这个措施，反而促使这些少壯軍官下决心在出发以前发动政变。这样，就以步兵第二联队①的安藤輝三大尉、步兵第一联队的栗原安秀中尉为中心，并在村中孝次和磯部淺一的参与下，从1936年2月开始准备武装政变。經过很短时期的秘密策划，到2月26日拂曉，少壯軍官假借非常集合把部队拉了出来，发动了武装叛变。参加这次叛变的是一支較大的队伍，其中包括步兵第三联队的主力以及步兵第一联队和近卫步兵第三联队各一部分，共有軍官二十二名，士兵一千四百数十名。在准备过程中，参加叛乱的軍官对于夜間值勤的顺序和彈藥的准备等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暴动前夕，他們并利用平素牢牢掌握住的軍士阶层欺騙兵士，詐称进行夜間演习把大批队伍带出了兵营。

2月26日拂曉，叛軍冒着二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大雪分头襲击了东京市內的首相官邸、內大臣私邸、教育总监私邸、侍从长官邸、大藏（財政）相私邸、警視厅、朝日新聞社以及在湯河原的前內大臣牧野伸显所住的旅館等，当場刺死了內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錠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并严重伤害了侍从长鈴木貫太郎。第一步襲击成功以后，叛軍即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議事堂在內的麴町一带地区，对陆軍上层开始了政治工作。叛軍首領們吸取过去多次政变均归失敗的經驗，决心用武力建立軍人內閣，实現"国家

① 相当于"团"。——譯者

改造”，不达到目的，决不收兵。他們期望他們所敬仰的眞崎甚三郎、柳川平助等皇道派的将領們能够貫彻他們的意图，出来收拾局面，使武装政变收到有利的結果。事实上，陆軍的首脑部一听說发生叛变便完全失去了信心，在一个时期內被叛軍牵着鼻子走。陆相川島把叛軍的“起义宣言書”向全軍作了傳达；接見叛軍首領的軍事参議官們，极口称贊他們的壮举；陆軍在发生叛乱后頒布戒严令时，不仅把叛軍划归戒严司令官指揮，甚至默許叛軍繼續留在他們占領的地区。

这次叛变使日本的政治、經济的中樞机构一度陷于完全癱瘓状态。股票市場以及各种商品市場从2月26日起宣告暫时停市；票据停止交換，票据交易所也随之休业。除首相官邸、陆軍省、参謀本部和警視厅以外，大部分政府机关都在叛軍占領区內，因而它們都停止了活动。而且，軍部由于不能决定它对事件的态度，禁止有关政变的一切报道，所以各报紙对于事件一字不提，只是报道了各市場停止营业的消息，广播电台也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已經料到发生了重大事件，內心惶惶不安，謠言四起。直到2月28日，当局才公布消息說，发生了大批队伍的叛变，而且叛軍还沒有被鎭压下去。但是，好不容易才知道了眞相以后，老百姓不仅沒有象軍部和右翼分子所期待的那样对事件表示同情，反而用沉默表示了坚决的反抗。政界和实业界也沒有出現支持叛变的气氛。此外，一向和陆軍对立的海軍，听說发生叛乱，立刻把联合艦队开到东京灣，向陆軍进行了无言的抗議。由于这些因素，表面上对于叛軍表示同情而在內心里又顧虑叛軍会破坏自己威信，因而搖摆不定的陆軍首脑部，也終于不得不决定了对事件的态度。这就是說，他們采取了鎭压叛乱以維持威信的态度，在叛乱发生后的第四天即2月29日早晨，决定采取断然处理的方針。最初在陆軍省发表的公告中，叛軍被称为“为了拥护团体”的“起义部队”，但是到了

2月28日一变而为"騷扰部队"，到了次日再变而为"叛軍"了。最初叛軍头目看到軍部首脑們态度曖昧，一直誤認为事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一旦局势急轉直下，立刻惊慌失措而陷于混乱，到2月29日中午，叛軍完全瓦解，大部分头目被擒，被騙盲从的士兵也三三兩兩地脫离队伍繳械投降了。

随着叛軍的瓦解，一向迷乱动搖的陆軍首脑部急遽地改变了态度，向內外表示了处理事件的强硬决心。同时，对于陆軍內部，則重視了叛軍破坏軍队的命令系統，下級損害上級威信的事实，而表明了严厉处分叛乱分子和徹底进行肅軍的方針。而对于外部，更力图把这次政变作为压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到政治上，以便强行貫徹軍部的主張。这次武裝暴动在日本政治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大事变，其結果使軍部在向政界和实业界的发言上面增添了血腥的压力。2月26日暴动一发生，軍部立即宣布在第一师团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內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更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結束以后，也不把它解除。因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結社都被禁止，市民的基本人权遭到限制，而軍部却超越一切地掌握着絕对权能，这一状态一直持續到7月間才宣告結束。

广田內閣的成立

2月26日叛軍襲击首相官邸后，傳說岡田首相已被刺死，因此內閣立即实行总辞职，而由內务相后藤临时代理首相职务，在繼任內閣成立以前暫时处理政务。但是，在叛乱期中，政府完全陷于癱瘓状态；重臣和政党也都茫然不知所措，只是观望着事态的发展。軍部最初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結果，来成立一个軍事独裁內閣。但是，叛軍和民間右翼势力所强硬要求的由眞埼甚三郎和柳川平助等皇道派領袖們組閣的主張，决非反对皇道派得势的

軍部主流派所能接受的；而陆軍內部对于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意見也不一致；同时，各方面对于政变的反感又出乎意外地强烈，由于这一切，陆軍对于成立軍事独裁內閣的态度不得不趋于消极。因此，在組織繼任內閣的問題上，只有右翼分子和部分政客进行活动，一时也看不出将是怎样一个結局。

在叛乱結束后的3月2日，元老西园寺公望进京，奉命推荐繼任首相的人选。表現在政变上面的軍部的压力，使各政党对于繼任內閣人选問題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以及和他們接近的宫廷势力不得不在考虑軍部意图的前提下进行决定人选的工作，也就是說，作为繼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須是軍部所同意的人物。因此，作为候补人选被提出来的有兩个人：一个是樞密院（日皇的諮詢机关）副議长、法西斯团体国本社会长平沼騏一郎；另一个是貴族院議长、一向受到革新派的屬意、也和軍部接近的公爵近卫文麿。平沼有极端露骨的法西斯言行，因而被西园寺等和財閥关系密切的元老、重臣們視为危險人物而置于考虑之外；而近卫則条件較优，他是軍部和实业界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桥梁人物，所以在3月2日元老西园寺向日皇奏請命令近卫組閣。可是，近卫考虑到收拾局面的困难，以健康为理由辞退了組閣命令，于是人选問題又发生了困难。出乎意外地，在繼任首相人选中根本未被提到的前外相广田弘毅，由于他是福岡县出身、玄洋社員这样一个經历，突然被提名，經过陆海軍的同意后，于3月5日奉命組閣。接到組閣命令以后，广田以前駐意大利大使吉田茂为組閣"参謀"着手組閣工作，組閣工作主要是和陆軍之間的商談。陆軍方面提出它一向主張的加强国防、"明确国体"、"安定民生（农村对策）"，"革新外交"四項要求作为新陆相的入閣条件，并且推荐軍事参議官寺內寿一大将为新任陆相。如果軍部拒絕推荐陆相入閣，就意味着內閣的流产，所以广田答应了軍部的四項要求，閣員的名单也內定

下来，眼看就要完成組閣工作。不料，內閣名单傳出以后，遭到軍部中堅分子的强硬反对；寺內当即发表下列談話，表明了反对新內閣的态度，他說：“負有打开空前的困难局面这样一种重任的新內閣，必須具有彻底革除內政、外交各个方面的一切积弊、貫彻执行加强国防等积极而有力的一系列国策的气魄和毅力；决不允許仍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专門从事維持現状或妥协退縮；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陆軍一致的要求；妥协退縮不但不能收拾局面，反而会使局面更加紛乱；以致給将来留下严重禍根。一个不能滿足上述要求的內閣，如何能够克服当前內外兩方面的非常局势呢？”（1936年3月5日《东京朝日新聞》）。

陆軍方面攻击的所謂“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人物，是指內定閣員中的下村宏（拓务相）、吉田茂（外相）和小原直（司法相）三人。另外，內务（川崎卓吉，民政党）、文部（永田秀次郎）兩相，也因为是政党的成員或接近政党而遭到反对；同时，陆軍还反对政友、民政兩党各出兩名閣員，認为出得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广田不得不从已經內定的新閣員名单中删掉下村、吉田、小原三人，并且还答应更換內务、文部兩相的人选，取得了陆軍的同意；然后又发表了一項把軍部的强硬要求包括在內的关于組閣方針的声明，向內外宣布了“革除以往弊政，积极地、主动地調整国际关系”这样一种强硬政策，这才取得軍部的同意，在3月9日完成了組閣工作。閣員名单包括政友、民政兩党各二名，貴族院議員三名，表面上象是“举国一致的內閣”的样子，然而实际上并沒有值得一提的任何新鮮东西，因而被評为“二流內閣”。不过，有一点应当指出，这就是：在組閣过程中已經露骨地表現出来的陆軍的强大压力，一直决定着新內閣的前进方向。

馬場財政

在戒严令之下，全面接受軍部的要求而成立的广田內閣，于3月17日发表了政綱，提出了"全面革新政治"的任务。其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因为，軍部認为二·二六事件的爆发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如果不革新政治，就不能防止类似事件再度爆发。

支持"全面革新政治"这个政策的財政方面負責人，是由軍部的推荐出任大藏相的日本劝业銀行总裁馬場鍈一。他就任伊始就发表了一項声明，迈出了"革新財政"的第一步。他在声明中說："……我認为当前的財政經济問題在于保証实現一系列重要国策，包括貫彻我国对'滿'政策，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漁村的經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因此，不但不能設想减少財政开支，相反地，还要估計到可能增加新的开支。一部分經費当然可以用发行公債的方式进行筹措；同时，也不能認为目前公債的发行已經碰壁。……我所考虑的財政方針是和前任內閣有相当差异的。"

这番談話說明了，馬場的財政方針是彻底地放弃了他的前任大藏相高桥的健全財政和逐漸减少公債发行的方針，而要用增发公債和增稅来弥补財政上的膨脹。这种財政方針意味着，日本壟断資本集团在"滿洲景气"已达极限，以及由于侵占"滿洲"和通过降低外汇率实行对外傾銷而在政治上、經济上同欧美列强之間加深了矛盾的情况下，企图进一步以武力为背景来独霸中国和"滿洲"市場，因而打破了"財政上的生命綫"，开始进入战时經济。当时，大藏相馬場在关于时局的談話中曾經这样說："在許多情况下，也唯有依靠背后的軍事压力，产业和貿易才能对外起作用。"（1936年5月31日《东京朝日新聞》）这不仅是大藏相馬場一个人的想法，同时也反映了壟断資本集团的态度。只是由于当时实业界对于下一步侵略的具体方針、时机以及它可能給实业界带来的影响

这些問題还沒有弄清;所以馬場的談話曾一度震动財界,引起了股票的暴跌。尽管如此,作为日本壟断資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向,日本的战时財政宣告开始了。

在所謂"馬場財政"的名义下編制的預算,从編制的程序上打破了以往的慣例。也就是說,廢除了以往在編制預算的一开始先由各省(中央各部——譯者)会計科长和大藏省主計局长进行洽商的办法,而从新規定了所謂"国策先議"的原則。由广田內閣創始的"国策閣議"优先討論陆海軍的国防建設計划,"軍費未确定以前,岁出就不能确定"(藏相馬場語),这就是当时編制預算的情况。在这期間,陆海軍陆續向"国策閣議"提出了各自的軍备計划。陆軍的計划是这样:第一次計划,(1)扩充航空、防空設备,第一年度經費約六亿日元,經常費約三亿日元;(2)扩充駐在"滿洲"的兵力,第一年度經費約六亿日元,經常費一亿五千万日元。第二次計划,(1)改善內地(日本国內)的軍备,經費約三亿日元;(2)整备作战資材,經費約一亿数千万日元。上述全部經費自 1937 年起繼續要求五年到十年。海軍方面也借口 1936 年 1 月退出裁軍会議,除制定了大規模的建艦計划外,还提出了以建造主力艦及扩充空軍为中心的龐大的补充計划,并且还散布謬論說:"軍費中有极大部分是投向民間,所以不但对于安定民生起很大作用,而且对发展重工业及其他各种企业也有很大貢献。"

这样,在最后一次"国策閣議"上决定的"七大国策十四項目"中,首先提出"加强国防",而以貫彻陆軍的大陆政策和海軍針对无条約第一年的扩充軍备为內容。另外,作为广义国防,还制定了发展燃料、原料,統制电力,发展航空事业等国策,并动員这些工业部門为战时經济服务和建立有关設施。如执行这一国策的 1937 年度預算总額达三十四亿日元之多,而对它的审查工作則极其寬大。結果,三十亿四千万日元这样一个空前龐大的預算,內閣会議仅

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在閣員們談笑之中通过了。这笔預算，比上一年度多七亿多日元，增加了将近三分之一。在全部預算中，軍部經費的比重大大增长，仅直接軍事費，就超过了岁出总額的百分之四十三。与此相反，被列为国策之一的“国民生活安定費”却微不足道，只有五千万日元，仅占預算总額的百分之一点六。另外，就是軍部为了“保証兵源”而大事宣傳的“农业救济費”也少得可怜。岁出概算被审查通过的新增加項目中“被認为和重要国策有关的經費”如下：（以百万日元为单位）

陆軍省經費	728
海軍省經費	681
加强国防費	691
教育改进費	1
調整中央、地方稅制費	237
国民生活安定費	53
灾害預防、救济費	19
保健設施費	9
农村、漁村、中小商业复兴費	24
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貿易費	57
加强电力統制費	1
液体燃料增产費（为达到自給自足）	22
鋼鉄增产費（为达到自給自足）	1
确保纖維資源費	2
鼓励、統制貿易費	11
航空工业发展費	9
海运事业发展費	3
海外移民鼓励費	4
对“滿洲”移民、投資鼓励費	25

为了筹措上述龐大經費，除拟定了的增稅六亿日元这样一个日本稅制史上空前的大增稅方案以外，还提高关稅和对紙烟实行加价。这次修改稅制，据說是为了实現“合理負担”，但是它的主要內容是通过減征地方稅近三亿日元和撥付地方財政补助金来实現

税制的中央集权化，以及通过提高紅利所得税和消費税来增加税收六亿日元，其結果由于减征地方税得到利益的是农村的地主和資本家，而增税的負担却落到广大群众身上。經过这次增税仍然不足的部分，則由发行公債八亿另六百万日元来加以弥补。

这种以軍費为中心的"畸形預算"，固然受到軍部和軍火資本家的欢迎，然而从整个日本資本主义看来，重工业的生产力过低，軍事經济体制尙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掌握相当于国民所得总額的百分之二十三的資金，把它投入軍需工业，使其消化，的确是負担过重。这种矛盾具体表現为物价的上漲。尽管藏相馬場声称物价的上漲只是由于人們进行投机的結果，但是他的語言未落，物价就暴漲起来了。同时，由于物价的不断上漲給預算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以致社会出現了要求糾正"过火"的呼声。通过上述事实，統治者們才逐漸認識到，为了推行战爭經济，不能单靠投注資金，还需要实行全面的統制經济。

肃軍和軍部干預政治

二·二六政变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便是肃軍。日本人民对軍部干預政治和迫在眉睫的法西斯威胁的不滿情緒，由于这次政变已經达到了頂点，可是他們一直被剝夺了向軍部提出反对意見的一切自由，因而只能通过要求肃軍来表达对于事件的批判。因为这一事件破坏指揮系統，違反敕令而采取了"叛乱"的形式，这就为輿論批判軍部提供了合法根据。人民对軍部的这种反感，使报刊、政党和实业界也都不能置若罔聞，要求肃軍的呼声日益高漲了。因此，广田內閣不得不把肃軍列为首要任务，而陆相寺內就任以后也不得不再三发表彻底肃軍的諾言。人民要求于內閣和軍部的肃軍，是制止軍部从事政治活动和"堵塞走向法西斯的道路"；而軍部本身所需要的肃軍，則是內容完全不相同的另外一种肃軍。下

級軍官无視軍方首脑部擅自进行"革新运动"是損害軍部威信的严重問題。当时的情况已經达到这种地步，即青年軍官的法西斯活动受到軍方首脑部的庇护，并成为他們利用的对象。如果对这种非法的武装政变仍旧采取曖昧的态度而加以默許，就会使人民譴責的鋒芒轉向軍部本身。况且由于事件带来的压力，已使軍部的政治地盘有了充分的扩大，因此，即使为了維持軍部自己的統治，也必須进行彻底的肃軍。不过，这种肃軍的內容实質是和人民所要求的完全不同，它是为了鎮压皇道派以确立統制派即軍中央的領导权，并以此为交換条件来进一步提高軍部的威信，加强軍部的压力。

因为这种緣故，軍部对二·二六事件，进行了异常严厉的处理，而以往对于三月事件、五·一五事件、十一月事件等历次事件的处理是极其寬大的。陆相寺內在第六十九屆議会上关于叛軍的指导思想曾这样說道："驅使这些人竟然敢于叛乱的指导精神，在根本上隐藏着一部分外部的人所抱有的和我国国体絕对不相容的、极端过激的、企图改革国家的思想，这是令人万分遺憾的。"他断定这些人的行动是違反国体的，并表示了給予严厉处分的决心。为了处分这批叛軍，在 1936 年 3 月 4 日，以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軍軍事法庭。审理工作是在秘密中迅速进行的，同年 7 月 5 日第一次判决結果，对叛軍的全部首領十九名判处死刑，其余七十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对于同情叛軍的分子和被認为是皇道派的分子，进行了彻底整肃。1936 年 3 月 23 日，实行了包括对有責任者的处分在內的第一次調动；同年 7 月 10 日实行了第二次对有責任者的調动；同年 8 月 1 日又实行了包括三千余名的大規模的定期人事調动。通过这几次人事調动，重要人事几乎全部重新調換，撤免了大批軍官，基本上完成了肃軍工作。整肃的結果，陆軍內部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从而确立了統制派的統

治权

本来是由于軍部本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肃軍，却被軍部当作了对外要求重大代价的政治資本。作为肃軍的条件，軍部强迫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推行以四大政綱为中心的"全面革新政治"。社会上要求肃軍的呼声愈高，軍部愈是进行它所謂的肃軍工作，軍部大臣对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干涉就愈多，他的发言权也愈来愈扩大了。广田內閣成立后軍部对政治上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一些主張或宣傳，而是直接推动內閣左右政策的力量。通过肃軍，軍部和內閣完全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內閣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这首先表現为 1936 年 5 月 18 日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恢复。陆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軍閥干預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經过长期斗争，于 1913 年（大正二年）好不容易才把它廢除（但实际上从来沒有过預备役或后备役軍官担任陆相的先例）；然而軍部利用这次二·二六事件的压力，仅以一紙敕令就把这个制度恢复了。这样一来，軍部掌握內閣的生死大权就有了法律根据，軍部对政府的領导权也就完全确立起来了。

第二节　准战时体制化和日德防共协定

国策方案的决定

陆軍在通过 1936 年 8 月的"八月人事調动"完成了"肃軍"，肃清了皇道派，巩固了內部以后，加紧展开了政治攻势。其結果，在 8 月 7 日的五相会議上通过了包括軍部的全部要求在內的所謂"国策基准"。原来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大藏相这五个重要閣員組成的五相会議，实际上是代替全体閣員参加的內閣会議的組織形式，在这个会議上討論有关对外問題的重要政策，其中大

部分是討論軍部的提案，而以陆、海軍省的軍务局和外务省东亚局为中心进行工作。所謂“国策基准”的精神实質，是“在外交国防互相配合下确保日本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洋扩張发展”（参看本書附录[二]）。这是一个侵略中国，进攻苏联，待机南进，以至于发动太平洋战爭的对外侵略的初步战略方案。陆海两軍所以拟定了这个方案，固然也是由于当时日本正在推行新的对华侵略計划，但在这同时，內中还隐藏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就是說，当时陆軍中央鉴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关东軍日益强大，极力想把它的权力和活动范圍局限在“滿洲国”的范圍以內，不讓它向华北方面扩張，而使它专心对付苏联，这就是所謂“北进論”产生的历史背景。（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上卷）对此，海軍也不甘示弱，极力主張南进，并且以此为扩軍的理由同陆軍相对抗。于是双方都把各自的主張提到五相会議上。会上双方意見趋于一致，同时决定了陆軍的北进方針，海軍的南进方針和全面侵略中国的政策。

接着在同年8月25日，由陆、海軍省和企划院的“革新派官僚”拟定一項“自昭和十二年（1937年）起开始实施的重点項目”，即所謂“全面革新政治”的七項政綱，內容如下：

（一）加强国防

（二）改革教育

（三）整頓中央、地方稅制

（四）安定国民生活：

（1）預防、救济灾害对策

（2）扩充保健設施

（3）复兴农村、漁村，发展中小工商业

（五）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貿易：

（1）加强电力統制

（2）实現液体燃料、鋼鉄自給自足

（3）确保繊維資源

（4）奖励并統制貿易

（5）发展航空、海运事业

（6）奖励国民向海外发展

（六）制定重要的对"滿"政策——移民政策和奖励投資政策

（七）調整改进行政机构

以上"七大国策"指出了准战时体制化的基本方向，正如前面所述，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1937年度預算中軍費的陡增。

行政机构改革問題

如上所述，广田內閣所标榜的"七大国策"中有一項"改革行政机构"。陆相寺內認为，作为"全面革新政治"的基本問題，应首先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以及議会制度。經过同海相永野进行协商，陆海两軍意見取得一致，决定由双方共同拟定一个草案提交內閣。1936年9月21日陆海两相会晤首相广田，提出这个草案，并坚决地要求从1937年度起付諸实施。据說，軍部考虑的問題包括：明确划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界限，議会議員不得担任国务大臣或其他官职；否認由两大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或多数政党执政的所謂"宪政常道論"，不承認政党內閣；为适应当前的国际形势，政府、議会和国民三者应打成一片，采取举国一致的一国一党的形式；实現除陆海相以外只有五、六名不管部大臣参加的少数內閣制；等等。

陆海两相要求"改革中央、地方行政机构和議会制度"的强硬态度，使广田內閣大为震动；各政党以及一般国民也都严重注意怎样处理这个問題。为了决定內閣对这一問題的方針，广田首相决定由閣員們分头进行研究。他首先把問題分为有关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行政制度部分同有关議会制度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責成大

藏相馬場、鉄道相前田、递信(邮电)相賴母木、文相平生等四閣員，后一部分責成內相潮、法相林、农相島田、商相小川、拓务(殖民)相永田等五閣員，也就是組織所謂四相会議和五相会議进行討論研究。会上討論的陆海軍共同提案的內容如下:

关于改革行政机构的共同方案

随着国家的进展，有必要根据帝国宪法全面地革新政治。为此，首先应当对于一切政治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改革綱要如下:

中央行政机构

第一，設立集中掌握国策的机构: 在內閣总理大臣之下，設立担任有关重要国务的調查研究、統轄、預算的控制和安排等工作的机关。将情报委員会也合并于該机关之內。該机关的首长得列为閣員。

第二，人事行政: 在內閣总理大臣領导下，設立管理和改革人事行政的机构。

第三，合并外务、拓务两省，以便統一和加强对外政策。

第四，合并农林、商工两省，并扩大或新設掌管貿易、燃料、电气的机关，以便加强产业行政的合理化。

第五，将內务省神社局掌管事項移交給文部省，以便鼓舞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質。

第六，改組內务省，将神社局以及有关道路、港口的一部分土木工程行政事务分别移交第五、第七两項內的各該机关，改革內务行政机构，統一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

第七，統一鉄路、航空、邮电行政事务，促进民間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并統一加强有关船舶、港口的行政管理。

第八，整頓改进各省內部，統一調整各省重复的机构、行政事务以及研究机关。

地方行政机构

配合中央行政机构的整頓改革，并适应国运的发展，对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整頓改革。

議会制度

鉴于国运的发展及議会的現状，应修正議院法和选举法，改革議会制度。

[附] 为实施本綱要，各有关大臣应暫时留任。

在軍部提出行政机构和議会制度改革方案的压力下組織起来的所謂四相会議和五相会議，自1936年11月起开始举行。其中，負責审查研究中央行政机构改革問題的四相会議認为有必要了解軍部方案的眞意所在，在11月9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議上，要求陆軍次官梅津和海軍次官长谷川加以說明。当时主要发言人海軍次官长谷川就軍部所以制定这一方案的精神进行了解釋，强調了在当前非常局势下，根据生产和国防上的原因，对中央及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和有机的集中化的必要；同时对于內閣最感不安的国务大臣和行政长官分化的問題，表明了軍部的意見，就是說，軍部經过研究的結果，認为保持現行制度，即国务大臣和行政长官二位一体的制度是恰当的，不过，为使行政事务能够集中起来，軍部認为有必要对某些省进行裁并。通过这次說明，內閣方面大致明确了軍部的意图，基本上解除了当初存在的与軍部发生对立的顧虑。于是，四相会議便从本身的立場出发，很快地拟就了中央行政机构改革方案，并經1937年1月12日的四相会議通过，其中包括設立总务厅、內閣人事局、帝国經济会議这些集中掌握国策的机关；另外还决定把实行这一方案所需經費，作为昭和12年（1937年）度的追加預算，提交第七十次議会进行审查。

另外，关于軍部对改革議会制度的意見，据后来的傳說，大致包括以下重大的內容：

一、使日本議会和現行英国式的議院內閣制分开，仿照美国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廢除由議会中占多数議席的政党組織政府的政党內閣制。

二、制定一項可以称为政党法的法律，規定政党在議会中的活动范圍。

三、修改現行以政府和議会互相对立为根本精神的制度，而以互相合作的日本精神为准則，从而取消議会可以通过彈劾政府之类的决議的权力。

四、改变貴族院的职能，在众議院內附設經济参謀本部。

五、修改选举法，只賦与家长（戶主）或服过兵役的公民以选举权。

这一傳聞中的軍部的議会制度改革方案曾經使政界大为震动。特别是政党方面对于排斥政党內閣制的主張感到惊訝，表示了反对情緒。于是陆相便发表談話，解釋說："軍部希望建立我国固有的宪政，絲毫沒有类似縮小議会权限的意图"；另外，在議院制度調查会和閣員的恳談会上，政党和軍部之間达到了妥协，这个問題也就告一段落了。

"处理华北方針"

广田內閣在"基本国策"上表明的侵略中国計划的基本路綫，具体表現为它所制定的所謂"处理华北方針"。紧接着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战綫以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八一宣言。在这个宣言的鼓舞下，中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漲起来，——尽管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妥协政策和卖国政策——相繼发生了一系列事件：1936 年 7 月 10 日的萱生被杀事件、8 月 24 日的成都事件、9 月 3 日的北海事件、9 月 17 日的汕头事件、9 月 18 日的丰台事件、9 月 19 日的汉口

事件以及9月23日在上海的日艦"出云号"水兵被狙击事件(参看本書第三章第一节)。当时为了扭轉这种局面,从同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开始举行国民党政府外长張群同日本駐华大使川越的談判。日本方面的方針基本上是根据所謂"广田三原則",这就是1936年1月外相广田在議会上发表的对华外交方針:(1)停止"排日"运动,放弃依靠欧美的方針,实現中日合作;(2)中国承認"滿洲国",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进行調整日、"滿"、华三国的关系;(3)为防止"赤化",中日策划共同防御,它的目的是要扩大原有的通过"加强冀察政务委員会以使华北特殊化"的方案,把华北五省作为华"滿"之間的緩冲地带而使其特殊化。关于华北五省"滿洲"化、特殊化的方案包括在1936年8月五相会議所通过的"处理华北綱要"里。这一方案規定"策划在該地区內成立一个牢固的防共、亲日'滿'的地带,以便取得国防資源,扩充交通設施,借以防备苏联'侵入'和奠定日'滿'华三国互助的基础"。这个"处理华北綱要"除規定了以华北五省为目标而企图使这五省实际上脫离中国外,还規定了对"冀察政务委員会"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指导方針",并分别規定了对山东、山西、綏远三省的"指导方針",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达到"分而治之"和"經济开发"的侵略目的。

"处理华北綱要"的制定工作完成时,关东軍已經作好准备,随时可以越过长城綫大举向华北进攻。另外,根据同年5月15日陆軍省布告,日本駐华北的兵力,远远超过了辛丑条約中規定的日本在北京使館区、天津領事館区以及租界地区駐軍的数目,駐在华北的是由步兵两个联队和炮兵、工兵、騎兵、通信兵等兵种組成的一个独立兵团。当时在成立"滿洲国"的影响和日軍的策动下,察哈尔省一部分蒙古族以德王为中心,以百灵庙为根据地进行脫离中国的"自治运动"。1936年11月在关东軍参謀长东条直接指揮下,由田中隆吉上校率領德王等的蒙古伪軍,以"蒙古人的蒙古"

为口号侵入了綏远(森島宁人:«阴謀、暗杀、軍刀»)。他們受到傅作义指揮的綏远軍的反击,又遇到严寒天气,以致遭到慘敗(綏东事件)。通过这次綏东事件,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越发坚定,到同年12月,張群、川越談判終于擱淺了。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以这次事变为轉折点,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得到飞跃的发展。这种趋势使"冀察政务委員会"也日益傾向国民党中央,宋哲元对于他已經答应了的日方的津石鉄路敷設权和龙烟鉄矿开采权等問題也改变了态度,而主張只有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取消以后才能同意。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

"日德防共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在加紧准备进一步侵略中国,另一方面还在策划侵略苏联。1936年11月25日签訂了"日德防共协定",就是一个具体表現。这个协定的主要內容是:"日、德互相交换关于第三国际活动的情报;协商必要的防御措施,幷且以紧密合作来完成防御措施"。(参看附录〔二〕有关資料)

在签訂"日德防共协定"的当天,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說,共产国际的活动目标是日本和德国,它的活动具有严重的危險性,对于現有国家的安宁以及世界和平,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不能不采取对它的防御措施。同时表明,該协定幷未附有任何秘密协定;其目的只是为了防御共产国际,幷非以苏联为对象。然而实际上却附有秘密协定(据战后在远东国际軍事法庭上暴露的情况,参看附录〔二〕"日德防共协定"的补充协定)。

这个秘密补充协定充分地証明了它以苏联为假想敌国,无疑是为日、德法西斯进攻苏联开辟道路的。

在第一章第一节里已經說过,在奥地利問題上曾处于对立状

态的德意两国后来通过侵略埃塞俄比亚战争、干涉西班牙内战而逐漸接近。1936年11月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米兰发表演說时宣称:"新时代已經开始",并且强調說:"罗馬和柏林間的垂直綫不是障壁,而是軸心。"这就是"柏林一罗馬軸心"一詞的由来。至此,欧洲两个法西斯国家完全勾結起来了,并約定德国向中欧和东欧扩張,意大利向地中海沿岸地区扩張,划分了两国的侵略范圍,积极准备重新瓜分世界的战爭。日、德两国之間,当初在中国問題上也存在着矛盾。納粹取得政权以后,积极进行对华經济扩張,因此它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关系也趋于密切。然而,因为日、德两国同是脫离国际联盟因而陷于孤立的国家,因此就有"物以类聚"的可能,更因为彼此同是标榜"反苏反共",他們都感到共产国际决定采取人民陣綫的斗爭策略,是对于自己的法西斯体制的共同威胁。因此,从1935年底起,德国和以日本軍部为中心的亲德分子之間建立了联系。这种活动的主要产物,就是日本駐德大使館陆軍武官大島浩和希特勒的外交顧問里宾特罗甫之間經过私人談判而签訂的"防共协定"。

德国政府首脑和日本軍部之間本来企图締結对苏軍事同盟,只因受到日本統治阶級內部亲英、美派的阻撓,所以只好締結了这样一个"防共协定"。尽管是防共协定而不是軍事同盟,但是毫无疑問,它的締結却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在国际間的孤立地位;使日本卷入了帝国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圍內的敌对关系中,使日本投身于最反动的法西斯陣营里。1936年12月日本政府承認西班牙佛朗哥政权;1937年11月意大利参加"防共协定",三个軸心国的这种勾結注定了在不久的将来就要締結三国軍事同盟和挑起太平洋战爭。"日德防共协定"引起了日本对苏关系的恶化。当时苏联正在召开第八届最高苏維埃会議,討論新宪法草案,在1936年11月29日的会議上,苏联外长李維諾夫就"日德防共协定"作了如下的发言·

“日德防共协定”是被国际間所唾弃的两个孤立者相互結合的产物，为了締結这样一个仅以两条为主要內容的条約費了十五个月的时間，而且主持交涉的还是日本駐德武官。——从这些事实就足以証明这个协定实际上是以反共之名为掩护的反苏协定。正因为如此，一向对苏联不敢輕易进行武裝挑衅的日本軍部，在簽訂协定以后的某一个时期仅在四十八小时以內就連續动員大部队的兵力向苏联境內进犯两次。尽管它們有反共协定，但是苏联紅軍对于胆敢进犯的敌軍是会予以坚决的回击的。日本政府一方面答应了調整日苏关系、解决两国間的悬案，但是另一方面又和德国締結防共协定，从而使可能解决的悬案，甚至于可能締結的互不侵犯条約也都受到这个协定的牽制而不得不擱淺。現在日、德、意三国的侵略行动虽然日形露骨，然而我們确信偉大的紅軍和它的艦队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一旦挺身而起的时候，一定能发揮世界史上未曾有的战斗力量。

在日苏两国間要解决的悬案中，虽然在成立国境划定委員会和处理紛爭委員会的問題上还有兩、三点未能取得意見的一致，其他关于延长北庫頁島石油开采权以及修改漁业条約等悬案已經达成协議，而且前者已經簽字，后者也决定在 1936 年 12 月 20 日簽字，可是由于防共协定的簽訂，使漁业条約的簽訂宣告流产。本来，日本統治阶級內部在簽訂防共协定的問題上担心的是会不会因此而影响日本对英美的关系。当时英国外交表現了逐漸加强縱容法西斯国家进行侵略的傾向即所謂“綏靖政策”。不过，这在骨子里却包藏着复杂的打算，即一方面企图把法西斯国家进攻的矛头引向苏联，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些国家在对苏作战中遭到打击而削弱力量。事实上，英国为了維护大英帝国的权益并准备对德作战，已經从 1934 年底开始扩充軍备。所以“防共协定”的簽訂，不仅意味着敌視苏联，而且也意味着敌視英美，这就使得搖摆于“北进”和“南进”之間，而不能决定新的侵略方向的——正如表現在“国策基准”上的情况——日本統治阶級內部的“維持現状派”对于軍部領导的秘密外交感到不安。日苏漁业条約沒有能够簽訂一

事，引起了对于"日德防共协定"的非难。这些情况构成了导致广田內閣垮台的根本原因。

广田內閣的垮台

广田內閣在內政方面把空前龐大的三十亿四千万日元的預算强加在人民头上，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活。在外交上，則不仅将中日关系推入絕境，而且由于签訂了日德防共协定，使日苏关系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大大恶化，引起了日本国民对广田內閣全部政治措施的极大不滿。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反映到政党的态度上面，而且各个政党方面本来对軍部所拟定的行政机构改革方案，尤其是議会制度改革方案已經表示了严重的憤慨。在这种情况下，民政党和政友会在1937年1月20日分别召开了党代表大会，确定了它們在即将召开的第七十次議会上采取的态度。

民政党总裁町田在大会上譴責政府說：

"……一部分官僚动輒就想利用政府的权力来压制国民的輿論，这种想法是錯誤的。为了'全面革新政治'，首先应該广开言路；而实行愚民政策則是极大的时代錯誤。在立宪制度下，竟然企图用权力来压制輿論，这是絕对不能容許的。"

同时，政友会也发表宣言說：

"外交出于多元使人莫知責任所在，把由官僚包办的秘密外交奉为金科玉律，而不知貫彻执行近代国家的国民外交的原則。在錯誤地認为应該采取准战时体制的主观判断下拟定的各种方案妨碍了产业的发展，并且威胁着国民生活，弄得人民怨声載道，甚至国民精神消沉沮丧。官僚一意剛愎自用，軍部充滿着优越感，力图排斥別人，包攬国政。如果听任这种歪風滋長下去，其結果必然要阻塞民意的暢达。这样虽名为立宪政治，实际上将流于寡头專制的作風……。"

目睹上述情况，陆軍方面对政、民兩党只字未提加强国防問題的必要性，深感遺憾。他們认为，这問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

該成为这次議会中最重要的問題。并且認为，政、民两党既然派出自己的成員参加內閣而又攻击內閣的这种态度，是不可理解的，如政党要反对內閣，就应当先从內閣中撤出它的成員。根据上述看法，陆軍認为政党对时局"認識不足"而大为不滿。

在这种紧張的情况下，于1937年1月21日繼續召开的第七十次議会，由于以軍部、閣員为中心的"革新派"和既成政党之間的对立而充滿了危險的气氛。当时政友会的驍将濱田国松繼民政党議員櫻內幸雄之后登台，发表了猛烈攻击軍部的演說。他說：

"軍部近几年来自命为我国政治的推动力，大有乃公不出如蒼生何的气概。这表現在五·一五事件上，二·二六事件上，从軍部中不断傳出的主張实行独裁政治的言論上，議会制度調查会召集的恳談会上陸相的发言上，以及关东軍司令官就'滿洲国协和会'发表的声明上。总之，主張加强独裁政治的論調已經成为軍部的暗流，滔滔向前，有时甚至要冲破文武官員必須恪守的堤防而泛濫成灾，因此日本国民一致不滿。"

这篇演說果然引起严重事态。濱田演說結束后，陆相寺內立刻起来进行反击，他說："我認为我国的政治应該根据我国欽定宪法的精神来进行，这是我們一貫表明的。然而竟有人怀疑这一点，这可能是由于某种錯覚在作祟。方才濱田議員的发言带有侮辱軍人的口吻，令人感到遺憾。……"于是，濱田再度登台严詞反駁說："……我既然是国民的代表，而竟然被誣賴为侮辱了我們光荣的軍人，我是不能容忍的。……"对此，陆相寺內又还击說："濱田議員带有侮辱軍人味道的言論恰恰破坏了他自己說的全国一致的精神，所以不能不提出忠告。"突然发生的軍部和政党之間的这場正面冲突，引起会場上一片怒罵之声。在这极端紧張和激动的气氛中，濱田議員第三次登台向寺內进逼說："……可以查記录。如果查出我的发言中有侮辱軍部的地方，我願意剖腹謝罪；否則要求陆相剖腹。……"事前早已預料到将会发生糾紛的第七十次議会，果然在

复会的第一天便发生了政党和政府、特别是和陆軍之間的正面冲突。

当天散会后，政府就在議院內召集了紧急內閣会議。陆相寺內以要求政党进行反省为理由，主張解散議会；然而除递信相賴母木以外，其他政党成員的閣員們（鉄道相前田、农相島田、商相小川）則坚持反对解散議会。在这种情况下，首相广田拿不定主意，只好覲見日皇，奏請休会两天。这样，政府已陷入严重分歧，如果陆相寺內同屬于其他政党的成員之間不能达到妥协，那么不是广田內閣总辞职，就是解散議会。

从五·一五事件以后拚命追随軍部的政党，經过这次向軍部开火，似乎恢复了以往的面貌，然而它們已經腐化到这般程度，以致不可能組織并代表民意而同軍部进行斗争。对于統治体制法西斯化的問題，他們在本質上并不反对。上述事件只是表明，对民意的动态比較敏感的一部分政党人士，赤裸裸地发泄了他們被排挤于政权中樞以外的不滿情緒；也可以說，这是政党人士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的最后一次挣扎。

第三节　人民陣綫运动的开展

工农运动走向高潮

所謂“准战时体制”，就是这样一种体制：維持和壮大自己，准备在进一步和更大規模地推行已經开始执行的侵略政策的同时，和德、意法西斯国家勾結在一起，以便发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侵略战爭。为了这个目的，他們积极进行建立所謂“准战时体制”，但是这种“准战时体制”的矛盾却从各方面暴露出来了。

利用增发紙币来大量发展軍需工业的作法，使工人就业指数不断上升，这种情况表現得最突出的是，以男工为骨干的重工业部

門，其中增加得最多的是造船业，其次就是机器制造业、金屬冶炼业等。工人就业指数的这种上升虽然减少了失业現象，然而淨得的工資却有了下降，而且由于通貨膨脹物价上漲的結果，实际工資也降低了。于是，工人阶級的反抗加强了；进入 1936 年以后，特别是重工业部門圍繞着“临时工”的問題，劳資糾紛越来越严重了。在这一年里，劳資糾紛从一向的漸减趋势，变为急剧增长，共达一千四百五十七件。参加的人数虽然沒有随着件数的增加而增加，表現了斗爭的規模逐漸縮小，但是斗爭由以往反对降低工資、反对解雇、要求复工等消极的自卫的斗爭轉化为要求增加工資的所謂“积极斗爭”；这种斗爭最先发生在軍需工业部門，接着发展到交通运輸业，最后席卷了各个工业部門和各个地区。（参看《太平洋战爭史》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第 178 頁《劳資糾紛件数及参加人数表》）

农村方面，虽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漲，农业收入有了增加，然而农业危机并未因此克服；相反地，圍繞着土地問題，激烈的佃农斗爭急剧地发展了。这种斗爭在 1931 年以前，每年平均在两千件至三千件之間，从 1931 年起，呈現了直綫上升。而且大致以 1930 年为轉折点，从以往主要是要求减免地租和反对提高地租，变为要求延长租約、要求确認租佃权或永佃权等为保卫耕种权而激烈展开的土地斗爭。这个斗

保衛耕种权的佃农斗爭件数

年　度	件　数	在全部佃农斗爭中所占的百分比
1927	432	21.1
1928	461	24.7
1929	704	28.9
1930	1,002	40.4
1931	1,307	38.2
1932	1,520	44.5
1933	2,275	56.9
1934	2,704	46.4
1935	3,031	44.4
1936	2,644	53.6
1937	3,575	57.9

（摘自井上、宇佐美：《陷于危机中的日本資本主义的构成》）

争是針对着中、小地主們企图收回租地、轉卖土地而发动的，地主因在出售农产品方面同农民竞争牟利，反而遭到亏累和面临破产，因而要收回租地或轉卖土地。

禁止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慑于工农力量日益壮大的日本政府当局，为了禁止劳动人民在国际劳动节——1936年5月1日进行庆祝活动（在日本，这是第十七次），通过內务省向全国发布了禁令，其中列举的"理由"如下：

（一）二・二六事件的戒严令尙未解除。

（二）5月1日是第六十九次特別議会开幕的日子。

（三）以上两項虽然只是和东京市有关，然而二・二六事件的影响却遍及全国，因而这一戒严令应适用于全国范圍。

这項非法的禁令立即遭到全国工农团体的反对。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日本工会会議（1932年成立，領导人是松岡駒吉）大阪地方协議会。大阪地方协議会在3月25日向大阪府知事坚决要求准許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活动，同时日本工会会議主席松岡駒吉也根据該会政治委員会的决議提出抗議性的請願書。然而工会会議并未能彻底开展反对禁令的运动，4月9日政治委員会竟然作出决定說："本届国际劳动节由于不得已的原因，只好在全国范圍內停止一切活动，并将这一决定向4月18日在神戶召开的扩大委員会提出报告。" 18日召开的扩大委員会也根据这項报告作出决定說："工会会議原則上决定停止庆祝活动，至于各地协議会以及所屬单位可以在停止举行示威活动的前提下，各自組織适当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比較左傾的工会組織而受到日本无产党支持的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1934年成立，委員长是加藤勘十），反对上述工会会議派的妥协和讓步，会同东京交通工会、东京市从业員工

会、东京汽車工会的代表前往內务省，就禁止举行五一庆祝活动問題，提出了大意如下的严重抗議：

"政府以維持治安为借口而下令禁止庆祝国际劳动节，然而历年的事实証明，从来沒有因为举行庆祝五一活动而影响治安，尤其是在全国范圍內禁止一切活动的命令更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庆祝国际劳动节是工人、农民的旣得权利，所以我們对这一命令坚决抗議和反对到底！"

另外，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于3月30日向全国各地所屬工会組織发出一項关于准备斗爭的指示，其中說道："非常时局的重压将要剝夺我們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示威活动的自由，全体工会会員必須竭尽全力，不仅动員参加組織的工人，而且应該最大限度地动員会外的工人群众，为爭取第十七次国际劳动节成为无产阶級的节日而斗爭到底！"同时，全国农民組合（农民协会）也向所屬单位发出反对禁止五一庆祝活动的指令說："为了向这一禁令进行反击，我們要和工人弟兄团結起来，开展一个爭取实現租佃法和工会法的斗爭。"

尽管是在这种反对禁令的高潮中迎接了第十七次国际劳动节，然而由于官宪的彈压，未能举行示威活动，仅在工作場所举行了联欢会等各种集会。以禁止庆祝第十七次国际劳动节为开端，后来日本政府竟长期禁止庆祝国际劳动节。

禁止官营企业工人組織工会

政府当局不但强行禁止劳动人民庆祝自己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而且更进一步地采取了禁止官营軍需工厂工人組織工会的措施。二·二六事件以后，标榜"肃軍"的陆軍当局，借口加强"建軍精神"，严禁陆軍所屬各軍需工厂工人組織工会，并于19.6年9月10日以兵工厂长官永持中将的名义发布了陆軍省的指令，其中說道："严禁陆軍所屬各軍需工厂的工人进行团体活动；凡参

加工会組織者应立即退出。小仓、大阪、名古屋等地的各軍需工厂接到以上命令后，除立即向官营企业工会进行傳达外，还强迫工人退出工会，并永远不許工人参加任何工人組織。

上述各地的陆軍所屬各工厂的工会組織，是在大正初期成立，历史較长，一共拥有会員八千名，共同組成陆軍工会协議会，屬于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是日本軍需工业工会运动的核心。所以，禁止上述各軍需工厂工会組織的命令不但給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带来了危机，同时也大大地影响了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所屬的日本工会会議、社会大众党以及其他工人組織的存在。也就是說，由于陆軍当局的这項禁令并不仅仅是針对各軍需工厂的工人，而且还包含着这样危險，即其他各官营企业以至于民营企业、特别是軍需工厂企业也照样来否認工会組織的存在。

禁止官营企业工会組織的問題一发生，立刻引起了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本身以及日本工会会議、社会大众党和其他各工人团体的反对。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在发布了上述禁令的次日即与日本劳动組合会議、社会大众党取得联系，决定为了保卫工人的团結权，爭取实現工会法，开展全国性的斗爭；接着，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又召开中央委員会，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 "陸軍当局强加于工会的非法鎭压，不仅違反了軍部自己所标榜的广义国防的原則，而且也暴露了它对于安定国民生活是毫无誠意的。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甚至連从业員的私生活也横遭干涉，其中包括同其他工会組織干部的私人接触受到禁止，不敢出席友人的婚礼，以及工会在处理財产上也要受到'指示'等等。我們認为，这是对于国民基本权利的蹂躪，其結果将迫使健全合法的行为轉向非合法化。我們坚决地反对这种暴行，今后誓与社会大众党、工会会議联合起来，为保卫团結权而斗爭。同时更郑重声明，我們将誓死保卫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的旗帜，为了完成工会的使命进行不懈的斗爭。"

然而，工会和社会大众党干部所进行的这次反抗禁令运动，由

于空有形式而无内容，以及干部中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的法西斯化，終于使陆軍所屬各軍需工厂的工会組織陷于崩潰，从而动摇了具有二十年历史的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的基础。此后在1937年春，因違反大选事件而引起內部糾紛的大阪市从业員工会內出現了“革新派”，他們声明退出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并决定組織所謂“日本主义”的工会。此外，大阪、名古屋两市的烟草业工会也自动声明解散；这样，在1938年中，官营企业劳动总同盟終于瓦解。

人民陣綫运动的开始

恰巧在1935年7、8月間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陣綫运动的綱領（参看本書第一章第二节）。在这次大会上，执行委員威廉·皮克向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如下的建議：

> “今后为了爭取不斷的胜利，日本共产党必須徹底清除宗派主义的殘余，并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机会，为維护工人阶級的日常利益进行斗爭。——这也是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的先决条件。具备了这种条件，才能引导劳动大众走向反对反动势力的道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演說集》）

1936年2月，当时在莫斯科的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化名“岡野、田中”，发表了一封《告日本共产主义者書》，在这封信中指出了在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运动中日本共产党的任务。来自海外的上述建議和鼓励对于連遭鎮压而被削弱了的日本人民陣綫运动的骨干——日本共产党展开活动起了作用。同年5月上旬，大阪府的工人、农民和消費合作社社員等收到了以日本共产党关西地方委員会名义发表的《建立統一战綫》、《統一工人阶級的反法西斯战綫》以及由共产党中央重建筹备委員会名义刊印的《組織人民陣綫》等小册子。日本共产党中央重建筹备委員会是由1930年被全协革新同盟开除的和田四三四、奥村秀松、宫本喜久雄等人于1936

年4月在大阪組織起来的。他們加入了社会大众党、东京劳动組合、新兴佛教青年同盟等組織，进行合法的活动，同时还利用合法工会和农民协会，通过无产阶級世界語团体、海員小組来进行以国际联絡为中心的活动，以及通过作为文化团体和党的代行机关等非法組織的活动，进行重建党的基础工作。然而，团結在重建筹备委員会周圍的一千多人，在1936年12月，就在日本各地遭到逮捕，因此未能完成預期的目的。

政治統一战綫的流产

共产党和它影响下的外圍組織因遭到暴風雨般的鎮压而被削弱了以后，标榜阶級斗争而集中了左派群众的"全評"以及"东交"等合法左翼工会也遭到反动势力的严重压迫而不得不逐步退縮。在这种形势下，憤激的基层群众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綫和統一战綫的要求。

1936年11月，全評（1934年11月由总評議会和全劳統一全国会議合并成立）在东京市芝区协調会館召开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大旨如下的反法西斯斗爭方針。

> "我們必須坚决地站在全体劳动人民的最前列，掀起一个大規模的国民运动，来反对广田半法西斯內閣。唯有这样作，才能保卫国民的生活，才能保障宪法所賦予的自由和政治权利。因此，不仅是工会，而是应当广泛地将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打成一片，建立一个統一的国民战綫。为了展开这种大規模的群众运动，城市无产者必須首先把斗爭目标轉到厂內，并且应当自觉地把厂內的斗爭和扩大巩固自己队伍的斗爭密切地結合起来。"

同时，还就統一无产阶級政治战綫的問題提出了如下的方針：

"我們全評和其他未参加社会大众党的許多兄弟工会虽然长时期以来处于社会大众党之外，但是我們全評从来沒有攻击过社会大众党。我們希望一切反法西斯的无产阶級政治力量統一起来，并且

声明如果这个希望能够实現，我們全評将和其他兄弟工会共同加入社会大众党，为此目的，我們参加了促使社会大众党彻底开放門戶的运动。我們全評認为，在目前进行統一无产阶級政治战綫的运动中，应当把社会大众党作为軸心；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必須朝着这个軸心团結起来，这就是我們的主要努力方向。……”

全評所以如此主張，就是因为在开展日本人民陣綫的运动中，可以作为核心的革命力量过于薄弱，所以它才考虑到只有社会大众党——日本工会会議这个系統可以成为核心；也就是說，以社会大众党——日本工会会議为核心联合所有合法的左翼工会和其他各独立工会、农民协会、水平社、群众文化团体結成統一战綫，然后再把还沒組織起来的广泛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团結在它的周圍，这就是当前唯一的組織上和策略上的課題。但是，应該成为这一核心力量的社会大众党——日本工会会議的領导干部都是一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以决不能指望这些人为实現組織的統一而努力，为此，只有加强来自基层群众的要求和压力，才能达到目的。这样，推动这个运动的任务，也就落到全評、东交等合法左翼工会以及进步的文化团体的肩上了。但是，当时在力量对比上，各左翼組織的力量比右翼各工会远处于劣势。尽管这样，而且就在这种組織力量的基础上，人民陣綫运动还是开展起来了。

1935年4月，大阪港南地区总同盟，全劳的基层群众（十五个工厂共有四千六百八十人）提出了建立統一战綫的要求，这件事成了这个运动的开端。后来很快地发展成为全国基层群众的要求。同年8月，东京交通工会首先提出了一項提案說：“应該以社会大众党为核心，在明确的反法西斯旗帜下，毫不犹豫地把社会大众党以外的一切本阶級的力量統一起来。”在翌年2月的大选中，大阪劳农团体协議会又以实际行动支持了社会大众党，这样接二連三地推动了以社会大众党为核心建立政治統一战綫的运动向前发

展。

日本的人民陣綫运动的开展，是和无产阶級政党的"政治統一战綫运动"交織在一起的。1936年5月，岡山地方无产团体协会根据基层自下而上地建立統一战綫的要求着手組織社会大众党支部。在成立支部的筹备会上作出的决議中，提出"政治統一战綫"的問題并把它当作当前的政治斗爭任务之一；这是"政治統一战綫"第一次出現在无产阶級政治运动的决議中。尽管在1936年2月的大选中，在反法西斯和反軍国主义的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社会大众党得到了空前的胜利（参看第一章第四节），然而因为該党的領导干部是一些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和社会法西斯分子，所以他們对于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运动竟然頑固地采取了敌对阶級的态度。事实的經过是这样的。

1936年7月，为了开展反法西斯斗爭而重新組織起来的联合組織——"劳农无产协議会"，为爭取成为"反法西斯統一战綫的推动者"发表了一項声明，主張：一，組織动員所有被社会大众党关在門外的无产阶級团体；二，为了从反动势力的强权和重压下拯救劳动大众并保卫他們的生活，社会大众党和其他各无产阶級团体必須共同开展坚决的斗爭；三，如果社会大众党开放門戶，我們准备随时可以解散自己的組織与之合流。但是，这項声明却被社会大众党根据以下理由加以拒絕了。

这些理由是："日本的无产阶級运动在現阶段与其建立人民陣綫，不如首先为了加强无产阶級运动的主体力量进行斗爭。因此，所有的工农团体都应該立即团結在社会大众党的旗帜下"；"人民陣綫运动乃是忽視日本社会力量的不現实的斗爭方式"；"日本的法西斯是合法的、来自上层的，而不是来自下层的，而人民陣綫的战略体系是共产党为了向各方面'扩張'而采取的妥协政策；另外，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和国民陣綫兩大陣营所引起的思想斗

争，和我党反法西斯斗争的具体战略是不相容的”。(1936 年《社会大众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由于这种縁故，社会大众党和劳农无产协議会之間，总同盟和合法左翼各工会之間，更加不能进行共同斗争。于是，劳农无产协議会就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說：“通过这一次大会把我們劳农无产协議会变为全国性的政党；并通过和社会大众党进行全国性的共同斗争，争取完成新的政治上的合并运动。”从此，它自动地放弃以往建立統一战綫的运动方針，而改組为日本无产党，形成了和社会大众党相对立的政党。至此，政治統一战綫运动終于宣告失败了。

尽管人民陣綫运动一时受到挫折，然而从 1937 年起工人运动急剧轉入高潮；特别是以八幡鋼鉄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为开端，不顧右翼社会民主主义干部的反对，在全国范圍內掀起了罢工的浪潮；同时这次斗争也把一向追随在日益加剧的自发斗争后面发号施令的左翼工会領导阶层甩到一边。

反法西斯的文化活动

当时在日本，同劳动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綫运动相呼应，在文化、思想界也开展了包括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內的更加广泛的人民陣綫运动。这个运动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上的統一組織的，只是受到政治的影响，并且在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以利用論坛提倡人道主义，或者刊行《人民文庫》等文化領域內的一种分散性的运动方式进行活动而已。戶坂潤在 1935 年 9 月号的《响尾蛇》杂志上曾就这个問題发表如下的談話：

“……既然文化运动毕竟要受到政治活动的制約，那么，在政治上尚未成立人民陣綫的今天，老实說，就不可能产生作为人民陣綫的眞正有机的一翼的文化运动。然而也不应該忘記，文化运动在某些方面还有它

对于政治活动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对于从反法西斯的侧面来广泛地团結各种民主力量这样一种政治运动——人民陣綫运动，文化运动尤其可以具有更多的独立性。本来，和人民陣綫这样的政治运动相配合的文化活动（作为战綫的一翼和配合运动）的形式，至少从外表看来是文化的自由主义。这种文化的自由主义最近也被称为人道主义。它的一个特点是对于政治运动保持相对的独立，并以自己特有的运动形式間接地参加政治运动，或与政治运动相配合……”。

当时的主要人道主义論者是論坛上的中心人物、进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三木清。他强調：“对于反对文化的野蛮現象，人道主义者不仅要为文化，更应当为人道进行斗争。因此，人道主义者尤其不能不反抗今天的野蛮現象——法西斯主义”，并且批判了和法西斯主义勾結在一起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的現代意义》）。另外，青野季吉也极力倡导人道主义思想，借以帮助知識分子摆脫思想上的混乱、空虛和頹廢状态（《現代人道主义的文学》）。患有麻瘋病的北条民雄的名著《生命的初夜》（1936年）以及其他作品之所以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巨大共鳴，也是由于这些作品反映了作者在絕望的环境中仍然追求人道主义的渴望。另外，在1936年3月，为了抵制被認为是政府的御用文艺团体——文艺恳談会（1934年在前警保局长松本学授意下成立，1937年并入帝国艺术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庫》，出版了同名的杂志《人民文庫》。

以武田麟太郎为首的轉向作家（包括高見順、本庄陸男、田宮虎彥等）以此为据点竭力主張建立根据“散文精神的現实主义”，企图从文学上进行抵抗。虽然色采不同，但也表現这种傾向的文学作品有：島木健作的《獄》（1934年）、《黎明》（1935年）、《再建》（1936年），山本有三的《眞誠》（1935—1936年）、《路旁之石》（1937年），石坂洋次郎的《年青人》（正、續編）（1935—1937年），石川达三的《阴影下的村庄》（1937年）等。

要求摆脱不安、动搖、頽廢情緒的愿望超越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場的差异，广泛地深入到爱好自由主义的文化人的心里，甚至頽廢本身也被認为“含有反抗封建殘余的因素”（大森义太郎）而获得了“具有某些进步性（虽然是被动的）”的評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文化人士是怎样在到处发掘对于天皇制破坏文化的抵抗力量。就連頽廢情緒也可能轉化和組織成为反法西斯的东西，因而开展人民陣綫运动具有客观上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抗議德国納粹党焚書事件（焚毁了有关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書籍）的文化界人士，为了从法西斯魔掌中保卫学术的自由，成立了以德田秋声为会长的“学艺自由同盟”。这件事說明人民陣綫性質的文化运动已經达到頂点。

这种运动不仅出現在評論界、文学界，而且也出現在戏剧界和电影界。1936年9月，为了追悼同年6月逝世的社会主义現实主义之父——高尔基，新协剧团在筑地小剧場公演《底层（夜店）》的时候，观众人数打破了該剧場成立以来的最高紀录。新协剧团和新筑地剧团即使在无产阶級文化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也坚持不懈地公演了《黎明前》、《雷雨》、《天佑丸》、《群盜》等进步戏剧。特别是《群盜》中主人公的呼声——“不自由，毋宁死”，更是使观众深受感动。另外，值得重視的是，1937年6月，前进座开办了以共同生活为主的电影剧研究所，不断地演出了歌舞伎，新的戏剧和拍制电影。前进座針对松竹資本利用名演員和大剧場的作法进行了斗爭，从而使营业性的演出得到了改进。在这个时期，电影界的进步也很突出，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努力表現群众的悲欢，追求人道主义思想；如实地反映社会現实，揭露社会的矛盾。1936年出現了以抛弃諸侯嗣子地位而奔馳在荒野中的虛无主义的落草武士的首領为主人公的《战国群盜傳》（PCL和前进座的协作作品，瀧澤英輔主演）和把尾崎士郎的作品搬上銀幕的《人生舞台》（內田

吐梦主演)。1937年出現了描繪走向沒落的小商人和对他进行盘剝的高利貸者的眞实情况的《赤裸裸的街》(內田主演)、《永远向前》(同上)、《青年人》(丰田四郎主演)、《眞誠》(田阪具隆主演)等优秀作品;另外,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向南美移民的人們为题材的《蒼氓》(熊谷久虎主演)和向懦弱而善良的失业流浪者的悲剧中注入了現代市民感情的《人情气球》(山中貞雄主演)等影片,都給許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充满了整个文化界的、相信人的善意的前进傾向,虽然也带有某种悲观气氛,但这里面毕竟还蘊藏着試图进行最后抵抗的决心,而这种决心潛伏在每个进步的知識分子內心深处。但是,文化界的这种保卫自由的运动,不仅未能和工农运动取得联系,而且由于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組織已被鎮压、摧毁(参看《太平洋战爭史》第一卷第四章第三节),也不可能同它取得联系了。这种文化运动是单純由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在相当模糊的反法西斯思想指导下搞的。对于当时的人道主义論和它的文学作品,宮本百合子曾經指出,这种主張未免过于唯心;她还指出傾向于"抽象地尊重人性"和"无原則地承認人性"的一些缺点;然后她批判說:"讀者們知道,在今天的現实社会中仅仅依靠抽象的良心,是不能解决任何問題的。"(《通向人道主义的道路》)事实上,尽管这一文化运动,是在一些个人的善良意志的基础上产生的,然而,它只是停留在报刊的言論上,沒有形成反法西斯的具体行动;因而,在遭到中日战爭爆发这一客观局势的重压后,就輕易地被摧毁无遺了。当这种空洞的希望被粉碎以后,在受到严酷的現实的蹂躏以后,便更加严重地陷入迷惑和流于逃避現实。在这时期出版了处女作短篇集《晚年》的太宰治、《雪国》的作者川端康成、《濹东綺譚》的作者永井荷風,都描写了这样的社会气氛。另外,未参加反法西斯組織的頽廢文化却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良好工具而被用来麻醉人民,防止人

民的"赤化"。然而，輪到灌輸軍国主义思想的时候，已經不起作用的頹廢文化就被禁止了。風行一时的流行歌曲《哥儿，可别忘了我》，因为色情气氛太重而被勒令改变了曲調，这件事最能說明問題。

第四节 从林內閣到近衛內閣

宇垣內閣的流产

广田內閣辞职以后，重臣、元老們为使陆軍和政党重归于好，經过研究的結果，推荐既为陆軍元老又与政党保有联系的前陆軍大将宇垣一成組織繼任內閣。长期閑居在伊豆长岡的宇垣接到組閣命令，是在 1937 年 1 月 24 日深夜。重臣、元老們的这种作法虽然博得了資产阶級和政党的贊成，但是陆軍方面却表示坚决反对。原来，在陆軍內部反对这个被称为"万年候补"的宇垣的空气一向是很濃厚的。当宇垣奉命組閣的消息傳出后，这种反对的暗流就立即泛濫出来了。宇垣还在去东京的途中，宪兵司令官中島今朝吾就奉陆相寺內之命赶来見他，并以陆軍內部的情况为理由劝告宇垣打消組閣的意图。在宇垣觐見日皇的同时，参謀次长西尾寿造、陆軍次官(副大臣)梅津美治郎、教育总监部本部长中村孝太郎、軍务局长磯谷廉介、軍事科长町尻量基、参謀本部科长石原莞尔、以及宪兵司令官中島等陆軍骨干人員在陆相的官邸举行会議，并作为"全軍意願"发表了下列两点結論。

一、如果宇垣組閣，将給肃軍带来恶劣影响，因而从統率全軍的角度上坚决反对他組閣。

二、陆軍方面認为，在对时局的認識上，宇垣內閣和陆軍之間存在着根本不可調和的矛盾

西尾参謀次长立即将上述强硬意見向参謀总长閑院宮作了报

告。1月25日，宇垣以前朝鮮政务总监今井田清德和陆軍中将林弥三吉为組閣参謀，开始了組閣工作，对于閣員的人选也大致作了决定，但为防范万一，并未召見任何一个候补閣員，而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对陆海軍的工作上。当日下午4时，宇垣正式訪問陆相寺內，要求推荐继任陆相人选，然而寺內只是反复劝告宇垣打消組閣意图，对继任陆相問題避而不談。接着，宇垣又訪問了海相永野，当时永野答应只要陆軍沒有意見，海軍方面随时都可以推荐继任海相人选。这样一来，問題只在陆軍了。宇垣会晤了陆相寺內后，陆軍在当天晚上7时召开了首脑会議，参加会議的有陆相寺內、教育总监杉山、梅津、中村、磯谷等人。根据会議的决定，翌日(26日)上午11时杉山和建川二人前往組閣本部会見宇垣，說明推荐继任人选有困难的情况，又一次拒絕了宇垣。在組閣的过程中，宇垣也曾要求他的旧部下朝鮮駐軍司令小磯国昭担任陆相。然而机警的小磯只表示"陆軍三长官同意就行"，而不作肯定的答复。

原来，陆軍方面反对宇垣組閣是有历史根源的。(一)宇垣曾在陆軍內部制造自己的派系；(二)在三月事件中，他在建川、小磯等人的支持下策划夺取政权的中途突然变卦，招致了陆軍中坚阶层的极大反感；(三)宇垣虽然进行組織新党活动，然而另一方面民政党却在策划捧宇垣为党魁，和政党对立的軍部对此感到不滿。

借口"全軍意願"反对宇垣組閣的陆軍方面所提的理由是：(一)必須追查"宇垣同三月事件的关系和他的責任"；(二)同既成势力有关系的人物不可能下决心革新政治，而宇垣却和目前的政治上层、政党、财閥等有着絕对不可分割的因緣。

在这种气氛中，內大臣湯淺往見西園寺回到东京以后，为了探听陆軍的意見，会晤了陆相寺內。据說当时寺內"已經大致沒有問題了"(«西园寺公和政局»)。但是，对于这个問題，陆軍內部校級

干部却坚决反对，致使寺內、杉山、建川、小磯等宇垣的亲信也不得不劝告宇垣打消組閣的意图。这批校級干部当时已經可以左右将軍們，完全掌握了全軍的統率权。陆軍的这种作法，曾引起各方面的指責。报上曾以諷刺性的口吻批評所謂"全軍意願"說，所謂陆軍的意願的提法恐怕是有問題的。甚至于逃避組閣的近卫文麿也写信給寺內，譴責了陆軍的行为。信中写道："……如果是由于政見的不同而爭論是非，或許还可以；然而在圣旨下达以后，对于奉旨組閣的人进行反对，这是大义上所不能允許的。"（1月25日，見矢部貞雄：《近卫文麿》）

由于客观上的要求，陆軍方面不得不正式表明态度（虽然是一种形式）。它发表了一項通告，內称："1月26日下午3时以陆軍三长官的名义向杉山元、中村孝太郎、近卫师团长香月清司就出任陆相問題征求过意見，結果三人都坚辞不就。"（根据牧野伸显的自傳《松籟淸談》中所說的，事后香月向友人透露，他并沒有受到征詢。）宇垣所以一直从正面要求陆軍提出继任陆相人选，不消說是由于存在着这样一个关卡，这就是：1935年5月根据陆相寺內的主張，把"軍部大臣任用制度"改为"現役軍官制"；而在上述通告公布以后，宇垣的組閣工作便完全陷入危机了。宇垣认为陆軍的作法是干犯天皇的大权，自己"旣然奉到圣旨，就必須排除万难，完成組閣任务"。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在1月27日上午要求內大臣湯淺仓平根据宪法运用日皇大权来約束陆軍，但是湯淺认为这样作会造成"流血事件"，未予同意。这样，宇垣的最后要求也被拒絕了。当日下午，似乎为了进一步迫使宇垣放弃組閣意图，陆軍次官梅津又发表了談話，"希望宇垣立即辞退組閣大命"。次日（1月28日），宇垣要求会晤陆軍三长官，然而得意揚揚的陆軍竟表示"并不拒絕会見，不过会見恐怕也无济于事"，予以婉言拒絕。至此，宇垣的組閣工作已完全陷于不可能。当天晚上，宇垣还发表声明說：

"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以便打开局面"。但是所有的办法已經用尽了。白白費了五天的力气以后，到了29日，宇垣終于打消了組閣的念头。

宇垣內閣的流产有力地証明了，在日本統治阶級內部，軍部的势力远远駕乎重臣、財閥、政党之上。日本法西斯体制的主体天皇和它的核心軍部，已經不仅仅干預政治，而且自命为法西斯独裁者了。

林內閣的成立

1月29日，即宇垣組閣宣告失敗的当天，樞密院議长平沼騏一郎被內定为繼任首相的第一候补人；陆軍大将林銑十郎为第二候补人。因为前一年剛从樞密院的"万年副議长"升为正議长的平沼辞而不就，于是在当天晚上，組閣"大命"就落到林銑十郎身上了。

林在1月30日上午10时，召見梅津陆軍次官，了解了陆軍內部的意見以后才决定組閣，并以十河信二(兴中公司兼塘沽运輸公司經理、前南滿鉄路理事)、大桥八郎(貴族院議員)为組閣参謀开始了組閣工作。陆軍方面因为阻挠宇垣組閣而受到各方面的譴責，所以这次一方面抱着旁观的态度，一方面又发表談話說:"陆軍所希望的是切合时势的革新;然而陆軍也充分估計到，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引起不良影响，反而不能取得成效"，暗示有意和其他統治势力进行妥协。尽管这样，实际上陆軍內部的意見并不一致。因为当时掌握陆軍实权的不是将官們，而是校級軍官。同时，林有个外号，叫做"牆头草"，也就是沒有主見、随人摆布的傀儡。最初林以为在軍部的支持下能够順利地完成組閣工作，可是因为他不了解应当作陆軍內部哪个阶层的傀儡，碰到了意外的障碍。

組閣参謀十河信二和石原莞尔等很早就有来往，他們以石原

为中心，在关东軍代表参加之下曾研究制定一个日“滿”两地联为一体的大規模五年国防計划，并得出一个方案。他們希望未来的內閣以实現这个方案作为決定政策的依据，并且以下列內閣成員名单为实現这一方案的絕对的必要条件，这个名单是：大藏相由池田成彬担任；商工相由津田信吾担任；陆相由板垣征四郎担任；海相由末次信正担任；总务厅长官由十河信二担任。(《西园寺公和政局》)林完全接受了这个方案，并以这个方案为依据开始組閣。林敢于出来組閣也正是因为有石原等人的支持。石原曾說过，“林这人，最能听摆布，既可以成为猫，又可以成为虎。”可是，将軍們对于在石原操縱下的林的組閣工作却不予支持。因为将軍們在受到陆軍中坚层軍官支持的情况下，不希望陆相掌握实权。林向寺內說明組閣方針，并且要求推荐板垣征四郎为繼任陆相，对此，寺內以其不能統率全軍为理由表示不同意，并傳达前一天陆軍三长官会議决定推荐中林孝太郎为繼任陆相。林感到这和自己的要求不一致，把这个問題暂时保留下来，随即往晤海相永野。永野也不同意林所指定的末次繼任海相，并說：“海軍方面一向从自己的立場推荐繼任海相人选，这次也希望尊重这一慣例。”因而这个問題未能取得一致。于是，林一方面派十河信二作为組閣本部代表到各方面进行活动，一方面亲自往晤参謀总长閑院宫，接着又訪問寺內，再度要求推荐板垣征四郎；但是因为陆軍首脑們坚持三长官的决定，未能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担任組閣工作的人員中屬于林的一派害怕过分坚持必然要造成內閣的流产，不得已在1月31日晚放弃了原来的方案，根据軍部的推荐，决定由中村繼任陆相，米內光政繼任海相。十河信二对于林向軍部妥协，板垣、末次未能入閣感到失望，退出了組閣本部。这就是說，林由陆軍中坚层軍官的傀儡变为陆軍上层的傀儡，因此失掉了陆軍中坚层的积极支持。

在石原、十河方案中，大藏相原定为池田。但是他看到閣員名单后，在正式接到入閣邀請时，以健康問題为理由表示辞退，另行推荐兴业銀行总裁結城丰太郎。这一推荐征得了結城的同意。池田贊成由津田信吾担任商工相，并一再慫恿津田入閣，但津田以鐘紡事务繁重不能脱身为理由，拒絕入閣。另一方面，根据广田內閣垮台的經驗，林对于吸收政党成員入閣的問題采取愼重态度。但后来他邀請了政友会的中島知久平、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昭和会的山崎达之輔入閣，这使社会上感到意外。他这样做，据說是由于这三个人都贊成組織"新軍新党"；而中島和永井二人还策划捧林上台。林約請以上三人入閣是以他們"脫党"为条件的，可是永井認为"政党成員脫党入閣是自杀的行为"，因而拒絕入閣。中島虽曾一度表示积极，但由于党內的复杂情况，也終于表示不能接受"脫党"的条件，而拒絕入閣。結果，只有山崎达之輔答应入閣，被內定兼任遞信相和农林相。剩下的商工相一席，經林再三考虑結果內定林的同乡、昭和制鋼会社社长、海軍造船中将伍堂卓雄担任；2月2日林內閣正式宣告成立。八名閣員占据了十三把交椅，所以被称为"二人三足內閣"。

林內閣閣員名单如下：

首相兼外相及文相	陆軍大将	林銑十郎
內相	协調会理事	河原田稼吉
大藏相兼拓务相	兴业銀行总裁	結城丰太郎
陆相	陸軍中将	中村孝太郎
海相	海軍中将	米內光政
农相兼遞信相		山崎达之輔
商相兼鉄道相		伍堂卓雄
法相	大审院檢事局次長	盐野季彥
內閣書記官長		大桥八郎

（后来陸相改由杉山元、遞信相改由儿玉秀雄、外相改由佐藤尙武担

任。)

結城財政

由林內閣的組閣过程不难看出，尽管陸軍內部上层和中坚之間存在着矛盾，然而在担任財政部門的閣員人选上，他們却一致同意由实业界代表人物——池田、結城、津田等人担任。同时，这些財界代表人物也不反对参加这个典型的軍部的傀儡內閣。其所以这样，是因为軍部法西斯在本質上不但不排斥壟断資本家的利益，而且是更加徹底地貫徹壟断資本主义的阶級統治。軍部法西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虽然和壟断資本发生过一些表面的摩擦，但是壟断資本在骨子里是坚持要求通过驅使国家权力来达到加强本身統治的目的的。而且也不能否認，左右国家权力的始終是壟断資本。这就是林內閣的一个特点——軍部、实业界相結合的財政政策所以出現的原因。

結城就任大藏相以后，致力于"消除軍部与財界之間的隔閡"（森广藏語），最足以說明他代表壟断資本利益的一件事，就是他抬出池田成彬担任日本銀行总裁。結城在 1937 年 2 月 7 日，約請池田出任日本銀行总裁，当即得到池田的同意。关于这件事，池田曾发表如下的談話：

"……对于石原的具体方案，尽管存在着历史条件必須加以考虑，但是总的說来，我还是認为应該根据国际形势貫徹执行陸軍所要求的加强国防的計划。然而也不能因此就摧毀現有的經济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成为金融核心的日本銀行如果不愼重从事，前途将不堪設想。所以，为国家着想，財政金融实在是第一等大事。也就是說，旣不能为了执行軍部中坚层的方案而摧毀現有的經济机构，造成混乱，也不能忽視国防。局面非常严重，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大藏相結城的要求，并想尽最大的努力来协助他。"（«西园寺公和政局»第 5 卷）

馬場財政的弊端：空前未有的龐大的軍事預算給尙未完成战

时經济体制的实业界造成了沉重的負担，这个矛盾表現为物价的暴漲。結城財政的任务在于糾正这种弊端。但是它对于馬場財政的重点——“加强国防”的方針，却原封不动地繼承下来了。大藏相結城本人曾經这样說过：“我并不反对前任大藏相馬場的預算編制方針，处在这种局势下，采取这样的方針也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希望实行龐大軍事預算的不仅是站在侵略主义最前列的軍部，还有壟断資本。因为壟断資本企图霸占“滿洲”和中国的市場，来解决軍事工业原料供应的严重困难和国內市場日益狹小的問題。結城剛一就任大藏相，日本經济联盟就向政府提出如下的建議：

> “我們認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加强我国国防确是当务之急。因此，除国防費以外，其他各部应当忍受牺牲，避免增加預算。国防以外的一般行政机构的增添、扩充对于增进国民的福利固然也有必要，但如果因此而使国家的开支超过国民的生产力，則将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必須以加强国防为首要任务，其他各部的行政費应当根据尽量緊縮的方針編制預算。”（《东京朝日新聞》，1937年3月9日）

結城財政的基本任务就是，按照壟断資本的要求編制“国防”預算。在口气上似乎同壟断資本之間存在某种矛盾的这个“革新財政”，沒有多久就被人們恰如其分地称为“軍部、实业界相結合的財政”了。結城財政的目的在于抑制物价上漲，因此他拋弃了前任大藏相馬場認为物价上漲是由于心理作用的說法，而承認物价上漲的根源在于龐大的預算，所以結城在他的預算編制方針中加上了这样一項：“为了緩和物資需要量的急剧增加，应以減少經費开支为前提”。3月公布的新預算总額为二十八亿七千万日元，比前任大藏相馬場时的預算減少了一成。但是在这新預算中，被削減部分是包括有关农村的經費在內的行政費和国民生活安定費；至于軍費不但沒有削減，反而有了增加，仅陆海軍直接軍費就达到十三亿六千万日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三亿日元，軍費在总預算中所

占的比重由馬場时期的百分之四十三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九。此外，軍人优撫費、国民保健費和救护設备扩充費等为数不多，而有关社会福利的經費，則只有符合于加强国防这一目的的才被保留了一部分。关于这一点，陆相杉山发表了如下的談話：

"……在貫徹社会政策的項目中，有一項是增强国民体質，軍部特別从国防观点上对此十分重視。今后如果再提出有关国民健康保險之类的法案，軍部将不惜大力支持促其实現。"

針对龐大的軍事預算刺激物价直綫上升的情况，大藏相結城按照壟断資本家的要求，采取了保留軍費，紧縮其他經費的措施。这是从广田內閣的"广义国防"轉变为林內閣的"狹义国防"的眞面目。他鉴于前任大藏相馬場因为六亿日元的大量增稅而受到責难，所以結合减少岁出，把增稅額由六亿日元减为四亿三千万日元。根据临时賦稅加征法案，主要地增加了以所得稅为中心的法人营业收益稅、股息稅、繼承稅、矿产稅、酒稅、糖类消費稅、交易所稅、临时利得稅的稅額。地方稅制虽然沒有什么变更，但是，如果把专卖事业純益也考虑在內，則总稅收額中广大群众所負担的比重已經达到百分之五十五。此外，地方財政調整交付金被取消了，仅临时地方財政补助金一項有所增加，因此国庫支付給地方財政的补助費也由馬場时代的二亿三千万日元减为一亿日元；但公債收入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亿一千八百万日元。結城稅制改革法案的成果是："过去由于馬場稅制改革法案的公布而陷入停业状态的公司債券市場，随着結城稅制改革法案的确定恢复了营业。"（«东京朝日新聞»，1937 年 4 月 10 日）大藏相結城在編制所謂"漸进的"預算的同时，想借扩充生产来抑制物价。中日战爭爆发以后，由于軍需物資的需要迅速地大量增加，"扩充生产"成了重要国策之一。这时，大藏相結城提出了通过"扩充生产"来抑制物价的办法，然而，他的財政政策本来就是扩充生产，特别是扩充軍需生产。

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等軍需工业部門通过新建、增資和发行企业債券等措施扩充了資本。到1937年3月，資本的膨脹赶上了日本經济史上資本膨脹最大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的最高水平。由于生产資金的需要量急剧增加，放款利率回升，銀行、信托、保險公司等金融机关的放款額也随着急剧增加。結果，为弥补軍事預算而增发的公債在銷售上遇到了阻碍，造成了扩充生产政策和公債政策之間的矛盾。大藏相結城想通过修改日本銀行制度来緩和这个矛盾，約請了三井財閥的代表人物——池田成彬出任日本銀行总裁。这就出現了人們所說的"結城池田合作財政"。池田就任后，为了加强日本銀行統制金融市場的力量，采取了在市場上公开收卖公債的措施，积极参与产业金融活动；在必要时向兴业銀行提供資金；此外，聘請了金融界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担任日本銀行的理事和监事。至此，日本銀行的統制力由商业金融的范圍扩大到工业金融的范圍。在扩充生产的要求下，日本的經济逐漸被納入統制的軌道。財閥通过向最高金融机关派遣代表、同財政机关密切結合的办法开始走上統制經济的道路。

"推完磨杀驢式"的解散議会

在第七十次議会期中发生政变以后成立的林內閣，因为一时来不及充分考虑具体政策，因此，它对于广田內閣遺留下来的重要法案，作了这样的决定：增稅法案、电力国营法案、义务教育年限延长法案、地方財政調整补助金等法案暫且擱置不提；对于前任內閣的預算方案則作了上述的修改，准备向2月15日开始复会的第七十次会議提出。林內閣并于2月8日发表了如下的五大政綱，宣布了一般的施政方針。

一、更进一步地明确国体观念；闡明敬神尊皇的大义；发揚祭

政一致的精神，以期国运亨通。

二、遵循欽定宪法的条款，謀求我国独特的立宪政治的发展；訪察民意，傾听輿論，以期实行开明的政治。

三、为了根据国际正义来实現东亚的安定和万邦的共荣，并使国际关系明朗、融洽，执行举国一致的外交政策。

四、充实为帝国安泰、国运隆昌，以及貫彻国策所必需的国防軍备；同时必須提高生产，以培养国力。

五、适应国内外經济形势謀求生产事业的全面发展；在对生产事业采取保护措施的同时，实行适当的統制；并发揮国民的創造力。

上述政綱，虽被社会大众党嘲笑为“教义式的政綱”，然而在傳聞林首相企图实行一国一党的法西斯政治的时候，这种套用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的、复古色彩极为濃厚的政綱，其意图何在，确实引起了各方面的深切注意。

第七十次議会复会以来，最初一个阶段是比較順利的。然而在会期过半的时候，即3月16日，政友会和民政党在众議院全体会議上以联合提案的形式提出了一項“众議院議員选举法修正法案”，这項法案，尽管社会大众党及其他小党派表示反对，还是列入了議程，在委員会上也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并于24日由全体会議通过，提交給貴族院。其內容包括混合开票、緩和有关連坐的規定、扩大第三者活动范圍、放寬对于竞选期前活动的限制等項。提出这个提案的目的是为了廢除政党在选举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也是为了开脫1935年2月大选中发生的違反选举法事件的牵連者的罪責。对于这項法案，林內閣站在“肃正选举”的立場坚決表示反对。面对这种情况，政、民两党在法案提交貴族院以后，为了爭取这項法案得到通过，展开了狂热的活动。正如社会大众党在声明中所指出的，“这一法案是为了开脫違反选举法的罪犯，和以改

劣选举为目的提出来的。这是既成政党的一个丑恶的政治交易”。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了迫使政府同意，采取了对政府的提案拖延审議的战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会期由3月25日起延长了六天，可是政府所提出的修改关税法案、退职金法案、鋼鉄冶炼业法案、軍机保护法案、农地法案、帝国燃料兴业公司法案、国民健康保險等重要法案始終拖而不决，使政府感到焦虑，尽管如此，政府和政党之間仍未能取得妥协。会議的停滞不前，逐渐引起各方面的責难。这就使政府面临这样的抉擇：或者延长会期或者解散議会。3月30日深夜和31日上午召开了紧急內閣会議，以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作出了解散議会的决定。对此，除了社会大众党、国民同盟、东方会等小党派因为反对大政党而欢迎解散以外，政友会、民政党則由于政府的意外打击而深感狼狈。它們指責政府的这种措施是一种“推完磨杀驴”式的行徑。因为，政府提出的八十三項提案中已有四十八項获得两院通过，另外还有几項可能通过。政府則反唇相譏，把这次解散說成是“懲罰性的解散”，并且发表了如下的解散理由：

> 在当前的国內外形势之下，为了克服时艰，使国运亨通，朝野必須同心协力。为此，政府在組閣伊始即出席議会，并竭誠企求議案获得通过。然而从审議的經过看来，众議院方面极其缺乏誠意；特别是对于同国防、安定国民生活等有关的重要議案的审議，横加阻挠，致使紧要的政务停滞不前。政府对于众議院是否眞正認識时局的严重性，是否有誠意在立宪大业上完成翼贊的任务这一点不能不表示怀疑。由上述事实看来，要求革新議会的主張不是无的放矢。当此时机，政府有必要向公正的国民提出控訴，要求天下公断是非，从而使議会成为实現帝国宪法的桥梁。同时希望国民在健康的政治基础上自觉地和政府同心协力，为打开当前的重大局势发揮力量。因此，政府不得不奏請解散众議院。

当时社会上对于林內閣作出解散議会的决定的內幕有种种猜測：有人說这是由于林首相已經完成組織新党的准备工作；也有人

說是由于海相米內在3月20日深夜的閣議上强硬主張解散；还有人說这是由于林內閣的后台老板——石原莞尔和淺原健三等人以“如不解散，将引起严重后果”进行了恐吓。(《西园寺公和政局》第5卷)如果我們分析一下政府的这种“懲罰”的底細，就不难看出，这不单是为了“懲罰”政党，而且是想利用同政党发生对立的机会解散議会，爭取在国民的支持下建立法西斯統治。

第二十届众議院議員的大选定于4月30日举行。政府在4月5、6两日先后召开了地方长官和警察部长会議，就政府对大选的方針作了指示；指示中要求严厉取締“离間軍民、煽动赤化”的言論。同时，与会者一致同意：“不要因为害怕被指責为蹂躪人权而放松警察的职权”。为了牵制两大政党，政府还制定了三条标語：“我的一票关系到打开时局”；“認清时局，促使日本跃进”；“舍己奉公是政治之本”，要求选民严肃地对待选举，不要弃权。

抛开1942年御用的“翼贊选举”不算，第二十届大选可以說是日本投降以前的最后一次选举。选举結果如下：

政党	当选人数	同解散前比較	得票总数(单位：千)
民政党	179	减 27	3,668
政友会	175	增 3	3,584
社会大众党	37	增 18	947
昭和会	19	减 5	398
国民同盟	11	0	282
东方会	11	增 2	221
其他各派	9	增 5	335
中立	25	增 6	769
合計	466		10,204

(《日本經济年报》第28輯)

这次大选具有下列几个特征：

一、弃权率打破了历年的記录，大阪为百分之五十一点五(比上一届增加百分之十以上)；京都为百分之四十一点四；东京为百分之三十九点一；全国总平均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比上一届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增加百分之五以上)。这种情况，突出地表明了国民对大选漠不关心，对政爭失望，以及对政府的消极反抗。

二、反对政府的政党联合战綫取得了压倒的胜利。民政党、政友会、社会大众党等共取得四百余席，八百余万票；而被認为支持政府的昭和会、国民同盟等只取得不到四十席，一百五十万票。这个結果明显地表明了国民反对林內閣的情緒。

三、社会大众党有了巨大发展。当时它的竞选口号是："国民富裕，'国防'巩固"、"調整中日經济及文化关系"、"締結日苏互不侵犯条約"。日本无产党也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保卫議会政治"等口号，竞选的結果得到近百万票。日本无产党的唯一当选人——加藤勘十(东京第五区)得五万四千票，創造了当选者得票数的最高記录。社会大众党、日本无产党获得的选票这样多，明显地反映了国民反对軍部、反对法西斯的情緒。当时，池田成彬曾对原田熊雄說："国民充滿反对軍部的思想，如果再一次解散議会，恐怕軍民之間的关系更要恶化。"(《西园寺公和政局》第5卷)

林內閣总辞职

大选結果，陷于不利地位的林內閣，为了决定当前的对策，在5月3日召开了重要的內閣会議。会上圍繞着总辞职或再次解散議会的問題展开了爭論。林首相的意見是：他本来想辞职，讓近卫上台，可是近卫不同意．同时考虑到馬上辞职意味着向政党屈服，很不妙，所以打消了辞意。这样，內閣决定留任，并以首相的名义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从目前的国內外形势看来，当前局势十分严重。为了克服时艰，旣

要克服因循守旧，又要避免过激，断然进行切合客观形势的革新。……現在已經公正地完成了大选，政府衷心期望新当选的議員們以舍己奉公的精神，根据国体的本义，发揚开国的理想，发展我国独有的立宪政治，以便在正确認識时局的基础上完成翼贊大政的任务。……政府基于上述的信念和期望，誓以竭誠奉公之决心貫徹执行当前最迫切的各項政策……。”

当天，林首相在記者招待会上也曾表示：“在出席特别議会听取各議員的言論以前，不考虑进退問題”。政府所說的最紧要的措施是成立三个新的机构。第一个是临时物价对策委員会。5月10日內閣会議决定成立这个机构，并由林首相兼任会长，結城、伍堂、山崎兼任副会长。准战时体制的加强引起了預算的急剧膨脹，使国民生活受到压迫，并大大地影响了財政計划。这个机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抑制物价而成立的。第二个机构是企划厅，它的組織条例是在5月13日頒布的。这是在軍部的建議下成立的一个統一“国策的机构”；由結城任总裁，井野碩哉任次长，于5月14日即开始工作。第三个机构是文教审議会，它的組織条例是在5月24日頒布的。

这次大选的結果虽然大致預示了林內閣的命运，然而林內閣一再表示强硬的态度，从而加深了它和政党之間的对立。当林內閣表明繼續留任的态度以后，由于胜利而态度强硬起来的政党立即明确地表明打倒內閣的决心。政友会在5月5日的临时总务会和干部会上和5月11日的議員大会上明确指出：必須按照国民在大选中所表明的意願，坚决彈劾違宪的林內閣。民政党也在5月7日召开的議員会議上对林內閣展开攻势，它指出：为了实行打开时局的措施，首先必須迫使林內閣下台。5月8日社会大众党在新当选的議員会議上也主張“林內閣下野和改变政局”。然而林內閣的态度并未因此而有絲毫的改变。5月6日商相伍堂前往名古屋时在火車上发表談話說：“即使議会提出不信任案也沒有辞职的必

要；如果提出不信任案，就再一次解散議会”。同伍堂的談話相呼应，5月12日林首相在他的时局談話里也表示将“以紧急对策应付特别議会”。5月17日夜，在第二次地方长官会議的晚餐会上，林首相又发表了如下的談話：“我願意趁这个机会表白自己的心意。……我認为政党已經忘掉日本本来的面目，变成了欧洲式的政党。……在議会上朝野互相鬧对立是欧洲式的作風；而这次解散議会的目的正是为了通过解散改变議員的思想，我希望政党自觉地改变态度。……如果現在我下野，就要失掉解散議会的意义。我認为弄清議員們是否眞的反省自觉，这是本人的义务。”另外，在前一天，儿玉递信相在火車上也发表談話說：“既然各政党持那样的态度，那就只有同他們进行决战。”这些談話进一步激怒了反对林內閣的政党。

根据5月14日政友、民政两党干事长的协商，5月19日两党代表举行了首次会議，作出联合倒閣的决定：

> “为了打开当前局面，使国运亨通，需要一个发揚宪法本义、以民意为依据的眞正举国一致的內閣。然而林內閣竟然无視民意、蹂躪輿論，妄想强使議会盲从，实行專断，貽誤天下大事。为了国家利益，我們一天也不能容許这种內閣繼續存在下去。为此，我們成立打倒林內閣联盟，願意同各方面的同忧之士联合起来，为尽快实現上述目的而斗爭。”

5月28日政友、民政两党又召开了大約有五百余人参加的联欢大会（出席人員为貴、众两院議員及两党全国各地支部領导人），大大地壮大了倒閣的声势，倒閣本部也在这时成立了。24日，林內閣唯一的与党昭和会也根据望月的提議而宣告解散了。同时，望月还敦請林首相愼重考虑进退的問題等等。客观形势对林內閣越发不利。面对这种局势，林內閣內部发生分化，結城、盐野、伍堂等强硬派反对向政党低头，他們再三給林首相打气，而河原田、山崎、儿玉、米內各相則主張考虑进退問題，不要蛮干下去。这样，內閣

的辞职已經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林首相本人在5月29日也下定了辞职的决心，并向近卫探詢是否有意出馬。（林首相估計近卫不会出来，他也只是探詢一下而已。他的本意是想讓杉山上台，因为他考虑到，如果向政党屈服，势将影响軍部的威信，在世界面前失掉面子。）（《西园寺公和政局》第5卷）

在政友、民政两党联合倒閣委員会的倒閣本部决定正式开始行动的5月31日，林首相在临时召开的內閣会議上表明了內閣辞职的意向，获得閣員的一致同意。这样，成立仅三个多月（一百十九天）的林內閣宣告垮台。林的辞职声明如下：

"大选后，我对时局的态度已經在5月3日的声明里詳細表明。从那时候起，我虽然一直致力于制定措施，然而由于奏請解散議会事件同众議院部分議員发生糾紛，不能不感到遺憾。我相信政府解散議会的公正理由自会得到全体国民的理解。目前局势严重，正是朝野同心协力，克服时艰，宣揚国威的时候，絕对不容許国內有任何对立斗争。內閣成立为时不久，未能完成执行国策的重大任务，內心感到惶恐不安。現在'革新'政治的基础已經奠定，謹此奏請辞职。但願繼任的內閣依照国体本义在立宪政治上有所建树；并相信我的辞职是有利于国家的。"

第一屆近衛內閣的成立

促使林內閣下决心辞职的一个直接原因是近卫在进京途中发表的談話，談話的內容如下：

"大选后，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并且毫无下野的表示，另一方面，政党倒閣运动也日益激烈化。这样下去，恐怕政局的不安将日甚一日，不但对內难以推行国策，而且要受到外国的輕侮，不能貫彻坚定不移的对外政策。因此必須寻求打开局面的道路。但是政府在目前似乎还沒有成熟的步驟，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它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今后一旦发生政变，必須有一个能够組織强有力的內閣的人物出来掌握政权，否則就不可能收拾局面。到那个时候，政府和政党的关系就会在举国一致的前提下趋于好轉。总而言之，貴族院必須注視政局的动向，并慎重对待。"

近卫的这次时局談話实际上是代表元老和官僚劝导林內閣下野。5月29日晚上近卫回东京后，林首相立即以电話邀請近卫出馬組閣。但是这并不是林的心愿；正如以上所述，林是希望陆相杉山担任下一届首相的。当时元老西园寺根据源田熊雄的报告，知道林的意图以后，发表了如下的意見：“讓陆相出任內閣总理，这是不妥当的。应当讓近卫出来。当然这样近卫要辛苦一些。可是除近卫以外，我認为再沒有更适当的人选了。”（《西园寺公和政局》第5卷）在当时的形势下，元老为了調停軍部和政党之間的糾紛，为了緩和国民反法西斯的情緒，不能不把在各方面享有众望的近卫当作最后一張王牌。过去以健康情况不佳为理由避免出任首相的近卫，这次也感到“如果这次再推辞不就，恐怕有背为臣之道”，因而表示同意了。

6月1日傍晚正式奉到組閣命令的近卫，以他的旧知內务官僚出身的河原田稼吉为組閣参謀长，在后藤隆之助等人的协助下开始組閣。在人选方面大致作出决定以后，近卫于6月1日夜晚和2日先后会晤陆相杉山和海相米內，商定他們两人繼續留任。当时陆軍方面提出了“明确国体”、“加强国防”、“革新政治”、“安定国民生活”等要求，海軍方面則要求同意它的“新补充計划”，对此，近卫表示完全同意。大藏相原定由結城留任，后来由于陆軍方面推荐的馬場鍈一决定入閣，討厌馬場的結城就拒絕留任。近卫又約請前正金銀行老板儿玉謙次担任，儿玉以无法滿足軍部的要求为理由加以拒絕，最后决定由大藏次官賀屋兴宣接任大藏相，軍部推荐的馬場担任內相。商工相一职原定由平生釟三郎担任，由于他表示愿当文相，坚决拒絕担任这个职务，因而改由东北兴业銀行总裁吉野信次担任。文相一职則內定由优秀的地方官大阪府知事安井英二担任。法相一职，因考虑到同平沼騏一郎的关系，决定由盐野連任。农相原定为石黑忠篤，由于他坚辞不就，改为有

馬賴宁。另外，政党参加內閣的人选也順利地确定了。政友会同意由該会成員中島知久平出任鉄道相；民政党也同意由該党成員永井柳太郎出任遞信相。西园寺最担心的外相一职，也取得前首相广田的同意，决定由他以副首相的資格担任。內閣書記官长定为風見章。近卫順利地完成組閣任务以后，于6月4日上午同賀屋、吉野就財政經济政策进行协商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当日下午內閣举行就职仪式，正式宣布成立。

近卫內閣受到各阶层意外的欢迎。其所以这样，也許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人們都抱着"依靠这个人，国家就能得救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信任感"（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上卷）；閣員的平均年龄只有五十四岁，被称为"青年內閣"；同时，近卫声明中的"国际正义"、"社会正义"等口号同林內閣的腐朽的教义式的政綱对比起来，也給国民一种新的希望。尽管如此，不能否認仍有一部分人为近卫內閣担忧。因为，从閣員的名单上可以看出，由馬場（他虽然受到实业界的反对，但由于要求龐大預算的軍部的强力支持，仍然当上了內相）、賀屋、吉野所代表的財政經济政策，包含着实行通貨膨脹的財政和健全財政两种可能性。近卫內閣是在軍部、实业界、元老三者的不同打算和期待下，在国民盲目欢迎的气氛中成立起来的。据說原田就近卫內閣的成立向西园寺道賀的时候，西园寺回答說："有什么可賀的？应該同情近卫！"（矢部貞治：《近卫文麿》上卷）。西园寺的这两句話充分說明了軍部、实业界、元老三者間并沒有达到眞正的互相理解和互相信賴，以及人們对于这种情况的不安。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現，就是7月7日軍部在华北发动的武装侵略。

第三章　中日战爭的爆發

第一节　战爭前夕的中国

長征和八·一宣言

“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內阶級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①

这种形势特别是以 1935 年的何(应欽)梅(津)协定(第一卷第四章第四节)为轉折点，明确地形成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战略的轉变，就是：引导中国人民走上“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道路。中共自从 1932 年对日宣战以来曾不止一次地发表抗日宣言。后来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剧，又于 1934 年 4 月发出了建立反帝統一战綫的呼吁，号召“一切眞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业与性别，都联合起来，在反帝統一战綫之下，一致与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作战！”(《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領华北幷吞中国告全国民众書》)在这个号召下，有宋庆齡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等数千人签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綱領》公布了。綱領呼吁組織抗日救国的民族自卫战爭，要求动員所有的武装力量和全国人民，幷实行全民武装，成立有各阶层代表参加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員会”及其下級組織。中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呼吁，公开签名贊成的不下数十万人。然而当时“左”傾机会主义者在中共党內占据着領导地位，他們不

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第 249 頁。

但阻撓了統一战綫的发展，而且否定了毛澤东所主張的卓越的游击战术，从而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攻中遭到失败，不得不突圍撤离江西根据地，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为了在不利的形势下保存力量，为了北上挽救华北的危机，1934 月 9 月底紅軍开始西征。除后来新四軍的領导者項英、陈毅等将領繼續留在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以外，主力部队冲破敌人三层封鎖綫开始西进，并轉战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省到达貴州遵义。1935 年 1 月中共在遵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議，清算了以往的"左"傾机会主义，确定了毛澤东在全党的領导地位，"这就使革命的胜利得到最重要的保証"。①

針对当时的形势，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如下的措施：尽管在何梅协定签訂以后，关东軍向长城沿綫增派重兵，仍撤出河北、察哈尔两省的数十万守軍轉用于"剿共"；严厉禁止带有抗日性質的書刊报章；并且发布所謂"睦邻令"鎮压抗日运动。在这个时候，蔣介石为了加强他的独裁統治，对日本仍然不惜采取妥协政策。特别在紅軍主力撤离江西以后，蔣介石进一步加强了"統一"中国的工作。1934 年 2 月他开始提倡"新生活运动"；1934 年底成立了御用的"中国文化协会"。1935 年 1 月他授意陶希圣等十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設宣言》。这一系列活动实际上都是强調儒教精神的文化复古运动，目的在于进行加强独裁的思想动員。

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战綫——人民陣綫的策略。大会指出："国际的和国内的改变了的情况，使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統一战綫成为异常重要的問題。"② 并在决議中指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6 頁。

② 《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1 頁。

出:"在中国必須把扩大苏維埃运动与巩固紅軍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連結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正在进行困难的长征,但是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仍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划时代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書》(这就是有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战綫,并建議:"有錢的出錢,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根据全国人民的意志組織国防政府,組織抗日联軍,武装全国人民。此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紅軍在长征途中克服了难以形容的艰难困苦,粉碎了張国燾的逃跑主义,終于在一年以后即1935年10月到达了陝北,和刘志丹等指揮下的紅軍会合了。正象美国新聞記者斯諾所說的,长征的确是一个历史上空前大規模的武装宣傳旅行;通过这个旅行完成了革命部队的轉移工作。同时,长征"使全国人民对于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前途有了希望"。[1]但是在另一方面,紅軍的长征也給蔣介石带来了扩大他的統治范圍的机会。这就是蔣介石利用"追剿"的机会征服了紅軍經过地区的地方軍閥。在这个时期,蔣介石"統一"中国的工作在經济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35年冬实行了英国經济顧問李滋·罗斯的币制改革方案。(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四节)其結果,国民党政府的財政基础加强了,地方軍閥的基础被破坏了,蔣介石"統一"中国的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对于英美的依附关系也进一步加深了。

当时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是直接以武力統治中国。它强行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員会",把华北从中国分割开来。(参看第一卷第四章第四节)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上述两个傀儡政权的統治区作为它的侵略据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的活动。

---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頁。

以冀东作为由"滿洲"向华北走私的基地,"从这里向中国內地傾銷了几百万元的走私商品和几百万元的鴉片、海洛英等毒品"。(斯諾:《亚洲的解放》)同时,日本还策划通过"冀察政务委員会"夺取滄石鉄路的敷設权,并利用兴中公司掠夺中国的資源。"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賊集团的主要成分的許多軍閥政客土豪劣紳买办及銀行資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組成分子及其贊助者"。(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决議)

一二·九运动

八一宣言中曾指出,随着1927年田中奏折所預定的灭亡中国的毒計的逐步实施,中国人民开始坚决地踏上了抗日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打倒亲日分子的行动。同时,文化界的抗日言行也日益增多。从1935年11月末到12月华北各大学教授以及文化界人士先后从各方面发出了反对分割华北的呼声;与此相呼应,学生們也再次行动起来了。

华北的学生組成了学生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我們平时埋头讀書,无暇过問国事,今天国难如此严重,焉能坐視淪亡……",从此开展了抗日救国請願运动。12月9日,华北傀儡政权成立前夕,北京各大、中学以及小学的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运动。这次抗日示威运动对于假借民意策划組織所謂"华北自治政权"、加紧侵略华北的日本来說,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另一方面它給与中国人民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以往由于当局的鎮压,只能在各地分散进行的抗日运动,現在已經成为公开的行动并在全国范圍內互相联系起来了。其中,学生运动更遍及于全国。在12月16日,即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員会"的那一天,北京学生又发动了更大規模的示威运动。参加这次示威游行的人数包括市民在内超过十万人。通过这兩次运动学生团結救亡的力量越

发壮大了。学生救国运动在全国各地一直延續到第二年。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反动当局，为了鎮压抗日救国运动，甚至頒布了戒严令。随着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漲，上海文化界人士也开始了实际行动。12月中旬上海妇女救国会首先宣告成立；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奋等文化界人士三百余人，在12月下旬組成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接着，全国各地又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学生和文化界人士的奋起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覚醒和民族革命队伍的开始組成，这是統一战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起点。就在这一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現八一宣言，排除万难到达陝北。两个月以后，华北就爆发了革命的風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議，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議»，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把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修改了对富农、工商界的政策。决議中指出：为了达到組織有各团体、阶层、党派、政权、軍队代表参加的国防政府、抗日联軍的目的，必須重新肯定建立統一战綫的必要性。

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运动以后，北京的学生决心进一步深入到群众中去。他們組織了南下扩大宣傳团，于1936年1月3日开始下乡运动；以兩周以上的时間冒着严寒沿京汉綫踏遍了河北省的十几个县，向农民进行了抗日宣傳。运动虽然遭到反动軍警的阻撓，但是学生們仍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鋒队"，这一組織成了后来学生运动的前驅。天津、广州、上海等地的学生也到各地展开活动。1936年春，武汉的学生也展开了宣傳工作。抗日战爭爆发以后，有不少学生参加了游击队。

中共号召一致抗日

从1935年底一直延續到第二年的学生抗日运动，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是，蔣介石对抗日运动的回答却是，在1936

年2月19日頒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实行瘋狂的鎮压。此后，各地軍警襲击学校，大批逮捕抗日学生等暴行层出不穷。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以后，很快地完成了紅軍的整編工作。1936年2月发表了实現抗日，渡河东进的宣言，渡过黄河，开始向山西进軍。东进的紅軍遭到了国民党軍的阻撓，紅軍为了避免冲突，在5月間回师黄河西岸，并发表回师通电，再一次主張停止內战、組織抗日联軍。在这个时期，蔣介石利用紅軍回师的机会，把一向态度曖昧的山西軍閥"中央化"了。当紅軍在山西境內轉战的时候，华北的形势发生了激剧变化。在学生抗日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延期成立的伪冀察政务委員会，終于在1936年春宣告成立了。5月，日本为了解决悬而未决的滄石鉄路、兴中公司的問題，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謀活动；同时又增派华北駐軍强占丰台。另一方面，随着"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頒布，受到瘋狂鎮压而被迫轉入地下的学生运动，在4月間的全世界几百万学生展开的"声援中国学生周"的鼓舞之下，重新活跃起来。5月間，学生們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举行了示威游行。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以及全国一切救国团体的大团結向前推进了一步。1936年5月29日，在各地学生运动的基础上，为了統一領导以后的抗日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宣言中强调指出："中华民族空前的危机迫使青年学生从教室走上街头，离开書本投入斗爭"；"必須首先扩大和加强学生自己的統一战綫"；并以"喚起民众，教育民众，組織民众为首要任务"，"因此我們必須下定决心准备迎接长期艰苦的斗爭生活"。接着，5月31日到6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六十多个救国团体和十八个城市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在宣言中要求各党各派停止內战，釋放政治犯，建立統一的抗日政权；并强調指出"救国战綫当前的首要任务——促使全国各党各派合作抗敌——具有

重要的历史意义"。

1936年5月胡汉民死后，开始軍事行动的西南派于6月2日发出通电，略謂："日本一面大批走私，一面增兵平津。除全国一致奋起抗战以外，我中华民族别无出路，切望中央毅然兴师，从事抗战。"接着，两广部队即开进湖南。这是一向保持半独立状态、反对旨在巩固蔣介石独裁統治的五五宪草的西南派借抗日之名行倒蔣之实。但是这次軍事行动被反对內战的輿論所制止，反而促成了西南的"中央化"。

当西南派的倒蔣运动达到最高潮的时候，1936年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領袖沈鈞儒（上海律师公会主席）、陶行知（国难教育社代表）、鄒韜奋（生活周刊主編）等联名发表了題为《团結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通电。通电指出：全国人民認为不問在朝与在野、中央与地方、左派与右派，当前的民族大敌只有一个。为了达到全民族大团結，特提出下列几項基本要求：(1)为了抗日救国，必須集中所有的人力、財力、智力、物力，实行全国总动員。(2)在抗日救国的問題上，必須共同一致，互相寬容。(3)在共同战綫內必須开誠布公，虛心坦怀。(4)只有建立广泛的救亡联合战綫，恢复民族自信心，才能克服汉奸意識，消灭一切汉奸活动。(5)民族联合战綫并非是短期的过渡性的結合；它的命运决定于成員的态度，和对于抗日救国是否具有必胜的信心。根据以上的認識，通电最后又分别向蔣介石、西南派、宋哲元、国民党、共产党和紅軍、一般群众提出若干具体的希望，呼吁避免內战，团結一致，共同抗日。8月10日毛澤东发表了一項声明，答称"我們同意你們的宣言、綱領和要求，并願意在你們这些綱領和要求下面同你們同一切願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誠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但同时也指出集中全国力量以后才能开始抗日說法是錯誤的，强調首先抗战，同时进行全国总动員。

在1936年7月到10月的救国运动高潮中，中国各地接二連三地发生了日本方面所說的“不法事件”。这些事件是日本在中国各地遍設特务机关、訓練汉奸、到处进行武装挑衅的結果。在这期間，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如夺取中国的紡織业、設立天津电业公司、試图鋪筑代替滄石鉄路的津石鉄路、强迫中国允許冀东走私等。在这种气氛中，同年11月，在关东軍参謀长东条英机直接指揮下的伪蒙軍又侵犯綏远，挑起了綏远事件（参看本書第二章第二节）。傅作义指揮下的綏远防軍奋起抗战，于是局部的抗日战爭便爆发了。全中国人民要求“中央軍”出动援助綏远守軍，并展开了全国性的捐輸救撫运动。街道居民們为前方战士义务縫制御寒用品。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学生、工人、文化界，組織北上慰問团进行了慰問；甚至边远的广西也有不少人参加了北上慰問团。11月24日，傅作义部击潰伪蒙軍，收复百灵庙。关东軍委派的伪蒙軍指揮官田中乘飞机仓皇逃跑。（森島守人：《阴謀、暗杀、軍刀》）綏远的胜利粉碎了失敗主义者認为“不能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的謬論，各界要求“停止內战、全面抗日”的呼声更加高漲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上海、青島等地的紗厂的数万中国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罢工是在11月10日由于上海紗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开始的。在各界救国会声援之下，12日召开了一个有兩千余名工人参加的罢工工人全体大会。沈鈞儒等人到会发表了演說。从17日到20日罢工浪潮席卷全市，学生、市民也参加进来了。17日，青島的紗厂工人也开始罢工，到20日，罢工运动进入了高潮。第二年（1937年）1月3日，日本海軍陆战队突然登陆占領青島市区，并大肆逮捕罢工工人。天津、汉口等地的日本紗厂的工人也紛紛起来举行罢工。这些罢工都遭到了日本和南京政府的殘酷鎮压。与此同时，上海各界利用12月12日举行“中国現代文学之父”魯迅殯仪的机会，为促进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掀起了大規模

的示威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还是一味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繼續鎭压抗日爱国运动：勒令解散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許多进步組織；迫使許多进步报紙、杂志停刊；逮捕数以千計的抗日人士。11 月 23 日又突然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沈鈞儒、鄒韜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人。这次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全国范圍內展开了营救"七君子"运动。

西安事变

上述一系列的抗日救国运动，特别是在西北引起了巨大的共鳴。据 1936 年 10 月 25 日美国《紐約太阳报》报道："为剿共而駐扎在中国陪都西安的青年元帅張学良的部下——极端反日的东北軍的內部正在醞釀着重大事变"；又說："在西安，在来自东北的流亡者中間正在逐漸形成一个巨大的抗日运动"。当时，在 1935 年 10 月"討共"战役中被俘，又被紅軍釋放的东北軍官兵回到了西安，由东北流亡到北京，由于参加一二·九运动遭到鎭压的东北大学学生也逃亡到西安。他們影响了一向反对蔣介石对日妥协的东北軍全体将士，使他們逐漸走上了"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道路。1936 年，紅軍同东北軍締結秘密协定，在陝西前綫停止了敌对行动。同时，紅軍还派遣政工人員担任东北軍的政訓工作。張学良本人也認为："只有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才能实現眞正的統一。"（張学良同尼姆·威尔斯的談話）1936 年 11 月，綏远事件发生后，張学良根据部下的要求，請求蔣介石准許东北軍增援綏远；蔣介石不仅不理，反而責成东北軍积极"剿共"。11 月底，救国会七君子被捕后，張学良曾向蔣介石抗議說："委座对人民爱国运动所采取的措施和袁世凱、張宗昌同出一轍。"（《西安民报》1936 年 12 月 17 日）

1936 年 10 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的第一軍精銳部队进攻紅軍。一再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紅軍为了警告"对外妥协，对

內用兵"的元凶，被迫应战，給与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蔣介石"在兩三周，最多一个月內剿灭共产党"的梦囈。东北軍坐視胡宗南部的慘敗并大加嘲笑。当蔣介石到西安督战的时候，东北軍和楊虎城所部西北軍軍官，为了向蔣介石提出"停止內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进行了多次的磋商。这时，蔣介石害怕西北苏区的发展，作了新的战斗部署：增調十个师以上的兵力集結在潼关一带。大批炮彈和軍需品源源不絕地运往西北；甚至在綏远事件中也从未使用的飞机，也准备出动百余架。这样，尽管胡宗南軍遭到了慘敗，又一次大規模的"剿共"战争还是迫在眉睫了。12月上旬，蔣介石到达西安。兩日后，卽12月9日，西安数千学生同各界救国团体共万余人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向蔣介石請願抗日，蔣介石命令軍警开枪鎮压。当时張学良出面調停，受到了蔣介石的申斥，蔣說張"企图代表双方（指国、共双方），极不忠实"。蔣介石不仅不答应东北軍、西北軍开赴綏远抗战的要求，反而严命張、楊积极"剿共"；并决定于12月12日向西北軍，东北軍，駐扎在甘肃、陝西一带的"中央軍"和在潼关待命的"中央軍"发出动員令。同时又声明：如果張学良抗命，卽解除东北軍的武装，剝夺張的指揮权。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軍和西北軍終于发动了武装政变。1936年12月12日占領了西安，逮捕了蔣介石。当日張学良、楊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党派共同負責救国；（2）停止一切內战；（3）立卽釋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領袖；（4）釋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权利；（7）确实遵行孙中山遺囑；（8）立卽召开救国会議。"中国共产党和紅軍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而且在西北很快地实施了八項主張。另一方面，由于南京政府禁止报道一切关于西安事变的眞实消息，引起了种种猜测，造成了世界輿論的混乱。

这时，以軍政部长何应欽为中心的南京政府亲日派，在藍衣社、CC派、黄埔系等法西斯团体的支持下，极力主張武力討伐，企图挑起內战，夺取蔣介石的軍权。为此，他們調动了二十个师以上的"中央軍"沿隴海綫西上；又派出空軍轟炸西安。日本积极支持亲日派的行动，企图掀起中国的內乱。12月18日蔣介石的"停止討伐"的信件到达南京，12月19日中共通电全国，略謂："……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結无以救国，坚持內战，无非自速其亡，……南京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中共主張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电，1936年12月19日）严厉譴責了亲日派何应欽等的阴謀活动，并主張召开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議，討論全国一致的抗日綱領。在蔣介石被扣留的期間，抗日联軍曾和蔣介石进行过多次談判。中国共产党以不咎既往的态度冷靜地判断了当时的形势以后，为了把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建立抗日統一战綫，建議和平解决事变，释放蔣介石，并且保留他的領导地位。为此，中共領导人对于坚决主張"人民公审蔣介石"的东北軍和西北軍少壮派还进行了耐心的說服。亲英美派也認为內乱对自己不利，宋子文和宋美龄相繼飞抵西安。后来由于大势所趋，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內战，采取抗日政策。因而在25日获得释放，飞回南京。

12月29日，蔣介石下令解散何应欽等主持的"討伐軍司令部"，并且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了包括停止討伐西北抗日軍在內的四項要求，从而实現了停止內战。1937年1月8日，亲日派外交部长張群被罢免，由亲美派王寵惠繼任。尽管这样，南京政府在对日外交問題上仍然搖摆不定。中共为了保卫和平，制止內战，1月6日通电譴責了企图挑撥內战的日本和亲日派，并且要求蔣介石遵守不再发动內战的諾言；另外，为了消除亲日派的借口，劝告抗日联軍撤离西安。这时，虽然在2月2日发生了孙銘九等东北軍和

西北軍部分官兵的紛乱事件，但很快就平息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发出具有历史意义通电，其中提出五項要求：(1)停止一切內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給人民以言論、集会、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軍各界代表会議，集中全国人力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并表示，如果国民党实現上述要求，中共保証采取以下四項措施：(1)在全国范圍內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裝暴动；(2)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紅軍改名为国民革命軍，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和軍事委員会的領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內，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沒收地主土地，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共同綱領。国民党中央委員宋庆龄、何香凝、馮玉祥等响应中共中央的主張，建議国民党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2月15日三中全会开幕，会上，亲日派和抗日派之間的斗爭非常激烈，最后，国民党終于以犹疑曖昧的态度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結御侮的抗日主張。三中全会答应召开国民大会，开放言論、出版自由，釋放政治犯，并且决定收复华北失地，撤消“冀察政务委員会”。

以西安事变、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轉折点，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4月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議，規定了新的任务，并发表了告全党同志書，指出：“由于国內外形势的变动，由于本党新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內战’的目的，已經实現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經結束。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內和平，爭取民主权利，实現对日抗战。”新的阶段以爭取民主权利作为中心任务。因为实現民主是把分散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集中起来反击日本侵略者，爭

取中国人民解放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現上述任务，国共双方开始接近。如:国民党对苏区交通綫的封鎖已大部解除，5月間，国民党統治区的一千余名青年到延安进了抗日軍政大学；6月，国民党組織視察团前往苏区；在同一个时期，周恩来应邀到廬山，同行政院各部长举行了数次会談。但是，关于承認陝甘宁特区政府的法案在行政院会議上通过以后，由于反共分子从中阻撓，未能公布。这样，国共两党在走向团結合作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許多障碍。

1937年5月，毛澤东分析了1936年以后日本陷入的严重危机，洞察到日本为了摆脫这种危机正在加紧准备大規模侵略战爭。他指出:"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盜战爭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驟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携'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于战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①中共根据毛澤东对日本的估計，为加强国共两党团結使全国走向民主化进行了不断的努力。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牵制了南京政府的动搖。4月間，中共組織了青年义勇軍；华北的学生到二十九軍部队中展开抗日宣傳工作；到七七前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全国各城市按行业組織起来的分支机构已达一千二百个，它們为保卫祖国进行了斗爭。7月4日，宋庆龄等到正在审訊救国会"七君子"的苏州法院去，要求釋放他們。当她的要求遭到拒絕以后，她提出抗議說：如果有爱国心就算犯罪，我們要求把我們也逮捕起来。上海及其他城市也掀起了要求

①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47頁。

釋放"七君子"的請願运动。6月間由日本浪人一手制造的"扰乱治安"的把戏很快被二十九軍平定了。在抗日高潮的影响下，甚至殷汝耕手下的伪保安队也逐漸轉向抗日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日本侵略的对峙，終于演变成了7月7日中日两軍在蘆沟桥附近的冲突，从而开始了全面战爭。

中日战爭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向全中国各阶层所組織的抗日統一战綫挑起的一場侵略战爭。

第二节　中日战爭的爆發

蘆沟桥的一声槍响

正如柳条沟的一声爆炸成了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綫那样，龙王庙附近的莫須有的一发枪声，成了八年中日战爭的着火点。

1937年7月7日夜晚，駐在北京西南郊丰台的日本軍，在靠近蘆沟桥中国兵营的龙王庙一带举行了挑衅性的夜間演习。在紧張的空气籠罩下的华北，而且是在夜間，在对方兵营附近进行武装活动，无疑是别有用心的，当时，駐在蘆沟桥一带的中国軍队只是进行了戒备，在上級的严令下，幷未越出城門一步。但日本軍的这次演习是有計划的、带有挑衅性的。当演习剛要結束的时候，参加演习的日軍部队硬說从日本軍头上飞过一发步枪子彈；听到枪声后，队长立即檢点人数，发現一名士兵失踪。这就是日本軍要求开进宛平县城的理由。然而据說"失踪"了的"这个士兵实际上是为了解手而离开了队伍"。(森島守人：《阴謀、暗杀、軍刀》)当时駐在丰台的日本軍联队长牟田口廉也上校就以这一"事件"为借口立即要求蘆沟桥的中国軍队无条件撤出宛平县城，将該县城讓与日本軍。还沒有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答复，他就下令开始全面进攻。次日，占領了蘆沟桥、龙王庙等地，控制了由北京通往天津、保定的联絡

要冲——永定河左岸一带地区

这次事变的发生早在人們意料之中。西安事变以后，由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华北地区的中国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抗日运动日趋高漲，甚至为保持个人权力不惜同日本妥协的华北軍閥們，在自下而上的抗日压力下，也不甘心給日本帝国主义充当傀儡了。特别是在侵略綏远失敗以后，日本侵略华北的道路已經完全堵塞。在"冀东非战区"，日本一手制造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陷于癱瘓状态；冀察政权傀儡化的企图也成为泡影；1936 年 9 月日本駐华軍司令官田代中将利用談判的形式从"冀察政务委員会"委員长宋哲元手中攫取的在华北地区的各項經济特权，除設立惠通航空公司以外，其他如津石鉄路敷設权、塘沽筑港权、龙烟鉄矿和井陘煤矿开采权等，都未能实現。同时，北京、天津地区的学生、工人的抗日运动又日益高漲。这样，九・一八事变以来不間断地向中国本部推进的日本侵略步伐，不得不在京津綫上停頓下来。为此，日本駐华軍、关东軍駐华北部队以及日本軍部都开始感到极度的焦躁。日本帝国主义針对这种形势，以过去侵占"滿洲"的手段来策划打开华北僵局，当然是預料中的事。所以从 1937 年春季以来，天津、北京一带的日本駐軍一再地举行挑衅性的軍事演习，越出駐扎区横冲直撞；日本軍官更故意向中国軍队寻衅，企图挑起冲突。另外日本国内的形势，也加速了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

二・二六事件以后，由于实行了急于建立战时經济体制的馬場、結城两大藏相的財政政策，通貨日益膨脹，特别是 1936 年末以后，对通貨膨脹感到不安而产生的搶購物資的風气，加剧了外汇的不稳定和物价的上漲。針对这种情况，政府在 1937 年 1 月頒布了外汇管理法，对外汇进行了統制，但是入超的趋势，仍日趋严重。从 1937 年 3 月到七七事变爆发的 7 月为止，黃金流出額达三亿七千七百万日元。在这期間，物价仍然繼續上漲。在 5 月間，政府不

得不設置临时物价对策委員会，采取应急措施。財政經济方面的这种趋势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經面临这样的关头，如果不发动更大規模的战爭，就要破产。經济危机也反映到政治上来。林內閣垮台以后，作为元老、重臣們的最后一張王牌而成立的第一次近卫內閣，从一开始就大力从事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爭来摆脫經济危机的基本方針。因此，不論从軍事上看还是从經济上看，发动七七事变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步驟。

战爭的扩大

孤立地看，七七事变也可說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是在上述情况之下，这次事件扩大为全面的战爭，是一种必然的趋势。7月7日夜晚中日两軍发生冲突以后，8日日軍占領了蘆沟桥、龙王庙，中国軍队暫时撤退到永定河西岸。到了10日，两軍又发生冲突。由于中国方面的第二十九軍要求停战，21日，两軍之間一度签訂了現地的停战协定。可是这次冲突和九·一八事变有所不同，日本軍部对这次事变采取了扩大的方針。7月11日，日本政府召开內閣会議，决定向华北增派援軍，并延长日本西部各师团的退伍期限。同时发表了如下的强硬声明：

> "維持华北治安，对日本帝国及'滿洲国'极关重要，这一点无須贅言。为了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方面必須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以及'排'日、'侮'日行为向日本謝罪，并适当保証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为此，政府在本日的內閣会議上下了重大的决心，决定就向华北增派軍队一事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一声明清楚地說明了日本政府并不打算作为局部的問題来結束事变，而企图以武力一举占領华北，解决多年的"悬案"。"事态的发展証明了东京政府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事变。"（斯諾：《亚洲的解放》）同时，中国方面也抱定了抗战的决心，因此事变的

扩大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虽然如此，日本声明中表面上也說要采取“不扩大”的方針；而华北的当事者宋哲元，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也不希望事变扩大；国民党政府也不願意战争，希望尽可能局部解决；同时，現地的日本軍，也因为兵力单薄，需要拖延时間，等待增援部队到达。在这种情况下，7月18日，宋哲元曾亲自訪問日本軍司令官香月中将当面道歉，19日，双方就签訂了一項就地停战协定。然而，在7月15日，日本方面就宣布向华北派遣援軍，7月17日又决定在預算中追加临时軍費，积极进行备战。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也在人民强烈的抗日意志的推动下，发表了强硬的声明，表示决心保卫領土主权，否定了7月19日的上述停战协定。在这期間，日本国内和关东軍所派遣的日本援軍源源到达北京、天津一带。日本方面在完成战斗部署以后，于7月2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軍队在7月28日正午以前撤离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并且不等中国方面的答复，就在28日占領了北京及其近郊，29日又占領了天津。

日軍占領北京、天津以后，为了侵占整个华北，又在30日展开进攻。中国方面只有宋哲元所部二十九軍单独应战，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未派遣一兵一卒，然而这次事变和九·一八事变不同，中国方面的抵抗是十分激烈的。二十九軍的官兵在抗日統一战綫的影响下，多半具有高度的救国信心，并且工人、学生也争先恐后地参加义勇軍投入战斗，甚至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保安队也举行起义（通州事变），参加抗击日軍。因此，日軍占領北京、天津后，战局一时陷于胶着状态，在北京西北方的南口一带，日軍和中国义勇軍之間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上海的战斗

华北战局陷于胶着状态以后，以“速战速决”为方針的日本軍，

为了直接迫使南京政府投降，又策划在上海挑起战争。为此目的，上海的日本海軍陆战队在扩充兵力以后，立即开始了战斗准备，海軍第三艦队也向上海集結了。由于考虑到战局将扩大，至8月9日为止，长江沿岸的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上海。8月9日夜間有一名日本海軍軍官和一名随从士兵在偵察中国軍队的配备情况时被枪杀(大山事件)，这一事件成了上海战事的导火綫。13日日本海軍陆战队同中国軍队展开了战斗。8月14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一項强硬声明，表示："为了懲罰殘暴的中国軍，促使南京政府反省，現在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这是对中国开始全面侵略战争的宣告。

上海战斗和1932年的上海事变——一·二八淞沪战役一样，由于中国軍队的頑强抵抗，工人、学生、市民的一致参加抗战，在战争初期日軍即陷于严重的苦战。8月23日日本一个旅团登陆增援，8月到9月之間，在上海北郊陆續登陆的援軍共有几个师团，但是这些登陆部队遭到中国軍队的英勇抵抗，又被渠道所阻擋，一步不得前进。战斗一直由9月持續到10月。在正面作战陷于不利的日軍，为了从背后襲击中国軍，于11月5日以几个师团編成另一路軍，由杭州灣登陆。这样一来，英勇的中国軍队不得不退却。日軍以死伤五万名的代价，于11月11日占領了上海。此后，由于中国軍队繼續退却，日軍得以一鼓作气于12月10日攻陷南京。日軍占領南京后，不仅屠杀战俘，而且屠杀了无辜的平民达数万人，极尽奸淫擄掠之能事。下面是美国新聞記者斯諾記述的南京大屠杀的一段实况：

"日軍于12月12日进入南京。当时中国軍民都想从余下的一个城門退到长江北岸，以致道路壅塞，秩序大乱。当数百万軍民正要渡江的时候，遭到日本空軍的机枪扫射，被杀伤和淹死的人，不計其数。另有数百人在通往下关城門的狭窄道路上被敌人抓住杀害，积尸累累，高达四呎以上。……南京的血腥大屠杀，震动了全

世界。日軍仅在南京一地就屠杀了平民四万二千人以上，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孺。在由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被屠杀的非战斗人員估計有三十万人。这个数字同中国軍队伤亡的数字几乎相等。……五万日軍，在进城以后的一个多月之間，干下了慘絕人寰的强奸、慘杀、掠夺以及其他各种暴行。一万二千戶商店和住宅被搶劫一空，房屋遭到焚毁，市民的財产被洗劫尽淨。日軍士兵、軍官各用搶来的汽車、人力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向上海搶运掠夺的物資。第三国外交官的住宅也被搶劫，雇用人慘遭杀害。士兵在上級的縱容下为所欲为，日本軍官則借口中国人是被征服者，沒有人权，包庇以至参与部下的暴行。我們要牢牢地記住杉山大将（当时的陆相）的一句話：‘比上帝还偉大的某种力量鼓舞了我們的将士。’”（斯諾：《亚洲的解放》）

华北的日軍逐漸增强兵力以后，8月12日攻陷南口，打开了通向察哈尔省的道路。从这以后，日軍就分兵三路——沿津浦綫向济南、沿京汉綫向保定、沿京綏綫向張家口进攻。沿津浦綫南下的部队10月底到达黃河北岸，在收买山东省主席韓复榘失败以后，于12月底占領济南，12月中河北、山东两省的重要地区先后淪陷。沿京綏綫西进的日軍占領察哈尔、綏远两省的南部地区以后，10月間侵入山西，和中国八路軍初次交鋒。日軍在长城綫的平型关、雁門关一带遭到以八路軍为主力的中国軍队的迎头痛击，損失慘重。11月間，日軍攻陷太原。截至1937年年底为止，日軍已占領了华北五省的主要城市和上海、南京等地，战爭暫且告一段落。在这一段战斗过程中，日本方面出动的兵力，共有陆軍六个軍，二十个师团，空軍主力，海軍第二、三艦队。死伤官兵七万名，損失各种战車一万八千輛。

在中日战爭的第一阶段，日本方面之所以取得了軍事上的胜利，固然是由于它准备充实和武力的优越，同时，中国方面各个战

綫的不統一，国际关系的对日有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卽通电全国："全国各报館、各团体、各軍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暨全国同胞們！……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二十九軍，幷立卽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北京、天津淪陷后，中共又提出"发动游击战爭，保卫河北"的口号，动員北京、天津、保定的大批大、中学生、革命青年深入到农村中去，开始发动抗日游击战爭。

蔣介石和国民党为了保持他們的搖搖欲墜的統治，在全国輿論的压力下，不得不多少变更他們的內外政策。他們首先修改了所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釋放了沈鈞儒、鄒韜奋等被捕的救国会領袖和大部分"政治犯"。9月23日又发表正式声明，同意中国共产党一再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主張，承認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幷且表示准备在武裝抗日斗爭中同共产党合作。从此，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正式建立起来。

8月22日，中国紅軍正式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下設三个师——林彪的一百十五师、賀龙的一百二十师、刘伯承的一百二十九师。8月25日八路軍卽开赴山西北部前綫。同年10月12日在华中的紅軍正式改編为国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叶挺、項英分任正、副軍长。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战爭中，一直是抗日軍的主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地坚持抗战。与此同时，由于国共合作，苏区改称为中国特区，或称陝甘宁边区。

同年8月25日，随着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中共中央委員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綱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全国軍事的总动員；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員；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的

外交政策;实行战时的財政經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賊亲日派，巩固后方;实行抗日的民族团結”。此后,出現了許多支援民族解放战爭，支持政府的抗日政策的爱国組織,民族統一战綫的定期刊物也出版了。次年(1938年)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偉大的政治报紙《新华日报》也創刊了。

在国际上，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訂立了包括四項条文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約，这个条約大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抗战。从此,苏联对中国大量地提供軍事援助。二年后,即1939年2月,中苏签訂了航空协定。同年6月孙科代表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代表对外貿易部部长米高揚又签訂了中苏通商协定。这个协定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以苏联向中国提供的二千五百万卢布信用貸款为貿易基金进行結算的換貨协定，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中国以原料換取苏联的軍需品。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爭对手英、美两国的立場和苏联完全不同。它們不仅不援助中国,当1937年8月日本宣布封鎖中国沿海时,美国竟予以追認,致使中国无法同美国进行貿易，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大批軍需品却源源流入日本。英、美等国对法西斯国家采取的这种綏靖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正如毛澤东指出的:中国在抗日战爭中,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綫。一条是以蔣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的路綫.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級和人民大众的路綫。以蔣介石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只有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直接損害他們的政策、利益而沒有妥协的余地的时候,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計划和行动,使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巨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想依附英美实行抗日。因此,随着形势的变化，蔣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动搖。一方面他在抗战

初表現了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并希望能够速胜，另一方面，他又极端害怕人民起来抗日，一貫压迫人民，阻撓人民抗日。他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一味依附外国势力，不願意徹底抗战，不向主要战場华北派遣援軍，而把主力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待时机，从而使日本軍得以迅速占領华北。与此相反，八路軍則开到战斗的最前綫，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937年9月在上述的平型关、雁門关战役中，林彪将軍麾下的八路軍，包圍击潰精銳部队板垣师团的一个旅团約四千人，消灭其三千余人，击毁汽車百余輛，繳获步枪千余支。这是日軍在中国战場上首次遭到的歼灭性的打击。接着在10月，八路軍又在山西省中部的山路——忻口战役中英勇奋战，牵制了南下进攻太原的日本軍主力达一个月之久。这个时期对中国来說，的确是歼灭华北全部日軍的絕好时机，但是蔣介石仍然不肯派兵出击，以致形成了八路軍和日軍互相流血消耗的局面。关于蔣介石始終不願徹底抗战的原因，毛澤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議上曾經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資产阶級，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爭对于他們的財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們的投降傾向是必然的。"他号召大家坚决地同投降主义者进行斗爭："我們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爭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爭取中間集团的进步和轉变。"①

南京陷落和和平交涉

在南京陷落以前，日本政府和軍部对于占領南京的政治意义評价很高。日本新任华中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上将在由东京启程时曾表示要以占領南京为主要目标，参謀次长多田也認为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爭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86、387頁。

攻陷了南京，就有媾和的机会。特别是軍部的首脑推测，只要占領南京，給与国民党政府以严重的打击，就可能迫使中国結"城下之盟"。10月底，德国駐日大使狄克逊和德国駐中国大使陶德曼，分别向中、日两国政府表示德国願意斡旋两国进行和談，当时，攻占南京在望的日本陆軍当局对和談不感兴趣。这些人的心目中可能是縈迴着这样一个事实，一年前意大利占領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貝巴，战爭卽告結束。豈知中国的情况根本不同，特别是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发展更不允許那样結束战爭。在德国駐华大使陶德曼和平工作的影响下，蔣介石、白崇禧、顧祝同、徐永昌等将領，曾一度发生动搖，后来由于遭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全国人民的严厉譴責，不得不打消停战的意图，明确表示願意迁都武汉，継續抗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方面也不得不后退一步，只想利用占領南京的軍事压力，爭取在有利条件下和蔣介石停战。当初对媾和不感兴趣的軍部，后来也逐漸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在1937年12月13日，卽完全占領南京的当日，大本营、政府連絡会議就作出了关于正式开始和平談判的决定。

当时国民党政府內部有一部分人似乎和日本方面的这种表示相呼应，又一次唱起了"和平論"。事实上，在南京陷落迫于眉睫时，汪精卫就极力要求蔣介石开始和談，国民党右翼集团之所以主張同日本妥协，結束战爭，不单是由于战局，也是列强对中国的态度所促成的。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統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有名的"隔离演說"(quarantine speech)，要求把侵略国"隔离"起来。次日，卽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日本的軍事行动違反了华盛頓九国公約及巴黎非战公約"。这些事情給了世界这样的印象：美国的态度在原則上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在这种影响下，中国于同年11月3日直接向九国公約締約国提出了控訴，对于在布魯塞尔

召开的包括美国在內的九国公約締約国会議寄与了莫大的希望。因此，11月6日日本第一次向蔣介石提出非正式的和平条件时，蔣以布魯塞尔会議正在进行为理由加以拒絕。然而会議的結果和中国的期望完全相反。苏联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各締約国采取共同行动的提案未被列入議程，美国的态度傾向于，給日本以政治上、經济上的安全感，而不要对日本进行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出席布魯塞尔会議以前就达到如下的結論："此次会議固然应当阻止日本目前的行徑，但是也必須給日本以經济上、政治上的安全感。为此目的，第一，必須为日本保障原料和市場；第二，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和中国恶意地利用这个机会。"（費思：《太平洋战爭前史》）美国国务院的这种态度表明，美国的远东政策是以犧牲苏联和中国，保障日本的原料和市場（就是殖民地）为原則来处理远东問題的一种綏靖政策。参加布魯塞尔会議的西欧各国，除英国以外，大都不願参与远东問題，英国也忙于应付欧洲局势，难以兼顧，而美国又采取了上述的綏靖政策，因此，布魯塞尔会議也就未能作出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决定。这次会議的結果不但使中国感到失望，而且会上的"綏靖主义"的气氛，还加强了国民党政府內部一部分人的对日本妥协的傾向。就在布魯塞尔会議开始一周以后（即12月2日），曾經一度表示拒絕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的蔣介石，又答应以这个条件作为談判的基础。这时，蔣介石十分重視德国的斡旋，他要求德国不仅作为一个居間人，而且进一步成为一个調停者。蔣的这种做法，同列强在布魯塞尔会議中所表示的态度不是沒有关系的。

日本提議进行和平談判，同列强的这种态度也有关系。一言以蔽之，日本是企图利用列强的綏靖政策，沿着对苏备战的方向来寻求解决事变的途徑。在这个前提下，日本于12月22日向德国駐日大使狄克逊提出了四項媾和基本条件：（1）中国放弃"容"共抗

日反"满"政策，和日、"满"两国协力防共；(2)划出必要的地区作为非武装地带，并在該地区設置特殊机关；(3)日、"满"、华三国建立密切的經济关系；(4)中国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在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議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根本方針"(参看附录資料)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如下要求：承認"滿洲国"；成立"內蒙防共自治政府"；日本在华北、华中指定地区內有駐兵权。上述这些条件显然都包含着准备新战爭的意图。这从下面这件事可以得到証明。后来根据这些条件进行和平工作的宇垣外相說过这样兩句話："內蒙是防共第一綫"、"华北是防共第二綫"。利用同中国停战，准备对苏作战的阴謀，当时特別受到了軍部中一部分人的积极支持，因此，这个阴謀是具有很大的現实意义的。当时主張对苏作战的参謀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参謀次长多田駿)为了促使和平談判获得成功，曾对政府施加压力。当石原看到近卫首相在談判中态度动搖，就往訪池田成彬，对他說："沒想到近卫这样糟糕。日本必須及早巩固'滿洲'，准备对苏作战。"(矢部貞治：《近卫文麿》)

然而軍部的主流——陆軍省仍然企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2月22日日本方面的正式的和平条件交給了蔣介石，但是在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認为和平无望的傾向又逐漸控制了政府。在正式决定开始和平談判的第二天，即12月14日，日本就在华北占領区成立了所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傀儡政权。尽管这个傀儡政府带有"临时"二字，仍然不难看出日本軍部是想在蔣介石政权以外，另外組織一个全国性的傀儡政权，来直接統治中国。因此，对于开始和平談判，杉山陆相和接近軍部的广田外相、末次內相都表示冷淡。接着，在12月21日，即向蔣介石提出和平条件的前一日，日本內閣举行了会議。会上認为"今后不一定期待同南京政府恢复和平"，并拟定了在中国建立傀儡中央政府的方針。1938年1月11日的御前会議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方針。当天，樞密院会議也

通过决議，提出以下几点："对华宣战，否認南京政府，代之以北京临时政府，繼續进行軍事行动，增撥用于支援軍事行动的补給船只。"这样，同蔣介石进行和平談判的决定已被否定，而使用武力，强使中国成为第二个"滿洲国"的方針确定下来了。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3日，利用中国政府把和平条件的詳細內容通知日方的机会，通告中国政府停止談判，并于1月16日发表下列声明：

> "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为了給与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一直等到今天。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眞意所在，对內不察人民塗炭之苦，对外不顧东亚和平，仍在一意孤行地坚持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眞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并願与其調整邦交，尽力协助新生中国的建設。当然，帝国尊重中国領土主权和各国在华权益的方針，始終不变。今后帝国对于东亚和平的責任愈益重大，政府切望国民为完成如此重大的任务作不懈的努力。"

这次"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一方面意味着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滿洲国"进一步扩大了它的侵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因此，进一步扩充和加强眞正的战时体制的問題就提到議程上来了。

第三节　战局的进展及其影响

扩充战时体制

中日和平談判的中断，堵塞了早日結束战爭的道路。战爭的长期化要求国內的政治、經济、文化各个方面正式轉向战时体制。在軍費方面，七七事变一发生就追加了九千七百万日元，8月又追加了四亿二千万日元，为此，政府新征了一亿二千万日元的"华北事变特別稅"。然而，随着战爭的扩大軍費开支日益龐大，因而有必要使經济机构轉向战时体制。于是，政府在1937年9月4

日召开了为期五天的第七十二次临时議会。这次議会以追加預算的形式通过了高达二十亿七千五百万日元的临时軍費，并决定这項軍費全部靠发行公債来筹集。因此，不难設想，这种龐大的开支，势必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内物价暴漲，恶性通貨膨脹等后果。而且要估計到，今后的軍費还要进一步增加，因而經济統制必然要随之加强。使經济机构轉向战时体制的工作，主要是通过进出口临时措施法、临时資金調整法（以上两項法案都是在9月10日頒布的)和1918年頒布的軍需工业动員法来进行的。10月1日政府又决定合并企划厅和資源局改設企划院，把它作为战时統制經济的中樞机构。随着經济統制的加强，企划院成了財經参謀本部,被賦予了优于各个財經部門的权限,这里集中了官僚中亲軍部的分子,在軍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工作。

随着經济方面战时体制的加强,軍事、政治方面也确立了战时体制。战争开始以来，近卫首相一直为統帅和国务上的不統一感到苦恼。內閣不但无权过問軍事行动，甚至它所听到的有关战局的消息,也不超出新聞报道的范圍。

"在报紙上讀到陸、海两相在內閣会議上报告有关战局及其他各种情况的消息的人們，可能以为报告中会有局外人不得而知的秘密事項，其实不然。令人气憤的是：所謂战况报告只是陆、海两相以煞有介事的态度重复一下报紙上的記載而已，至于新聞报道以外的軍事行动，从未透露过一个字。在这一点上,內閣在軍部的眼中簡直是不在話下。"（風見章：《近卫內閣》）

1937年11月17日制定了大本营令。11月20日，日俄战争以来从未成立过的大本营宣布成立了。当时近卫希望把总理大臣列为大本营的成員,但是在有碍統帅权的独立的口实下被拒絕了。統帅与国务之間，仅在大本营、內閣联络会議上进行事务上的联系，至于內閣对战争的政治指导則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謂調整統帅和国务之間的关系实質上只是使国务从屬于統帅。

制定国家总动員法

建立战时体制的一个决定性措施是制定国家总动員法。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次議会开幕了。这次議会的使命是为了适应战争的新阶段，完成国內体制的軍国主义化。国家总动員法是作为这种战时体制的根本措施提交給議会的。这一法案是在軍部指导下由企划院草拟的，其目的在于把国民經济和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完全置于反动的官僚統制之下，以便实行战时总动員。其范圍不仅包括經济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包括了教育、研究、言論出版、集会結社、工人运动等一切方面。所有这些，經过一紙敕令，即被置于政府的統制之下。事实上，后来的战时动員法以及其他大部分战时法令都是以此为法律根据而制定的。甚至近卫本人也不得不承認这个国家总动員法的露骨的反动性“在人民中間所引起的严重不安”。在議会上一部分政党的代表对这个法案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因此，政府在正式提出以前被迫临时删掉了特别受到反对的“禁止集会，禁止报紙发行”等条款。

然而，政府为了使国家总动員法能够得到通过，加强战时体制，不单是采取了向議会讓步的办法，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法西斯手段来破坏一切群众性的組織，压迫反对势力。如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檢举“人民陣綫派”，禁止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自由結社等一系列的法西斯措施，都是为了給建立战时体制鋪平道路。甚至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也未能幸免于檢举。司法省在禁止日本无产党、工会全国評議会自由結社时，曾发表声明說：“在今天，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思想有成为滋长共产主义思想的溫床的危險性”。在第七十三次議会上，貴族院的井田盘楠又对东京大学的河合荣治郎、横田喜三郎、田中耕太郎、宮澤俊义、矢內原忠雄等教授的著作进行攻击，他說：“今天帝国大学的法

律、經济兩学院是人民陣綫的大本营”。这时，完全堕落为法西斯政党的社会大众党，在議会上逢迎政府和軍部，不仅表示无条件地賛成国家总动員法，而且代表軍部的意图发出了“不需要审議”的論調。社会大众党的这种反动言行，甚至引起了保守政党的不滿。

国家总动員法案的审議，是在这种法西斯气氛下进行的。政府和軍部为了强迫議会通过这項法案，曾以恫吓、暴力等手段对政党施加压力。2 月 17 日，“防共护国团”的四百名右翼暴徒，襲击和占領了政友会、民政党本部。据說“防共护国团”的二十万日元的經費中，有一部分是出自近卫的荷包。又据众議院某議員的揭露，林銑十郎、松岡洋右、秋山定輔等人似乎也曾捐助这个团体。在正式审議国家总动員法案的 3 月 3 日，又发生了社会大众党党魁安部磯雄被毆打的事件。当天，陸軍省的一个科員佐藤中校在議会的专門委員会上答复某議員的質詢时，竟大肆咆哮地說：“住口！”对于这个事件，陆相只是簡单地表示道歉就算了事，事后佐藤中校仍然在議会之中大搖大摆。如果議会在当时还有一点起碼的权威，则这点权威在这个陆軍中校的一声大喝下也就丧失无遺了。在政府和軍部的这种高压下，議会終于不得不緩和它的反对态度，从而，在 3 月 24 日，国民总动員法被原案通过了。和总动員法同样重要的电力国家管理法，也在这次議会上通过了。第七十三次議会为建立高度軍国主义化的国內体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第七十三次議会原案通过实际上是把議会的絕大部分重要权力移交給政府的国家总动員法，意味着議会在实質上已被否定。然而这种局面的造成，并不完全由于政府和軍部的压力，同时也由于以下的原因。撇开完全变成御用政党的社会大众党不說，政友会和民政党虽然一度对总动員法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反对，但是它們的內部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相当强烈的傾向，即認为只有和政府、軍部协力一致完成法西斯的政治体制，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政

党內部的这种傾向，当时被称为新党运动。由于政見的分歧政党內部又分化为許多派系，情况极为复杂。如：政友会里既有前田米藏、中島知久平等亲軍部的新党派，也有以久原房之助为中心的一国一党論者；在民政党里也有主張政、民合并的派系同以町田总裁为首的"主張和軍部妥协、和政友会合作"的派系之間的对立。由于上述情况和派系間的对立，政、民兩党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統一的政治力量。这样，就在政党內部产生了强烈的迎合軍部的傾向。"电力国家管理法得到通过的一个有力的原因，是关于軍部支持这項法案的宣傳起了作用。国家总动員法的通过也是如此。"（風見章：《近卫內閣》）

和平談判的恢复

尽管日本統治者扩充战时体制，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方針，但是由于找不到收拾战局的途徑，仍不免感到焦躁。正当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可以寄托一綫希望的变化。1938 年年初以来，欧洲的形势已面临战爭边緣。3 月間，德国兼并奥地利，并将侵略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同年 1 月希特勒为了准备战爭，对国防軍和外交部的人事作了一番更换，加强了納粹党对德国的統治。同时，德国在备战过程中，不能不把它同日本的关系作为一个环节重新加以考虑。在中日和平談判中断、远东战爭长期化的形势下，在德国看来，放弃以往的和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間的密切的經济、軍事关系，同日本合作，以保持中国市場，对自己更为有利。1 月 26 日德国駐日大使狄克逊在向本国外交部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我国对华政策，在政治和經济方面至少应該进一步以华北为重点"，"为了在华北获得新的权益，我認为目前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和日本軍部和民間势力建立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說，德国从备战的角度选擇了进一步同日本建立密切联系的道路，并借以保持中国的市場。因此，

德国在2月20日决定承認"满洲国"，撤退駐国民党政府的軍事顧問团，放弃援蔣政策，实行了对华政策的大轉变。此时，德国新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大使館武官大島已經开始了締結軍事同盟——日、德、意三国同盟的談判。虽然德国正在积极备战，但是英国在2月間艾登外交大臣辞职以后，对法西斯各国进一步加强了"綏靖政策"。这就使日本在远东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候，英国一方面拒絕了蔣介石所提出的二千万英鎊借款的要求，一方面又积极向日本表示願意同日本謀求解决日、英兩国利害冲突最激烈的上海地区的糾紛。美国除口头表示以外，对日本仍未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日本在占領南京时轟炸美国在长江上的軍艦巴納号的事件，的确严重地刺激了当时美国的輿論，美国政府采取了訓令駐日大使直接向日皇提出抗議的强硬措施。但是，当日本用外交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采取道歉、賠款等方式，迅速地解决了巴納号事件以后，美国又恢复了原来的"綏靖政策"。当时，日本占領南京以后实行的对中国居民的大屠杀，激怒了全世界的民主輿論，人們紛紛要求美国停止对日本进行战爭起了重要作用的战爭資材的供应。然而美国并未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

如上所述，由于1938年年初的国际形势轉为对日本有利，近卫又开始产生不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希望。也就是說，日本占領南京时进行过而又失敗了的"和平談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又出乎日本意料之外，很快地出現了恢复的可能性。为此，首先必須在事实上否定"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必須集中一切反对积极主張扩大对华侵略的軍部主流派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基础。1938年5月近卫內閣的改組，就是近卫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糾正"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錯誤方針，經过深思熟慮而实行的政治冒險。支持"不以南京政府为对手"的杉山陆相和广田外相，在这次內閣改組时退出內閣了。为了制止軍部的反对，近卫甚

至利用了天皇。杉山被迫辞职，就是天皇通过閑院宫（明治天皇之弟）对陆軍施加压力的結果。在以天皇为首的宫廷势力、壟断資本和軍部中的部分軍人（参謀本部、皇道派残余）的一致支持下，近卫的政治冒險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在5月26日作出决定任命宇垣一成为外相，三井的大老板池田成彬为大藏相兼商工相，以法西斯将軍著称的皇道派軍人荒木貞夫为文相，稍迟又任命被認为主張不扩大事变的板垣征四郎为陆相，从而改变了內閣的面貌，完成了恢复和平談判所必要的政治体制。事实上，改組后的內閣成員在当时对恢复和談說来的确是一批最恰当的人选。宇垣入閣的条件就是："同中国恢复和平談判，必要时撤消不以蔣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同宇垣关系密切的池田成彬也从依靠英、美供应战略物資維持战时經济的日本壟断資本的立場，要求"搞好同英美的关系"。荒木一再主張以对苏外交作为外交上的重点。板垣后来也說："作为陆相，我的根本态度是，鉴于中日事变已使日本陷入全面战争的泥潭，而日本北方的苏联已完成了几个五年計划，国力有了飞跃的增长，在远东的軍备大大充实，威胁着日本的背后，因此，我認为日本应当排除同中国之間的一切糾紛，从大处着眼重建兩国邦交。"（板垣在远东軍事法庭上的供詞）乘板垣就任陆相的机会，参謀本部以及軍部主流派以外的眞崎甚三郎、荒木貞夫、柳川平助等皇道派軍人，曾在暗中大肆活动。他們还进一步策动夺取軍部領导权。这件事表明，当时在近卫領导下进行的企图从軍部的主流派手里夺取战争政策指导权的斗爭正在統治阶級內部激烈地展开。为了夺取战争政策指导权，改組后的內閣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它內部的政治体制。因此，在內閣会議以外，又制定了有首相近卫、外相宇垣、陆相板垣、海相米內、大藏相池田参加的五相会議制度，在那以后，五相会議就成了决定內閣最高方針的机构。

改組內閣的政治冒險获得成功以后，中国方面也出現了某些

事实，促进了近卫等人所主張的"对华政策"的轉变。首先，"对于宇垣就任外相表示最大欢迎的是中国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張群拍来了賀电。張群是宇垣的旧交，蔣介石手下的謀士，知日派的要人。对敌国的新任外相致賀电虽說不是公事，而是一种私人应酬，但如果考虑到蔣介石也是宇垣的旧交，就不难設想他們之間是互通声气的。"(渡边茂树:《宇垣一成所走的道路》)以張群的賀电为綫索，日本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行政院长孔祥熙，非正式地开始了和平談判。"和平談判是以前一次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的。"随着談判的进展，"日本方面了解到中国方面的主張和宇垣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同上書)日本要求由日本和国民党政府直接进行談判，而孔祥熙在最初曾希望英、美兩国居中斡旋。宇垣也打算談判到一定阶段后，邀請第三国居中斡旋。因此，日本政府在同中国进行和談的同时，为了解决战爭所引起的日本同英、美兩国的糾紛，又同英国駐日大使克萊琪、美国駐日大使格魯开始了談判。6月24日五相会議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事变，大致在本年度以內完成战爭的目的。第三国的善意斡旋，只要条件相宜，准备接受。"6月27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巴特勒也在下院表明:"如果中日兩国同意，英国乐于单独或和其他国家共同协力，为实現和平担任調停工作。"这样，英国进一步对日本表示了和解的态度。当时英国从孤立苏联的方針出发，对于德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想根据綏靖政策加以解决，因此，它在远东方面十分可能采取这样的方針，就是使蔣介石同日本妥协，以便把日本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如上所述，近卫等人的"和平談判"方式同英国的态度是相适应的。在日德意三国軍事同盟的問題上，德国的提案是从备战的观点出发，把英、法也列为对手，而日本的五相会議則采取促使这个同盟变成針对苏联的軍事同盟的态度。这样，宇垣的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企图組織当时英国張伯倫所追求的列强反苏因素，有效地利用列

强迴避帝国主义战爭的政策，来謀求解决中日战爭，同时，宇垣在某种程度上也看出了这样解决的可能性。7月，近卫和木戶进行了会談，他們一致認为，在1938年年底以前完全可能解决中日战爭。

張鼓峯事件

随着上述"解决事变"政策的进展，一个必然的趋势是，日本把战爭政策的重点，进一步放在对付苏联上。当时苏联在欧洲忙于捷克問題，所以在远东方面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1938年春，苏联外长李維諾夫曾向日方表示希望解决日苏間的悬案，但是日本方面的态度很冷淡。这种态度和宇垣表示准备在同英、美交涉中作相当大的讓步的情况，恰恰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但如此，当时日本国内还展开了大規模的反苏宣傳。各报刊几乎每天都大量报道"日、苏关系恶化"的消息，拿內閣进行改組的5月份的《东京朝日新聞》来說，暗示将对苏开战的消息，在这張报紙上占着显著的地位。

1938年7月爆发的張鼓峰事件，就是反苏政策达到最高潮的标志。由7月15日到8月11日，日本在"滿"苏边境的張鼓峰集中了駐朝鮮軍一个师团、重炮部队和关东軍兩千名，共約万余人，使用战車、飞机、重炮等現代化武器向紅軍挑衅。当时日軍先头部队的指揮官长勇上校是櫻会(法西斯組織——譯者)的成員，侵略"滿洲"的急先鋒。7月22日五相会議决定："作好准备以备万一，关于兵力的調遣，則在有关单位协商的基础上，以大命(日皇的命令——譯者)发布。"7月26日，日本外务省借口"日本在北庫頁島的权益受到苏联当局压制"，授权外务省情报部长发表談話，表明了准备全面进攻苏联的意图。据日方傳說，日、苏边境糾紛之所以发展成为正式的軍事行动，是由于苏联想要牵制日本对武汉的进攻。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卽使苏联有这种意图，当时以捷克問題

为中心的欧洲形势，也不允許苏联兼顧，何况以張鼓峰作为战場又是对苏联非常不利的。对于这种情况，当时日本的某些刊物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經济年报》(第三十三輯)分析了張鼓峰一带的地形以后，指出："总之，从苏联方面看来，張鼓峰一带作为'侵入滿洲'或朝鮮的基地，是非常不适宜的。"同时，硬說日本并无进攻苏联的意图的前任駐苏大使重光葵也說："不能否認，这个事件是由于駐朝鮮軍的軍官欠愼重而造成的。"（《昭和的动乱》上卷）由日本挑起的这次战事，到8月11日，已显然对日本不利，从8月12日起日、苏双方卽开始停战談判。結果，日本不得不停止軍事行动，事实上承認苏联对張鼓峰地区的主权。当时日本极力想隐蔽失敗的事实，但眞相还是傳遍了世界。事后，一个美国記者在外务省記者招待会上指出張鼓峰上飄揚着苏联国旗的事实时，外务省发言人还狼狽地辯駁說："不在山頂，可能稍微偏在对方。"（弗萊塞：《火山島》）

宇垣外交的失敗

日本在張鼓峰事件中的失敗，充分表明了日本对苏战爭的困难，对于以企图把战爭政策的矛头轉向苏联作为基础的宇垣外交的整个体系来說，的确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軍部主流派一貫反对宇垣的外交政策。当內閣改組时，軍部主流派曾要求任命东条英机为陆軍次官，以此作为同意板垣出任陆相的交換条件，以便监視板垣。从这时起，主流派就积极进行反对宇垣的外交政策的活动。同年夏季，同軍部有密切关系的右翼团体曾高呼"埋葬媚英外交"、"坚决反对宇垣、克萊琪会談"、"打倒宇垣"等口号，进行街头示威，惊动了酷暑下的东京市民。到9月間，軍部的这种攻势已使內閣在各个方面受到了重大的影响。軍部的意图是停止同英国妥协，以便扩大对中国的战爭。軍部的这种攻势目的就在于从外务省手里

夺取对中国的外交权，打断宇垣的和平工作，同时按照德国的希望，不仅以苏联为目标，而且也以英美为目标来締結三国軍事同盟。特别是圍繞爭夺对华外交权的問題，軍部和外务省之間发生了爭执。軍部主張成立一个直屬于內閣的执行对华政策的中樞机构作为"对华中央机构"；而外务省則坚持以外务省为中心設置这个机构。結果軍部获得胜利，設立了兴亚院。在作战方面，8 月到 10 月間軍部相繼向武汉、广州发动了进攻。这次軍事行动意味着把战爭扩大到同英国在經济上利害关系較深的华中、华南地区。这不仅是否定了对蔣政权的和平工作，事实上也否定了內閣的对英接近政策。軍部的这种攻势，由于宇垣外相的下野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宇垣于 9 月 27 日以兴亚院問題为理由而辞职了。宇垣的下野，表明了近卫为夺取战爭政策指导权所进行的种种策动已經失败。近卫虽然任命有田八郎接替宇垣担任外相，把內閣維持到 1939 年年初，然而"近卫本人从这时起，已經認定在不久的将来非辞职不可。这样，近卫便暗暗伺机下野，而內閣的日漸衰頹，也就不足为怪了。"(風見章:《近卫文麿》)

日軍占領广州、武汉

1938 年 10 月，日軍相繼占領了广州和武汉。这和日軍在 1937 年下半年占領天津、北京、上海、南京、山西省鉄路沿綫等地区相比，它的进攻速度大大緩慢下来了。实际上，日軍在 1938 年年底所开辟的战綫以后基本上沒有变化。在此以后，日軍只是在这个固定下来的战綫以內維持"点和綫"而已。正如毛澤东所指出的，这时中日战爭已經轉入"相持阶段"。日本显然陷入了战爭的泥潭。面对这种战局，被打断了"和平談判"之路的日本內閣，不得不再次同意軍部所主張的树立傀儡政权的方針。11 月 3 日，政府发表了

所謂"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示："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国决心把它击潰，否則决不收兵"。还指出："此次征战的終极目的在于建設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在这里，日本第一次使用了"新秩序"的字样。当时人們認为这个声明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想由中国排挤英、美的意图，特别是由于这个声明的发表，英国的綏靖政策完全失敗了。以此为轉机，英国开始同美国接近，同时这两个国家也比較积极地开展了援蔣活动。这个声明的另一个特征是修改了上述"不以蔣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它表明："当然，如果国民政府拋弃以往的指导方針，更换人事，改途易轍，参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亦不拒絕"。近卫本人也表示，这个声明緩和了"不以蔣介石为对手"的声明。(«为和平努力»)然而这个声明并不等于同蔣介石恢复"和平談判"。按照11月24日陆軍省拟定的"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工作要領"，日本是想把国民党政府当作一个单純的地方政权，使它和日軍所制造的其他傀儡政权一起組成一个綜合性的傀儡政权。当然，这种策謀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拉攏汪精卫的工作是互相关联的。(参閱本書第四章第一节)

实施国家总动員法的糾紛

从上述所謂"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可以看出，战爭政策指导权已經落在軍部主流派的手里。宇垣被迫辞职后，同他有密切关系的池田也受到了軍部的攻击。这表現在圍繞实施国家总动員法第十一条的問題发生的糾紛上。在議会审議国家总动員法的时候，近卫曾表示："本法不直接援用于中日战爭"，但是实际上从1938年5月起这个法案就已局部实施了。池田在就任大藏相和商工相时曾說："为了滿足战爭需要，当然要加强經济統制。"事实上，日本經济的軍事化在那以后进展得非常迅速。而且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作为促进战时經济的主力的壟断資本的代表——池田

才被抬出来。經济軍事化是在露骨地謀求龔断資本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的。与此相反，以和平工业为中心的中小工商业者、工人、农民却遭到了損害。在棉紡織业方面，大紡織业受到优待，小規模的作坊則受到歧視趋于沒落，軍需工业日益繁荣，而出口杂貨工业則日益衰退。进出口連鎖制的实行，更使三井等大貿易公司的利潤得到了优先的保証。

7月18日的內閣会議决定，实施国家总动員法第六条，对工人的雇用、解雇、工資、劳动时間等实行全面的統制。实施这种牺牲广大群众的利益、服务于龔断資本的政策的結果，1938年上半年大企业的利潤比上一年同期約增加百分之二十。另一方面，随着和平工业的不断倒閉，失业人数急遽增加。到1938年秋，預計将达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万人。同时，通貨膨脹所引起的物价暴漲，加速了广大群众的貧困化。在这种情况下，預定实行上述总动員法第六条的日期——11日迫近了。当时，不少人主張，如果实施总动員法第六条，就应該同时实施总动員法第十一条来限制資本家分配紅利。在內閣成員中持这种主張最力的是內相末次。他認为："如果不限制紅利的分配，可能引起工人的反对，影响治安。"末次內相是站在警察的立場，害怕生活不安定会引起工人鬧事才这样提的。对此，大藏相池田表示反对。他說："当前的問題是刺激生产，鼓励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我站在資本家的立場上，認为限制分配紅利的主張是不对的。"（《近卫文麿》）五相会議也支持池田，并且作出了不实施总动員法第十一条的决定。次日，陆軍情报部长佐藤賢了和內相末次相呼应，发表声明說："如果由于不实施总动員法的某項条款，而使人們感到一部分人被免除总动員法所带給他們的負担，……那将是一个不容忽視的严重問題。"这件事当时被称为十一条問題，曾經轟动一时。其实，佐藤不过是想刺一下池田罢了。事后，由于軍务局长影佐向池田表示歉意，問題就解

决了。然而，这个問題毕竟說明了，由于日本經济的軍事化，国內矛盾已經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內务省不得不提出实施总动員法第十一条的意見了。

1938年就在这种情况下临近末尾了：战綫固定下来，对外政策走上絕境，国內矛盾趋于尖銳，侵略战爭前途黯淡。近卫內閣的垮台也为期不远了。

第四章 中日战爭的長期化和日本国內的形勢

第一节 長期抗战下的中国

抗日統一战綫的發展

阻撓全国人民建立抗日統一战綫的国民党，由于政治的腐敗，軍事指导的低劣，造成了南京失陷、徐州潰退等軍事上的失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前夕，提出了三項重要建議：(1)参加統一战綫的成員，应在政治和組織上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根据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綱領建立各个抗日党派的革命的統一战綫；(2)成立足以代表全国民意的战时決策机构；(3)为实行国民总动員，应扩大群众性的組織——工会、青年、妇女、文艺工作等組織。对于以上三項建議，国民党临时六全大会只接受了第二項。国民党的首脑們，对于人民群众日益高漲的抗日运动越来越感到恐惧不安。虽然如此，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是通过了一項坚持抗战爭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決議，并且通过了国民党的新綱領——"抗战建国綱領"。这个綱領的主要內容是：一、必須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及遺嘱作为抗战建国时期的指导思想；二、必須把对敌抗战的民族武力集中于国民党及蔣介石的領导之下。

根据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決議，1938年7月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它的成員是由政府任命的政党、文化經济等团体的代表。参政会中有七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毛澤东、王明、秦邦宪、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穎超(女)。这个参政会当时成了中国民主党派代表的講台。由于它的成立，全中国一时出現了新的抗战气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汉鎮压十四个抗战救

亡团体，而且提出加强蔣介石独裁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領袖”的法西斯口号，照旧进行阻撓民族統一战綫的勾当。

由于日軍占领广州、武汉，国民党軍撤出了連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直到武汉的广大区域。但是日軍并未能全面控制这个广大区域。正如以下所述，这一片地区的群众以八路軍、新四軍为核心，在敌后和广大农村开辟了解放区。这样，抗日战争初期日本軍队长驅直入的势头开始陷于停頓状态。

《論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长期化的重要时期，为了进一步加强抗日統一战綫，在 1938 年 10 月召开了六届六中扩大全体会議。全会着重指出抗日战争已进入新的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并在統一战綫問題上批判和克服了对于蔣介石阴謀的右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在这次全会前四个月即 1938 年 5 月，毛澤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的《論持久战》中提出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最正确的路綫。这篇文章彻底駁斥了国民党内部的“亡国論”，科学地具体地指出了动員全国人民进行长期抗日战争和取得胜利的道路。毛澤东論証了这次战争不是短期战而是长期战：

> “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在东方是一等的，……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經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国度比較地小，其人力、軍力、財力、物力均感缺乏，經不起長期的战爭。……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
>
> “中国方面：第一，……我們在軍力、經济力和政治組織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然而第二，……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

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結，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①

毛澤东象上述那样，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并确定了抗日的政策、战略。他把持久战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②

同时，他指出了适应于这三个阶段的战争形式：

“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陣地战是輔助的。第二阶段，則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陣地战輔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輔之以陣地战和游击战。”③

当时毛澤东一方面指出，中国本身的力量，是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同时又指出，日本国内人民及其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将是一个縮短战争的条件。关于这个条件所起的作用留待日后研究。

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抗日部队，在抗日战争中正确地运用了上述理論，因而取得了偉大的胜利。

中国經济面貌的改观

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失掉了广大土地。特别是政治、經济的中心地区，几乎全部淪陷，因此經济上的損失极为严重。如：七七事变前，中国民族資本經营的九十六家紗厂（东北区除外）共有紗錠約三百万，織布机約兩万五千台，抗战后，不但生产停頓了，而且其

① 《論持久战》，《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437—439頁。

② 同上书，第452頁。

③ 同上书，第483頁。

中有六十家紗厂落于敌手，失掉紗錠約一百八十万，織布机近一万八千台，如果把小型染織厂也計算在內，則損失紗錠将及二百万，达总数的百分之七十。面粉制造业，抗战前共有制粉厂一百一十家，分布在上海、江苏、山东、河北等地的制粉厂的产量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后它們遭到敌人的破坏，产量降低了百分之六十。其他如木炭、造紙、盐酸等业损失也极大。据国民党政府經济部調查，上海市区遭到破坏的工厂共为二千三百五十家，損失达五亿元。其他各地也有二千三百七十五家工厂受到二亿四千万元的損失。此外，战爭的扩大，給农村带来了慘重的灾难。耕地、家畜、农具等損失甚巨。根据国民党农本局 1939 年 1 月的报告，全国七十六亿公亩的耕地中受到損失的达四十余亿公亩。二千三百万头耕牛中損失了八百余万头，主要农作物最低損失百分之十九，損失最多的达到百分之八十。殘暴的日本軍队，屠杀了大批无辜的农民。仅在江苏省的东南部江宁、句容、溧水、江浦、六合等县，就有四万多农民慘遭杀害，房屋的損失达二千四百万元，家畜六百七十万元，农具五百二十四万元，平均每戶損失二百二十元。

由于生产事业大量遭到破坏，以及日軍实行海上封鎖，交通运輸发生困难等原因，物价激剧高漲。以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例，1939 年 10 月份的总指数超过了 1937 年上半年平均指数的三倍。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急遽上漲，人民的生活愈益穷困。这种情况不限于重庆一地，昆明物价的上漲也很凶猛。当然，日軍占領下的上海、南京等地情况也沒有两样。1941 年 9 月 11 日《大公报》就战时的中国經济問題发表社論指出："抗战四年来，政府发行的法币，已經达到了社会需要的飽和量。內地物价上漲的主要原因是，物資缺乏和交通运輸困难，部分也由于通貨膨脹。"这就是說，中国和日本一样，由于作战的关系，通貨大大膨脹。民国二十六年度（1937 年 7 月到 1938 年 6 月）預算总額为十亿元，开战后激增至

二十一亿元，民国二十七年度为二十四亿元，民国二十八年度一跃而为二十八亿五千万元。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經济区的淪陷，稅收大为減少。就关稅而言，1938年关稅总額仅为二亿五千五百万元，比上一年度减少八千八百万元，而且国民党政府实际得到的还不到一亿元。因此在財政收支上赤字飞速增加，为了弥补赤字不得不連續发行公債。战爭爆发后的两年間共发行公債約三十亿元。同时，法币发行額也不断增加，尽管为稳定法币在得到英国貸款五百万鎊的情况下設立了外汇平衡資金，法币的危机还是越来越加深了。

中国的經济危机，不可避免地使官僚資产阶級对抗战丧失了信心。据說，利用战时經济大发横財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四大家族，在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二十年中窃取的資財竟达一百至二百亿美元之巨。这些大发国难財的人一旦感到繼續抗战会使革命力量加强，而經济危机将要威胁自己的财产时，就要毫不躊躇地出卖国家了。他們通过香港、上海等地进一步依附于英美資本，同时不断地策划破坏国共合作，伺机对日投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資产阶級在困难的情况下，却选擇了参加抗战、謀求生存的道路。中国的大多数工矿、企业由战区开始向后方迁移。迁移工作虽然进行得很緩慢，但是坚持下去了。中国的工人阶級参加了这个迁移工作。他們在困难的条件下耐心而周到地把工矿企业設备运到了后方各省。到抗战第一年終了时，武汉的工厂企业、鉄路設备、汉冶萍公司的全套設备、郑州、南昌、长沙等城市的工厂都已迁到四川、陕西等省。这样，内地工业有了发展，对民族解放战爭起了支援作用。生产設备轉移到資源丰富的西南、西北地区以后，开始了大規模的开发工作。在广大的地区里，根据各地的地理条件开展了工业建設。如：云南、貴州、广西三省发展了以生产出口用的錫、銅、茶以及国内、国防工业所必需的原料——

銅、鉄、煤、鋅、鉛、盐为目的的产业。在四川省資源丰富的地区开辟了盐田，栽培了甘蔗，嘉定市区的碱、硫銨、硫酸等的化学工业也投入了生产。在西北地区以宝鷄市为中心主要发展了纖維工业、化学工业。兰州地区加工畜产品——羊毛、皮革等的地方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它們采取了合作社經营的方式。

解放区的情况

支持抗日战綫的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日益发展的解放区。八路軍在华北敌后形成了武装斗爭的核心。在日軍占領山西省以后，它始終留在敌人的背后坚持抗战。它的抗战力量是以广大人民为基础而壮大起来的。它在解放农民、减租减息的基础上积极扩大了解放区。八路軍不但从未考虑退到和战綫大致平行的黄河的南岸，而且向北方和东方深入到淪陷区，一个村又一个村，一个鎮又一个鎮，一个县又一个县地收复失地。八路軍的战略、战术是根据毛澤东对战局的极其正确的分析制定的。1937年10月25日毛澤东在《和英国記者貝特兰的談話》中指出：

> "我們采取了其他中国軍队所沒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軍翼側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較單純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別。我們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須使用于側面，采取包圍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則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搗乱了敌人的运輸綫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軍队，也不可用單純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軍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战法，我們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①

毛澤东根据实踐和理論制定的游击战术，是战略相持阶段指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68—369頁。

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澤东在上述談話中，就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工作、軍队組織作了如下的說明：

"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这就是在軍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团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众，減輕民众的經济負担，打击危害軍民的汉奸卖国賊，因此軍民团結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軍和寬待俘虏的原則。我們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战，而且依靠敌軍的瓦解。瓦解敌軍和寬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則出发，八路軍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綫的方式，这个办法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①

事实完全証实了毛澤东的談話。全国各地相繼組織了救国团体，大批的工人、农民都組織起来，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如：山西省同蒲鉄路工人参加游击战，山东省博山煤矿工人組織游击队，道清（道口—清化）鉄路的工人也組織游击队在鉄路沿綫展开活动，京汉、津浦鉄路員工組織了两个爆破队，活跃在鉄路沿綫，破坏和顛复日本軍用列車。淪陷区的冶金、紡織、印刷等业工人也拒絕在日本工厂工作，紛紛到后方参加国防工业。上海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也不断罢工，或离开工厂参加抗日工作。

中国共产党組織群众工作的成功，进一步扩大和充实了解放区。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 1937 年曾向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准备把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的領导。战爭爆发一周后，共产党就根据这次通电，在陕西苏区——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三十几个县实行村、区、县代表的选举，組織了陕甘宁特区政府。在这次选举中，过去在苏区被剝夺选举权的一部分地主也恢复了选举权。随着敌后解放区的扩大，1938 年在山

① 《毛澤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369 頁。

西、察哈尔、河北三省边境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接着在华北又开辟了晋冀鲁豫边区和鲁苏豫边区，在华中建立了苏皖边区，等等。在这些边区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議——边区参議会，选出了执行机关——边区行政委員会，另外各县有县議会，所有的行政負責人都是民选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措施，就是从 1940 年起实行的三三制。当时边区内的旧官僚和国民党要人，因恐惧日軍的进攻，紛紛逃亡，因此当选为参議会和行政机关成員的多半是共产党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共产党把共产党員当选的人数限定为全部当选人数的三分之一，規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代表占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一为无党派人士。这样一来，边区政权机关不仅有国民党的代表，也有資本家和地主的代表。土地政策方面，停止了沒收地主土地的办法，实行了二五减租和保証交租的政策。政府在执行减租政策上，也不采取强迫命令的作法，而采取协商的方式。政府对富农也給予一定程度的保护，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因此，支援抗战的主力固然是貧农、中农，而部分地主、富农也組織了抗日自卫队。另外，工商业政策方面，也較大限度地准許私人資本的活动，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小型的民营企业，使工人参加經营管理，改善他們的待遇，以鼓舞生产积极性。

总的說来，解放区的政策体現着謀求人民即全民族利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論》

1940 年 1 月毛澤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論》。这个著作闡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信心。著作中指出："中国現时社会的性質，旣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須分为两个步驟。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

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現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①作为第一步，現在必須使农民、知識分子、小資产阶級、进步的資产阶級人士在无产阶級的領导下联合起来，驅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勢力。这个革命仍然是資产阶級民主主义性質的，不是以建立資本主义社会和資产阶級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而是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級联合专政的国家和建設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所以它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为社会主义所容許，成为世界无产阶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毛澤东闡明了抗日战爭时期中国革命的意义，同时还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在經济方面，具有社会主义性質的国营經济是整个国民經济的領导力量；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級領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下面談一談抗日斗爭中文艺界人士的活动概况。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以毅然离开日本、結束亡命生活回到祖国的郭沫若为中心积极展开活动。协会发表宣言說：

> "我們相信文艺是政府与民众間的桥梁，所以必須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入民間；同时，把民間的实况傳达給当局。一方面我們竭誠的去激动士气民气，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揭发了各方面的缺点和弱点，以求补救与革新。"②

自此以后，文艺工作者、教授、艺术家等积极走上政治舞台，展开活动。

---

① 《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9頁。

② 《中国現代文学史参考資料》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出版，第10頁。

在这以前，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早已积极展开活动。艾思奇、柯仲平、陈荒煤、刘白羽、卞之琳、周而复等人組織了"文化界救亡协会"，通过文艺活动鼓舞了抗敌士气。另外，田間等人也主持《西北文艺》，从事抗日宣傳。同时，以"魯迅艺术学院"为中心进行了組織民間艺术参加抗日的工作，許多文艺工作者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所組織的"文艺工作团"，深入到部队、工厂农村、街道中去展开工作，鼓舞了士兵和群众的情緒。

文艺工作者們繼承了五四运动傳統的反抗精神，参加了各地的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其中赵树理、郭沫若、巴金、茅盾、老舍等人更創作了許多优秀的作品。

汪精衛投敌

从 1938 年下半年起，国共关系即开始恶化。自命代表全体国民的国民党，实际上只是一个代表少数大地主、官僚資产阶級利益的政党。它在抗战的过程中进一步成为以蔣介石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組織。因此，它和坚决保护工农、小資产阶級利益的共产党之間自然要发生尖銳的对立。1939 年 1 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决定把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轉向对內，实行所謂"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国民党右派还提出了旨在破坏国共合作，限制共产党和八路軍势力扩大的提案。国民党并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禁止共产党的活动，以中共为"第一敌人"，而以日本为"第二敌人"，积极地准备发动內战。例如，1939 年 4 月，山东国民党将軍沈鴻烈命令屬下秦启荣部突然襲击八路軍的背后方，惨杀了四百余人。許多英勇抗战的共产党員和人民遭到蔣介石爪牙的屠杀。新四軍、八路軍的留守处也遭到国民党的襲击，甚至伤病員和抗屬也惨遭屠杀。另外，国民党在統治区內积极加强了法西斯特务組織和特务統治，发展了"CC 派"和"复兴社"两大法西斯

組織，在各地大肆逮捕抗日的进步青年。

1939年9月德国同英、法开战，英、美帝国主义为了把力量集中到欧洲，企图同日本妥协。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政府一方面要求美国居中調停，另一方面为使談判得以順利进行，又掀起了反共高潮。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軍侵入陝甘宁边区，占領了五个县城，并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領导下的抗日敢死队。八路軍、新四軍在国民党軍和日軍的夹击下坚决抵抗，粉碎了国民党軍的进攻。就在这种形势下，毛澤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論》，向中国人民指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才能得到胜利。1940年2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过一篇評論，大意是："老实說，今天中国之所以能够坚持抗战，而沒有造成远东慕尼黑的局面，就是由于共产党問題无法解决，如果沒有共产党，中国早就接受日本条件而同日本媾和了。"《新民主主义論》的发表，对于当时国民党的卖国勾当，給予了沉重的打击。

抗日战綫的这种分裂的征象給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在此以前，即1937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梁鴻志为首的伪"中华民国維新政府"。它們虽然都标榜着"反共建国"，但是由中国人看来，很明显，这两个"政府"都是日本政府、特别是在华北、华中的日軍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它們对群众沒有任何吸引力，因此，日軍在維持占領区的治安上，感到极大困难。为寻求对国民党进行"和平"工作的綫索，日本的特务机关展开了活动。在香港的高宗武和在上海的梅思平同日本特务机关发生了关系。高宗武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长，他根据蔣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的計划駐在香港，专門搜集有关日本的情报。据說高曾經在1938年5月，秘密到东京向日本政府要人探詢过日本有无进行和談的意图。同年11月，高宗武和梅思平等人一起同日本陆軍省軍务科长影佐禎

照上校 参謀本部成員今井武夫中校、犬养健等人进行了商談，拟定了“調整中日国交的基本条件”，同时在日本統帅部、政府的同意下确定了“抬出汪精卫”的方針。11月3日日本政府关于“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就是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发表的。（参看本書第三章第三节）

高宗武的活动究竟同蔣介石有多大关系，我們还不清楚，然而不难想象，至少前一阶段的活动蔣介石是知道的，而且是在他的默許之下进行的。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副总裁，国民党主和派的首領。1938年10月，他拿着日軍在华南登陆的报道向路透社記者公开表示有意同日本进行和談，他說：“如果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的生存，我們就应該接受并作为討論的基础，不然就沒有調停的余地。一切要看日本提出的条件而定。”这番談話虽然受到了共产党甚至国民党內部的抗战派的譴責，但是汪精卫联合蔣介石陣营內部的暗中“主和”的右翼——CC派、藍衣社的右派，組成“反共和平”派，再三地劝告蔣介石屈膝“求和”。当时蔣介石一方面似乎同意，另一方面，他又接近抗战派。这是因为，在抗日統一战綫的压力下，只有繼續抗战才能維持他的独裁地位。12月3日蔣介石在国民党紀念周上发表演說：“中国的抗战前途越来越光明，……抗战能够統一全国，只要全国民众精誠团結，任何强敌都不可怕。”这样一来，汪精卫感到除逃出重庆以外别无他策，于是他跑到昆明，同因公到那里的周佛海商量好，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于12月20日飞到河內。就在这个时候，即12月22日，东京发表了所謂“近卫三原則”的声明，以近卫首相談話的方式表明了“日本政府关于調整日中国交的根本方針”（参看附录資料）。汪的所謂“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張就是同近卫的声明相呼应的。針对这种情况，蔣介石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員会常务委員会临时会議，宣布汪为叛逆，开除党籍，褫夺公权終身。当时中国輿論对于身为国

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投敌一事进行了严厉的譴責。結果国民党內部的主和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抗战派的势力大为增长，而日本和国民党亲日派抬出汪精卫的意义也就大为减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日本派影佐、犬养到河內把汪精卫接到上海。从此，汪精卫就完全成了日本方面，特别是影佐指揮的特务机关——“梅机关”掌握的傀儡了。

第二节　战时經济和壟断資本

1937—1938 年的經济危机

1929 年世界性的經济危机爆发以后，各資本主义国家逐漸由危机轉入蕭条。虽然部分工业的情况有了好轉，生产略有上升，然而这种好轉只是曇花一現，而且也沒有达到一般程度的繁荣，到1937 年下半年，又发生了新的經济危机。这次危机襲击了美、英、法以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带来了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第三次生产过剩。

这次危机虽然仍表現为生产过剩，然而和过去的危机有很多不同之点。这些不同点不是比从前好些，而是比以前更糟。第一，在这次危机以前并未出現繁荣；第二，这次危机并非发生在平时，而是发生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以后，也就是日、德、意三国完成战时經济体制，其他各資本主义国家也正在开始轉入战时經济的时期。第三，这次危机发生在尙未完成战时經济体制的經济力量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美、英、法等国。至于日、德、意三国虽然临近于生产过剩的边緣，但是由于它們大力地发展軍需工业，并未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然而人們已經估計到，当經济力量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摆脫危机的时候，热中于侵略战爭的日、德、意等国由于黄金儲备和原料的枯竭必然要陷于严重的經济危机。

以首先陷于經济危机的美国为例。自 1937 年 9 月股票和物价开始暴跌后，在短短两三个月以内即下跌了百分之五十左右。据联邦儲备局发表的生产指数（以 1923—1925 年为一百）：1937 年最高月份——5 月为一百一十八，到 1938 年 2 月下降为七十九，仅仅九个月就下降百分之三十三。在危机发生以后，首先遭到打击的是消費品工业。1937 年 9 月生产資料工业也遭到了危机。生产資料的生产指数在 1937 年 8 月到次年 2 月的六个月期間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同时，由于 1937 年在世界范圍内出現了农业大丰收，在这年的秋天农产品价格发生暴跌。在这种危机之下，产业界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中小企业損失慘重，在 1938 年第一季度倒閉的厂商就有三千四百七十八家，負債总額达到四千四百万美元。工人处境更趋恶化，1938 年失业工人为一千零四十万八千人，和就业情况最好的上一年 9 月相比，失业工人增加了四百三十四万三千人。1938 年 2 月，每一工人每周收入，由于减低工資和縮短生产时間，比 1937 年 5 月降低了百分之二十。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当时解雇、减低工資的風暴已經席卷全国。这就必然要激起工人阶級的激烈反抗。仅以 1938 年 2 月为例，劳資糾紛次数即达二百五十次，参加人数为七万人。危机发生后，美国大壟断資本經营的軍需工业想靠出口軍火寻求出路，这样，美国就逐漸成为"世界兵工厂"。美国在外交上之所以对日、德采取强硬态度，就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經济背景。

美国的危机很快地傳到了欧洲。以股票行情为例，1938 年 10 月底同 1937 年的最高峰相比，倫敦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布魯塞尔和巴黎都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在同一时期内，銅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五，鉛下降了百分之六十，錫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六，小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九，棉花下降百分之三十七。在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仅次于美国的是英国。1938 年中期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生产也

有了显著的下降。

日、德、意法西斯国家，虽然由于为准备大規模的侵略战爭而进行軍需生产，延緩了危机的发生，然而由于它們实行法西斯統治，使国民經济从屬于壟断資本的战爭利益，通貨不断膨脹，从而，在壟断資本获得愈来愈巨大的利潤的同时，广大群众日益陷入极

主要工业国工业生产指数（以1929年为100）

国　　别	1934 年	1935 年	1936 年	1937 年	1938 年
美　　国	66.4	75.6	88.1	92.2	72.0
英　　国	98.8	105.6	115.9	123.7	112.0
法　　国	71.0	67.4	79.3	82.8	70.0
意 大 利	80.0	93.8	87.5	99.6	96.0
德　　国	79.8	94.0	106.3	117.2	125.0
日　　本	128.7	141.8	151.1	170.8	165.0
苏　　联	238.3	293.4	382.3	424.0	477.0

端的貧困。由于經济的軍事化，这些国家的生产虽然表面上有某种程度的上升，但是从本質上看，这种經济的軍事化給国民經济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在德国，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原料荒，黃金儲备瀕于枯竭，广大群众的貧困化达到极点，非軍需生产部門趋于沒落，公債增发不已，而且，还面临着潛在性的通貨膨脹。

当时，日本虽然保証了軍需生产部門的高度的开工率，然而另一方面又苦于原料不足和和平工业生产的显著減退。公債的发行已經突破一百亿日元，尙无止境。农村中的佃农无力購买价格日日上漲的肥料。美国的危机已使日本的出口业陷于破产，原料的进口也中断了。黃金外流日益加剧。粮食、原料的进口有了惊人的減低，拿 1938 年 1 月至 3 月和前一年同期相比，小麦減少百分之九十七点六，羊毛減少百分之八十七点三，棉花減少百分之七十八点六，生胶減少百分之五十一点九，油料物資減少百分之四十六点七，皮革类減少百分之六十，碱減少百分之八十四点四。进口商品

平均減少百分之三十八。出口也大量減少，拿1938年1月至6月和前一年同期相比，按出口价格計算，絲織品減少百分之三十四，棉織品減少百分之三十二，人造絲織品減少百分之七十一点三，玩具类減少百分之三十七点二。总出口量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八点八。日本的黃金儲备，1936年年底为二亿七千三百万美元，1939年9月減少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九千七百万美元。当时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的黃金儲备的总和尙不及一个小国——瑞士之多。

在上述情况下，1938年4月，日本消費品生产比前一年7月減少了百分之十五点八，生产資料的生产由于把重点轉向軍火生产，因而产值增加了百分之六点九，但是生产总値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三，显示了生产下降的趋势。

經济統制的加强和战时財政政策

1937年6月4日成立的第一次近卫內閣，为了加强战时体制，制定了扩充生产、平衡国际收支、調整物資供应等三項原則。这是因为，对于原料和生产手段几乎完全依靠国外进口的当时的日本說来，在加强战力，生产大量的近代化武器成为首要任务的时候，为了在質的方面达到高度的技术要求，在量的方面滿足大量的需要，除新建和扩建各种基础工业以外，别无他途。秀裴克特洛夫在《軍需工业論》中曾經指出："在沒有重型机器制造业、汽車拖拉机制造业以及近代化学工业的国家，在缺乏进步的金屬加工技术和精密机器設备的操作訓練的国家，可以說不存在生产精密武器的基础。"日本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日本政府为了扩充軍需生产和調剂物資供应，不得不多方利用国外貿易，然而这是一个非常沒有把握的打算。于是，它对經济的一切領域撒下了統制网，以期突破难关。

施行"重要产业統制法"以后，为了遏止从1936年开始的入超

加剧所引起的日元汇率的跌落，从1937年年初起开始了黄金出口，并且采取“外汇許可制”，实行了进口統制。随着中日战爭的扩大，又在1937年9月同时頒布了有关物資方面的“进出口临时措施法”和有关資金方面的“临时資金調整法”，并援用早在1918年頒布的“軍需工业动員法”，完成了經济动員的体制。后来由于侵略的扩大和战爭的长期化，終于实行了“国家总动員法”。（参閱本章第二、三节）上述的“进出口临时措施法”，把过去通过外汇管理进行的对进出口貿易的間接統制改为直接統制。它不仅对物資的进出口进行統制，而且对进出口物資在国内的生产和使用也进行了統制。1937年又施行了“临时进出口許可制”，棉花、羊毛、木材、皮革、纖維紙浆、橡胶等六种物資被限制进口，另外还有二百七十种消費品，被作为“不需要或非急需物資”基本上禁止进口；同时禁止了軍需物資的出口。为了把所有的进口原料、資材完全用于軍需生产，于1937年到1938年期間又采取了限制和禁止使用、配給統制等項措施。这些重要資材的配給統制是委托壟断資本的代表机构“日本橡胶工业联合会”、“日本电綫工业联合会”、“銅配給統制协議会”等在“自主的配給統制”原则下执行的。“进出口临时措施法”是为了对物資进行統制，与此同时施行的“临时資金調整法”则是为了从資金方面积极扩充軍需生产，为了尽可能阻遏随着軍需生产的扩充而必然会表面化的通貨膨脹，并为了順利地推銷公債，防止資金流向和平工业方面。它的具体措施是制定“事业資金調整标准”，排定应当扩充的生产部門的次序（甲：軍需工业和同軍需工业有关系的基础工业；乙：不屬于甲、丙的企业；丙：生产力过剩的企业、奢侈品及其他），根据这种規定对金融机关的貸款实行統制，并設有特例保証軍需工业筹措資金，同时，还把兴业銀行的債券发行額由五亿日元提高到十亿日元。1938年4月，政府对兴业銀行的債券提供了償还本利的保証，从此兴业銀行卽完全以国家信用为

背景成为資金統制的核心。政府除施行"进出口临时措施法"、"临时資金調整法"以外，同时还頒布了一項以直接动員人力、資源、国民經济为目标的"軍需工业动員法"。到 1938 年 5 月，这个法令的內容随着"国家总动員法"的施行有了进一步的扩充。"国家总动員法"不仅是为了在战时迅速地把金融、企业和国民生活納入总动員体制，并为此規定了有关劳务、物資、資金、物价、出版等項的統制措施，而且还包括了有关平时的国民登記、技术人員的培养、物資保存計划的制定等。总之，这是一个授权政府建立把全体国民投入軍事监獄的警察国家的法令。在这个时期，为了加速国民經济的軍事化而制定的法令还有："人造石油事业法"、"鋼鉄冶炼事业法"、"电力国家管理法"、"重要矿物增产法"、"工作母机制造事业法"、"飞机制造事业法"等等，不胜枚举。

以資本主义生产无府政状态为基础的軍需工业的发展，只有在符合壟断資本追求最高利潤的要求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通过上述經济統制，在牺牲国民生活的基础上，把物資、資金源源不絕地供給壟断資本。这样做的必然結果，就是进一步加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不平衡性，使国民經济陷于极度混乱。到 1938 年 3 月，在世界經济危机（1937 年到 1938 年的危机）的影响下，进出口貿易同前一年同期相比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消費品的生产減少了百分之十五点八，生产总値減少了百分之二点三。同軍需工业的发展相反，和平工业由于原料不足，开工率大为降低（紡織工业降低了百分之六十一点四、洋紙制造业降低百分之五十、人造纖維工业降低百分之七十），造成了固定資本的大量过剩，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必需品深感不足，黑市盛行，通貨急遽膨脹。

1938 年 4 月，慑于上述严重局势的政府不得不进一步加强經济統制。同年 5 月第一次近卫內閣实行重大改組，任命池田成彬

为大藏相，制定了充实軍需、抑制物价、鼓励出口三項原則。在对外貿易方面制定了“进出口連鎖制”、在国內体制方面实行了“国家总动員法”，在这个基础上实施了物資动員計划、配給計划、調整消費、統制劳动力等。同时为了更系統地压榨殖民地，又加强了所謂“日、滿集团經济”以及“日、滿、华集团經济”。战时經济統制从此轉入了一个新阶段。

中日战爭爆发以后，日本的財政已完全轉化为軍事財政，財政政策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国民經济适应龐大的預算。1938年的預算編成以后，政府又要求各部提出所謂“物資預算”，实行了物資供求的調整。在这期間預算逐年增加。一般会計、特別会計加上七七事变以后的临时軍費特別預算，1937年为一百二十一亿三千三百万日元，1938年为一百九十八亿八千七百万日元，1939年为二百三十四亿八千九百万日元，1940年为二百七十七亿二千八百万日元。不用說預算增加得最多的是軍費。而且軍費以外的一些預算項目，从某种意义上說也带有軍費的色彩。另一方面，同国防无关的預算则逐年受到削減或延緩，以1938年的預算为例，即削減了“不需要或非急需”事业費一亿四千万日元，內务省的土木建筑工程費竟被一笔勾銷。不断增加的預算的岁入部分，是靠連續增稅和增发公債来筹集的。自从結成大藏相实施“临时賦稅加征法”以来，在賀屋大藏相任內又开征了“华北事件特別稅”，次年又开征了“中国事变特別稅”，更于1939年修改了“特別稅法”。在公債发行方面突破了“公債漸減方針”，逐年增加，1937年为十五亿日元，1938年为四十三亿日元，1939年为五十三亿日元，1940年为六十八亿日元，1941年为九十一亿日元，在短短四年間即增加五倍以上，从一般会計和临时軍費特別会計决算看来，岁入部分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左右是靠发行公債来弥补的。

在战时財政政策下，政府支付給民間（主要是指財閥集团——

譯者)的金額逐年增加。同前一年比較，1936年向"民間"支付的資金增加十五亿日元，1937年增加十八亿日元，1938年增加四十八亿日元，1939年增加五十三亿日元，1940年增加四十七亿日元，1941年增加七十八亿日元，五年中增加了五倍以上。以軍費为中心的財政支出促进了軍需生产的发展，扩大了資本的利潤。从臨时軍費的支付結果看来，在1937年至1941年的支付总額中，对重工业、化学工业的支付占百分之六十。为战爭服务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不仅在課税上受到优待，而且还受到各項經济統制法令的保护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它以壟断的形式日益发展。

財閥勢力的扩大

所謂"財閥反对战爭"，"財閥、軍部、官僚之間利害关系不一致"等等說法，完全是財閥本身故意制造的讕言，也是他們用以回避战爭責任的一种辯解。实际上，企图利用侵略战爭攫取最大利潤的正是他們。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所謂建設"王道乐土"的日窒（日本氮肥)、日曹(日本制碱)、森、日产等新兴財閥，利用国家信用或依靠軍事訂貨有了一些发展。在这时候三井、三菱、住友等旧財閥抓住这些新兴財閥还沒有自营的金融机关的弱点，除利用金融机关控制它們以外，自己也投下大量資本，着手建立巨大的化学工业，以期壟断这方面的利潤。

三井于1933年开办东洋高压(硫銨)和日滿制鉛兩厂，1934年开办人造絲和苛性鈉工厂，1935年开办高速机关工业(汽車)和石川島芝浦发动机兩厂，更于1936年开办玉造船厂，1937年开办南洋鋁矿，向軍需工业发展。东洋高压厂于1937年合并三池氮肥公司后，在克劳德式的生产技术基础上又采用了杜邦式的新技术，很快就追上了新兴財閥——野口遵經营的朝鮮氮肥厂和森矗昶經营

的昭和化肥公司。后来，玉造船厂从三井物产船舶部独立出来，至1937年发展成为仅次于三菱长崎造船厂、川崎造船厂的日本第三个大造船厂。与此同时，旧有的重工业、化学工业部門为了发展軍需生产，也增加了大量資本。芝浦机器制造厂于1932年由一千万日元增至一千五百万日元，日本制粉厂于1933年由四百万日元增至一千二百万日元，东洋人造絲厂于1933年由一千万日元增至三千万日元，合成工业由五十万日元增至一百万日元，北海道碱厂1934年增至三百万日元，大日本賽璐珞（化学工业）于1935年由一千万日元增至二千万日元，丰田織机厂于1934年由七百五十万日元增至一千五百万日元，1936年日滿制鉛厂由五百万日元增至一千万日元。

在基础工业中，三井的壟断一向是根深蒂固的。三井系統下的三井矿山、北海道煤矿輪船、太平洋煤矿等矿厂的产煤量竟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三井矿山除产煤以外还从事于金銀以及鉛（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八点八）、鋅（百分之八十一点五）的采炼。三池氮肥公司拥有染料工厂，生产焦炭、煤焦油、硫酸、染料、火藥、炸藥、毒瓦斯等，是一个重要的化学武器制造厂随着战时經济的进展，三井矿山又在三池开办了人造石油厂，在北海道設立了人造石油公司、在"滿洲"設立了合成燃料公司（生产人造石油）。日本制鋼厂拥有生产以鑄鋼、鍛鋼、合金等为原材料的武器的优良技术和設备，特别是在制造炮身和战車方面沒有一个能和它相比。日本制鋼厂經营的室兰、广島兩厂，制造炮身的生产能力足以供应日本海軍所需的炮身的半数。

三菱系統的东京鋼材厂，在1933年經过兩次增資，由四十万日元增至二百万日元，1935年又增至五百万日元，等于原資本的十二倍。三菱造船厂和三菱飞机制造厂在1934年合幷成为三菱重工业公司（資本为五千五百万日元），1935年因收买日本邮船系

統的横濱船塢又增加了資本五百万日元，1937年資本又增加一倍，达一亿二千万日元。1932年曾告亏損的这个大軍火公司，随着軍需工业的景气，利潤率不断上升。1934年所得利潤为百分之十点三，1935年为百分之十三点六，1936年为百分之十六点五。1937年三菱重工业为东京朝日新聞社制造的"神風号"飞机，以九十四小时的記录完成了东京、倫敦間的飞行。它的发动机是三井系統的中島飞机制造厂和神戶制鋼厂（台灣銀行系統）的产品，做机身用的硬鋁和鎂的合金是住友金屬工业供給的，无綫电收发报机是日本无綫电信电話公司（大仓系統）制造的。日本各財閥工厂合作制成"神風号"飞机一事，表明日本在建立生产近代化武器体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当时某杂志报道称："当'神風号'飞抵倫敦时，軍人們比朝日新聞社的人員还要狂喜，一批和二·二六事件时意义不同的'挺身队'喝得醉熏熏的，拥进朝日新聞社，强迫該社人員高呼万岁（不是讓他們举手听命）。从这件事不难看出'神風号'飞机的飞往倫敦的意义。这是将要采取某种行动之前的一个前奏。"（«日本評論»1937年5月号）此外，三菱重工业系統的长崎造船厂于1938年3月已开始秘密建造排水量六万四千吨、装有九門口徑为四十六公分的大炮的世界最大的軍艦"武藏号"。这不是为了称霸太平洋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又是什么呢？

在基础工矿方面，三菱系統的三菱矿业、九州煤矿輪船、雄别煤矿等三个煤矿的产量，約为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五。其中三菱矿山除产煤以外，还盛产錫、鉛和鋅，錫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六，几乎壟断了全部錫的生产，鉛的产量为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二，鋅为百分之十一点四。此外，还和三井矿山同样地生产金、銀、电解銅、电解錫、电解鋅、优質鉛、鎢矿、硫化矿、鉄矿、硫酸、焦炭等。1937年对重工业、化学工业、海軍方面的投資，三菱为資本总額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九；三井为資本总額的百

分之三十点一；对机器工业、造船工业方面的投資，三菱为資本总額的百分之十二点八，三井为百分之六点三。显然在軍需工业的投資方面，三菱处于显著优势。1934年，住友財閥把住友化肥制造厂的資本由一千万日元增至二千万日元，并改称住友化学工业公司。1937年这个公司的硫銨产量仅次于日本氮肥、昭和化肥、东洋高压各大工厂，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同年，住友系統的日本平板玻璃厂的資本由四百万日元增至一千万日元，在这一年中又設立了住友制鋁厂（資本为一千万日元）和滿州住友鋼管厂（資本为一千万日元）。1935年住友压延銅鋼管和住友制鋼厂合并成立住友金屬工业公司（資本为五千万日元）。1937年住友別子矿山和住友煤矿合并成立住友矿业公司。这个公司由于拥有別子銅山，在銅矿的开采上占优越地位。

軍需工业是財閥获取利潤的源泉。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932年上半年到七七事变前夕的1936年下半年为止，財閥大本营所得到的紅利，屬于三井系統的企业，仅三井矿山、北海道煤矿輪船、芝浦机器制造厂、日本制鋼厂等四个单位就达到三千九百零八万日元，等于三井紅利总額的百分之三十四。屬于三菱系統的企业，仅三菱重工业、三菱矿业、三菱电机等三个单位的紅利即达二千九百九十六万日元，占三菱紅利总額的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見，1931年以前几乎都告亏損的这些財閥企业，由于軍事开支的增长，不断提高了利潤。

如上所述，財閥通过在战爭中获得最大限度利潤来謀求出路，不断充实了經营体制。其后，財閥要走的唯一道路，則是在大搞軍需生产的同时，夺取新兴財閥所开辟的經济領域，并在战时統制的名义下，利用国家权力来获取利潤。这种作法随着下列許多情况的发生越来越变本加厉了。这些情况是：在1937至1938年发生的經济危机波及日本，超过經济力的軍备扩充，使进出口貿易減少

百分之四十，与此同时，1939年年初开始出現了利潤下降的趋向；1938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原材料和生产軍火用的工作母机的进口中断；1940年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締盟的結果，同盟国冻結了日本国外資产，美国廢弃日美通商条約，以致日本和同盟国之間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終于发动了企图統治全世界的冒險战爭。

日"滿"华經济"合作"

日本侵占"滿洲"后，就在"滿洲"开始建設重工业，当时它把这种經济建設称为"日滿經济合作"。从1937年起日本模仿苏联的計划經济，实施了所謂"第一个滿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計划"，开始在"滿洲"建立战时經济体制。这个計划的主要目标是使重要軍事企业达到自給自足，和从战略出发实現"滿洲"的經济独立。这个計划的重点在于扩充工矿业部門，特别是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急切需要軍需物資。于是，它对所謂五年計划作了修改和补充。在这次修改和补充中，加强了把日"滿"联为一体的軍需生产的扩充，同时，放弃了最初拟定的使"滿洲"經济独立的方針，强調了二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修正五年計划的主要目标是大力扩充工矿业——包括鉄、煤炭等原料以及液体燃料、电力等动力資源的生产，建立飞机、汽車和武器等軍需工业。

为了在保証利潤的条件下，积极地吸引日本国内的資本来发展"滿洲"的軍需工业，以适应对于軍需品的急剧增长的需求，"滿洲国"政府在1933年发表了"滿洲国經济建設綱要"，緩和了对于資本利潤的統制。1937年11月以日产財閥为主体成立了滿洲重工业公司，代替"滿鉄"(南滿鉄路公司)成为重工业建設的軸心。当滿洲重工业公司成立时，为了保証日本股东的利益，使日本国内的

資本可以安心地投向"滿洲"，日产和"滿洲国"政府之間締結了如下有利于日本股东的协定：日本股东每年的紅利低于百分之十时，"滿洲国"股东的紅利訂为日本股东的一半；"滿洲国"政府保証在公司成立后的十年內，除保証股东的安全以外，对公司所办企业的一切資本支付年率百分之六的股息，公司紅利的分配比率不受任何限制。（参看井上、宇佐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論》）这时廢除了过去各企业隶屬于"滿鉄"时所实行的"一个部門一个公司"的原則，根据"重要产业統制法"分别設立了"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股东是日、"滿"政府各机关、在"滿洲"、中国投机致富的日本人和日本陆海軍軍官中的資本家。"滿洲国"政府把原来中国人在"滿洲"的財产沒收或以微不足道的价格收买过来，以"实物投資"的形式投入这些公司。"特殊"公司和"准特殊"公司在1932年只有三家，到1943年6月增加到六十九家，已交資本額由一千三百万日元增至三十六亿五千九百万日元。可見在保証利潤和保护企业的政策下，以日本財閥为中心的日本股东的投資在不断增加。七七事变后代替"滿鉄"在"滿洲"重工业的建設中起主导作用的鮎川所主持的滿洲重工业公司壟断了煤炭、鋼鉄、有色金屬、机器制造和化学等工业。它的投資总額由1938年的六亿零六百万日元增至1944年的二十八亿六千三百万日元。到1943年为止，三井財閥向"滿洲"的五个企业共投資一千三百二十万日元，三菱財閥向四个企业投資六百六十万日元，住友財閥向三个企业投資三百五十万日元，大仓財閥向两个企业投資七百二十万日元。

"滿洲"經济建設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对苏的軍事基地。从1939年5月起，"滿洲国"政府又实行了同五年計划并行的"北部边疆地区三年建設計划"。这个計划是在充实"北滿"的国防的总目标之下，同加强軍备、产业开发五年計划和开垦等政策相配合，以通过扩充交通通信設备来加强运輸力量、建設城市、发展农牧业、进行

开垦为直接目的的。为此目的，"滿洲国"政府在靠近苏联的边境上新設东安、北安兩省作为特殊地区，并且扩充了負責执行这項建設計划的机构。

日本国内經济体制的战时化，首先是要求动員战略物資和扩大軍需生产。一向依靠进口原料的日本資本主义經济，在进行軍需生产时，也必須进口大量的战略物資。然而，由于退出国际联盟而陷于孤立的日本，不得不在对外貿易方面減少其对英美市場的依賴程度而向亚洲市場集中。1938年11月政府又拟定了旨在加强重工业生产的物資动員計划。这是一个以开发日、"滿"、华三国資源为目的的綜合計划，具体地說，也就是利用日、"滿"、华三国的資源自給自足地生产鋼鉄、煤炭、輕金屬、鋅、碱、硫銨、紙浆、机車車輛、汽車、船舶等物資，形成所謂"日'滿'华經济合作"的局面。在1940年11月又制定了"日'滿'华經济建設綱要"，并根据这个綱要制定了包括"日'滿'华三国經济"在內的重工业化計划。

中日战爭的爆发，使朝鮮北部和"滿洲"的重工业化相呼应，也踏上了重工业化的道路。在"滿洲"搞重工业的主要是新兴財閥日产，在北朝鮮从事重工业建設的主要是和三菱携手同朝鮮总督府合作的日本氮肥公司。它通过建設和經营赴战江水力发电站、长津江水力发电站奠定壟断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支配着朝鮮氮肥、日本鎂金屬、朝鮮煤炭、朝鮮氮素火藥、朝鮮石油等重工业。当时以日本氮肥公司为中心形成了連結罗津、清津、兴南等地的北朝鮮重工业地带和連結新义州、平壤、鎮南浦等地的西朝鮮工业地带。这些重工业都是以强制的手段征用朝鮮工人来建設的。当时日本以"內鮮一如"(意指：朝鮮、日本是一家——譯者)为招牌宣布朝鮮人为"日本人"，而另一方面又把朝鮮工人关在工厂里强迫他們从事劳动。这种囚犯式的强迫劳动，迫使朝鮮工人不断逃亡。

"滿洲"、朝鮮的經济建設是和日本內地的重工业化以及扩大

軍需生产相輔而行的。日本壟断資本由于采行极力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和实行最低工資制，对殖民地的劳动力进行野蛮的剝削，因而获得了最高利潤。

随着 1933—1935 年日本势力的侵入华北，以及中日战爭的爆发，日本資本开始排挤他国資本，扩大自己的投資。七七事变前，日本的資本主要投在輕工业和商业方面，事变后，随着“日‘滿’华經济集团”的形成，日本硬把中国經济納入日本战时經济体系作为它的一个环节，强使中国經济轉入重工业化的道路。开发中国的軍需資源补充日本軍需生产的原料，这就是所謂“日‘滿’华經济合作”的实际內容和主要目的。1938 年日本国家資本和壟断資本合作的产物——“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宣告成立。这两个公司的主要任务是开发鉄矿、煤炭、海盐等資源。它們不仅在分配紅利上受到保証，而且有权发行等于資本額十倍的債券。它們把过去日本人所支配的中国方面的各大公司，改組为自己的附屬公司，把中国人从經营管理工作中排挤出去。这两个公司就是这样地把中国人經营的工厂一个个地夺取过来。如：正丰、博山、中兴、大同、保晋、平定、井陘、宣化等煤矿，大冶、宣化的鉄矿和石景山、汉冶萍、六河沟等鋼鉄厂都变成了这两个公司的附屬公司（1944 年 3 月“华北开发公司”拥有三十四个直屬公司，“华中振兴公司”拥有十二个直屬公司）。和这两个公司同时幷进瘋狂地掠夺中国工厂的，还有鐘淵紡織、东洋紡、日清制粉、大同电力、大仓組、淺野水泥、小野田水泥、王子制紙、丰田汽車、朝鮮合同电力等財閥系統的企业。例如，瓜分中国面粉厂的，在华北有东亚制粉（三井系統），日清、日东；在华中有三井、三菱、大日本制粉联合会（以合組三兴制粉厂的形式）。它們都获得了巨大的利潤。日清紡織在青島拥有的紗錠数仅为它在国内的紗錠数的百分之六点七，但在 1941 年上半年所获得的利潤，竟高达总利潤的百分之三十九。据

說，日本在中国的紡織厂在两、三年內就可以撈回全部投資，获利之巨由此可以想見。随着日軍侵入中国的日本厂商的这种掠夺是在枪杆和刺刀保护下进行的。1937年9月，三井物产公司經理向职員发出一項指令，內称："随着华北治安的恢复和亲日势力的成长，营业可能很快地恢复，应当抓紧机会同各分支机构以及有关当局进行密切联系，研究积极发展的方策。"（持股公司整理委員会：《日本財閥及其解散》）特别是日本国內的和平企业，在国內战时經济体制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向中国大陆寻找出路。侵入中国的日本厂商从三菱重工业之类的重工业資本开始，以至于白木屋、高島屋、松坂屋、大丸等百貨公司，小田电車、东京高速度等交通企业、野田酱油公司、啤酒公司、制材厂等。日本的劳动力也随着这些企业一同进入中国，其中有一些以工长的身份对中国工人进行封建特权式的监督，并站在工头同企业之間，管理由工头承包的劳动。日本宪兵、軍屬也进入工厂，和日本工长互相勾結，以軍事的組織形式，用强制征用劳动力和加强劳动强度等手段，强迫中国工人劳动。他們以武力威胁防止了中国工人的反抗。日华紡的經理竟公开威胁中国工人說：工人如果罢工，立即枪杀。

殖民地农业也受到了非常殘酷的掠夺。如：三菱商事壟断了朝鲜大米的进口，三井壟断了台灣米的进口，三井、三菱、大仓等日本商行深入中国、"滿洲"农村，和中国粮棧相勾結統購高粱、小米、玉蜀黍以及大豆、小麦、大米、棉花、茧、烟叶、鴉片等农产品。当时一个美国女記者就制造鴉片一事报道称："哈尔濱、大連的麻醉藥品工厂在資金方面受到三井、鈴木系統的銀行家的援助，工厂的机器設备是德国制造的。利潤之巨令人吃惊。"（裴維滋尼尔：《日本財閥》）

占領区的財政、金融也在日本的經济統制范圍以內。日本完全控制了地方財政。1938年在北京設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銀行"，1940年又在上海設立了"中央儲备銀行"。这两个銀行完全是在

日本支配之下，大部分行員是日本人。这两个銀行在发行紙币的制度上和日本其他各殖民地的发行銀行同样地沒有任何准备金。它們发行紙币是以它們对日本銀行的債权和它們在日本銀行的存款作为形式上的根据，这不过是一种賬簿上的騙人手法而已，实际上这种紙币是不能兌現的。因此，这种紙币同日軍司令部发行的軍票沒有两样，为了筹集軍費和上述各种企业的資金，曾被大量发行。由于这种紙币和軍票的濫发，使中国經济陷于通貨膨脹的深淵。1938 年底“中国联合准备銀行”的紙币发行額为一亿六千一百九十六万三千元，1939 年底增至四亿五千八百零四万二千元。据天津中国問題研究所調查，1937 年天津工人生活指数（以 1926 年为一百）为一二三点四一，1940 年 3 月上升至四二七点二。

在上述經济侵略的基础上，日軍又借“就地征用”的名义半公开地大肆掠夺軍需物資。由此可以看出，所謂“日‘滿’华經济合作”給殖民地經济带来的后果只是破坏和衰落。这种情况，必然要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1936 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工人救亡协会”。上海淪陷后，这个組織轉入地下，坚持抗日斗爭。占領区的工人在来自解放区、国民党区的秘密指导下，以参加游击队、发起救国捐献运动、怠工、罢工等形式进行了斗爭。正如左表所示，上海的抗日斗爭是逐年加剧的，1940 年 11 月甚至警察、消防队也参加了罢工。

上海工人罢工統計表

年度	罢工次数	参加人数	罢工日数
1938	22	7,009	30,669
1939	112	33,314	607,357
1940	289	24,230	658,484

（中国研究所編：《現代中国辞典》，第 178 頁）

国民生活的穷困

战时經济給壟断資本带来了龐大的利潤，同时也促进了国民

大众的貧困化。随着中日战争的进展，在壟断資本日益集中的形势下，中小企业走上了破产和倒閉的道路。1938年夏季突然发生的"轉业失业問題"轟动了社会。据企划院估計，1938年度和平企业的失业人数共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包括工厂工人約八十万人，商舖店員、汽車司机約五十万人。另一方面，虽然軍需工业为了"保护"劳动力，1938年8月将劳动时間限制在十二小时以内，但是政府并未对失业問題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只是发表了所謂"失业对策綱要"，講一番空洞的道理，"可能发生失业的各企业部門，应采取縮短劳动时間、增加休假等措施尽量防止失业，……发揚坚忍持久、自力更生的精神，……指导企业本着举国一致克服时艰的精神解决困难。"总之，政府对救济失业毫无誠意。

在劳动政策上也表現了一筹莫展。日本資本主义由于具有以低工資为基础的初期資本主义的特点，和資本积累水平的低下，即使在平时重工业部門已經感覚熟練工人不足，当为了貫彻战时經济政策必須扩大生产时，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靠雇用临时工并加强他們的劳动强度来强行扩大生产的軍需資本家們，更为熟練工人的不足大伤脑筋。在林內閣时期已經缺乏熟練工人十万以上，后来不仅熟練工人甚至一般工人也感到显著不足，出現了所謂"人荒"的現象。

由于通貨膨脹的表面化，工人的实际工資大大地降低了。政府和軍火資本家們并不認真考虑如何保护劳动和培养劳动力，而只是一味地爭夺熟練工人和加强劳动强度。中日战爭时期，軍需工厂甚至还实行了"早上班，通宵不眠，直到次日晚間連續劳动三十六小时"的所謂"連勤"制度。关于这种漫无限制的长时間劳动，一个工人曾这样說道："从上午七点二十分上班，到下午五点是正式劳动时間，在这以后就开始加班，一直做到第二天上班时間，吃过家里送来的早飯以后，又繼續劳动到下午五点。三十六小时的

劳动按照三十八小时零八分計算工資，也就是多得三小时的工資。如果不这样作，也就无法維持生活，明知損害健康，也只好这样做下去。有的人甚至在一星期里这样干四次，把身体累垮。我們如果累垮就等于死亡。”（«社会政策时报»第 203 号：«关于工业从业員健康問題的座談会»）

这种过度的劳动，給工人增加了无穷的灾难。关于中日战爭爆发后半年內的劳动灾害，仅就职工的死亡数字而言，就达到七千零十四人，比前一年同期的四千六百八十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对此，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規定軍需工厂的劳动时間为十二小时，如果延长，应以二小时为限，并且鼓励这样做。”（厚生相木戶在第七十三次議会上的答辯）这种对策反而造成了这样“良好”的效果：劳动时間不到十二小时的工厂，一律延长到十二小时。

在加强劳动和生活不安的情况下，工人加强了反抗，怠工、罢工等斗爭日趋激烈。

針对工人的反抗，政府和資本家們一方面鎮压工人运动，压制

劳資斗爭的發展

年度	总数		同盟罢工、怠工及閉厂	
	件数	参加人数	件数	参加人数
1938	1,050	55,565	262	18,341
1939	1,120	128,924	358	72,835
1940	732	55,003	271	32,949

工人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为了确保軍需工业的劳动力，又在1938年 7 月把职业介紹所改为国营，并根据国家总动員法实行“劳动动員計划”，接着又实施了“学校毕业生使用限制令”（1938 年 8 月）、“国民职业能力登記令”（1939 年 1 月）、“学校培养技能令”、“工厂企业培养技能令”、“从业人員雇用限制令”（同年 4 月）等項

法令。为了保証軍火資本家的最大利潤，又于1939年4月施行了“工資統制令”。这个法令是为了防止資本家之間因爭夺劳动力互相提高工資影响利潤而頒布的。此外，并拟实施以征用方式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方法。

貨币工資虽然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跟不上物价指数和生活費的上漲，所以职工的实际工資还是不断下降。如以1937年的实际工資为一百，1940年則为八十六点四一，1941年为八十四，而且实际工資的这种降低又是在严重消耗体力和加强劳动强度的情况下产生的。工人提前上班，加班和星期日上班成了家常便飯，同时由于消費水平的降低，工人日益疲憊，伤亡事故和患病者不断增加。1940年甚至政府統治工人的工具——产业报国会的机关报也不得不就工人生活的不安、低工資政策的不合理进行了如下的揭露：“尽管根据‘九·一八工資临时措施令’，工資被固定下来，然而由于黑市盛行，……职工的生活普遍地陷于困难。……特别是有家屬的工人因为物价日日猛漲，更惶惶不安地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因此，他們流露出焦燥的情緒。”（«产业报国»第二十三号）

实际工資的降低率

年　度	貨币工資指　数	实际物价零售指数	实际工資指　数
1937	100	100	100
1938	109	111	98
1939	123	124	99
1940	139	161	86
1941	157	188	84

佃农斗爭次数及参加人数

年　度	次　数	参加人数
1938	4,615	52,817
1939	3,578	25,904
1940	3 165	38,614

再看一看农民的生活情况：自从实行高桥財政政策以来，虽然由于軍需工业的发展出現了一时的繁荣，但是通貨膨脹的政策給农村带来了連續不断的慢性危机。肥料的壟断价格、日用品价格的暴漲、口粮的不

足等等，使得农民債台高筑，无力交租的趋向日益严重，从而，地主收回土地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佃农斗爭与年俱增。以二·二六事件为轉机，更加明目張胆地从事扩軍备战的法西斯統治，为了摆脫农村危机，除采取鎮压手段以外，更企图靠对外侵略来緩和国內的矛盾。每当发生佃农斗爭时，地主为了迫使佃农屈服，甚至模仿二·二六事件中"曉諭叛軍"的方式向反抗的农民发出"劝降"的"告佃农書"，內称：

"地主决不把你們看成制米机器。貸、借双方签訂的合同，对借方不利是自古以来的定例。你們願意斗就斗吧。我們一定給你們一个苦头嚐嚐。如果地主把土地收回来，你們将怎么办？那时你們的老婆孩子就要哭叫。現在还不算晚，希望你們立刻撤消你們的要求，按照以前的条件續訂租契，讓我們一同到櫻花树下喝一杯吧。如果不抓紧时間，櫻花就要謝了。

新泻县村松乡、地主同盟会員佐藤五郎三郎"

（平野义太郎：《农业問題和土地改革》）

政府对发动抗租运动的农民組織，进行了彻底的鎮压。1937年春，在鎮压人民陣綫的風暴中，全国农协左派分子被捕。1938年为了培养所謂"国粹"的农民組織，成立了大日本农民协会。（綱領第一条：我們本着勤劳奉公的精神涵养德性，广开見聞，以期发展农村文化）同时，为了从生活方面束縛农民，繼"产业組合扩充五年計划"之后，又实行了"产业組合扩充三年計划"，企图在信用、販卖等方面支配农民的經济活动。这个"产业組合"不但被当作供銷机构的一环，而且后来更被用来搜刮农村零星資金投向軍需工业。

农村物价指数（以1937年为100）

品种＼年度	1938	1939	1940	1941
农产品	108.9	137.5	164.2	162.0
农业用品	116.8	138.5	186.4	180.8
肥料	114.0	133.0	186.0	180.0
日用品	120.0	145.8	190.2	200.7

（《九·一八事变后的財政金融史》，第448頁）

农民的生活由于

中日战争的爆发，遭到了更大的摧殘。在通貨膨脹的影响下，不仅軍需品、进出口物資，就是生活必需品也在不断漲价，使农产品和农村必需品价格的剪刀差日益增大。如以1937年为标准，1941年农产品价格上漲了百分之六十二，而肥料等农业用品則上漲了百分之八十，日用品竟上漲了百分之一百。上表所列的农产品价格是販卖价格，如果把商人的中間剝削估計在內，則农产品的卖价就要更低，农村必需品的买价就要更高。这样，农民的經济情况就更不堪設想了。

和平工业的縮小，农村購买力的降低，使原已缺乏的农用資材更感不足。特別是肥料价格的暴漲，給施肥量占世界首位的日本农村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在半封建的高地租的日本农村耕地一般很分散的情况下，增施可以零碎使用、并在四五个月內可以用收获的农产品換回代价的肥料，很早以来就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几乎唯一的手段。因此，肥料的漲价对农村来說，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由于全面轉入战时經济而引起的肥料的絕对不足，更使农村踏上了破产的道路。当时政府虽曾鼓励农民自給自足地增产肥料，然而因为山林均归国有或地主所有，缺少放牧地的佃农根本无法飼养家畜从事积肥。政

化学肥料生产量（单位1000吨）

年度	氮肥	磷肥	鉀肥
1912	281	187	176
1928	477	326	249
1938	760	437	392

在生产資料費用中肥料和农具費所占的比重
（单位日元，1939年）

生产費	自耕	佃耕
生产資料費用总額	245.10	206.58
肥料費	100.25	116.06
肥料費所占%	40.9	56.1
农具費	20.44	18.69
农具費所占%	8.12	9.0

（《日本經济年报》第四十一輯）

府的措施反而加强了山林地主的权力。

通貨膨脹所引起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漲，造成了地租和地价的暴漲，給地主带来了发財致富的机会。

肥料消費指数（以1937年为100）

年度	氮肥	磷肥	鉀肥
1938	103	99	68
1939	84	98	65
1940	95	90	48

單位面积产量（以1937年为100）

年度	大米	麦
1938	99.7	107.8
1939	105.1	114.7
1940	93.4	110.0

（大內、楫西、加藤、大島：《日本資本主义的发展》）

1939年春全国平均实收地租

	每反（991.7平方米）实收地租	1938年对1939年	1937年对1939年
水田	1.06石	1.0%	2.0%
旱田	16.94日元	5.7%	14.7%

（表中水田的地租是1926年以来的最高紀录）

水田、旱田买卖价格

	每反（991.7平方米）价格	1938年对1939年	1937年对1939年
水田	576日元	11.0%	21.4%（1924年以来的最高紀录）
旱田	343日元	12.8%	22.2%（1927年以来的最高紀录）

（以上两表摘自《日本經济年报》第四十輯）

战争給农村带来的另一个足以使农村趋于破产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劳动力的不足。农村曾經是向城市工厂提供工人的源泉，在工业蕭条的时候，又是吸收失业工人的地方。农村人口到城市劳动，是維持世界最低工資的基本条件。为了补充侵略中国的兵力、給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准备龐大的預备兵力、滿足支持侵略战争的軍需生产急剧发展的需要，对农民实行了"大批动員"和"殘

暴的拐騙”，使农村的青壮年大量离开家乡，成为士兵或工人。（大河內一男：《社会政策的战时和平时》）的确，农村既是“强兵的母体”，又是“产业劳动力的源泉”。

中日战争开始后的三年半时間里（1937年7月10日至1941年2月15日），由农村（包括森林区、漁业区）轉业到軍需工厂等的人数为二百零七万八千二百七十八人，在同一时期，各工厂职工增加了一百六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六人。这个数字充分說明了軍需工厂新增加的工人，完全是来自农村的。（山田盛太郎：《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这种現象对于一向靠大量劳力維持生产的日本农村說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时为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問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加强以妇女、儿童、老人为主的家屬劳动，和动員学生参加农村义务劳动。（中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范圍內实行了学生参加农村义务劳动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实行了学生参加軍需工厂义务劳动制。）

上述誘拐农业劳动力和剝夺农业用資材，正是威胁日本农业基础的两大禍患。这种矛盾很快地到达了爆发点。首先，表現为粮荒。1936年稻田的耕种面积和1931年相比减少了四万二千町步（一町步为9,918平方米）。农产品的收获量丰、歉年份相差悬殊，一直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虽然靠掠夺朝鮮、台灣的办法勉强緩和了粮荒，但是由于朝鮮、台灣长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生产情况比日本国内还要不稳定，因此，并不能根本解决日本的粮食問題。

农业劳动

年　度	每戶平均劳动力	劳动时数
1936	2.94 人	6,232
1937	2.91 人	6,188
1938	2.80 人	5,933
1939	2.85 人	6,028
1940	2.76 人	6,051

（《九·一八事变后的財政金融史》，第449頁）

1939年9月，日本西部、朝鮮发生了大旱灾，粮荒益趋严重。

受灾耕地面积为六十一万町步，顆粒不收的耕地面积达十一万町步。在欧战剛开始，日本正强調自給自足的时候发生这样的灾害，对于日本实在是雪上加霜。日本农村在半封建的地主統治和分散耕种的不利条件下，不能圓滿解决土地改良、水利工程、机械化等問題，一旦受到战爭破坏，陷于疲憊，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天灾。

政府对于造成粮食問題的根本原因——土地問題，不想采取任何措施，只是一味地高倡增产，强迫农民进行过重的劳动。虽然作为从技术上解决問題的办法曾提倡过"农业机械化論"和适当調整农业經营規模的論調，然而这些都是紙上空談，沒有任何实現的可能性。結果由政府发給微少的"增产补助金"、"粮食增产設施費"就算完事。

战爭和社会民主主义

随着中日战爭的开始而实行的"战时体制"化，必然要給工人运动带来严重的影响。1933年7月，社会民众党同全国劳农大众党合并成立的社会大众党，当中日战爭一开始，便急忙发表声明，表示願意积极参加举国一致的行动，全面支持侵华战爭。声明中說："中国事变是通过杜絕中国的殖民地化和共产主义化，来建設以日'滿'华三国为軸心的远东和平机构，并对发展人类文化作出貢献的一次日本民族的圣战。"（1937年社会大众党战时运动方針）这个"合法无产阶級政党"背叛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反軍部反法西斯，标榜"根据国体本义謀求日本国民的进步发展，并进而促进人类文化的提高"，为了把"圣战"——侵华战爭进行到底，他們扛着"举党一致"、"勤劳报国"的标語，全力参加了送迎"出征"軍人、募集国防基金和国民精神总动員运动。

1937年10月以"劳动总同盟"为核心的"日本工会会議"在第

六次大会上发表宣言，內称："我們过去为了从共产主义的魔掌中保卫工人阶級，进行了英勇的斗爭。我們当前的任务是更进一步地堵塞它向一切方面进行的活动，以純洁的劳动奉公的精神团結广大群众。当我們想到賭国家命运的这次中国事变的前途时，不禁产生忧国之情。我們的使命是劳动报国，我們的目的是实現万民共荣、举国一致的体制。" 在这里，它竟然提到了"忧国之情"的字样！ 10月17日，劳动总同盟在全国大会上又通过了"事变期間停止同盟罢工"的决議。

以社会大众党为中心的右翼社会民主主义的領导干部，从九·一八事变时起，就一貫积极支持侵略战爭，中日战爭爆发后，更急遽地走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艰难地保卫着一小块无产阶級陣地的"合法左翼"——日本无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突然遭到了当局的鎮压。这就是1937年12月15日的所謂"人民陣綫派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同时被捕的有山川均、荒畑寒村（日本无产党創立委員）、猪俣津南雄、向坂逸郎（前九州大学教授）、鈴木茂三郎（日本无产党書記长）、加藤勘十（全評委員长）、黑田寿男（全国农民协会領导干部）等四百余人。同月22日，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本身也被勒令解散。司法省发表的解散理由是："共产国际采用人民陣綫战术以来，一切共产主义者都千方百計地企图打入社会民主主义团体，或利用这些团体进行阴謀活动，因此警察取締的范圍势必涉及到这类团体，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目前頗有成为滋长共产主义的溫床的危險性。"这样，在一心要把侵华战爭进行到底的日本帝国主义面前，社会民主主义受到反对；"擯弃通过阶級斗爭改变資本主义的过去的社会运动理論"的社会大众党，不得不"采用'全体主义'的理論"在帝国主义权力机构中寻求自己的地位。（該党1938年全国大会規定的一般方針）1938年2月，劳动总同盟会长松岡駒吉在后方

生产协力大会上致辞說:"現在正是全体国民应該以仿佛接到动員令踊跃开赴前綫的精神,效尽忠报国之誠的时候。我們所說的'尽忠报国'就是确保产业界的和平,齐心一致地扩大后方生产,把战爭引向胜利,使帝国飞跃发展。"接着,总同盟便很快地投入了以"劳資一体"、"事业一家"、"产业报国"为口号的产业报国运动。右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工人、农民的这种叛变,为日本进行侵略战爭清除了一些障碍。

第三节　鎮压文化界和文化界的反抗

对文化的統制

严厉的战时統制,涉及到国民的思想、文化、娛乐各个方面。对出版物加强了檢查制度。1938年3月,政府借口《中央公論》所載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中描写了日軍在中国的殘暴行为,給予这个杂志以禁止发行处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对出版物的干涉日益严厉。同一年,宮本百合子、中野重治也受到禁止发表著作的处分。另外,有許多进步的文化人被捕入獄。

1939年10月1日,又模仿納粹德国,实施"电影法",以"給予全国国民以健全的娛乐"为理由,陆續对音乐、戏剧进行了統制。在这种統制的桎梏下,当然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文艺作品。以最大众化的艺术——电影为例,在实施电影法以前,日本电影界曾經出現过所謂黃金时代,产生了很多杰作(参看本書第二章第三节)。电影法实施以后,情況为之一变。电影法是为了迫使电影服从国家意志(把侵略战爭进行到底),禁止揭露社会黑暗、禁止描写恋爱問題、禁止表現自由主义思想,强調国家主义思想,迫使电影为"使与国家共命运的民族日益昌盛"的方針服务而頒布的。頒布以后,电影的脚本、排演、数量等都受到了严格的統制。因此,影片

不但失掉了自由創造性和艺术性，現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和戏剧性也遭到破坏。結果当时日本的电影界只能拍攝諸如《上海陆战队》、《土和士兵》、《揚子江艦队》之类的作品。

对宗教也加强了統制。为了迅速地完成神宮、神社的新建和扩建計划，編制了巨額預算。与此相反，对一些新兴宗教（如出口王仁三郎的"大本教"、御木德一的"人道教团"），則以冒犯皇室尊严（不敬罪）或教团堕落等为理由提出公訴，强迫解散。救世軍也由于新出現的右翼分裂派叫嚷"确立日本救世軍自主权"而发生了糾紛。1936年8月，日本利用派遣近三百名选手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机会，同德国民族主义的大示威相呼应，在全国范圍內掀起了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此，体育运动就作为訓練青少年成为"健强之兵"的唯一手段而被重視起来，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体育运动大会，并且实行了长刀、木劍等訓練。

政府还迫使教育同"国民精神总动員运动"密切配合，露骨地为侵略战爭服务。1937年12月，在"鉴于文化的进步和內外形势的发展，必須无穷无尽地培养国力"的理由下，設立了旨在根本改革教育方針的"教育审議会"。表面上看来，这种措施似乎是为了使現行的教育制度合理化，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然而它的眞正意图乃是适应战时体制，加强軍国主义教育。为此目的，在1938年首先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使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男女青年进入"青年学校"。"青年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服务于"加强国防力量"（通过"发展經济、提高生产"和加强軍事教育）以及担任地方生活法西斯化工作的"骨干人員"。1940年3月，为了"以皇国之道为指針，施行初等普通教育，对国民进行基本訓練"，制定了"国民学校令"，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至八年，并将教育內容定为国民科、数理科、体炼科、艺能科、实业科等五科，实施在"皇国之道"指导下的

教育。同年又成立了大日本青年团。成立时，强調了"为适应建設高度国防国家的要求(中略)，必須确立强有力的訓練制度"。青年团同青年学校紧密配合，开展了通过生活进行軍事訓練的活动。1937年4月，由文部省編纂分发給全国各学校的《国体本义》，就是天皇主义教育的一部"圣經"。

如上所述，政府对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行了一系列的統制。同时，对不肯屈服于法西斯主义、軍国主义統治的文化、思想界，施加了无情的鎮压。首先遭到鎮压的是过去一度被破坏后来又恢复活动的日本无产者文化联盟。在宮本百合子、窪田稻子等人被捕后，地方左翼文化小組成員也相繼被捕。《文化集团》、《社会評論》、《文学評論》等繼承无产阶級文化运动傳統的杂志也陆續被迫停刊。对无产阶級文学出版事业有重大貢献的科学社，也在1936年7月被查封，負責人員被捕。同年7月，山田盛太郎、平野義太郎、小林良正、櫻井武雄、田边耕一郎、金斗熔等三十三名所謂"旧講座派"人士同时被捕。当局发表的逮捕理由是：他們負有在日本組織共产国际文化指导部、共产主义研究院的任务。这次逮捕是在計划出版《日本封建制講座》的过程中发生的，是政府第一次援用治安維持法对合法著作活动进行的鎮压。1938年2月1日，繼1937年12月15日对人民陣綫派进行的第一次逮捕之后，又在違反治安維持法的"罪名"下逮捕了大內兵卫(东京大学)、有澤广己(同前)、胁村义太郎(同前)、阿部勇(法政大学)、美农部亮吉(同前)、宇野宏藏(东北大学)等"工农派教授集团"。鎮压的風暴扩展到高等学校。当时編輯主要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刊物——《唯物論研究》的唯物論研究会也在1938年1月被迫解散，3月《唯物論研究》停刊。同年4月，它改名《学艺》重新出版。在同年11月同《学艺》有关的岡邦雄、戶坂潤、古在由重等人又被捕了。同年1月，失去組織联系的无产阶級文学家作为唯一的集合場所而成立的"独

立作家俱乐部”也被迫解散。同年3月，“日本新剧俱乐部”也被迫解散。失掉一切組織联系的进步的文化人士，在那以后，虽然孤立地分散地进行了一些沒有成效的抵抗，并为了保持自己的良心而作了斗爭，但最后終于不得不走上失敗的道路。

統治者鎮压的魔手日益伸向更大的范圍。甚至曾在文部省策划的預防学生“左傾、赤化”的“学生思想善导”工作中担任主要角色的东京大学經济学院教授河合荣治郎也未能幸免。1938年10月，他的四部著作——《法西斯主义批判》(1934年出版)、《改訂社会政策原理》(1935年出版)、《时局和自由主义》(同上)、《第二学生生活》(1937年出版)，被加上“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受到出版法第十九条規定的禁止发行处分。次年1月，河合荣治郎被免去职务，2月，被提起公訴。由于这次河合事件，东京大学內部拥护河合的“純理派”和反对河合、企图使大学法西斯化的“革新派”之間发生了尖銳的斗爭。矢內原忠雄教授也由于土方成美、本位田祥男、桥爪明男等“革新派”教授勾結警察和右翼分子进行的出卖有良心的同事的阴謀活动，遭到笔禍，被迫离校。在大学里，不仅由于外部的鎮压，同时也由于內部的叛变，甚至最后仅有的一点学术自由也将被剝夺淨尽。当时东京大学校长平賀讓为了平息經济学院內部糾紛，采取不管有理无理同等处理的方式，于1939年1月呈請上級給河合教授和同他对立的土方教授以停职处分。因校长的这个措施并未通过教授会，引起了內部的反对。“純理派”的山田文雄、大河內一男等教授、“革新派”的本位田祥男、田边忠勇等七人，以学校当局破坏自治为理由分别提出辞呈，結果使东京大学的經济学院瀕于垮台。

极力向国民灌輸“民族自覚”思想的政府，动員了一切宣傳机关，鼓吹“八紘一宇”、“东亚共荣圈”、“建設东亚新秩序”。1939年9月1日，开展了“兴亚奉公日”运动，規定每月1日为“国旗飯盒

日”①、“飲食店休业日”。另外，政府为了“激发民族意識”，采取了一切办法，如在大街小巷到处放送內閣情报局选定的“爱国进行曲”（1937年），派“日本号”飞机作环球飞行（1939年），把摔跤作为民族的体育活动积极地加以提倡。在乡軍人会、爱国妇人会及其他法西斯团体的骨干人員，深入民众进行种种活动，使国民大众在表面上不能不屈从于統制。但是，民众在內心里并不完全接受隐蔽着侵略主义的民族主义。他們的反抗情緒，虽然只能表現在当时流行的軍歌声中抑制不住的哀調，以及軍人家屬要求街头行人給“千人針避彈带”②縫一針的心情上，然而政府所企望的自下而上的民族意識的昂揚也未能实現。

在这里不能忽視的問題是，为什么国民对侵略战争仅仅是不积极支持，而几乎沒有展开反战运动。这主要由于——如上所述——政府的瘋狂鎮压，彻底破坏了人民的政党和民主組織，逮捕和杀害了这些組織的領导人，以致国民的要求无从以有組織的形式表达出来，群众也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要求，精力徒然消散；同时，也由于民众缺乏主动性。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天皇法西斯巧妙地利用了国民的潜在意識。就是說，他們利用国民傳統的尊皇感情掩盖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資本家、地主同无产阶級、佃农之間的对立。如：为了轉化社会底层貧困阶級內心里潜藏着的反抗情緒，他們一方面提出“奢侈是敌人”之类的口号，伪装

---

① “国旗飯盒”原名“日之丸辨当”。“日之丸”是日本国旗太阳旗的紅心，“辨当”是盛着飯菜的飯盒。所謂“国旗飯盒”就是在飯盒里只盛飯，中間放上一枚紅酸梅代替菜。因为形样象太阳旗，所以叫作“国旗飯盒”。日本侵略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了鼓励人民縮食、向陣亡軍人致哀、表示坚持侵略战争的决心，提倡每月1日吃这种飯。——譯者

② “千人針避彈带”原名“千人針”，“出征”軍人家屬或亲友为了“保佑”自己的亲人，拿一个带子伫立街头，乞求过路的女人每人在带子上縫一針，縫滿一千針以后，寄給亲人佩用。这固然是一种迷信行为，但也說明了当时日本人民厌战怕死的心理。——譯者

攻击富裕阶級，另一方面，又把經常处于社会底层的貧苦阶級潜在的反抗意識轉化成为"艰苦朴素，带头响应国策"的"优越感"。又如，对工人、軍屬分別給予"产业战士"、"名誉之家"等空洞称号，玩弄"一君万民"、"一亿一心"等动听的辞句来麻痹人民的阶級意識。他們利用这样的办法，强使人民誤信侵略战争的"意义"和"必要性"，从而支持他們賴以发財致富的侵略战争。天皇法西斯就是这样以极端殘暴的鎮压和无耻的造謠来欺騙和压迫人民。

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化人

日本的統治者在对思想、文化、娛乐实行上述的統制，对不願为他們服务的文化界人士进行鎮压的同时，为了給侵略战争搽脂抹粉，替侵略战争辯护，要求文化界自动地帮助他們做思想宣傳工作。当时文化人的接受統治者的要求，并不都是屈于政治压力。其中甘心充当侵略者爪牙的也不在少数。这些甘心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文化人"，帮助統治者激发国民的侵略性的"爱国心"，驅使他們投入太平洋战争；在使国家走上失敗和从屬的道路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种作家的自愿为侵略战争服务，首先表現在作家从軍和描写战地报告上。1938 年 9 月，石川达三、丹羽文雄、杉山平助、深田久弥、神原潤等二十二名作家，接受內閣情报部的命令，作为"笔杆部队"参加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在此以前，即 1937 年 8 月，《中央公論》社派尾崎士郎和林房雄、《主妇之友》社派吉屋信子等分別到华北、上海方面进行采訪，写了战地报告。《文艺春秋》社为了向在中国作战的、《粪尿譚》的作者火野葦平发芥川奖金，也派小林秀雄和岸田国士到中国来。另外，《中央公論》社还派石川达三参加了进攻南京的作战。当时各大报社、杂志社紛紛向战地派遣著名作家，以特派員通訊或报告的形式登載他們的作品。从这时起，所謂

"报告文学"突然成为报刊上流行的文艺形式，在整个战争时期，为进行侵略战争起了帮腔作用。

在"报告文学"中，最受国民大众"欢迎"的，是火野葦平的《麦子和士兵》(1938年載于《改造》杂志)。他以参加徐州作战的一个士兵的从軍日記为题材，作为生动的战争現实描写了士兵在行軍和战斗中的体驗，可以使人联想到战地的風光和士兵們在战斗中的生活情况，因而迎合了当时急于了解战争情况的"后方"国民大众的心理。火野又陆續写出了《土和士兵》(1938年10月載于《文艺春秋》)、《花和士兵》(1938—1939年連載于《东京朝日新聞》)，一跃而为战争文学的第一把交椅。特别是《麦子和士兵》的"成功"，推动了內閣情报部实行驅使大批文化人从軍的計划。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1938年3月載于《中央公論》)是以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时的体驗为題材而写的。他以活潑潑的作家精神，描写了战争的殘暴性，和軍人在战争中逐漸丧失人性的情况。这部作品尽管在最后还把这种非人性的战争当作不可避免的現实而加以肯定，但是由于它正确地把握了現实，还是受到了上述的軍部的禁止发行处分，而且石川达三本人还被提起公訴。这次事件，使作家深刻体会到以后对統治者进行积极的反抗是多么困难，只有盲目地为战争服务，才是唯一保身之道。后来，石川达三为了消除他的"筆禍"，发表了《武汉作战》(1938年)，一味表示效忠軍国主义。此外，上田广的《黃尘》(1938年9月載于《大陆》)、《鮑庆卿》(同年8月載于《中央公論》)、丹羽文雄的《沒有回来的一个連》(同年12月載于《中央公論》)、日比野士郎的《吳淞渠道》(1939年2月載于《中央公論》)、大嶽康子的《病院船》(1939年)等，也是当时的主要作品。这类作品虽然風靡一时，然而由于总是这一套，天长日久，就引起了国民的厌倦，終于衰微下去了。

当許多文化人，主动地或被迫地走向"灭私奉公"、"为貫徹国

策服务"的时候，以第二《文学界》(1933年10月創刊)为中心发表了不少迎合时局的評論，大力协助統治者粉飾侵略战争，把侵略行为描写成"英雄的壮举"，这是值得注意的。1938至1939年，由文坛中心势力青野季吉、三木清、林房雄、井伏鱒二、中島健藏、三好达治、今日出海、中村光夫、火野葦平等二十九名作家、評論家、詩人主办的第二《文学界》，也成了强調复古的民族主义的"日本浪漫派"集团(龟井胜一郎、淺野晃、保田与重郎等)活动的主要舞台。"日本浪漫派"由于得到聚集在《文学界》周圍的文坛势力的支持，他們所倡导的法西斯爱国思想在整个战争时期成了主导論調。第二《文学界》为促进国民思想法西斯化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場所，这种情况，显然給当时在瘋狂的鎮压下进行最后抵抗的有良心的人們的崇高活动带来了更严重的困难。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島木健作发表的长篇小說《生活的追求》(1937年)和《生活的追求續篇》(1938年)，引起了作家們对农村和农民的关心。从这时起到1940年，出現了許多的所謂"农民文学"的作品。这种农民文学的兴起，固然是由于当时頗受新聞界欢迎的和田傳的《沃土》(1937年，获得第一次新潮奖金)、伊藤永之介的《梟》(1937年)、《鶯》(1938年，获得第二次新潮奖金)等作品的影响，然而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进行侵略战争，作为国策的一个环节的农村增产問題受到了重視。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产生了发展农民文学的要求。执行这种要求的一个最露骨的組織是农民"文学恳話会"(1938年10月成立)。这是在当时农相有馬賴宁直接領导、援助、提供經費等情况下，由和田傳、島木健作、伊藤永之介、藤森成吉、叶山嘉树、桥本英吉、丸山义二等三十余从事农民文学的作家組織的一个团体，其目的在于創造有助于貫徹农业政策的农民文学。在这个組織的方針指导下发表的农民文学，和为扩大生产政策服务的"生产文学"、为向中国大陆移民开垦的政策服

务的"大陆文学"，以及为海洋渔业政策服务的"海洋文学"一样，是为进行侵略战争的錯誤的政策效劳的。因此，它不可能刻划出現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只能产生千篇一律地描写迎合时局的白痴般的盲目乐观的人物、不符合現实的明朗的环境、"劳动的喜悦"之类的作品。这种作品不可能給群众以艺术的感染，因此逐漸受到唾弃，从 1940 年逐漸衰落了。

在政府为进行侵略战爭而摧殘文化事业的風暴中，通俗的大众文学，当然也不会不受到影响。当时的大众文学的主要傾向是激发群众单純的"爱国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軍国主义思想滲透到国民生活里。对富于情感的青少年，它以种种英雄事迹引起他們对于"神圣帝国軍队"的向往；对妇女們則以歌頌自我牺牲的美德的"軍国日本的典型妇女美談"之类的讀物，激起她們的"爱国心"，使她們放弃母爱和对人的情感。当时，在 1935—1937 年連載于东京、大阪《朝日新聞》，后来又印成单行本的吉川英治的小說《宮本武藏》，博得了各阶层的热烈欢迎。这本書描写了劍客宮本武藏在青壮年时期苦炼的情景。書中出現的人物很多，情节复杂，富于戏剧性，是一个正規的大众文学作品。它通过一心修炼的書中主人公的形象，强調了刻苦力行的精神主义以及正义派的道德观。在这个作品中，作者从他的人生观，即在封建桎梏下苦恼的人們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得救的观点出发，演述了正义派的精神主义。这一点巧妙地符合了强調在"灭私奉公"的口号下把个人的存在溶化在法西斯全体主义里的統治者的理論。

坚持眞理的斗爭

統治者以种种方式进行的长期的殘酷鎭压，不仅破坏了国民大众的有組織的联系，而且威胁了他們的生活甚至生命。虽然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良心的人們仍然坚持了斗爭。这是孤立的最

低限度的斗争，它有时候是在妥协的伪装下委婉曲折地进行。然而，在仅有的抵抗道路上艰苦斗争的这些人的事迹是不容忽視的。

在这些人物发表的作品中，久保荣的《火山灰地》(1937—1938年載于《新潮》)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剧本以北海道某个农业城市为背景，以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努力改良特殊土壤的“火山灰地”，幷坚持学术良心保卫人道主义的一个农业技术人員为中心人物，描写了和根深蒂固地統治着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不断进行斗爭的被压榨的农民的形象。1938年6月8日至26日新协剧团在筑地小剧場演出了它的第一部，接着在7月2日至8日演出了第二部。在演出当中，观众們发出喊声說:“我們懂了!”幷且热烈鼓掌。这部作品是在中日战爭的爆发以后統制和鎮压不断加强的形势下，作者久保荣不顧自己的病体，在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基础上，以高度的戏剧艺术和热情完成的。在大多数文艺(戏曲)成为軍部的御用工具，失掉文化气息的年代里，它成了标志着彻底体現“科学的理論和詩的形象之間的統一”的社会主义現实主义在实踐中的胜利的一个剧本。此外，藤森成吉的《突出江戶城》(1938年)、久板荣二郎的《东北風》(1937年)和《神圣家族》(1939年)、三好十郎的《彥六大笑》(1936年)、《地热》(1937年)等剧本虽然是些相当消极的作品，然而在当时貧困的新剧界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发揮了一定的作用。

这个时期，在小說方面虽然由同政府相勾結的“报告文学”占統治地位，但是与此同时，还有明治、大正以来的一些老作家——德田秋声、正宗白鳥、幸田露伴、谷崎潤一郎、志賀直哉等，为了保持自己的艺术性，置身在把自己同时代潮流隔絕开来的天地中，写了一些作品。极力想运用意識活动来保持艺术性的川端康成、堀振雄、井伏鱒二等作家也写了一些作品。此外，有一些作家因为

在当时不能从現实社会取材来表現艺术的眞实性，乃逃避現实，順应統治者所要求的为"民族傳統精神的覚醒"的潮流，創作了一些历史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也曾風行一时。其中，本庄陆南的《石狩川》(1939年)，以保卫眞正的文学精神的消极方式反抗了战爭，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还有，德永直于1936年12月声明不再出版过去的作品以后，虽然逐漸屈服于时代的压力，发表了大陆开垦村視察記《先遣队》(1939年載于《改造》)，但是他还不甘心完全屈服，一方面逃避到历史文学的領域里，另一方面又发表了《他人之中》及其他描写工人經历的一些作品。

曾經是无产阶級文学健将的一些作家变节屈服了。如林房雄之流的作家堕落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走卒，島木健作逃避到精神主义里去。与此同时，藏原惟人、宮本显治等評論家虽然身在獄中，仍然坚持信念，忠勇不屈地进行斗爭，宮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作家也坚持了活动。对这些人，我們应該給以高度的評价。从1937年年底起大約一年半时間，和中野重治同时受到禁止写作处分的宮本百合子，在那以后，在更加严厉的监視下，为了同堕落为統治阶級进行侵略战爭的工具的保守文学相对抗，为了坚决保卫人性，直到太平洋战爭爆发时被捕为止，陆續发表了一些評論和小說。她在1939年写的作品有小說《杉原》(載于11月《中央公論》)、評論《風俗的感受性——現在風俗的解剖》(載于《三田新聞》)、《人生的共感——人們所要求的文学》(載于《文艺》)、《現实和文学——思維的生活感情》(載于《帝国大学新聞》)、《今天的文学和文学奖金》(載于《悬賞界》)等。当时宮本百合子的心境，表現在战后出版的《十二年的通信》即和她的丈夫宮本显治往返的信件里。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她所进行的严肃的文学斗爭是多么艰苦。和宮本百合子同时受到禁止写作处分的中野重治，后来虽然背上一个所謂"变节"的沉重包袱，但是仍然頑强地进行反抗，不愧为一个詩人、

小說家、評論家。他以詩人的自豪感，把艺术因素注入充滿內心的反抗精神，用一見似乎晦澀难解的独特的文体发表了許多作品，对从日本文学內部防止法西斯破坏作出了重要貢献。他在 1939 年发表的作品，小說有《空想家和脚本》（載于《文艺》）、《在歌声中离别》（載于《革新》），詩有《即兴》（載于《改造》7 月号），評論有收集在战后出版的《愉快的杂談》里的独具風格、类似短詩的一些"杂文"。此外，坚持在最低抵抗綫上的一些作家也发表了不少各种形式的作品。其中，屬于評論的有窪川鶴次郎的《現代文学論》（1939 年中央公論社出版），詩有金子光晴从虛无主义立場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作品，收集在战后出版的《降落伞》、《結草虫的歌謠》、《蛾》等詩集里。还有，作家小熊秀雄，一面和病魔作斗爭，一面用諷刺詩坚持了对法西斯的抵抗。他不愧为工人出身的詩人，直到生命結束为止写了許多詩篇。以上这些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但是，这些反抗法西斯主义的人們所进行的充滿苦难的斗爭，并沒有形成一股巨流，这是被赶进毀灭深淵的日本人民的不幸。但是也不能否認，他們这种强烈的愿望，成为不可泯灭的潜力，对于推动历史車輪前进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發和日本

第一节 日、德、意軍事同盟問題和国际間对立的尖銳化

从近衛內閣到平沼內閣

1938年10月，日軍攻陷广州、武汉以后不得不停止进攻，从此中日战爭即轉入长期相持的阶段。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軍部最初想从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意图，遭到决定性的失敗。其結果越发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国內和国际間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結束使自己陷于泥沼中的中日战爭，进行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經济侵略，而在其占領地則将繼續瘋狂的軍事'扫蕩'"。①同时为了迫使中国早日屈服，又采取了阻止列强援华的措施。当战火蔓延到列强权利集中的地区——华中、华南，以及日本加强对华經济掠夺以后，圍繞着"在华权利"、"开放长江"、"实施門戶开放原則"等問題，日本同列强之間的对立愈益加剧。旨在阻止中国屈服的列强对华援助急剧地增加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一方面极力設法加强和德意間的軸心关系；另一方面，由于中日战爭长期化和国际关系的尖銳化，它在国內正式施行了曾向議会保証不援用于"中国事变"的国家总动員法，并扩大了生产。其結果立即給基础薄弱的日本經济带来了物資不足、轉业和失业、劳力不足、通貨膨脹等一系列的問題，引起了深刻的社会不安。

上述这些矛盾，在近卫內閣末期已經露头。圍繞着对策問題，

---

①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記者的談話》，《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72頁。

內閣內部发生了尖銳的对立。以陆相板垣、內相末次为代表的"革新派"，积极主張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和全面施行总动員法，和內閣主流派池田大藏相、米內海相发生了对立，使政府在决策上陷于僵局。本来軍部主張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的目的是为了牵制苏联，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調到中国战場，以期早日結束中日战爭。簡单說来，这个軍事同盟是以苏联为对手的。关于这一点，在 1938 年 8 月的五相会議上已經得到通过。不料板垣陆相在 12 月初举行的五相会議上竟推翻前言，坚决主張把英法两国也列为日德意軍事同盟的敌对国，因此五相会議事实上已陷于瘫痪。在此以前，即 11 月中旬，近卫首相就决心辞职。12 月下旬，汪精卫逃出重庆发出关于"和平救国"的声明以后，近卫首相更坚定了他的辞意。当时坚决反对近卫辞职的就是板垣陆相所代表的陆軍。反对的理由是："更換內閣会打击士气，妨碍对汪精卫的工作。"陆軍方面持这种态度，是想在中日战爭长期化、面临种种困难的形势下，利用近卫来加强它的政治力量。为此目的，陆軍曾通过参謀总长閑院宮請求天皇挽留近卫，但沒有成功。元老西园寺評論当时的情况說："近卫本来打算想尽一切办法勉为其难地应付时局，但在軍部的牵制下事事被动，一籌莫展，等于被牵着鼻子走。"(《西园寺公和政局》第 7 卷）然而当前政府的危机已經严重到这般程度，使近卫再也无法这样呆下去了。

关于繼任首相的人选，曾由近卫首相、池田大藏相、湯淺內大臣等进行磋商。近卫首相一直認为樞密院議长平沼最适当。从九・一八事变起到二・二六政变前夜，担任樞密院副議长的平沼，一向以反动团体——国本社会长的地位同右翼分子和軍部接近，支持所謂革新运动。但是在二・二六政变后担任樞密院議长以后，就和国本社断絕关系，不久国本社就宣告解散，从此他的"革新派"气息也稀薄了。池田在人选問題上，則主張"在目前的形势下，

为了控制陆軍，应由米內組閣”，然而米內坚辞不就。池田和湯淺所以对平沼不放心，主要是怕他在对英美的外交上采取强硬态度。但是由于平沼不但表示对英美不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而且还多次会晤池田表示愿意承襲現行的財政政策，同时还接受池田推荐現任大藏省次官石渡繼任大藏相，因此，繼任首相就內定为平沼了。

1939年1月4日，近卫內閣发表声明，表示事变轉入新阶段，必須革新政治，接着就辞职了。天皇命令平沼組閣。平沼首先邀請近卫出任樞密院議长兼不管部大臣，又邀請有田外相、石渡大藏省次官参加組閣工作。1月5日新內閣宣告成立。平沼內閣的成員中除近卫以外，留任閣員竟达七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它是近卫內閣的繼續。特別是在对华問題上，新內閣声明承襲前內閣的方針。內相一职由木戶厚生相替換了在近卫內閣任內一向支持右翼运动、排英运动的末次，有田外相也以加强防共协定、不以英法为敌对国的条件同意留任。而陆軍方面在日、德、意軍事同盟等問題上，仍然坚持己見，不肯退讓。后来，圍繞这些問題，在內閣內部也不断发生爭执。

由平沼內閣所标榜的“万众和諧”、“万民輔弼”等口号可以看出，它对于因战爭长期化而引起的經济矛盾和政治对立等問題并不想采取坚决措施，只是在謀求各派势力均衡的基础上推行妥协政策。平沼內閣成立后不久，第七十四次議会宣告复会。当时內閣发表的施政方針完全是近卫內閣的翻版，这就表明了平沼內閣的性格。近卫內閣适应战爭的长期化和經济統制的进展，为了充实政治体制，加强国民动員，曾經提出改革內閣制度和官吏制度、开展新党运动、重新組織国民等任务。但是平沼內閣对以上几点并未积极执行。如在改革官吏制度上，只答应考虑修改文官任用令和改善下級官吏待遇，至于包括廢除身分保障制度在內的官吏制度的根本改革，則根本未提。在重新組織国民的問題上，由于木

戶內相以"重新組織国民是对于国民的侮辱"为理由表示反对，結果采取了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員和官僚統制的方針。然而，在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員方面，也只是在同年4月由首相平沼、文相荒木主持，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一次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員講演会而已。他們所实行的政治是沉重地压在国民头上的强权政治。政党对当时的政府方針也未表示任何异議，一味地順应时局，实行了所謂"万众和諧"的口号。在第七十四次議会后下期，政府才提出米谷法案及其他許多重要法案，尽管这样，也沒有发生任何波折。政府提出的包括預算案在內的八十九件法案，除了其中的十一件被修改外，其余的都得到原案通过。其中有关經济的法案共达五十七件，这就說明了当时經济統制的进展情况。关于上海租界、北洋漁业等問題，議会上不仅出現了激烈的发言，还作出了强硬的决議，对政府进行督促。政府也配合議会，大肆吹嘘在外交問題上的"举国一致"。这次議会被称为"兴亚議会"。这样，議会便基本上成了为政府闡明外交方針的一种宣傳机关。

政党开始瓦解

如上所述，政党处于时局的重压下，只能向政府和軍部献媚，这种現象正是政党将要瓦解的預兆。当时政友会以代行委員制代行了久病不愈的鈴木喜三郎总裁的职务。到1938年，政友会內部鳩山一郎和中島知久平两派之間为爭夺总裁的交椅而发生了尖銳的斗爭。同年年底，久原房之助表明支持鳩山一郎出任总裁。据說，久原捧不受軍部欢迎的鳩山，用意在于借軍部的压力搞掉鳩山然后取而代之。到1939年4月，两派間的斗爭达到頂点。中島派把鳩山以外的各代行委員拉过来以后，就想把中島强行推上总裁的宝座。鳩山派針对这种情况，积极策动鈴木总裁更換代行委員。中島派(革新派)于4月30日、反中島派(正統派)于5月20日分别

召开大会，各自推举中島知久平和久原房之助为总裁。这样，政友会便在事实上分裂了。中島派由于中島飞机制造厂发了巨額的战爭財，明目張胆地策划組織亲軍部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民政党为了迎合时局，在町田总裁的領导下加强团結，匆忙地提出"开展重建东亚国民运动"，高喊"建設东亚新秩序"、"对英国实行强硬外交"。

在1939年的大选中，一举获得三十七个議席的社会大众党内部也发生了糾紛。自从1937年年底人民陣綫派的成員被捕以后，該党迎合时局的色彩日形濃厚。1938年年底东方会会长中野正剛和社会大众党旧日劳系的麻生久、三輪寿壮等人，为把社会大众党和东方会合并成为全体主义的政党，进行了种种活动。这种活动是以軍部为中心策划日德軍事同盟的間接反映，目的在于建立納粹式的組織。三輪寿壮拉攏旧社民系的片山哲参加了这个活动。1939年2月，安部和中野两党魁会談后，发表了关于組織新的国民政党的联合声明。日本革新农村协議会也表示参加。但是这个組織新党的計划由于两派为爭夺党魁发生糾紛而遇到挫折，特别是旧社民系坚决反对中野担任新党魁。安部鉴于党内糾紛激化，表明引退，因此社会大众党停止了参加組織新党的活动。另外，圍繞产业报国运动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内部发生分裂，这种分裂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大众党内部的糾紛。以上情况表明，社会大众党内部的分化是由于該党极端法西斯化所引起的。尽管政府和議会象上述那样无能，但是由于进行侵略战爭和扩大軍需生产的需要，国民生活还是不得不遭到严重的压迫。

"东亜新秩序"

为了結束长期化的中日战爭，远在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就发表了《关于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緩和了过去"不以国民

政府为对手"的方針，接着又根据御前会議所决定的"調整中日新关系的方針"，提出了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經济合作"为內容的近卫三原則(参看附录資料)。汪精卫就是与此相呼应逃出重庆，开始了"和平工作"的。在这以前的"和平策略"，是为了破坏国共合作，并使采取綏靖政策的英国支持日本，促使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和平"。然而由于日本侵华战爭的进展，帝国主义之間的对立愈益加深，致使作为上述"和平策略"的一部分的宇垣、克萊琪会談受到挫折。軍部的对汪工作也仅限于把汪精卫拉出重庆；在另一方面，列强却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近卫发表的《关于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企图結束单凭武力不能解决的中日战爭的一种策略。所謂"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經济合作"，实际上不外是粉飾"政治进攻、軍事扫蕩、經济侵略"的美名而已。

平沼內閣虽然承襲了近卫內閣的对华方針，然而当时还沒有决定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1939年6月，汪精卫率領周佛海、高宗武等訪問日本，同平沼首相以及各相、近卫樞密院議长举行会談，就成立新"中央政府"达成了原則上的协議。在这次会談中，汪精卫为了澄清在外国压力下变更政体的观点，收攬人心，坚决主張仍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奉行三民主义和使用青天白日旗，并反对日本所主張的华中、华北分治政策，使日本讓了步。虽然如此，但是在具体問題上两者之間仍有相当的分歧，特别是在成立"中央政府"的問題上，临时、維新两个傀儡政府及其幕后的駐华北和华中的日軍曾表示强硬反对。

看到单凭武力不能摧毀中国人民抗战的平沼內閣，除了通过对汪工作展开政治攻势以外，还加强了对占領区的經济掠夺，极力阻止列强援华，以便迫使中国屈服。特别是英、法兩国在慕尼黑会談中所采取的綏靖政策，刺激了日本的南进。这一点表現在1939

年2月日軍对海南島的占領上。海南島不但是一个資源丰富的重要地区，而且也是一个进攻印度支那的重要据点。因此美、英、法三国立即就日本占領海南島向日本提出抗議。日本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在3月宣布合并距海南島南方約七百哩的南沙群島，并对列强通过印度支那援助中国的行动施加了压力。

由于日本加强对占領区的經济掠夺，越发加深了和列强之間特別是和英、美之間的对立，因此圍繞着英国权利的根据地——租界，发生了激烈的糾紛。租界不仅是抗日分子进行政治、經济活动的根据地，也是列强援助中国的一个桥梁。此外，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租界又掌握着經济上的实权，因此，日本的占領政策在天津、上海以至鼓浪屿等地的租界里到处受到抵抗。于是，日軍不断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改組的要求。当时租界問題鬧得最凶的，是日本占領軍的經营管理已进入統一通貨和管理出口貿易阶段的华北地区的天津租界。天津租界問題的直接原因是在租界內不断发生暗杀中国亲日分子事件。1939年4月，伪海关监督程錫庚遇刺，日軍向英国駐天津总領事要求引渡"凶手"，英国总領事声称"犯人"除供詞以外并无物証，予以拒絕。后来这次事件由要求引渡"凶手"問題，扩大为以天津租界为代表的英国在华北的权益問題。长期以来，天津是华北的經济中心，天津的英、法租界不仅壟断了华北对第三国以及对上海的貿易，而且掌握了华北的金融和外汇。1939年春，由于伪临时政府发行的伪联銀券急遽貶值，引起了經济界的混乱。日軍利用这个机会，向法币在华北的根据地——天津租界，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移交現銀等协助日本推行經济政策的要求。

圍繞日德軍事同盟問題發生的糾紛和日本同英美的交涉

在上述情况下，內閣把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作为一个紧急任

务。近卫内閣辞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圍繞这个問題和陆軍发生了糾紛。近卫首相、有田外相、米內海相等閣員，始終主張这項軍事同盟的对手只限于苏联；板垣陆相、大島駐德大使則极力主張把英、法两国也包括进去。1939 年 1 月上旬，德、意两国向平沼内閣正式提議締結三国軍事同盟。这个提案是以日本陆軍通过大島駐德大使向德、意提出的原案为基础而拟定的，原案中把英、法也列为敌对国。有田外相經过愼重考慮，和代表陆軍方面意見的骨干分子——陆軍省、参謀本部科长級干部，坦率地交換了意見，然后出席了 1 月 19 日召开的五相会議。在五相会議上贊成德、意提案的只有板垣陆相。在这种情况下，有田外相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以苏联为主要的敌对国，必要时也可以把英、法当作敌对国，但在这种情况下是否相互进行武力援助，必須根据情况来决定。关于这个同盟的締結，对外只說是防共协定的延长。"这一方案得到了通过。这是对陆軍的一个最大限度的讓步，事实上也只能在这个限度上达到妥协。于是派出了伊藤公使和辰己、阿部两上校，把政府的决定向駐德大使大島和駐意大使白鳥作了傳达。但是駐德大使大島不但不听从命令，反而要求政府重新考慮。后来圍繞着是否再拟定妥协方案，以及参战范圍、参战程度等問題，在五相会議上不断发生爭执。同年 5 月，德国又提出所謂"高斯案"的一項妥协方案，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修改，然而在本質上一如前案。平沼首相支持陆相，主張同意这項方案。这就加剧了他們同有田外相、米內海相、石渡大藏相之間的对立，一直得不到解决。在这期間，5 月 22 日，德、意两国締結了軍事同盟。此后，日本的提案和德国的提案，始終圍繞着参战范圍和参战条件等問題相持不下，使三国軍事同盟的締結陷于擱淺狀态。陆軍为了促使問題解决，对政府不断施加压力，結果更加促进了政局的动蕩不安。

陆軍发动的政治攻势，表現为对天津租界問題和諾門坎事件

的强硬态度，以及与此相呼应的排英运动。华北日軍当局为了解决天津租界問題，于5月向英方提出引渡刺杀程錫庚的嫌疑犯和支持"华北临时政府"的通貨政策的要求。由于这一要求遭到英方拒絕，日軍在6月14日开始封鎖天津英、法租界，6月19日更在封鎖綫上安装电网。英国对此表示强硬态度，声称："如果日本駐华北軍事当局不撤消'停止援蔣'和支持'建設东亚新秩序'等要求，則英国政府为了維护在华权益，将考虑采取直接而实际的措施。"虽然如此，但是处在欧洲局势日益紧迫以及美国不积极支持的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强硬到底。6月19日，英国外相表示，希望天津租界問題作为一个局部問題就地解决。双方决定从6月26日起开始就地解决，在这个原則下，7月15日，有田外相和英国駐日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第一次会談。英国政府虽然在最初相当强硬，可是不久就表示讓步。7月22日在原則上达成协議，并发表了如下的备忘录：

> "英国政府确認在进行大規模战斗中的中国，存在着現实問題，……英国政府承認在中国的日軍为保障它的安全和維持治安，应当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認为日本有必要排除不利于自己而有利于中国的行为。英国政府排除有碍于日軍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决定指示在华英国国民，使之确認上述政策。"

正当英国对日态度軟化的时候，美国突然在7月26日通知日本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約。这是为了鼓励英国不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面前屈服，使英国繼續成为阻止日本势力扩大的力量。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約，意味着这一措施在六个月以后生效时，美国可以任意限制或停止对日进出口貿易。因此很可能由于禁止对日輸出軍需物資，立即引起日本对美国的报复。但据观测，由于距条約失效还有六个月时期，在这期間，美国政府可以对禁运軍需物資的問題决定态度，而日本也可能改变对美政策，进行妥协，因此，通商条

約的廢除导致美日战爭的危險性不大，并且还能够起到牵制日本的作用。当日、英在东京进行会談的时候，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員会正在审議共和党的范登堡关于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約的提案。美国政府原拟在該委員会通过該項提案以后，再行通知日方。后来鉴于7月26日的討論情况有使审議拖延的趋势，而英国在日英会談中表現的态度又意外地軟弱，为了給英国打气，于是美国政府不等該委員会作出决定，就破例地在当日下午五点鐘向日本发出上述通告。

另一方面，日英会談也从7月26日开始进入了决定細节的阶段。起先英国虽曾表示較大程度的妥协，但是在經济問題上始終不肯讓步。到美国声明廢除美日通商航海条約以后，英国的态度便强硬起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內部关于締結三国軍事同盟的主張更加坚决，8月10日，天津日本駐軍声明撤回它的談判代表。对此，英国虽曾声明要交出刺程"凶手"，表示某种和解态度，但是到8月21日，双方会談終于中断，事实上已陷于决裂。一向利用英、美两帝国主义的对立来进行对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专門对面临欧洲紧張局势的英、法两国施加压力，迫使它們协助自己"建設东亚新秩序"，这个企图至此已完全失敗了。

諾門坎事件

1939年5月，在"滿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地区——呼倫貝尔盟諾門坎，以所謂"侵犯国境"的問題为导火綫，日、"滿"軍和苏、蒙軍展开了大規模的战斗。在此以前，在苏"滿"边境地区曾不断发生过張鼓峰事件之类的許多次边境糾紛。所以在这个时期发生諾門坎事件不是偶然的。在发生冲突前一个月，1939年4月，关东軍曾向全軍下达"国境紛爭处理綱要"，其中有如下値得重視的条款:

一、发現对方越境时，应立即予以歼灭，为此目的准許暫时侵入苏境。

二、在国境綫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得自主地划定境界，并通知第一綫部队。

三、发生紛爭时，第一綫部队应立即采取积极果敢的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事态，应信賴上級司令官处理。

四、过去的指示、通知一律作廢。

过去在划定諾門坎一带的边境綫問題上发生过糾紛。日軍主張以哈尔哈河为界，苏、蒙方面主張以哈尔哈河以东十三公里的諾門坎附近为界。根据当时关东軍作战参謀辻政信所写的《諾門坎》一書的記載，九·一八事变后划定边境綫时，日本方面发現被認为最有权威的滿鉄調查部发行的文献中有关哈尔哈河部分的划法对日本不利，曾下令扣发該文献。

諾門坎事件的爆发經过是这样的：5月12日，約有七百名蒙軍騎兵正在渡过哈尔哈河的时候，日軍認为犯境，立即根据上述关东軍下达的“国境紛爭处理綱要”开始攻击，于是蒙軍也立即增援兵力，开始反击，冲突因而扩大。当时关东軍作战参謀服部卓四郎、辻政信等認为这是苏联有意識地牵制日本对中国作战，于是不顧有些人害怕妨碍正在进行的日英会談主張愼重的論調，坚决主張进行“彻底歼灭”。参謀本部也認为当时的情况和張鼓峰事件时有所不同，中国战場又比較稳定，因此采取了“听任关东軍适当处理”的态度，并未积极干預。后来更由于关东軍轟炸特木斯克、三貝尔等蒙軍后方基地，苏联根据苏蒙互助条約参加了战斗，因此战爭的范圍扩大了。当时参謀本部采取了不扩大战局的方針。但关东軍則始終認为根据諾門坎地区离日、“滿”方面的鉄路終点比較近，而离苏、蒙方面的鉄路終点大約有一百五十日里，苏、蒙方面在动員兵力上受到一定限制，因而日軍可以通过攻击輕易地收

拾战局。这次冲突刚发生时，日軍的主力是第二十三师团。7月又增派兵力渡过哈尔哈河进行迂回作战，但是遭到苏、蒙軍的迎头痛击，損失了大部分炮兵和坦克战車而败退。到了8月，日軍預料苏、蒙軍将要发动攻势，編成了以荻洲立兵中将为司令官的第六軍。但是苏、蒙軍在8月20日发动的攻势规模之大远远超出日本的預料，同时苏、蒙軍还巧妙地运用优势的炮兵和坦克从两翼包抄日軍，給了它以歼灭性的打击。苏、蒙軍的炮火和战車远远駕乎日軍之上，同时还发揮强大的补充力量集中了意想不到的优势兵力和大量軍需品。在这次战斗中，日軍遭到歼灭性的打击，死伤了一万数千名。就在关东軍准备以第二、第四两师团增援第六軍进行反攻的时候，国內局势发生变化了。

內閣內部对立的尖銳化

在整个这段时間里，日本国內在陆軍大力支持下，掀起了猛烈的排英运动。据《原田日記》記載，关于这个运动，木戶內相也說："实际上是陆軍出錢，宪兵带头，所以对它毫无办法。"据傳，駐华北日軍副参謀长武藤章（当地日軍談判代表）为使警視总监和警保局长支持排英运动，曾宴請他們，給他們打气。另外，天皇也曾詢問平沼首相："能否設法取締反英运动？"平沼答称："很难取締。"在这个期間，本間宪一郎、佐佐井一晁等人曾策划刺杀內大臣湯淺、宮內大臣松平、池田成彬、山本五十六海軍次官等所謂亲英派分子。对此，海軍甚至决定出动搭載陆战队的装甲車，以备万一。（参看《岡田启介回忆录》）

以这种形势为背景，有田外相为使英国承認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在日英会談中曾暗示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可能性；而板垣陆相在8月8日的五相会議上提出了立即締結在敌对国問題上无保留的日德意軍事同盟的强硬主張。但是由于米內海相、有田外相、

石渡大藏相极力反对，平沼首相也不同意，会議无結果而散。这时，社会上頻傳板垣陆相将要辞职，一旦陆相辞职內閣就要垮台，随之而来的将是軍人专权。8月11日板垣陆相写信給德、意两国駐日大使，說："8月8日在五相会議上所作的努力未获成功。为了实現三国軍事同盟，我决心以辞职作为最后手段。……請貴国作出讓步，給以援助。"关于这封信德国駐日大使奥托申述了以下的意見："日本陆軍主張締結三国同盟最力，使它保持內政上的地位，对我們来說，意义十分重大。……現在有田外相正在同英国大使密切合作，全力爭取日英談判的成功。如果我方作出讓步，将会破坏有田的全部計划。"

当时，日本政府內部在对外政策的根本方向上搖摆不定，閣員間的对立也变化无常。但是国民在国民精神总动員运动的束縛下，只能支持政府的政策。随着战爭的长期化，战时經济的压力逐漸全面地威胁国民生活，統治者又开展了一个所謂"革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动員运动。关于这个运动，荒木文相在7月11日的內閣会議上报告說："根据我国目前的形势，必須糾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更进一步地加强国民为国尽忠的生活态度……。通过这种实踐，来振奋国民精神。"話虽如此，但实际上这次运动只不过是在"奢侈是敌人"的口号下，作了一些諸如"不燙发"、"不穿长袖衣服"等不关痛痒的瑣碎活动而已。关于政府在三国軍事同盟問題上的方針的轉变，也只是在6月15日以內閣書記官长談話的形式，发表一項政府声明，說："在对欧政策上意見已取得一致"，因此，国民对于这个問題的詳細內容无从了解。后来，政府又就8月8日五相会議的情况发表一項公报說："会上再次討論了欧洲形势，但是尚未得出結論。"公报中虽然提到再次討論云云，但关于事实真相，国民仍旧茫然无知，只能瞅着报上登的軍政首脑来来往往的一些照片发呆。在"不見、不聞、不言"的国民精神总动員的压力

下，国民在生活上越来越感到不安了。

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两国締結了互不侵犯条約，这对日本政府和軍部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日本国内，出現了对政府特别是一再强調同德国合作的軍部追究責任的呼声。平沼首相被迫表示："这是軍部的蛮干所招来的外交上的失败。我認为，为尽日本特有的臣道，首先应当要求陆軍进行反省。同时为了作出榜样，我应該引咎辞职，向陛下謝罪。"樞密院議长近卫認为內閣辞职，将給人以日本发生动搖的印象，后果不好，曾加劝阻，但未奏效。

日本政府于 8 月 25 日召开五相会議，决定通告德、意两国：由于苏、德締結互不侵犯条約，日本决定結束关于締結三国同盟的談判。同时日本政府又訓令駐德大使大島，就德国政府的这种措施違反日德意防共协定秘密条款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議。但大島反对这样做，尽管政府再度訓令其执行命令，他仍根据德国副外长的要求，未即执行。直到 9 月 18 日，他才把 8 月 26 日的抗議書交給德国政府。

第二节　慕尼黑协定

德国吞并奥地利

当亚洲爆发中日战争的时候，在欧洲方面，德国正以飞快的速度进行扩軍备战。据估計，1933 至 1934 年度，德国的軍费为二十亿馬克，1936—1937 年度一跃而为一百二十六亿馬克。据說 1936 年德国空軍作战用的飞机不下二千架，这个数目远远超过英国空軍。軍火化学工业的发展更快。当时的德国已經达到用全力从事侵略的地步。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書中拟定的侵略計划，是牺牲欧洲弱小国家来扩張势力，占領苏联尤其是烏克兰，以及击潰法国。繼上述埃塞俄比亚、西班牙被侵略之后，欧洲的各弱小民族成

了侵略的目标。

19.6年7月签訂的德奥协定上，虽然約定德国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参看本書第一章第一节），但是不用說，德国对奥地利始終未放弃它的野心。德国在签訂协定后不久，就給奥地利納粹党发出一項加强活动的秘密指令。它为了作好占領奥地利的准备工作，一边援助奥地利納粹党，一边鼓励奥地利政界的亲德分子积极活动，以便由內部瓦解奥地利。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德国是有利的。德意的軸心联盟解除了他們在奥地利問題上的冲突。1937年5月成立的英国張伯倫內閣，具有濃厚的对德綏靖色彩，对于同年7月在远东爆发的中日战爭，也沒有坚决地表示反对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侵略奥地利的道路逐漸敞开了。

1937年11月5日，在柏林总統官邸召开的以希特勒、戈林为首的納粹德国領袖秘密会議，决定了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方針（根据《紐倫堡审判記录》）。接着，在11月19日，英国樞密院議长哈利法克斯非正式地訪問了德国，向希特勒提議签訂英法德意四国协定。当时哈利法克斯已經同意了德国在奥地利、捷克問題上所抱的打算。英国的企图，是想成立一个新的資本主义列强的国际組織，来代替有苏联参加的国际联盟。这对于借反苏之名努力爭取列强的容忍和支持的德国来說，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希特勒和哈利法克斯虽然在这次非正式会談中沒有得出明确的結論，但是从此以后德国的侵略和英国的綏靖政策便眞正开始了。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免去了国防部长勃倫堡的职务，对軍事部門进行了大規模的人事更动，使軍事隶屬于納粹。此外，撤換了外交部长牛賴特，代之以他的心腹里宾特洛甫，把在外交政策上持稳健态度的人員一律撤职，加强了納粹的統治。与此同时，英国也似乎和德国相呼应，以哈利法克斯代替了一向以主張对德强硬著称的艾登外交大臣。从此英国就公然采取了張伯倫、哈利法克斯

所倡导的对德綏靖政策。同时因为法国的旭当内閣已經不再代表人民陣綫，在外交政策上追随英国。

1938年2月12日，希特勒召見奧地利总理舒斯尼格，以占領奧地利相威胁，迫使舒斯尼格答应了德国的以下要求：特赦以政治犯的名义囚禁的全部納粹党員；任命納粹党員賽斯英奎为內务部长兼保安部长，掌握警察权。三日后，奧地利改組內閣，釋放納粹政治犯，因此納粹党徒又开始猖狂起来了。3月9日，舒斯尼格宣布在3月11日举行全民投票表决奧国的独立問題。希特勒立即向舒斯尼格发出停止全民投票的最后通牒，当晚戈林又提出任命賽斯英奎为內閣总理的要求。舒斯尼格終于屈服辞职，賽斯英奎就任內閣总理。12日拂曉德軍越境侵入奧地利。次日，即3月13日，奧总統密克拉斯辞职，賽斯英奎正式頒布法令，宣布奧地利并入德国。15日，希特勒抵达維也納，終于实現了吞并奧地利的宿願。对此，西欧列强均保持沉默。英国保守党右派分子甚至还表示欢迎德国吞并奧地利。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又成为德国的侵略目标。

苏台德問題和慕尼黑协定

納粹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借口是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問題。所謂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就是居住在波希米亚西北部边境一带的德国人的总称，約占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本来，波希米亚的德国人和捷克人之間的民族矛盾，不但非常深刻而且由来已久。捷克虽然在凡尔賽体系下获得独立，但是因为凡尔賽体系是从这一体系的領导国的利益出发組成的，这一点就給捷克斯洛伐克种下了禍根。这些領导国違反民族自决的原則，硬把苏台德地区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結果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国內各民族之間的糾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民族政策上是比較溫

和的，民族間的对立，在該国資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一时有了緩和，但是后来由于世界經济危机給苏台德地区带来了經济蕭条，这个地区德国人的民族运动又逐漸激化了。当时策划东进的德国，对于在它东进道路上首当其冲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以上情况，自然不能放过。自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法西斯組織受到鎮压以后，納粹德国就拉攏汉林，通过他和他所領导的苏台德德人党（最初称为苏台德德国人祖国战綫）的党徒，煽动当地德国人掀起法西斯的反捷克斯洛伐克运动。汉林起先只提出在捷克斯洛伐克享有自治权的要求，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为了把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

德奧合并后，捷克斯洛伐克就处在德国直接威胁之下了。針对这种情况，苏联外长李維諾夫除声明遵守早已締結的苏捷互助条約以外，为了保障集体安全，还提出了召开民主国家会議的建議。的确，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危完全系于保障集体安全体制的力量。然而，3 月 24 日英国首相張伯倫却在下院发表演說，表明英国沒有保障捷克斯洛伐克的意思，拒絕了苏联的建議。4 月 16 日英意协定成立，据說这不仅是两国之間的协定，而是进一步签訂英法德意四国协定的前提。与此同时，法国又成立了反苏亲德的达拉第內閣。这样，圍繞着苏台德問題的国际局势是：以英国的綏靖政策为軸心，列强在反苏問題上逐漸趋于一致，而对抗法西斯的国际合作却日趋瓦解了。

4 月 24 日，汉林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要求自治权的演說，从此，苏台德問題更加尖銳化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要求自治的德人党进行了談判，結果只是拖延时間而已。7 月，張伯倫以斡旋的名义，非正式地派遣隆西門前往布拉格，据說这是为了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屈服。事实上英国在苏台德問題上所采取的态度，也就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9 月 5 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于苏台德德人党的自治要求，出人意料地决定了一項讓步的方案。这个方案使

得原来企图超越自治的范圍使苏台德地区并入德国的苏台德德人党感到周章狼狽。他們故意寻衅，中断了同政府之間的談判。9月12日，希特勒在紐倫堡发表演說，謾駡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虐待"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并且說，为了实現苏台德地区德国人的"民族自决"的要求，德国人将不惜給与任何援助。与此相呼应，苏台德地区的德人党人，一再掀起暴动，汉林还公然叫嚷这个地区必須并入德国。

在这种情况下，張伯倫于9月15日飞抵波齐赫山宮会見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威胁張伯倫說，为了实現苏台德的"民族自决"，即使引起世界战争，也在所不辞。張伯倫考虑到捷克斯洛伐克和苏、法两国締結有互助条約，英国是国际联盟的領导国，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要引起德国和各国以及英国之間的战爭，因此深感恐惧。他立即返回倫敦，召开內閣会議，由捷克斯洛伐克剛回到倫敦的隆西門也参加了这次会議。接着，張伯倫又邀請法国总理达拉第和外长龐納到倫敦，就英、法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建議进行了磋商。9月18日，英、法两国决定劝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割讓苏台德地区，并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廢除法捷、苏捷互助条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虽曾一度拒絕，但是在英、法威胁之下，終于在9月21日被迫接受，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便大致决定了。9月22日，張伯倫又飞往德国，和希特勒在萊茵河畔葛特斯堡会見。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立即割讓苏台德地区，并表示德国准备在10月1日实行占領。这样一来，欧洲局势頓形紧張。英、法两国甚至頒布了动員令，使人感到战爭即将爆发。

虽然如此，張伯倫的既定方針还是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他为了保全大英帝国的安全，一心想为德国东进开辟道路。当时德国国防軍內部反希特勒派正在策划武装政变，張伯倫也略知一二，但是他希望希特勒政权繼續存在，不但閉口不談这个政变計划，反而

大肆宣傳战爭的危險，以使英国人民相信必須接受希特勒的要求。9月29日，在欧洲各国人民忐忑不安的气氛中，張伯倫、希特勒、墨索里尼、达拉第四人在慕尼黑举行会談，9月30日未明即达成协議，决定把苏台德地区立即割讓給德国。10月1日，德軍进駐該地，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境上的要塞地带完整无損地拿到手里。当时英、法两国人民認为战爭已經避免，安下心来。張伯倫也夸称这个协定是"我們这一代的和平条約"。不过事实証明，这种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或者欺騙。英法的綏靖政策曾經牺牲了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奥地利，根据这个政策締結的慕尼黑协定同样地牺牲了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弱小国家。慕尼黑协定受到了世界上一切民主力量的責难。甘地对此曾作了有名的批評："欧洲为了在地球上生存一个星期而出卖了灵魂。"慕尼黑协定除了默認納粹的侵略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就是英法等国完成了从国际外交上排除苏联的工作。誠如丘吉尔所說的："各种事情都在似乎苏联不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着"(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在苏台德問題上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苏联完全被置之度外了。慕尼黑协定的签訂使得保障欧洲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法、苏、捷互助条約宣告崩潰了。总之，慕尼黑协定就是牺牲小国对抗苏联的四国协定。由于它的签訂，張伯倫、哈利法克斯所策划的四国反苏协定开始实現了。繼慕尼黑协定之后，9月30日英、德又发表联合声明，相約两国互不侵犯。同时，法国的人民陣綫也宣告瓦解。12月6日，法、德也发表一項联合声明。这样，法国便完全丧失了对抗德国的意志和能力。从此，欧洲的法西斯和人民陣綫之間的对抗关系逐漸消失，而代之以英、法、德、意統治阶級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以及各国民主力量的局面。虽然如此，列强并沒有放弃彼此間进行战爭的意图。慕尼黑协定的签訂不但沒有消除英法和德意之間的对立，反而进一步加劇了它們之間的矛盾。这是不容忽視的。面对

这种情况，苏联也逐漸感覚到同英、法合作是徒然的了。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

美国一个外交史专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各資本主义国家未能对法西斯侵略采取共同行动所造成的悲剧，曾这样写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八年里，侵略者曾經发动八次攻势，試探西欧民主国家是否有联合起来保卫和平的意志。苏联对每次攻势都呼吁采取反对侵略的集体行动。而西欧各国每次都回避責任，給侵略者大开方便之門。这八次攻势是：九·一八事变、希特勒宣布重新武装、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德国武装萊茵区、西班牙內战、日本侵华战争、德国吞并奧地利、德国兼并苏台德。”（F. L. 舒曼：《苏联的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

的确，自希特勒上台以来，有过許多次可以制止法西斯国家侵略的机会，但是各国未能抓紧时机进行合作，坐視法西斯各国經过历次侵略不断壮大，加强了他們的战略地位。慕尼黑协定的締結，使德国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防上、工业上的心臟——苏台德地区，巩固了德国帝国主义扩張的基础，开辟了东进的道路。

慕尼黑协定以后，法西斯各国展开了进攻。刚一进入 1939 年，反法西斯势力的一个堡垒——西班牙的人民陣綫的失敗已成定局。1938 年 4 月底西班牙人民陣綫的涅哥林內閣进行改組，竪起“民主独立的西班牙”的旗帜以来，不但巩固了西班牙共和国的防卫，而且加强了以改革西班牙社会为目的的民族战綫的团結。7 月人民陣綫軍并在厄布罗河沿岸展开了猛烈的反击。这次战斗中人民陣綫軍表現的旺盛的士气和整然有序的組織威力是值得惊叹的。但是由于人民陣綫軍装备低劣，而法西斯叛軍方面在武器上处于压倒优势，战局对人民陣綫軍日益不利。1938 年这一年在英、法对德妥协中渡过去了。1939 年西班牙外交部长伐育，为購买和租借武器奔走英法之間，英法都以“不干涉”为借口加以拒絕。2 月

16 日，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最后据点——巴賽罗納失守，这就决定了西班牙民主主义的命运。当时涅哥林总理和西班牙共产党表明要和法西斯战斗到底，但是阿柴那总統則認为大势已去，亡命巴黎，其他各政党想要投降，掀起了打倒涅哥林內閣和反对共产党的运动。馬德里发生了国防委員会的加沙德上校所領导的标榜"反共和平"的政变，于是西班牙人民陣綫发生分裂。3 月 28 日，坚持抗战二年半的首都馬德里終于失陷，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以悲壮的失败而宣告結束。在这以前，2 月間，英、法已經承認佛朗哥政权。在佛朗哥的独裁統治下，数十万民主主义者被屠杀或被囚禁，西班牙又重新成为充滿軍人和乞丐的国家。佛朗哥的胜利，更縮短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路程。从此以后，法西斯各国傾注全力要把欧洲拖进战争的火坑。

签訂慕尼黑协定以后，德国日益增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捷克斯洛伐克是否能保全它的領土，完全取决于英法的态度了。同时德国为了从內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再一次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少数民族——斯洛伐克民族进行煽动。对此，断送了苏台德地区的英法也无可奈何。从 1939 年 2 月底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的斯洛伐克民族"独立运动"逐漸高漲。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斯洛伐克自治政府曾施加压力，因此斯洛伐克独立問題更趋尖銳。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邀請斯洛伐克自治政府要人到柏林，許以援助。3 月 14 日，斯洛伐克宣布独立。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就走向瓦解。与此同时，即 3 月 14 日，希特勒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統哈柴邀請到柏林，和戈林等納粹首脑一起强迫哈柴在把波希米亚、摩拉維亚割讓給德国的协定上签字，并威胁說："如果拒絕签字，德国将轟炸布拉格，把它化为灰烬。"哈柴不得已而签字。次日，即 3 月 15 日，德軍进占波希米亚和摩拉維亚。3 月 16 日，斯洛伐克成为德国的保护領，于是納粹德国占領捷克斯洛伐克的計划完成了。

慕尼黑的"和平"，未及半載卽寿終正寢。德国不但在东进路上获得了有利的战略基地，而且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軍队的装备，占有了著名的斯科达軍火工厂，因此大大提高了德軍的战斗力。

3月22日，德国更叫嚣要收复由于凡尔賽和約的签訂而失去的領土，从立陶宛手里夺取了波罗的海的重要港口——默麦尔。看到这种情况，意大利也一举吞并了对岸的阿尔巴尼亚。5月22日，德意签訂軍事同盟，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更加熾烈。至此，欧洲各国团結一致制止德意侵略的机会只剩下最后一次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發

德国占領捷克斯洛伐克是違反慕尼黑协定的。在签定慕尼黑协定以前，張伯倫同希特勒在葛特斯堡会談时，希特勒曾表示："苏台德是我所要求的在欧洲的最后一块土地。"事实証明这完全是假話。虽然如此，張伯倫对于改变綏靖政策仍然犹疑不决。3月15日，卽德軍占領布拉格的当天，他还說："我不想轉变我的方針。"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国民反德的气势日益高漲了。甚至英国的統治阶层也逐漸看出德国的方向不一定符合英国的期待。英国的議会、新聞界紛紛表示了攻击德国的态度。在这种形势下，張伯倫不得不改变以往为德国辯护的态度，向国民表示："对于国民的失望和憤怒我是同情的。"从此，英国对德国的侵略也不得不采取对抗的方針。3月31日，答应給波兰——德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以安全保障，4月13日，对罗馬尼亚和希腊也給了同样的保障。

但是英国的外交仍未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变——从綏靖政策轉变为建立阻止德国侵略的民主国家联合战綫，仍然企图把日益露骨的德国侵略的矛头引向东欧，具体地說，就是引向苏联。3月16日，英国产业联盟和德国国家产业团签訂了卡特尔协定。5月23日，英国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倫敦的存款六百万鎊私自移交

給德国。在圍繞波兰問題形势日趋紧張的情况下举行的苏、英、法談判中，英国的这种态度很明显地表現出来了。

3 月 20 日，苏联作为阻止德国侵略的一种最后的尝試，建議召开苏、英、法、波兰、罗馬尼亚、土耳其六国和平会議。英国以"为时尙早"为理由予以拒絕。这使苏联感到"慕尼黑"尙未成为历史上的陈迹。4 月中旬，英国外相哈利法克斯反过来向苏联建議締結"和平战綫"，于是苏英法开始会談。苏联为了使和平战綫成为一个具有实效的組織，提出締結三国軍事同盟的建議，英国对此未作任何答复。正在此时，莫洛托夫接替李維諾夫担任苏联外长。在慕尼黑协定以前，苏联在外交上的努力方向是同列强合作，靠集体保障安全来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尽量推迟大战的爆发。但是自从签訂慕尼黑协定以来，英、法固执地避免和苏联合作，因此苏联不能不以确保本国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重点，以防止业已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以对苏战争的形式爆发。

"假如張伯倫接受苏联的建議，以'好吧，讓我們三国团結起来，砍掉希特勒的脑袋'来回答苏联，我想議会也能贊成，斯大林也会諒解，历史也許会沿着另一条道路前进。至少，不会走上更坏的道路。"（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到 5 月 8 日，英国才向苏联提出答复。在答复中提到英、法为保卫波兰和罗馬尼亚而采取行动时，苏联負有援助英、法的义务；但如果苏联为了保卫波罗的海沿海各国而卷入战爭时，英、法是否有援助苏联的义务，則并未提及。6 月举行苏英会談时，英国只派遣一名普通外交官前往莫斯科出席会談。关于这一点，丘吉尔也承認："派遣二流人物，实在有損于对方的感情。"6 月底，《眞理报》发表了日丹諾夫的声明："英、法两国政府沒有和苏联締結任何平等条約的意图。"（F. L. 舒曼：《苏联的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在英国尙未拟定阻止德国侵略的任何有效措施以前，德国就作出

了进攻波兰的决定，并且抱定了对英作战的决心。根据紐倫堡軍事法庭的記录，希特勒早在1939年4月3日就对德国国防軍下达一項命令：作好准备，以便在同年9月1日以后随时可以进攻波兰。5月23日，希特勒和戈林、卡特尔等举行軍事会議时，强调进攻波兰的必要性，指出英法援助波兰的可能，并表示了不辞对英一战的决心。

根据希特勒在这次軍事会議上所表明的德国对波兰所抱的打算，是"把德国的生活圈扩展到东欧，以便确保德国的粮食来源"。为此目的，它以收复由于凡尔賽和約的签訂而失掉的領土——革但斯克及其走廊地带（由德国本土通往东普魯士的地带）为名，向波兰提出了要求。早在1938年10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已經向波兰提出归还革但斯克和走廊地带，以及兴修附有治外法权的鉄路、公路的权利的要求。波兰因为革但斯克和走廊地带是它唯一的通向海洋的地区，采取了回避的态度。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便正式向波兰开刀了。3月21日它又和波兰举行談判。这一談判在国际緊張局势下只是迁延时日，得不出結果。4月28日，希特勒突然声明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約和英德海軍协定，于是波兰問題益趋尖銳。同时波兰国內的納粹和德国人也展开了頻繁的阴謀活动。尽管如此，波兰的統治阶級仍然希望和納粹德国妥协以反对苏联，甚至到1939年3月还采取了拒絕和苏联共同行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一向依賴各国資本的波兰統治阶級，又想依靠英法同德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逐漸投进英法帝国主义陣营。

英、法、苏三国会談，由于英、法态度曖昧，一直停滞不前。7月底，英、法派遣軍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但是这个軍事代表团并沒有和苏联政府締結协定的任何权限。到这个时候，摆在苏联面前的唯一道路就是独自采取措施防止德国进攻。而决定进攻波兰的

德国，也需要避免两面作战。由于波兰已投靠英法陣营，使苏联保持中立更成为德国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5月底，德国外交部开始和苏联进行交涉。苏联起先并沒有理睬。但是，后来苏英法会談陷于停頓，从6月起英德又为締結某种协定在进行秘密談判，7月至8月在远东发生的諾門坎事件使苏日关系趋于紧張。这样一来，苏联为了保証自己的安全，只好和德国締結互不侵犯条約。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前夕，即8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談后，立刻签訂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約。一周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他的演說中指出："签訂这个条約的結果，苏联既沒有和英国站在一起对德国作战的义务，同时也沒有和德国站在一起对英国作战的义务。"

自从签訂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和德意間的对立已經不具有民主国家同法西斯国家对抗的意义，因此签訂苏德互不侵犯条約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也可以說，这是同苏联对立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內部分裂所造成的后果。縱令英法政府在援助波兰的名义下对德意宣战，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帮助它們在道义上站住脚。事实上英、法只有压制本国人民对政府的民主輿論才能对德开战 这种情况可以确切地說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英德战爭的意义。

第三节　阿部·米內內閣的举棋不定

"复杂离奇"的辞职和天皇的意图

紧接着苏德签訂互不侵犯条約以后，希特勒在9月1日下令进攻波兰。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奉行綏靖政策的英、法兩国，也被迫对德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随着中日战爭的长期化，政治、經济危机逐漸加深的日本，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签訂，在国际上越发陷于孤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它不能不

重新考虑它的对外政策。日本在这次大战中所处的地位和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处的坐收渔人之利的地位根本不同。虽然在中国問題上，它同苏、英、美之間不断加深的紧張关系，有了一时的緩和，但是列强对軍需物資的需要急遽增加，給正在进行长期战爭的日本帝国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經济困难，使它的內部矛盾进一步尖銳化了。从战争爆发到 1940 年初夏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这个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面临政策的轉折点搖摆不定的时期。短命的阿部·米內內閣突出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苦恼。

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签訂，平沼內閣决定辞职以后，发生了繼任首相人选的問題。平沼首相、近卫樞密院議长、湯淺內大臣等主張由前首相广田弘毅繼任首相，但陆軍方面表示反对，推荐阿部信行大将和前首相林銑十郎繼任。由于广田坚辞不就，于是湯淺又推荐池田成彬，元老西园寺也以近卫支持池田为条件表示同意。但是近卫对池田組閣沒有信心，結果組閣命令就落到阿部的身上了(阿部和木戶內相是亲戚)。8 月 28 日，平沼內閣发表声明，承認現行外交政策失败而实行总辞职。声明中說:“因为在欧洲土地上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必須改变現行政策，另行制定新的政策……。我認为扭轉局势，振奋人心为当务之急。”平沼辞职后，阿部繼任首相。这次更选首相的过程說明，一向实行的以重臣、元老为中心选任首相的方式，已經毫无任何意义了。《东京朝日新聞》在 8 月 31 日的社論中指出:“制造新內閣只是重臣、元老的私事，也可以說是儿戏，結果只是几个职业大臣出出进进而已。”正当决定日本政治方向的紧要关头，“由八面玲瓏的阿部出任首相执掌政权，这簡直是在开玩笑。”(《日本經济年报》第三十九輯)事实上，阿部內閣就是各派系妥协的产物。当天皇命令他組閣的时候，附有下列各項命令:

一、必須尊重宪法，按宪法条款行使政权。

二、在国际关系上不要蛮干以免引起无謂的爭端。

三、勿使实业界发生剧烈变动。

四、应和英、美和諧协調。

五、陆相的人选由我指名，不管三长官的意見如何，必須从梅津美治郎和畑俊六二人中选任。

六、內务、司法兩部同治安有关，确定人选时应特別愼重。（近卫文麿：《为和平努力》）

上述六項中，一至三項，是自从二·二六事件以来，每当命令候补首相組閣时都要提到的。其中的第二項，自从 1938 年 11 月和国际联盟断絕合作关系以后，已經几乎失掉意义，只有第四、五、六項是新提出的。这个时期对日本来說，正是改变外交政策同英、美妥协的絕好机会。为此，首先需要选任一个旣能支持政府外交政策又能有力地控制陆軍的陆相。其次，需要內相和法相严厉取締反对改变对外政策的活动。这些都是政府从日英会談时出現的排英运动的經驗中深深体会到的。

阿部对上述命令感到惶惑，他把命令的內容告訴了近卫。近卫又就这个問題同木戶內相进行磋商。他們担心的是这样会加剧同陆軍之間的摩擦。但是出乎意外地，陆軍方面早把內定的候补陆相人选——第三軍司令官多田和关东軍参謀长磯谷撤回，由陆軍三长官重新推荐侍从武官长畑俊六为繼任陆相了。自从林內閣以来，历届內閣的閣員中留任的占絕大多数，但是在阿部內閣的閣員里沒有一个是留任的，这是値得注意的。

外交政策的搖摆

阿部內閣剛剛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 9 月初爆发了。阿部內閣发表声明說："帝国不拟参与这次欧洲战爭，致力解决中国事变。"9 月 13 日內閣又发表政綱，其根本方針是："以处理中国事

变为政策的重心，对外坚持自主的立場，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对内致力于充实軍备和培养国力，为此，决定集中掌握对內对外各項政策措施，以期眞正做到日'滿'一体，实現日华新关系。"同时，日本政府又劝告欧洲各交战国，从中国的日軍占领区內撤退船舶和軍队。上述外交方針具体表現为对苏美英的"协調外交"。但是，圍繞着中国問題，日本同美英之間仍然存在着对立，日本又无意放弃所謂建設东亚新秩序——独占中国的野心，因此，"协調外交"是有一定限度的。

首先，参謀本部为了早日結束平沼內閣末期冲突激烈化、日軍受到严重打击的諾門坎事件，于8月30日向日軍发出停止进攻和撤出冲突地区的命令。同时，在莫斯科开始了外交談判。9月5日，日方宣布停战。这时发表的战斗情况和以往大不相同，承認了日軍損失慘重。9月7日撤免了关东軍司令官植田和关东軍参謀长磯谷，代之以梅津美治郎和飯村穰。此后，对边境糾紛采取了愼重的方針。日軍在諾門坎的慘敗根本打击了日軍对苏的战略。这次战斗对于日本由北进論轉为南进論起了重大作用。虽然如此，但是，据說"同諾門坎事件关系最大而且应負实际責任的关东軍司令部第一科（作战参謀）的大多数人員，只是被調到次要的职位上，而且他們不久又轉到中央部門担任要职……。过激分子犯錯誤时，人事当局总是寬大处理。即使进行处分，大部分都是为了敷衍輿論。另一方面，稳健分子往往被看作怯懦者，犯錯誤时，在很多情况下都被严厉追究責任……。調到大本营作战科工作的这群应对諾門坎事件負責任的軍官，后来成了极力主張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人。这是当时在陆軍中央部門担任职务的人所一致承認的。"（林三郎：《太平洋战爭陆战概史》）9月15日，駐苏大使东乡和莫洛托夫簽訂停战协定。从此，苏联对日本采取了协調的方針。

随着停战协定的簽訂，苏联政府任命斯梅塔宁出任从同年6

月即出缺的苏联駐日大使，莫洛托夫也发表了希望同日本調整邦交的演說。苏联对日本采取协調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締結反苏統一战綫，也可以說是針对預料中的德国侵略而采取的一种爭取时間的策略。因此苏联对日的协調政策并不妨碍它的援华政策。与此相反，日本則企图利用苏联的协調政策，使苏联停止援华。据日本估計，如果苏联停止援华，就会削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抗战派的政治地位，从而相对地加强反共派、"和平派"的力量。当时日本駐苏大使东乡，为了阻撓苏美結成对日联合战綫，曾主張締結苏日互不侵犯条約和通商条約，貫徹对苏协調政策。但是正热中于締結美日通商条約临时协定的阿部內閣，考虑到对美关系，对东乡的主張不大感兴趣。尽管如此，苏日之間后来还是設立了"国境划定委員会"，开始了划界工作。1939年年底又签訂了日苏漁业临时协定，开始了締結苏日通商条約的談判，日本并于1940年1月初以前付清了从1935年起开始償付的中东鉄路的最后一笔价款。

由于日本停止了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的談判，签訂了諾門坎停战协定，日本外交暫时回到前一时期的立場上。9月25日，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将野村吉三郎为专任外相。內閣起用野村，是想利用以下的情况：野村外相在1915年担任駐美大使館海軍武官时，和当时担任美国海軍部副部长的現任总統罗斯福以及美国政界的領导集团交往很密。野村就任外相以后，立即适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美日通商航海条約廢弃的局面，对苏美英实行了协調外交，特别致力于調整日美邦交。

在日英会談中途受到美国宣布廢除美日通商条約的鼓励态度轉强的英国，在欧洲大战爆发后不久态度又軟化了。9月7日英国外交副大臣巴特勒在下院表明，英国愿意同日本恢复談判，并且訓令駐日大使克萊琪通知日本政府。不久，野村和克萊琪恢复了

日英会談。会談結果，英国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問題上作了讓步，并由 10 月至 12 月撤退了大部分駐中国的軍队。法国也和英国采取了同一步調。英法两国在远东方面虽然依然受到美国的支持，但在防卫力薄弱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加强对日妥协，以期維持他們在远东的殖民地。

在調整日美关系的問題上，阿部內閣的一項任务，是在美国宣布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約以后的六个月期間，也就是在 1940 年 1 月 26 日条約失效以前，采取某种对策。早在签訂苏德互不侵犯条約以后的第三天，即平沼內閣辞职前两天——8 月 26 日，日本駐美大使堀內卽訪晤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日本决心停止同德、意两国进行一切談判，并暗示日本将不得不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事实上野村出任外相主要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美国方面也想利用日本将要改变外交政策的机会来加强自己在远东的地位。它一方面避免同日本决裂，另一方面，在不过分刺激日本的限度內对日本施加压力，以便鼓励由于欧洲战爭的爆发而在对日关系上态度逐漸軟化的英、法两国对抗日本。1939 年 10 月 19 日，归国述职后回到日本的美国駐日大使格魯在日美协会主办的晚餐招待会上发表演說，他說："'建設东亚新秩序'，似乎包括了掠夺美国在中国的既得权利，……美国在中国的权利和权益正在遭受日本当局的政策和行动的侵犯。美国国民有充分的根据，認为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企图控制亚洲广大地区，在这个地区建立排他性的經济制度，此外，日本还以轟炸、侮辱等多种多样的行动，干涉美国的权益，这种干涉决定着今天美国国民的对日态度。"（格魯：《在日十年》）格魯这次演說的意图在于謹愼地向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表明美国政府和美国国民决不退讓的决心。但同时还要注意到，正如美国的《美亚杂志》所指出的，格魯的用意，不是要求日本遵守九国公約，不是維护中国的独立和領土的完整，也不是要求日本从中国撤軍，

他只是单純地从美国的直接利害出发責难了“东亚新秩序”而已。

由11月4日开始，野村和格魯举行了四次会談。日本方面表明，将根据具体事实处理中日战爭所引起的日美之間的六百件悬案，并拟为第三国船舶开放长江和珠江。格魯也报之以友好的态度，他对野村說，美日关系不会陷于无条約状态。格魯的这番話只是一种曖昧的表示，并未付諸实行。

成立汪精卫傀儡政权

这期間，日本在中国进行了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1939年8月28日，根据汪精卫的提議，召开了所謂“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国民党的政策改为“反共睦邻”，解除蔣介石的国民党总裁职务，代之以汪精卫。一向代表日本政府操縱汪精卫进行活动的是影佐上校領导的、設在上海北四川路梅华堂的梅机关。10月1日，日本政府为了排除支持“临时”、“維新”两个地方傀儡政权的华北和华中日本派遣軍的反对，特設立了日本派遣軍总司令部，梅机关也被置于总司令部的指揮下繼續担任同汪精卫的联絡工作。

日本政府在中国占領区建立新的伪中央政权的动机，是想把对战局的不利和广大人民的革命化持恐惧心理的中国大地主、大資产阶級从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分化出去，以便結束长期化的中日战爭。因此在表面上必須使新的伪中央政府具有“政治独立”，并伪装日本“不干涉中国內政”。关于这一点，不仅汪精卫，而且直接操縱汪精卫的梅机关也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有此必要。但是10月上旬兴亚院会議所决定的“日华基本条約方案”，却要求即将成立的伪政权同意扩大日本駐兵地区，并給日本以广泛的特权，这同汪精卫的希望大相徑庭。因此日汪談判一再发生波折，在一段时間里甚至瀕于决裂，直到12月30日才勉强达成协議。日本帝国主

义甚至不敢給汪精卫以虛假的“独立”。1940 年 1 月 8 日，日本內閣会議正式批准了日汪协議案。

日本政府在中国問題上虽然对美国作了若干讓步，但是在“建設东亚新秩序”和成立汪精卫傀儡政权的問題上，則始終坚持自己的主張。另外，开放长江及其他措施，也由于軍部等的反对，迟迟未能实現。在 1939 年这一年里，美国根本不提重新签訂条約或恢复条約，同时它恐怕引起冲突，也未实行任何制裁，仅仅决定保持对日本采取禁运及其他行动的自由。“当野村从格魯那里听到美国的上述决定后，感到灰心失望。格魯发現，会談以后，野村破例第一次沒有把他送到門外。”(費思：《太平洋战爭前史》)对于美国的这套政策，格魯大使以及后来由于日美开战直接蒙受打击的英法两国，都有异議。格魯大使早就提醒本国政府，如果美国坚持反对日本的方案，阿部內閣就要垮台。而美国政府則認为，固然有必要經过阿部內閣牽制日本陆軍，但是阿部內閣在把日本势力扩大到亚洲这一点上，并不次于陆軍，也許多少愼重一些罢了。想要在不刺激美国的情况下“建設东亚新秩序”的阿部內閣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远东慕尼黑的流产

从上述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可以看出“远东慕尼黑”的可能性。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締結以及欧洲战爭而陷于困难处境的英法两帝国主义，企图在牺牲中国的情况下同日本取得妥协，結束中日战爭，牵制苏联，并鎮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据美国駐日大使格魯的活动看来，美国也似乎要采取同样的步調。而日本，也由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的签訂，它以往同德意合作来对抗苏美英的外交方針遭到破产，在国际間陷于孤立，于是在日本資产阶級当中，强烈地出現了对英美法讓步，以便集中力量掠夺中国的傾

向。虽然如此，但要締結远东慕尼黑协定，还存在着若干問題。陷于困难处境的英法对日本不惜尽量讓步；而和日本帝国主义对立的、掌握着远东慕尼黑决定权的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却要求日本讓步，并且鼓励英法对抗日本。当时日本一方面企图和英美特别是美国調整邦交，一方面又依然坚持"建設东亚新秩序"的方針。远东慕尼黑的困难就在于此。况且在中国抗战过程中，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抗战派取得优势，想通过远东慕尼黑的阴謀活动来分化中国的抗战派是困难的。另外，苏联也为了防止远东慕尼黑的成立，从諾門坎停战以后，采取了避免同日本发生摩擦的方針。

在当时的远东形势中，日美两帝国主义間的对立达到了最尖銳的程度。尽管日本在頗大程度上依靠美国，因而希望关于締結日美通商条約的談判能够达成协議，但是在中国問題上，却不肯輕易讓步。不仅如此，以軍部强硬派为中心的势力甚至抱有这种情緒：如果日美邦交难以調整，就不如重新接近軸心，对抗英美。在苏德已經締結互不侵犯条約、欧洲战争已經爆发的情况下，縱令日本采取和德国合作的方針，日德同盟的性質也不能不有所变化。"在这以前，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寻求反苏同盟国。此后，日本考虑的問題是，是否以苏联为友，并和德国一起进攻西欧列强。日本对外方針的这种轉变，最后必然要引起日美之間的战争。这是值得注意的。"（費思：《太平洋战争前史》）

內政陷于僵局

阿部內閣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危机，在对內政策上，决定确立战时体制。在它的政綱中提出："扩充和运用綜合經济力、充实和加强国家总动員体制、改革和运用各种制度"，力图集中和加强政府的权力，以便摆脫經济危机。首先在組閣时，采取少数閣員制，由首相兼外相，內务、厚生、农林、商工、递信、鉄道各相都采取兼任的

办法。阿部內閣同政、民两党的关系比較疏远。这两个政党在处理"中国事变"的問題上虽然支持政府，但是对內政方面却抱着"是非分明"的态度。內閣成立后不久，未經樞密院审議卽自行加强了首相的权限，并且規定首相在施行国家总动員法上有权发布指令。正如樞密院顧問官深井英五所指出的，加强首相权限一事，反映出二·二六政变以后，以軍部为背景出現的官僚政治具有严重的专横傾向，致使首相統御失灵。（深井英五：《樞密院重要議事备忘录》）《东京朝日新聞》在"藍鉛笔"一栏上登載了一段諷刺地方长官专横的故事：一个由地方調到中央的官員，曾就这年12月地方长官会議上地方长官們盛气凌人的情况說道，現在知事老爷們的奢华，使人联想起古代的諸侯。我眞想多干一个时期地方长官……。这一段插話暴露了加强統制时期社会的一个側面。

从近卫內閣时起，改革官吏制度就成为一項悬案。阿部內閣作为解决这个悬案的一項措施，企图廢除身份保障制度。但是在樞密院的坚决反对下，这个措施只好无限期地延擱下来。接着阿部內閣又碰到了設置貿易省的問題。这个問題也是在近卫內閣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为了在貿易行政一元化的基础上发展貿易，曾責成軍部和企划院計划設置貿易省，后来由于欧洲战爭爆发，这項措施更成为当务之急。以乡誠之助为会长的日本貿易振兴会也在1939年6月提出設置貿易省的建議。阿部內閣就讓一向主張設置貿易省的青木一男（大藏相兼企划院总裁）、伍堂卓雄（农相兼商相）着手筹备。但是这件事遭到了外务省的强烈反对。因为九·一八事变以来，外务省的权限就逐漸遭到削弱，尤其是兴亚院成立以后，在对华外交方面的权限也被剝夺了。为反对政府的这个措施，外务省通商局长松島首先提出辞呈，接着，外务省的科长、事务官級的官員也团結一致，以政府的措施破坏对外事务的一元化为理由表示坚决反对。这样，外务省的事务当局同包括野村外相在

內的政府之間的对立日益加剧，政府終于放弃了設置貿易省的方案，暴露了阿部內閣的軟弱无力。

阿部內閣采取的少数閣員制，是为了裁并各部，扫除各部割据积弊的第一步。但是仅凭这种制度上的措施，要想精簡由于政治和經济上的需要而日趋繁复的官厅机构，是根本做不到的。当时，粮食問題日益严重，农业团体要求充实农业生产資料的供应制度，人們对伍堂商相兼农相的不滿有增无已。因此，政府于10月16日任命帝国农会会长酒井忠正为专任农相，同时放弃了少数閣員制，由政党成員中选任了专任鉄道相和厚生相，借以巩固政府的基础。也就是說，阿部內閣在集中权力方面遭到失敗以后，又反过来广泛地爭取政治势力的支持，以便加强自己了。11月，阿部首相再三敦請軍部所同意的民政党总裁町田入閣，但未获成功。与此同时，政府又任命了永田秀次为鉄道相，秋田淸为厚生相，荒木貞夫、胜田主計、小泉又次郎、久原房之助为內閣参議。此外，还同政友会的两个派系、民政党、社会大众党、国民同盟等五个党派举行会談，企图密切同政党之間的关系。但是由于內閣的危机已經十分严重，这种不彻底的办法并未奏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物价直綫上升，以往的統制方式完全失掉作用，政府不得已根据总动員法第十九条頒布了冻結商品价格和工資、租金的法令（即九·一八冻結令）。恰恰在这一年的夏季，朝鮮和日本西部又遭遇旱灾，粮荒越发严重，米价暴漲，政府把每石糙米的价格訂为三十八日元。但是由于粮食严重缺乏，两个月以后，即11月6日，政府不能不把每石米的官价提到四十三日元，同时实行了征購粮米和禁止食用白米的办法。然而这种办法更加暴露了政府的无能，助长了囤积、惜售之風。此外，电力和煤炭的不足，以及其他許多矛盾的加深，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安。特別是工資冻結令所造成的实际工資的大大降低和为弥补劳动力

不足而实行的加强劳动强度的办法，使劳資糾紛急剧增多了。

米內內閣接替阿部內閣

在国民大众的責难和日益高漲的工人运动影响下，政党开始掀起了倒閣运动。1939年12月下旬，小党派——国民同盟、东方会等成員所組織的时局同志会首先发出了反对政府的呼声，接着政、民两党中的某些人所組成的月曜会也要求政府妥善处理当前問題。在第七十五次議会开幕的12月26日这一天，在众議院內，二百四十名議員举行临时性的集会，通过了一項要求阿部內閣下台的决議。次年，即1940年1月7日，又有二百七十六名議員联名提出对內閣的不信任案。这种不信任內閣的运动最初似乎也征求过陆軍的同意，但主要是由于各党派的議員回到自己的选区，了解实际情况以后才开展起来的，它不是政党的首脑以及謀士們策划的。到了这个时期阿部內閣已經陷于絕境，它似乎除了完成建立中国伪中央政权的使命以外，再沒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

在阿部內閣內部，厚生相秋田和遞信相永井等堅决主張解散議会，阿部首相也有这种想法。1月8日，成为悬案的有关成立汪伪政权的基本方案决定后，畑陆相即劝告由于政治上的一再失敗已經无法收攬人心的阿部內閣辞职。1月14日，阿部內閣終于被迫辞职。据阿部首相透露，軍部之所以反对解散議会，是害怕由于解散議会和重新选举而引起反战反軍部的气氛。（参看近卫文麿：《为和平努力》）按照慣例，在議会通过軍事預算以后陆相才向全軍发出訓示，但是这次却破例地在向議会提出軍事預算以前的12月28日，即发出訓示，曉諭全軍力戒浪費，珍惜国民的辛勤劳动所产生的軍費。陆相的这种做法反映出国民中广泛地存在着对政府的不滿情緒。

阿部內閣决定辞职以后，圍繞着繼任首相人选的問題，各派系

展开了頻繁的活动。在打倒內閣上起了作用的政党方面，时局同志会策划政党和軍部合作，但是由于政、民两党对軍部怀有戒心，这种主張未被采納。在陆軍內部，有一派人强力主張由畑陆相出任首相，但是由于和支持杉山元、寺內寿一两上将出任首相的派系发生对立，这种主張未能取得优势。于是，陆軍曾派遣軍务局长武藤章敦請近卫再度出馬，近卫托辞“新內閣必須以財政經济为重点，而自己对处理財經問題毫无信心”，坚决不肯接受。在这期間，在湯淺內大臣和岡田前首相的推荐下，米內前海相成为首相候补人，而且通过原田熊雄和元老西园寺取得了联系。1月14日阿部內閣实行总辞职后，湯淺內大臣即和平沼、岡田、近卫分别交換意見，此后，日皇便下令米內組閣。据說，在决定米內組閣以前，曾想征求亲英美派的代表人物牧野前內大臣的意見，然而西园寺認为这样做会給牧野带来麻煩，而且于事有害，因而作罢了。当时海軍內部曾屬意米內将来繼伏見宮担任軍令部总长，决定米內組閣后，海軍不得已讓米內辞退了現役，以便出任首相。米內在組閣过程中，經原田的推荐，請出前大藏相石渡和前厚生相广瀨充当組閣參謀。

从上述情况也可以看出，米內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是亲英美派中的重臣活动的結果。因此它受到陆軍和“革新派”的反对，而近卫也由于岡田、湯淺等人撇开自己，推荐米內組閣，感到不快。但是当米內組閣的时候，因为天皇曾命令陆相同米內合作，結果畑陆相决定留任，組閣工作順利地完成了。在內閣成員中，民政党占两名，政友会的两个派系各占一名，而且他們都担任了大藏相、农林相等財經方面的要职，这說明了內閣对老牌政党的重視。此外，內閣起用了实业界的要人藤原銀次郎担任商相。陆軍以及同陆軍合作的“革新派”对于这样一个內閣表示严重不滿。而前內閣參議中——海軍大将末次信正、陆軍大将松井石根、前滿鉄总裁松岡洋

右三人，也拒絕了米內的一再挽留，辞职不干了。

斋藤隆夫的"反軍演說"

2月1日，第七十五次議会复会，次日，以民政党斋藤隆夫的質問为导火綫，发生了所謂"斋藤事件"，造成了政治問題。斋藤在他的演詞里，批判了近卫声明和东亚新秩序，并且对"中国新政权"表示怀疑，追究七七事变以来政府的責任。因为演詞記录的后半部已被删掉，所以无从了解全部內容。当时米內首相对此仅作了簡单的答辯。会后，陆軍当局以污蔑"圣战"为口实，大肆責难，民政党首脑听到这个消息，急忙四出奔走，以期圓满解决。虽然斋藤在党內領导干部的劝告下脫党，但是由于陆軍和政府的态度非常强硬，所以問題还是益趋严重。与此相呼应，議会內部的政友会革新派、时局同志会、社会大众党也主張懲办斋藤。最初，民政党和政友会的正統派坚决反对取消斋藤的議員資格，但是在軍部的压力下，大多数人終于被迫同意。在表决的时候，政友会正統派的牧野良三、宮胁长吉投反对票，社会大众党的安部磯雄、片山哲等人缺席。斋藤事件严重地影响了政党，使各党派的內部糾紛达到頂点，几乎使政党瓦解。各政党內部的亲軍部分子企图乘机建立亲軍部政党，同时出現了反对这种做法的派别。政友会正統派議員中，有五名議員反对取消斋藤的議員資格，圍繞着处分斋藤問題，久原派和鳩山派发生了对立不久，两派便在事实上分裂了。社会大众党內部也圍繞处分缺席議員的問題发生了尖銳的对立，缺席議員有的被开除，有的脫党了。在此以前，叫囂懲办斋藤企图使軍部和民政党发生正面冲突的政友会的两派、社会大众党、时局同志会、第一議員俱乐部等五个派系的部分議員所組成的五派联盟，在3月下旬又收罗部分民政党人員成立了"圣战"貫徹議員联盟，主張解散旣成政党，組織举国一致的政党。另一方面，安部磯雄等被

开除或退出社会大众党的議員，在劳动总同盟的支持下，决定于5月12日成立勤劳国民党。但是，他們的建党申請，被內务省于5月7日以有被共产国际的人民陣綫策略所利用的很大危險为借口批駁了。就这样，即将出現的所謂“新体制运动”的基础逐漸奠定下来了。

这期間发生的一件令人注意的事件，是6月1日內大臣更换了。自从4月以来，湯淺內大臣健康不佳，引起了繼任人选的問題。在西园寺、近卫、岡田、米內等人的一致支持下，木戶幸一繼任了这一职务。6月1日《东京朝日新聞》指出：“有迹象說明，在革新陣营方面产生了积极要求更换湯淺內大臣的傾向，……特别是圍繞奏請天皇命令米內大将組閣問題所发生的糾葛，多少影响了內大臣同重臣們的关系。”內大臣的职务，对于控制日益强大的軍部势力，具有重要作用。以机会主义者木戶代替湯淺，意味着从亲英美派的重臣中間除掉了一根楔子，为政局的未来的发展下了一个重要的棋子。

在这种情况下，米內內閣为解除社会不安，并安定国民生活，重点地施行了进口外米、对电力和煤炭的应急办法、縮减政府开支等結合实际的措施。另一方面，又改进了国民精神总动員运动，彻底展开适应时局的“物心一体”运动，以节約消費、加强鼓励儲蓄的工作、实行購物票制、强制征購粮食、支持生产报国运动等具体措施，来安定国民生活。这种应急措施，反而加深了日本資本主义的矛盾，生产趋于全面停滞；同时針对精神运动、官僚統治要求生活明朗化的国民的呼声，也逐漸高漲起来了。

南进政策

米內內閣对外政策的綱領是：“处理中国事变”和“以自主的立場調整邦交”。关于前者，是承襲阿部內閣的基本方針，繼續致力

于成立"中国中央政府"的工作。但是正如以上所述，汪派沒有任何吸引力，日本方面对它也不能寄予过高的期望。斋藤的演說对这点曾进行猛烈的責难。而軍部也由于仅利用汪精卫未能实現"和平"，因而除繼續进行对汪工作以外，又通过种种綫索对重庆展开了誘降工作。这項工作是通过宋子文之弟宋子良进行的，似乎有成功希望。但是这一工作被認为妨害成立"汪精卫政权"的工作，中途又停止了。汪精卫从1940年1月24日起同"北京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南京維新政府"代表梁鴻志在青島会談三日，就成立"中央政府"达成协議。决定"中央政府"成立后，"临时政府"改組为"华北政务委員会"受"中央政府"的委任；"維新政府"則并入"中央政府"。3月20日汪精卫召开"中央政治会議"，30日举行了"国民政府"还都仪式，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了。日本政府派前首相阿部为特派大使参加仪式，并就締結"媾和条約"开始談判。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汪精卫伪政权成立的当天，卽声明拒絕承認，因此日本同列强之間的对立更为加深，日本同中国政府妥协也更困难了。

米內內閣对外政策的另一条綱領——"以自主的立場調整邦交"，承襲了阿部內閣不参予欧洲战爭的方針。阿部內閣为重新簽訂日美通商航海条約或締結临时协定的努力归于失敗，因此，1940年1月26日，日美通商航海条約宣告失效，日美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有田外相所指出的："米內內閣虽然极力避免和德意締結軍事同盟，但是鉴于签訂'防共协定'以来的国际关系和国內的政治形势，仍然采取了在不締結軍事同盟的前提下接近德意的方針。"同时，政府企图"和平南进"、"密切經济关系"。这种趋向在4月德軍侵入挪威、丹麦，5月席卷荷兰、比利时、法国后表現得特别明显，引起了認为米內內閣的政策不徹底的强硬派的反对。此外，米內內閣成立不久，卽1月21日，英国軍艦在距千叶县野島洋

面三十五浬的公海上，强行搜查由美国归航的日本郵船"淺間号"，捕走了二十一名德国乘客。日本政府表示："交战国的一方在公海上，只能要求中立国船只引渡敌对国的現役軍人"，并据此于22日向英国提出抗議。从此，日本国內的反英运动愈益高漲。

在南进政策上，日本为了确保石油及其他軍需資源，于1940年2月2日建議荷兰政府以在貿易及其他方面不采取限制措施为內容締結互惠协定。3月，日本政府又拟定了摆脫对美国的依賴，实現軍需物資自給自足的計划，日本对于南洋的野心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到4月15日，由于欧洲战局的扩大，有田外相发表了一項声明，內称："日本政府深切关怀足以改变荷屬东印度群島現状的任何事态"。对此，英、法两国表示大体上同意，美国和荷兰反对日本的这种干涉。5月，德軍占領荷兰后，荷屬东印度群島总督即宣布不限制石油、錫、橡胶及其他原料的对日輸出，然而日本并不以此为滿足，它更进一步地要求对日輸出其他重要物資，并保証这些物資的輸出量。6月，日本和泰国签訂友好亲善条約，加强了南进的战略地位。日本又向法屬印度支那当局要求禁止經由該地向中国輸送軍需物資，并要求同意日本派遣軍事代表团来监視这一工作。法国殖民当局在法国对德投降的同一天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曾建議日本政府共同发表关于不許变更南太平洋現状的声明。对此，有田外相借口在日美通商航海条約失效，其他許多悬案尙未解决的情况下，碍难同意，加以拒絕。同时，日本还要求英国撤退上海駐軍、封鎖香港边界和滇緬公路。当时英国向美国政府表示，英国无力单独保卫馬来亚和荷屬东印度群島，要求美国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或綏靖政策，并表示英国願意同美国采取同一步調。美国拒絕了英国的要求。于是，英国答应日本封鎖滇緬公路三个月。这里又一次露出了远东慕尼黑的苗头。

在这期間，以陆軍为中心的亲德派又大肆活跃起来。苏德締

結互不侵犯条約后，陆軍也支持了为全力解决中日战爭，不参与欧洲战爭的方針；然而实际上这只是待机发动新的侵略战爭的一种策略而已。1939年修改的軍备計划规定，只把軍事預算的百分之四十、重要物資的百分之二十用在中日战爭上，其余部分完全用在扩充軍备上。欧洲战場上德軍閃电战的胜利，使日本国內主張締結日德意軍事同盟的論調又急遽抬头，同时主張联苏南进的趋向也日益显著。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駐苏大使东乡开始同苏联交涉締結日苏中立条約。

这时，有田外相曾計划发表一項以結束中日战爭、确保东亚和平为目标的所謂"确立东亚自主权"的声明。这一計划的目的最初是想通过宣布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来和貫徹"圣战"議員同盟的决議相呼应，加强米內內閣的地位。然而拟議中的这一声明，由于陆軍認为同內閣現行外交政策不符表示反对，因而受到修正，最后，以"国际形势和日本的立場"为題由电台播送出来。当时，外务省情报部长須磨曾向記者透露外务省同陆軍意見的分歧，結果受到宪兵队的傳訊。繼而在7月5日，政府又破获了企图謀杀米內首相等亲英美派的神兵队行刺計划。在陆軍、亲軍部的右翼分子以及"革新派"的这种倒閣活动中正在孕育着新的風暴，这也意味着日本甘冒对英美开战的危險向南方迈出决定性一步的时代已經到来。

編后記

本卷記述了从中日战爭爆发前的1936年到1940年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个时期，不論从世界形势还是从日本国內形势来說，法西斯势力和民主力量之間的斗爭，都是非常尖銳的。由这种对立中，产生了日德意軸心势力和反軸心联合势力的对抗，因而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因此，对日本国民来說，这个时期是决定日本必然失敗的命运的时期，也可以說是特別应該引起深刻反省的时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时期，它的历史是极端錯綜复杂的。为了弄清事实眞相，需要搜集丰富的历史資料，加以認眞严肃的分析批判，并具备一种能够全面把握各个历史事实的科学的历史观。我們的工作尙未达到令人滿意的程度，不过也許可以說，我們从各种角度进行的集体研究，比过去的种种研究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第二卷的执笔者：

政治：远山茂树、荒井信一、今井清一、川村善二郎、藤井松一、藤原彰。

經济：宇佐美誠次郎、朝田輝彥、山田胜男。

文化：松島榮一、大久保和子、島田福子。

中国：野原四郎、中村义、野澤丰。

国际关系：江口朴郎、斋藤孝、山极洁。

附录(一)· 年表

（1936年2月——1940年6月）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36（昭和11年）	2·26	二·二六事件爆发。	3·8	冀察政务委員会就防共問題同日本当局会談，决定以廿九軍阻止紅軍东上抗日。	2·29	美国修改中立法。
	2·27	东京宣布戒严，岡田內閣总辞职。	3·10	中共发表抗日宣言。	3·7	德国发表宣言廢除罗迦諾公約。德軍进駐萊茵非武装地区。
	2·29	叛軍全部归降。	3·12	苏蒙互助条約成立。	3·10	罗迦諾公約締約国第一次会議（巴黎）。
	3·4	近卫文麿受命組閣未接受。	3·19	有田、張群会談，发表共同声明。	3·12	罗迦諾公約締約国第二次会議（倫敦）。
	3·6	湯淺仓平就任內大臣，松平恒雄就任宮內大臣。	3·25	日苏两軍在苏"滿"边境长岭子地区发生冲突。	3·14	国际联盟理事会开会討論德国进兵萊茵問題（—24日）。
	3·7	陆軍首脑部要求实行革新政策。	4·	紅軍进入綏远。	3·19	罗迦諾公約締約国簽訂四国（英、法、意、比）协定。
	3·9	广田內閣成立，馬場鍈一任大藏相。	4·30	"滿"德貿易协定簽字。	3·23	意、奥、匈簽訂罗馬补充議定書。
	3·13	平沼騏一郎就任樞密院議长。	5·5	中华苏維埃革命軍事委員会通电要求停止內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3·25	英、美、法在倫敦簽訂海軍条約。
	3·21	鐘紡公司收买天津裕元紡織公司。	5·6	冀察政务委員会和日本締結华北防共协定。	3·27	苏法交換互助条約批准書。
	3·24	內务省下令禁止庆祝"五一"活动。	5·18	中美締結白銀协定。	4·1	奥地利廢除圣吉尔曼（St. Termyn）条約。
	4·8	寺內陆相作有关肃軍的訓示。	5·31	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4·10	罗迦諾公約締約国第三次会議（日內瓦）。
	4·18	对外公文上的国号改为大日本帝国，帝称改为天皇。			4·15	英、法、比参謀本部
	5·4	第六十九次議会开幕（—27日）。加藤勘十等組成劳农无产协議会。				
	5·7	相澤中校被判处死				

年	月/日	日　本	月/日	东　方	月/日	西　方
1936 (昭和11年)		刑。	6·4	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西南将領主張出兵反蒋。		会議(倫敦)(18日)。
	5·15	陆軍省宣布向华北增派軍队。	7·15	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奋等发表《团結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	5·3	法国大选，人民陣綫派获胜。
	5·18	恢复陆相現役制。	8·7	伪内蒙軍侵入綏远东部。	5·5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貝巴陷落。
	5·25	中野正剛組成东方会。	8·25	中共中央为实現一致抗日呼吁举行国共会談。	5·9	意大利发表吞幷埃塞俄比亚的宣言。
	6·10	国本社决定解散。	9·3	发生北海事件。	6·4	法国勃鲁姆人民陣綫内閣成立。
	6·15	内閣会議决定发展日"满"生产的五年計划。	9·16	国民党政府再次发布睦邻令。蒋介石同广西派妥协。	6·7	法国成立劳資"馬尼翁"协定。
	7·10	逮捕左翼文化团体成員。	9·17	国民党政府为討論华北問題召开杭州会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議》。	6·18	法国政府下令解散法西斯团体。
	7·12	与二·二六事件有关的軍官被处决。	11·10	日軍、伪内蒙軍再次侵入綏远，与傅作义軍交战。	6·21	德意通商协定签字。
	7·18	解除戒严令和战时警备令。	11·13	英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十万镑信用借款。	7·4	国际联盟决定撤消对意制裁。
	8·11	政府决定国策的基本原则和处理华北問題的綱要。	11·23	上海救国会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	7·11	德奥协定签字。
	8·25	政府发表全面革新政治的国策。	11·24	中国軍夺回百灵庙。	7·17	西班牙内战爆发。
	9·10	政府禁止陆軍工厂工人加入工会。	12·2	青島日本紗厂中国工人罢工扩大，厂	7·23	英埃軍事协定签字。
	9·21	陆海两相提出行政机构改革方案。日本向上海增派陆战队。			8·1	法国提議不干涉西班牙内战。
	9·25	帝国在乡軍人会改組。			9·4	西班牙卡巴勒洛内閣成立。
	10·17	大日本青年党成立，首領为桥本欣五郎。			9·9	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委員会开会(倫敦)。
	11·25	日德防共协定签字。			9·26	法国取消金本位制。
	12·15	时局协議会成立。			9·29	西班牙佛朗哥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10·14	比利时声明恢复中立。

1936 （昭和11年）	12·26 第七十次議会开幕（～1937年3月31日）。 12·27 日苏漁业条約临时协定签字。 12·31 华盛頓海軍裁軍条約失效。	主封闭各工厂。日本海軍陆战队在青島登陆。 12·12 張学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西安事变）。 12·16 国民党政府下令討伐張学良。 12·25 蔣介石被釋放，返回洛阳。	10·23 苏联声明援助西班牙共和国。 10·24 希特勒、齐亚諾会談，德意軸心成立。 11·7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迁往巴棱西亚。 11·18 德、意承認佛朗哥政权。 12·5 苏联通过新宪法。
1937 （昭和12年）	1·21 政友会議員濱田在議会中和寺内陆相发生冲突。 1·23 广田内閣总辞职。 1·25 宇垣一成奉命組閣，由于陆軍的反对，于29日辞退組閣。 2·2 林内閣成立，結城丰太郎任大藏相。 2·5 日本兴业銀行声明对軍需工业实行积极放款的方針。 2·9 池田成彬就任日本銀行总裁。 2·28 政友会鳩山一郎、前田米藏、島田俊雄、中島知久平就任代行总裁职务委員。 3·11 日本訪华經济代表团出发。 3·22 政府决定拒絕参加英国提議召开的裁軍会議。	1·8 中共中央通电要求停止内战。 1·27 "滿洲"实行外汇許可制。 2·10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五項要求。 2·21 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根絕"赤禍"和撤銷华北政权机构的决議。 3·1 "滿洲"公布帝位繼承法。 3·11 国民党政府勒令《文学月刊》、《新認識》、《讀書生活》等十三种刊物停刊。 4·15 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内和平、民主和对日抗战的《告全党同志書》。 4·27 关于划定中緬国界的中英談判結束。 5·1 "滿洲"公布重要产业統制法。	1·2 英意締結地中海君子协定。 1·8 美国禁止对西班牙輸出軍需物資。 1·14 德、意在罗馬会談（～22日）。 2·26 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委員会决定禁止招募和派遣志願軍。 3·25 意南簽訂政治协定。 4·1 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划。 4·26 德空軍轟炸介尔尼加。 5·1 美国修改中立法、采用"現金本国船"主义。 5·17 西班牙涅哥林内閣成立。 5·28 英国首相鮑尔溫辞职。張伯倫内閣成立。 6·22 法国旭当内閣成立。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37（昭和12）	3·25	日英、日美間交換收回永久租借地的照会。	5·3	中共全国代表会議在延安举行，毛澤东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	7·16	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中日战争的声明。
	3·31	众議院解散。	5·15	苏联通告廢除苏“满”航运协定。	8·6	美苏通商协定签字。
	4·9	日荷通商协定概要签字。	7·12	日軍占領天津車站。	8·10	美国提議調停中日冲突。
	4·12	日印通商协定概要签字。	7·13	延安全市各机关举行紧急会議。	8·21	中苏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4·14	内务省下令禁止庆祝“五一”活动。	7·19	蔣介石发表廬山談話，国民党政府承認陝甘宁边区。	8·	美国发生經济危机。
	4·23	东京市电車工人罢工进入高潮。	7·26	日軍当局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宋哲元拒絕日方要求。	9·10	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委員会在尼翁开会（—14日）。
	4·30	第二十届大选。	7·28	日軍占領北京，30日占領天津。通州事件爆发。	9·25	墨索里尼訪德（—29日）。
	4·	文部省发行《国体本义》。	8·1	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鈞儒等七人。	10·5	罗斯福发表“隔离侵略国的演說”。
	5·1	制定重要产业統制法。	8·9	上海发生枪杀大山大尉事件。	10·6	国际联盟譴責日本。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反对日本侵华。
	5·14	設立企划厅。	8·14	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宣言。	10·13	德比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5·28	民、政两党要求林内閣立即总辞职。	8·15	日本海軍航空队轟炸中国。	10·20	西班牙共和国政府迁往巴塞罗納。
	5·31	林内閣总辞职。	8·22	国民党政府将紅軍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为总司令。	10·29	德国拒絕参加布魯塞尔九国公約締約国会議。
	6·4	第一次近卫内閣成立。	8·25	中共中央公布《抗日救国十大綱領》。	11·3	布魯塞尔九国公約締結国开会（—24日）。
	6·25	大藏省发表財經三原則。			11·5	德国举行首脑秘密会議，决定对奥、对捷克方針。
	7·7	芦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开始。				
	7·11	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軍队。				
	7·13	日本商工会議所、帝国农会等声明支援政府。				
	7·25	第七十一次議会开幕（—8月8日）。				
	7·27	結城丰太郎就任日				

1937（和12年）

本銀行总裁。政府声明在华北采取"自卫"行动。
8·13 在上海的中日两軍发生冲突。
8·15 政府声明"懲罰"中国政府。
9·4 第七十二次議会开幕（－9日）。通过临时軍費預算案。
9·10 实行軍需工业动員法。临时資金調整法、輸出入品等临时措置法公布。
9·11 政府在日比谷公会堂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員演講大会。
9·12 政府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員实施綱要。
9·25 政府拒絕国际联盟諮詢委員会的邀請。
10·12 国民精神总动員中央联盟成立。
10·14 內閣設置参議。
10·17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决定在中日战争期間停止罢工和支持侵华战争。
10·25 設置企划院。
10·27 政府宣布不参加布魯塞尔九国公約会議。
11·16 举行防空演习。
11·20 設立大本营。
12·1 东京大学教授矢內原因"笔禍"辞职。

8·29 英国大使許格生在上海遭日本空軍扫射。
9·1 日本陆軍在上海登陆。
9·5 日本海軍封鎖中国沿海。
9·13 国民党政府向国际联盟控訴日本侵略中国。
9·19 日本空軍开始轟炸南京。
9·22 国民党中央通訊社发表国共合作宣言。
9·25 林彪指揮下的八路軍在山西平型关打垮日軍一个旅。中共中央发表告日本陆海空軍將士書。
10·12 国民党政府將南方紅軍改編为陆軍新編第四軍，任命叶挺为軍长，項英为副軍长兼政治委員。
10·15 晋北大同伪自治政府成立。
10·23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
11·5 日軍在杭州灣登陆。
11·7 晋冀察軍区司令部成立。
11·8 日軍占領太原。
11·20 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11·6 意大利参加日德防共协定。
11·19 希特勒、哈里法克斯会談。
11·29 意大利承認"滿洲国"。英、法在倫敦会談（－30日）。
12·11 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37（昭和12年）	12•11	全国产业团体联合会通过反对电力国家管理法案的决議。	11•22	伪蒙、察、晋三自治政府签訂蒙疆联合会协定。		
	12•14	末次信正就任内相。	12•2	德国駐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轉达日本提出的六項停战条件，調解中日战争。		
	12•15	鎮压日本无产党、日本工会全国評議会等（第一次人民陣綫事件）。	12•9	"满洲"公布貿易統制法。		
	12•22	日本无产党、全評被解散。	12•12	日軍击沉美艦巴納号，炮轟英艦萊的巴德号。		
	12•26	第七十三次議会开幕（—1938年3月27日）。	12•13	日軍占領南京，实行大屠杀。		
	12•27	日产財閥决定同伪满合办"满洲"重工业公司。	12•14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		
			12•24	日軍占領济南。		
	12•29	日苏漁业协定延长一年議定書签字。	12•25	中共中央发表时局宣言。		
1938（昭和13年）	1•11	御前会議决定对华国策和設置厚生省。	1•10	晋察冀边区召开全边区軍政民代表大会。日軍占領青島。	1•28	罗斯福向議会提出特别国防諮文。
	1•15	在朝鮮实行志願兵制。	1•30	伪冀东政府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合并。	2•4	希特勒更換国防軍高級將領，罢免外长牛賴特，委派里宾特洛甫繼任。
	1•16	近卫政府发表声明，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对手。	1•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創刊。	2•12	希特勒邀晤奥首相舒斯尼格。
	2•1	大内兵卫等工农派学者被捕（第二次人民陣綫事件）。	2•7	公布伪中国联合准备銀行条例。	2•14	国际反侵略大会在倫敦举行。
	2•8	日本經济联盟通过反对电力管理法案的决議。	2•10	"满洲"公布国家总动員法。	2•20	英外相艾登辞职。
					3•12	德軍侵入奥地利。
	2•10	对棉制品、原棉的輸出实行連鎖制。	2•	国民党反动派以陈立夫为首創办艺文社。	3•13	德国发表德奥合并宣言。法国勃鲁姆内閣成立。
					3•17	李維諾夫建議各国

1938 （昭和13年）	2·17 防共护国团占領政、民两党本部。 2·21 平生釟三郎担任华北派遣軍最高經济顧問。 3· 1 日本辛迪加銀行团向中国联合准备銀行提供一亿日元貸款。 3· 3 社会大众党党魁安部遇刺。 3·24 国家总动員法成立。 3·26 电力国家管理法成立。 5· 5 国家总动員法公布，部分实施。政府設立国家总动員审議会。 5·26 近卫内閣改組，宇垣一成、池田成彬、荒木貞夫入閣。 6· 3 板垣征四郎就任陆相。 6·10 內閣会議决定設立五相会議。 7·14 張鼓峰事件爆发。加强暴利取締令。 7·26 宇垣、克莱琪(英国大使)开始会談。 7·28 荒木文相向各帝大校长提示大学改革方案。 7·30 产业报国联盟成立。 8·10 重光、李維諾夫会談，签訂日苏停战	3·28 伪中华民国維新政府在南京成立。 4· 2 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綱領，决定組織三民主义青年团。 4· 8 国民党召开四中全会，公布国民参政会組織条例。 4·11 日本海軍占領厦門。 5· 5 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中共刊物发行。 5· 6 伪維新政府接收上海海关。 5·18 日軍占領徐州。 5·26 毛澤东发表《論持久战》。 6·11 国民党軍队炸毁黄河河堤。 7· 6 国民参政会在武汉召开。 7· 国民党勒令《新华日报》停刊。 8·17 駐华主要外交机构向重庆轉移完毕。 8·19 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解散十六个中共領导下的民众团体。 10·12 日軍在大亚灣登陆。 10·12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 10·21 日軍占領广州。 10·27 日軍占領武汉。 10·28 国民参政会在重庆	举行会談，阻止納粹的侵略。 3·24 張伯倫拒絕苏联的建議。 4·10 就德奥合并問題举行国民投票。法国达拉第內閣成立。 4·16 英意协定签字。 4·24 (捷克斯洛伐克)汉林在卡尔斯拔发表演說。 4·28 英、法在倫敦会談(—29日)。 5· 4 希特勒訪意(—7日)。 5·17 美国通过扩充海軍的法案。 6·30 英美法海軍协定签字。 7· 1 美国对日实行“道义上”的禁止輸出。 7·24 西班牙政府軍在厄布魯河实行反攻。 7·26 英国宣布派隆西門訪捷。 9· 5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决定对苏台德德人党的讓步方案。 9·15 希特勒、張伯倫第一次会談(波齐赫山宫) 9·21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英法的建議。 9·22 希特勒、張伯倫第二次会談(葛特斯堡)。 9·29 四国会談在慕尼黑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38（昭和13年）		协定。		召开第二次会議，并发表抗战声明。		举行（-30日）。
	9•27	五相会議决定設立对华中央机关。	11•7	华北开发公司、华中振兴公司成立。	9•30	英德发表共同声明。
	9•30	宇垣外相辞职。	11•12	日軍占領岳阳。	10•1	德軍进駐苏台德地区。
	10•8	大島浩就任駐德大使。	12•18	汪精卫、陶希圣、陈公博等从重庆飞到云南。	10•6	美国就中国的門戶开放原則向日本提出抗議。
	10•29	政、民两党协商开展重建东亚国民运动。	12•29	汪精卫发表“和平反共救国声明”。	11•10	法国人民陣綫崩潰。
	11•2	同国际联盟各机关完全断絕关系。农业报国联盟成立。			11•16	英国承認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
	11•3	政府发表关于“建設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11•17	英美通商协定签字。
	11•9	实行总动員法第十一条，引起問題。			12•6	德法发表共同声明。
	11•14	有田外相拒絕美、英、法关于开放长江的要求。			12•15	英美向蔣介石提供貸款。
	11•18	有田外相間接否認九国公約。				
	11•30	御前会議决定調整中日新关系的方針。				
	12•15	設置兴亚院。				
	12•22	近卫首相发表調整中日邦交的談話。				
	12•26	第七十四次議会开幕（-1939年3月26日）。				
1939（昭和14年）	1•4	近卫内閣总辞职。	1•8	汪精卫发表給蔣介石的公开信。	1•11	英国首相張伯倫訪意。
	1•5	平沼内閣成立。近卫文麿就任樞密院議长。	1•15	国民党政府停止支付外債利息。	1•20	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援蔣。
	1•16	东京帝大教授河合荣治郎“笔禍”事	1•20	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蒋介石兼任国民	1•26	西班牙巴塞罗納陷落。

1939（昭和14年）

件。

1·17 决定发展生产的三年計划。

1·28 东京帝大发生平賀"肃校"事件。

2·9 政府决定加强国民精神总动員措施。

2·22 社会大众党和东方会的合并計划流产。

3·30 日本宣布东西沙群島归日本領有。

3·31 公布工資統制令和限制雇用职工令。

4·1 公布关于临时增税的三項敕令。公布关于分配公司紅利和調剂資金的法令。

4·12 政友会中島、鳩山两派在总裁問題上发生对立。

4·14 大藏省决定实行扣发工資强制儲蓄制。

4·30 政友会革新派举行大会，中島知久平就任总裁。

5·3 政府向英、美大使提議改組上海公共租界管理机构。

5·20 政友会正統派举行大会，久原房之助就任总裁。

5·22 向青少年学生发布敕語。

6·5 政府决定关于签訂

参政会主席。

1·30 国民党召开五中全会。

2·10 日軍在海南島登陆。

2· 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2·24 "滿洲国"参加防共协定。

3·3 有关上海租界問題細目的协定签字。

3·8 中英宣布共同設立法币稳定資金（一千万鎊）。

3·11 中国伪临时政府禁止法币流通。

3·12 蔣介石通电全国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員运动，并公布总动員綱領、国民公約及其实施办法。

3·29 日軍占領南昌。

4·20 国民党封閉西安生活書店，全国各地开始查封生活書店。

5·11 諾門坎事件爆发。

6·12 国民党軍在湖南平江圍攻新四軍（平江事件）。

6·14 日軍封鎖天津英、法租界。

6·21 日軍在汕头登陆。

7·27 英国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提供三百万鎊稳定法币的貸款。

8·9 汪精卫通电蔣介石

1·30 苏联公布第三个五年計划。

2·15 英国公布龐大的軍事預算。

2·24 匈牙利参加防共协定。

2·27 英、法承認佛朗哥政权。

3·14 斯洛伐克发表"独立"宣言。

3·15 德国兼并波希米亚、摩拉維亚。

3·22 苏联建議召开各国和平会議。德国占領米美尔。

3·28 馬德里陷落，西班牙内战結束。

3·31 英国声明援助波兰。

4·1 美国承認佛朗哥政权。

4·7 意大利占領阿尔巴尼亚。

4·13 英、法声明保障希腊、罗馬尼亚的独立。

4·15 英苏正式談判。

4·19 西班牙参加防共协定。

4·25 英国决定实行征兵制。

4·28 德国廢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約和英德海軍协定。

5·3 苏联外长李維諾夫辞职，莫洛托夫繼任。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39 (昭和14年)		日德意軍事同盟的方針。		劝降。	5·12	英土互助条約签字。
	7·8	公布国民征用令。		德国駐华軍事顧問团撤退。	5·22	德意軍事同盟签字。
	7·12	日本反英运动高漲。	9·1	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張家口成立。	6·22	英、法举行远东防卫会議(—27日，在新嘉坡)。
	7·15	日英在东京开始会談。	9·16	諾門坎停战协定签字。	6·25	中苏通商条約签字。
	7·24	日英发表共同声明。劳动总同盟由于幷入产业报国联盟問題发生分裂。	10·10	中共中央发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	7·26	美国通知日本廢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約。
	8·14	华北日軍就日英会談表明强硬态度。		国民党制定“异党問題处理办法”。	8·13	英、法、苏举行軍事会談(莫斯科)。
	8·25	政府抗議德国違反防共协定。	10·17	“滿洲国”公布重要特产物专管法。	8·19	苏德通商条約签字。
	8·28	平沼內閣总辞职。	11·15	日軍在北海附近登陆。	8·23	苏德互不侵犯条約签字。
	8·30	阿部內閣成立。	12·2	中苏締結航空协定。	8·25	英波互助条約签字。
	9·4	政府声明不参与欧洲战爭。	12·30	汪精卫和日本締結調整中日关系的綱要。	9·1	德軍侵入波兰。
	9·7	梅津美治郎就任关东軍司令官。			9·3	英、法对德宣战。
	9·12	設立中国派遣軍总司令部。			9·5	美国声明保持中立。
	9·19	公布九·一八物价冻結令。			9·6	德軍占領克拉科夫。
	9·25	野村吉三郎就任外相。			9·17	苏軍进駐波兰。
	9·30	制定关于統一掌握国家总动員法施行的敕令。			9·26	法国政府下令解散法国共产党。
	10·4	外务省事务当局反对設置貿易省。			9·27	华沙陷落。
	10·13	政府在設置貿易省問題上讓步。			9·28	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約签字。
	10·18	政府把工資、租金			9·29	苏德締結关于划定国界的协定。
					10·3	汎美会議发表巴拿

1939 昭 和 14 年 ）	等冻結在九·一八的水平。 10·24 以美元为計算标准的新汇兌协定签字。 11·1 設置舞鶴鎮守府。 11·4 野村、格魯开始会談。 11·6 农林省制定强制收購粮米的命令。 12·1 禁止食用白米。 12·4 阿部首相就处理中国事变問題和五党魁会談。 12·18 野村外相声明开放长江和珠江。 12·26 第七十五次議会开幕（—1940年3月27日）。部分議員要求阿部內閣总辞职。实施取締黑市等法令。 12·31 日苏漁业临时协定签字。		馬宣言。 10·5 英德在赫耳果兰海面进行海战。 10· 苏联—拉脫維亚互助条約签字。 10·6 希特勒向英国提議举行和平談判。 10·10 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約签字。 10·12 苏芬开始談判。英国拒絕德国关于举行和平談判的建議。 10·18 苏軍进駐爱沙尼亚。 11·4 美国修改中立法，廢除禁止輸出武器的条款。 11·8 希特勒遇刺（慕尼黑）。 11·14 苏軍进駐立陶宛。 11·26 苏芬国境发生冲突事件。 11·30 苏芬战争爆发。 12·13 英德在烏拉圭海面进行海战。 12·14 国际联盟决定开除苏联盟籍。
1940 （昭 和 15 年 ）	1·7 二百七十六名議員联名提出对內閣不信任案。 1·8 政府决定对华基本政策，烟陆相要求內閣妥善处理中国問題。 1·14 阿部內閣总辞职。 1·16 米内內閣成立。	1·15 毛澤东在《中国文化》創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論》。 1·23 汪精卫、王克敏、梁鴻志在青島会談，商定成立伪"中央政府"。 2·1 延安各界組成宪政促进会。	1·1 英国延长兵役年限。 3·12 苏芬媾和。 3·18 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勃倫納隘举行会談。 3·30 美国声明不承認汪伪政权。 4·9 德軍侵入挪威、丹

年	月/日	日本	月/日	东方	月/日	西方
1940	1·21	英艦捜査日本輪船淺間号。	2·	陝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举行第一次大会。		麦。
（昭和15年）	1·23	末次信正、松岡洋右等辞去内閣参議职务。	3·12	汪精卫发表"和平建国宣言"。	4·13	罗斯福对德提出抗議。
	1·26	日美通商条約失效。	3·30	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5·10	德軍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2·2	众議院議員斋藤隆夫批評对华政策，造成政治問題。	3·	上海各界成立宪政促进会。		英国張伯倫内閣总辞职。
	3·7	众議院取消斋藤隆夫的議員資格。	4·1	国民参政会举行第五次会議。	5·14	德軍攻破色当要塞。
	3·8	社会大众党开除在議会討論取消斋藤議員資格时未出席的片山哲等八名議員的党籍。	4·6	汪伪政权宣布重庆所締結的条約无效，向全中国軍队发出停战命令。	5·15	荷兰对德投降。
	3·21	社会大众党党魁安部磯雄脫党。		中共中央以毛澤东的《新民主主义論》为新綱領。	5·16	英国丘吉尔内閣成立。
	4·1	任命阿部信行为"駐华大使"。	5·2	国民党政府宣布改組东北四省政府。	5·19	法国雷諾内閣改組。
	4·15	政府声明不容許改变荷領印度支那的現状。	6·9	諾門坎"满"蒙边境談判达成协議。	5·28	比利时对德投降。
	4·22	发表陆軍軍需工厂适当利潤計算綱要。	6·20	法屬印度支那当局答应禁运援蒋物資。	6·4	英軍从敦克尔克撤退。
	5·7	安部磯雄等人筹組勤劳国民党未获批准。			6·9	法国政府迁往土倫。
	5·10	决定强制收購粮米措施。			6·10	意大利对英、法宣战。
	5·31	政府决定廢除官吏身份保障制。			6·14	德軍攻陷巴黎，法政府迁往波尔多。
	6·1	木戸幸一就任内大			6·16	法国貝当内閣成立。
					6·17	法国对德投降。
					6·18	戴高乐声明抗德。
					6·22	德法签訂停战条約。
					6·24	意法签訂停战条約。
					6·28	苏軍进駐比薩拉比亚、北布科維納。

1940 （昭 和 15 年）	臣。 实行糖、火柴凭票購买制。 6• 4 樞密院議长近卫就新体制发表談話。 6•11 貫徹"圣战"議員联盟劝告各党魁实行解散政党。 6•12 日泰友好和亲条約签字。 6•18 政府要求法屬印度支那当局禁运援蔣物資。 6•24 樞密院議长近卫辞职，声明致力新体制运动。原嘉道就任樞密院議长。 6•30 有田外相的广播演説造成政治問題。		

附录(二) 資料

国策的原則

(1936年8月7日,日本内閣五相会議决定)

一、国家的根本政策,是在大义名分之下,内求国基的巩固,外謀国运的发展,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質上都成为东亞的安定勢力,确保东方的和平,为世界人类的安宁和福利作出貢献,以实現建国的理想。

帝国鉴于国内外的形势,認为帝国应該确立的根本国策是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之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亞大陸上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发展。其原則綱要如下:

1. 排斥列强对东亞的覇道政策,根据眞正的共存共荣主义,共享幸福,是为皇道精神的表現,亦为我国在对外发展政策上应予貫徹的指导精神。

2. 为謀求国家安泰与发展,使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質上确保作为东亞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軍备。

3. 大陸政策的基本点是謀求"滿洲国"的健全发展,巩固日"滿"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現日"滿"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經济发展。在执行上述政策时,应注意保持与各国的友好关系。

4. 向南洋,特别是外南洋方面,謀求我国民族的經济的发展,力图避免刺激其他国家,逐步以和平手段扩張我国势力,并同"滿洲国"的建設相配合,充实和加强国力。

二、以上述根本国策为基础,統一調整內外各項政策,以期适应現今的形势而全面革新政治。其綱要如下:

1. 扩充国防軍备

(甲)陸軍軍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l

在"滿"朝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

(乙)海軍軍备应以对抗美国海軍,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充实足够兵力。

2. 我国外交政策,应根据完滿施行上述根本国策的精神全面加以革新。为使外交机关的活动有利而灵活地进行,軍部应进行內部援助,避免出面活

动。

3. 政治行政机构的革新和改进，財政經济政策的确立，其他各种設施的經营管理，必須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为此，关于下列事項，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甲）指导和統一国內的輿論，使其在突破非常时局方面，巩固国民的决心。

（乙）为了发展执行国策所必需的产业和貿易，应对行政机构和經济組織，加以适当的改革。

（丙）在稳定国民生活、增强国民体力和健全国民思想方面，应采取适当措施。

（丁）为謀求航空和海运事业飞速发展，应采取适当措施。

（戊）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要的重要資源和原料的自給自足方策。

（己）在改革外交机关的同时，充实情报宣傳組織，加强外交活动和对外文化活动。

（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上卷附录）

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防共协定）

（1936 年 11 月 25 日在柏林签訂，同月 27 日公布）

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一致認为，共产国际（所謂 Commintern）的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現有国家进行破坏和压迫；并确認：对于共产国际干涉各国的国内事务熟視无睹，不仅会使各国国内的安宁和社会的福利瀕于危險，且将使世界的普遍和平遭到威胁。两国政府願同心协力，防范共产主义的破坏。为此特签訂如下协定：

第一条　締約国双方商定，就互相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进行协商，并以紧密的合作完成上述措施。

第二条　締約国对于国内治安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卫措施，或进行共同劝导，使其参加本协定。

第三条　本协定書以日文本和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自签訂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間訂为五年。締約国应在期滿前的适当时期，就以后两国协作的形式，进行协商。

下列签字人各奉本国政府的正式委任，在本协定書上签字盖印，以昭信守。

本协定書制成两份，締約国双方各执一份。

昭和11年11月25日，即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全权代表签字从略）

补充議定書

在防共协定签字的今天，下列全权代表締結如下协定：

（甲）两締約国的有关当局，在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对共产国际采取揭发和防范措施方面，进行密切合作。

（乙）两締約国的有关当局，对于在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間接为共产国际服务，或助長其破坏工作者，应在現行法律范圍內，采取严厉措施。

（丙）为便于（甲）項所規定的两締約国的有关当局进行合作，成立常設委員会。常設委員会負責研究和协商为防止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应行采取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措施。

昭和11年11月25日，即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全权代表签字从略）

防共协定的秘密补充协定

大日本帝国政府和德国政府一致認为，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正在为实現共产国际的目的而努力，且将为此而使用其軍队；并确認：上述事实，不仅对締約国的存在，对全面的世界和平，亦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为了維护共同的利益，特締結如下协定：

第一条　兹約定締約国之一方，未經挑衅即受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攻击，或未經挑衅即受到攻击的威胁时，締約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可使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以減輕其負担的一切措施。

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締約国为了維护共同的利益，应就所应采取的措施，立即进行协商。

第二条　締約国在本协定有效期間，未經締約国另一方的同意，不得和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締結与本协定的精神相抵触的一切政治性条約。

第三条 本协定書以日文本和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与本日簽訂的“防共协定”同时生效，其有效期間亦同。

下列簽字人各奉本国政府的正式委任，在本协定書上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本协定書制成两份，締約国双方各执一份。

昭和11年11月25日，即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全权代表簽字从略）

（秘密补充协定系根据“远东国际軍事法庭記录”第173号）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針（御前会議議題）

（1938年1月11日）

帝国一貫的方針是同“滿洲国”和中国合作，形成东方和平的軸心，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貢献。根据上述方針，处理此次中国事变的最后目标是消除日华两国間过去的一切矛盾，从大处着眼重建两国邦交，互相尊重主权和領土，以达到融和一致。首先，应建立必要的保障，防止事变重演，并在两国之間明确約定下列各項：

一、日“滿”华三国根絕破坏相互間友好关系的政策、教育、交易及其他一切措施和足以招致上述恶果的行动。

二、日“滿”华三国共同謀求文化合作和防共政策的实現。

三、日“滿”华三国相約在产业經济方面，根据取長补短、有无相通的精神，进行互惠互助

根据上述方針，帝国将运用紧密結合的政略和战略，謀求下列各項的妥善实行。

（1）中国現中央政府如在此时反省悔悟，誠意求和，則根据另項（甲）的日华媾和条件进行談判。帝国今后如确認中国方面已切实执行和約条款，将廢除媾和条件中的保障条款另項（乙），并进而对中国的复兴和发展予以衷心的协助。

（2）如果中国現中央政府不求和，則帝国在今后不再期待以此政府为对手来解决事变，将扶助中国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其协商调整两国邦交，并协助新生中国的建設。对于中国現存的中央政府，帝国在力促其潰灭的同时，采取措施，使其归并于新兴中央政权。

(3) 为了处理这次事变，应付国际形势的轉变，并貫徹上述方針，应促进国力、特别是国防力量的迅速提高和充实，并保持和改善同第三国的友好关系。

(4) 尊重第三国的权益，在对华經济发展上，專以自由竞爭来获得优越地位。

(5) 指导輿論，使国民徹底領会处理事变根本方針的精神。

在对外宣傳方面也采取同样措施。

另項(甲)

日华媾和条件細目

一、中国正式承認"滿洲国"。

二、中国放弃"排"日和反"滿"政策。

三、在华北和內蒙設立非武裝地区。

四、为实現日"滿"华三国的共存共荣，应在中国主权范圍以內在华北設立适当的机构，并授与广泛的权限，以便实現日"滿"华經济合作。

五、在內蒙古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应与現在的外蒙古相同。

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并对日"滿"两国执行同一政策进行协助。

七、在华中占領地区設立非武裝地帶。日华两国共同协力維持大上海市的治安，并发展其經济。

八、日"滿"华三国就开发資源、关稅、貿易、航空、交通、通信等項，締結必要的协定。

九、中国对日本进行必要的賠償。

附記

(1) 为了保証上述条目的执行，在华北、內蒙和华中的特定地区，于必要期間駐扎日本軍队。

(2) 日华两国成立上述协定以后，停战协定即开始执行。如果中国政府誠意执行上述各項条款，对于我方关于日华两国互助合作的理想采取眞正合作态度，帝国将廢除协定中的保証条款，并准备进一步对中国的复兴和发展、国民的願望，予以衷心的协助。

另項(乙)

另項(甲)中的保証条款如下：

(1) 第三項內的非武裝地帶。

(2) 在进行有关第四項的交涉时我方提出的旨在保証协定执行的特殊

权益、以及为保持这种权益而必須保留的机关。

(3) 第七项内的非武装地带。

(4) 附記(1)内的駐軍兵力及有关軍事設施，同主要交通綫的管理、扩充有关的权益。

二、(1)何梅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秦德純一土肥原协定，上海停战协定。

(2)在廢除保証事項的同时，考虑廢除以往所有的在华特殊权益(例如治外法权、租界、駐兵权等)。

(青木得三:《太平洋战争前史》第3卷)

帝国政府声明

(1938年11月3日)

兹承陛下皇威，帝国陸海軍已攻克广东、武汉三鎮，平定中国重要地区。国民政府已退为地方政权。然而，如果国民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国决心把它击潰，否則决不收兵。

帝国所企求的，是建設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次征战的終极目的，亦在于此。此种新秩序的建設，应以日"滿"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經济、文化各方面建立互助关系为重点，而以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实現經济結合为目标。这将对安定东亚和世界进步有所貢献。帝国所期望于中国者，在于分担此种建設东亚新秩序的任务。帝国希望中国国民能理解我国眞意，以与帝国协力。当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針，更换人事，改途易轍，参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亦不拒絕。

帝国确信，各国亦将正确理解帝国之眞意，而采取与东亚新形势相适应的态度。在这个問题上，帝国对于盟国的深情厚誼，表示深切謝意。

东亚新秩序的建設，淵源于我国的建国精神，完成这一建設，是現代日本国民的光荣任务。

帝国必須在国内各方面进行革新，力求充实国力，排除一切困难，为完成此一事业而迈进。

特此声明帝国一貫的方針和决心。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編:《中国事变有关文件集》第3号)

調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針(御前会議議題)

(1938年11月30日)

日"滿"华三国应在建設东亞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善邻互相結合，并以成为东亞和平的軸心为共同目标。为此，規定基本事項如下:

一、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滿"华一般合作原則，其中包括善邻友好，共同防卫和經济合作的原則。

二、在华北及"蒙疆"設立国防上和經济上(特别是資源的开发利用)的日华高度合作地区。

在"蒙疆"地方，除上述以外，日本应取得以防共为目标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三、在長江下游設立日华在經济上的高度合作地区。

四、日本在华南沿海島屿上取得特殊地位。

有关具体事項以另項規定为依据。

另項

調整日华新关系的主要事項

第一、关于善邻友好原則的事項:

为使日"滿"华三国互相尊重固有的特点，而又融合一致，互相合作，以确保东亞和平，并眞正实現善邻友好，应在各方面采取互相合作和促进友好的措施。

一、中国承認"滿洲帝国"，日本和"滿洲"尊重中国的領土和主权，日"滿"华三国重建邦交。

二、日"滿"华三国在政治、外交、教育、宣傳、貿易等方面廢除破坏友好的措施，消除及永远根絕破坏友好的原因。

三、日"滿"华三国实行以相互合作为基础的外交，在同第三国的关系上，不采取違反上述宗旨的任何措施。

四、日"滿"华三国在文化的沟通、創造和发展上互相合作。

五、"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主义来規定。

"蒙疆"訂为高度防共自治地区。

上海、青島、厦門根据旣定方針分别划为特别行政区。

六、日本向新中央政府派遣少数顧問，协助"新中国"进行建設，特别在

高度合作地区及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配置顧問。

七、隨着日"滿"华善邻关系的实現，日本考虑逐步归还租界和撤消治外法权等。

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則的事項：

日"滿"华三国共同防共，并在維持共同治安方面，互相合作。

一、日"滿"华三国在各自領域內消灭共产分子組織，并在有关防共的情报宣傳方面，进行合作。

二、日华实行共同防共。

为此，日本在华北及"蒙疆"的重要地区駐扎必要的軍队。

三、此外，日华締結防共軍事同盟。

四、第二項所列地区以外的日本軍队，应适应全面的和局部的形势，尽量早日撤退。

但为了保証协定的执行，而在华北及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駐扎的軍队，应在治安确立以前，繼續駐扎。

为了維持共同治安，在長江沿岸特定地点、华南沿岸特定島屿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地点，駐扎若干艦船部队，在長江和中国沿海，日本拥有艦船航泊的自由。

五、中国对于日本的以协助上述治安工作为目的的駐兵，負有財政上的协力义务。

六、日本对于駐兵地区內的鉄路、航空、通信設施以及主要港口、水路，保留根据軍事上的需要提出要求的权利和进行监督的权利。

七、中国应改革和整編警察和軍队，同时，在向日本軍队駐扎地区配置軍警和軍事設施时，暂时以治安上和国防上所需要的最低数量为限。日本对于中国軍队和警察的建設，以派遣顧問、供給武器等办法，予以协助。

第三、关于經济合作原則的事項：

日"滿"华三国为实現互助合作和共同防卫，在产业經济等方面应根据取長补短、有无相通的原則，实行互惠互助。

一、日"滿"华三国就資源的开发、关税、貿易、航空、交通、通信、气象、測量等，締結必要的协定，以实現上述宗旨及以下各項。

二、关于資源的开发利用，在华北"蒙疆"方面，以寻求日"滿"两国所缺乏的資源，包括地下資源为政策措施的重点，中国应根据共同防卫和經济合作的观点，对此提供特殊便利。在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資源的开发，也应根据

經济合作的观点，提供必要的便利。

三、在一般产业方面，日"满"两国尽可能尊重中国方面的生产事业，日本且予以必要的援助。

帮助中国改良农业，以利于中国民生的安定，并扩充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資源。

四、对于中国制定財政經济政策，日本予以必要的援助。

五、在貿易方面采用适当的关税和海关制度，以全面促进日"满"华之間的通商，并使日"满"华，特别是日"满"同华北之間的物資供求趋于便利与合理。

六、对于中国发展交通、通信、气象和測量事业，日本将提供必要的援助和合作。

以发展全中国的航空，建設华北的鉄路（包括隴海綫），发展日华間及中国沿海的主要海运、長江的水运和华北及長江下游的通信事业作为日华交通事业的重点。

七、通过日华的合作来建設新上海。

附：

一、中国应补偿自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遭受的权利、利益上的損失。

二、第三国在中国的經济活动和权益，由于日"满"华經济合作的加强，当然要受到限制。但上述經济合作的加强，主要限于保卫国防及国家独立所必需的范圍以內，并非要超过以上范圍，而不当地排斥和限制第三国的活动和权益。

（原田熊雄：《西園寺公和政局》第7卷）

近卫首相关于調整日华邦交的談話

（1938年12月22日）

日本政府，如同在本年內发表的再一次声明中所表明的，一貫堅持对抗日的国民政府进行徹底的武力扫蕩，同时，和中国具有远見的人士合作，共同为建設东亞新秩序而迈进。目前，有迹象表明，在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已澎湃而起，建設的气氛愈趋高漲。在这里，政府为了使內外各方面徹底了解帝国的眞意，特宣布同新中国調整关系的根本方針。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設东

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而結合起来，共同謀求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經济合作的实現。为此，中国方面首先要清除旧有的狭隘观念，停止抗日的錯誤行动，并放弃对"滿洲国"的成見。

日本坦率地要求中国方面积极彻底地調整两国邦交。其次，因为在东亚的范圍內不能容許"共产国际"势力的存在，所以，日本認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締結日华防共协定，实为調整日华邦交的重要措施。鉴于中国的現状，为充分保証防共目的得以实現，特要求中国同意日本在防共协定有效期間在特定地点駐扎軍队，并将內蒙地区划为特殊防共地区。在日华經济关系上，日本并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經济上的壟断。而对于理解东亚新形势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善意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想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帝国的眞意只是企求日华的合作收到实效。这就是說，日本站在同中国平等的原則上，要求中国承認帝国臣民在中国內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以便增进日华两国人民的經济利益。并且，鉴于日华两国間历史上、經济上的关系，特别要求中国在华北和內蒙地区資源的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日本所要求于中国的大致如上所述。如果仔細体会日本出动大軍的眞意，就会明了，日本求之于中国的既不是区区領土，也不是賠偿軍費。

日本只是要求中国作为建設新秩序的分担者，提供为完成这項任务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保証。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于中国完成独立所必需的撤銷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也願加以积极的考虑。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編：《中国事变有关文件集》第3号附录）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太平洋战爭史» 第二卷 «中日战爭»
1953年11月15日
东洋經济新报社出版

·內部讀物(甲类)·
太　平　洋　战　爭　史
第二卷　中日战爭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編　金鋒等譯

商　务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7号)
新华書店发行
京华印書局印装
統一書号11017·[illegible]7

1961年2月初版　　开本850×1168 1/32
196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97千字
印張7 9/16　　印数1－2,000册
定价(9)1.10元

統一書号: 11017·97
定　　价: 1.10 元